

● 《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学术期刊引领力”论坛

# 肩负学术使命,传播体育价值,引领学术潮流

## ——《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学术期刊引领力”论坛综述

刘米娜<sup>1</sup>, 杭春梅<sup>1</sup>

**摘要** 把握学术发展脉动和走势、占领国内外学术领域的制高点、发挥引领学术潮流作用一直是学术期刊奋斗的目标。《体育与科学》杂志于2017年3月11日举办了以“学术期刊引领力”为主题的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对杂志发展及其在体育学科建设中如何有效发挥学术引领力等重要问题进行学术对话。专家们建议期刊要坚守学术本真,传播体育学术价值,肩负“顶天立地”的学术使命;坚持跨界性、思想性与开拓性的传承,走出具有独立风格的创新发展之路;加强人才队伍和期刊平台建设,积极探索灵活的商业模式,构建良性期刊体制创新机制,助力学术引领;坚持走数字化出版转型与融合的信息化和“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化之路,提升学术质量和竞争力,引领规范学术风尚,构建本土体育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促进中国体育学的繁荣与发展,推动中国体育学术走向世界。

**关键词** 学术引领;学术使命;学术价值;学术潮流;学科建设;创新;国际化;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90(2017)03-0001-08

## Undertake Academic Missions, Transmit Value of Sports, Lead Academic Trends: Review of the Forum on “Leading Power of Academic Journals”

LIU Mina<sup>1</sup>, HANG Chunmei<sup>1</sup>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To track on the frontiers and the directions of the research fields and lead the treads of research are the goals of academic journals. The academic workshop of Journal of Sports and Science sponsor a 2017 Spring Forum to discuss the topic on “The Leading Power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March 11th, 2017. During the forum, the editors and peers reviewer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 of Sports and Science and some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how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disciplines. The experts suggest that the academic journals should stick to the academic nature, transmit value of sports and undertake academic mission, inherit the style of cross-border, open-up and innovation. Experts also advis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eam and journal platform, more extensive and flexible business Model? Are the most important leading? Drives of academic leading power. The networking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cademic periodical is growing trend in this information age. “Bringing in, going out” and integration of print and digital publish, are the essential ways to enhance academic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journal. This discuss is to ke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the sports disciplines in China, dialogue with the global academics and lead the academic trends.

**Key words** academic leading; academic mission; academic value; academic tre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收稿日期**: 2017-04-15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镇化进程中体育参与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项目号: 16BTY02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公民导向”理念下县域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体系研究》,项目号: 3091501AE15001\_05;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体育学术期刊定位与办刊模式革新研究》,项目号: 16YJA890006。

**作者简介**: 刘米娜(1978-),女,广东河源人,副教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资本和体育社会学。

**作者单位**: 1. 南京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南京 210094。

2016年,《体育与科学》以学术性与思想性并重为责,紧扣时代发展和要求,积极策划选题,设置特色专栏,推动数字化传播,着眼体育学方法建设,极大丰富了期刊的内涵。然而,“科学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需求对作为学术成果的传播载体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学术期刊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功能和定位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sup>①</sup>此外,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学术期刊面临诸多挑战:传统纸质期刊出版不断萎缩,高水平论文稿源国内外竞争愈发激烈,读者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在这些机遇和挑战面前,《体育与科学》如何能成功转型升级保持长足发展后劲,坚守学术研究本真,肩负引领学术潮流的使命责任?为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扩大杂志的学术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2017年3月11日,《体育与科学》编委会——编委会主任陈刚(江苏省体育局局长)、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彤(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和其他编委召开了“学术期刊引领力”论坛。同时,编委会还特别邀请了杂志外审专家国家体育科学研究所冯连世副所长、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丘海雄教授、扬州大学体育学院颜军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金大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贾齐教授、上海体育学院路云亭教授参加“学术期刊引领力”论坛,探讨《体育与科学》杂志发展及其在体育学科建设中如何有效发挥学术引领力等重要问题。

## 1 期刊定位:肩负“顶天立地”的学术使命

学术期刊不仅是学术传播的载体,还是参与学术与共谋学术发展的平台,在引领学术潮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大学术名刊发表大量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为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确立了学术典范,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曾发起和推动的一场又一场学术论战和重大讨论,引领学术潮流,影响深远<sup>②</sup>。学术期刊怎样才能引领学术潮流?丘海雄认为,《体育与科

学》杂志要发挥其引领力,首先要认识到转型期中国体育学科发展中杂志的学术使命。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体育学术发展主要要做到“三个面对”:一要面对国家重要战略,即学术的发展要服务于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二要面对学科发展前沿;三要面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于学术发展的第一个“面对”——国家重要战略,丘海雄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重要战略有三个。第一个是区域发展战略,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体化。学术发展的回应应该围绕区域发展战略展开,在体育学科在区域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体育发展是否存在区域区隔,有无实现体育资源均等化等方面引领研究议题。第二个是创新发展战略。那么在此背景下,体育技术、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应当如何推陈出新都是值得探讨的方向。第三个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战略。他认为,“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实际上吸取了当年美国发展经验教训。美国政府早期将资源大力投在医疗上,然而对全民健康的贡献却不大,反而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在改变发展战略,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增强民众参加体育活动意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世界卫生组织对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医疗因素对健康的贡献率只有8%,而生活方式占到60%,其中体育锻炼是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体育和医疗的关系、体育对健康的作用等议题还有待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对于改变目前医疗为大的“健康中国”格局大有裨益。

“学术研究要服务于国家重要战略”观点受到在座专家的认同,尤其是“健康中国”的战略下《体育与科学》杂志如何引领体育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冯连世、颜军、金大陆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冯连世提出,“健康中国”背景下的全民健康、体医融合、体育是否能成为主导,这样的问题应该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下展开研究。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体育界对“健康中国”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运动可以促进健康仅仅是经验之谈,也缺乏医学界大量的追踪性、临床的关于运动与健康因果机制分析的实证研究。这样的体育学术研究现状导致决策层对“运动促进健康”的理论与实证结果不认可。“空白也是机遇,”冯连世进一步强调,“近几年,谁占据这个问题的理论至高点,谁就能够占

①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Z]. 新华网, 2016-05-18.

② 张耀铭. 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Z]. 爱思想网, 2016-04-27.

据以后学术的至高点!”而《体育与科学》可借助“学术工作坊”的优势,引领健康中国的理论、方法与对策的相关研究。对此,金大陆也十分赞同,利用“学术对话录”、“学术工作坊”等特色栏目引领“健康中国”前沿问题研究,体现出《体育与科学》杂志对社会的贡献。此外,颜军和冯连世认为,对于体育界而言,国家重要战略不仅仅是“健康中国”,还有体育战略与重大体育事件,如竞技体育重大事件、举国体制、体育体制改革、体育产业等,参与体育重要战略和重大体育事件讨论与研究既可以为重大事件积累资料,又可以扩大刊物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

对于学术发展的第二个“面对”——学科发展前沿,丘海雄认为,前沿不仅仅具有“新颖性”,还要强调重要性、核心性。比如体育社会学中的永恒主题——体育领域中的社会平等问题,如运动员有无平等成功的机会,公众有无平等的体育参与机会,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形成社会机制如何影响了体育不平等。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要重点把握什么是热门的学术议题中可持续的又具有新意的核心研究问题,体育科学中不同分支学科中的核心问题,还要把握好核心和前沿的关系。在颜军看来,学科发展前沿问题是“导向性”。这意味着《体育与科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发挥引导作用,所刊登的论文应该能够反映学科、专业、行业中高水平的、最新的、创新性高的成果,能够反映学科未来的发展动态、趋向,代表学科发展的前沿。对于学术发展的第三个“面对”——地方政府社会经济需求,丘海雄表示,这是学术期刊对本地的关怀需求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

“‘三个面对’既有学术方面的要求,也有应用上的需要,同时涉及‘顶天’还是‘立地’的问题。”丘海雄进一步总结,学术界对于“顶天”和“立地”问题总是争执不休,要么做“阳春白雪”、纯学术的“顶天”研究,要么做“下里巴人”、应用性的“立地”研究。在他看来,作为专业的学术杂志,学术研究是主业,但是也不能脱离为地方政府服务、为国家服务的应用研究。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相互促进发展的,没有理论指导做不出好的应用研究,做学术研究的完全脱离应用研究也会失去研究的机会和市场。为此,丘海雄献言:“既‘顶天’又‘立地’,在顶天立地间走出一条学术杂志的发展之路,这也是学术期刊的学术使命。”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他建议可以在将来引领和鼓励具有政策性价值的学术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和现象的因果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当然,政策建议的撰写要具备公共政策的理论知识,提

出切实可行、可持续、合理、合法、公平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平衡“顶天立地”的学术使命。编委会主任陈刚从政策层面提出殷切的期盼:“健康中国”战略下的体育研究要拿出真正有分量的实证成果支撑“运动促进健康”的理论,切实为实践服务。

## 2 发展战略:信息化时代下的创新与国际化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的引入,传播科技对于学术期刊的结构形态和业态环境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与变革。如何适应新的媒体环境,保持和扩大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和引领力,是摆在学术期刊面前的当务之急。

“创新和国际化是发展的双引擎,学术期刊的发展也要依靠创新和国际化!”这是丘海雄多年珠江三角洲企业研究的经验总结。据他观察,企业在金融危机后能够成功转型升级的最重要动力一是创新,二是走国际化发展道路,这样的转型升级战略同样适用于学术期刊。对于学术期刊如何走向国际化,丘海雄不吝道:“学习经济领域的国际化经验——‘引进来,走出去’,走出去即并购,购买国外技术。”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总期望进行国外合作,获得国际资助,学习前沿的理论和方法,而现在形势有所逆转。此外,国内还有的优势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而我们身处其中更了解自己的市场,国外学者来中国做研究,反而是他们期望与我们进行合作。在这样的机遇和形势下,学术期刊要主动走出去,让中国的研究成果影响世界,从而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最后,他也抛出了一些思考问题:如何进行国际化,国际化的渠道是什么,国际化的方法是什么?冯连世对“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化路径进一步进行了阐述:引进来是要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开展学术讲座、研讨和合作研究,走出去是指学术期刊开展国际合作,推广期刊。

国际化“话匣”一打开,掀起在座专家的一股讨论热潮。与两位专家期刊组织国际化的视角不同,颜军、金大陆和路云亭从期刊学术发展角度提出建议,《体育与科学》“学术对话录”、“学术工作坊”和“特邀论坛”特色栏目应做好国际化。颜军认为在信息化时代下,《体育与科学》在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方面已经起到引领作用,具备加快国际化进程的条件,下一步可以加快国际化进程,将高质量文章推向世界,否则没有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只能把好的文章、好的作者局限在国内。他认为,《体育与科学》一些经典的栏目实际上可以跟国际学者平等对话,而且具有话语权,比如体育文化、奥

林匹克、妇女体育、体育方法论这样的议题不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完全可以将这样的成果推向国际学术界,让《体育与科学》成为理论创新的阵地,学术成长的摇篮。金大陆也非常赞同利用特色栏目做大做强期刊,提议要大力拓展访谈的对象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国际体育界的学者,还可以扩大到体育项目的领导者,如国际田联、泳联等国际体育组织的管理专家。而路云亭则认为国际学术对话的形成在于文章的学术话题和议题是不是具有世界级的内涵。

那么期刊在国际化引领过程中仅仅起到平台作用吗?金大陆和路云亭不约而同地提出要重视学术期刊主编和编辑在学术引领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对学术传播应具有独到的学术敏感性,能敏锐地捕捉到前沿性的关键问题。因此可以围绕一些世界级的大选题进行细化策划与组织,深入开展学术研讨、交流等系列活动,通过研究问题,引领思想碰撞,形成学界合力,推陈创新,并通过学术期刊及时、充分、快速地传播,真正发挥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的功能。

新的发展时期,互联网异军突起,在危机与机遇中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每个企业都力图打造“互联网+”工程,加上移动设备的普及,新媒体的发展顺势而上,公众的阅读方式渐渐改变,轻松的浅阅读和快捷的视频传播成为主流。对于学术期刊来说,数字化既要顺应的大潮流,但厚重的学术研究该如何适应时代变化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体育与科学》杂志在网络化方面已经展开了相关的工作,采用优先数字出版平台,开设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讯息,等等。专家们在于予以肯定的同时还对未来的期刊信息平台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认为应重点增强期刊文章的传播速度、范围和时效性。冯连世首先指出,纸质期刊的发行量和阅读量都在下降,读者更多是网络下载、阅读和引用,阅读量、下载率、引用率替代发行量成为期刊运作和发展的重要指标。而在信息化背景下,要快速提高阅读量、下载率和引用率就要进行期刊平台的网络化、电子化建设。因此,他郑重建议:“在下一步的发展中考虑如何加快网络化进程,提高期刊跟读者见面的速度和时间。”不约而同,颜军亦强调:提高刊物的时效性和扩大受众面,能够扩大刊物的学术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紧接着,他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建议:要改变期刊网络平台阅读较为滞后和单一目录的现状,可以在内容上考虑扩大,把每一期的摘要放上去,让读者能够尽早地了解论文的基本情况;此外,期刊还可以加强微信公众号建设。他认为,目前期刊的微信公众号涉及

面还很窄,但完全可以将其打造成一个交流的阵地,把每一期的目录和一到两篇重点文章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早地推送出去,不失为期刊扩大受众人群一个好方法。

### 3 独立风格:转型升级下的学术传承与创新

学术期刊从创刊起,就与那些在科学领域中默默耕耘的探索者一起在历史长河中试图留下自己的印记。然而在今天信息化时代下,竞争激烈而残酷,谁才能经受住历史的洗礼和考验呢?这是许多期刊人所思考、探索的问题。“独立风格”恰好是《体育与科学》创刊以来的能够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法宝,从内容到形式体现出了与其他期刊相比更加突出的个性和特色。在20世纪80年中期,在国内首倡体育文化建设,为体育学独立于教育学,成为人文社会学的一级学科,起到拓荒性的作用。

面对这样辉煌的历史,路云亭无比怀念那个时期的文章,内容形式活泼,充满不可知性,让人爱不释手,这样的魅力就是文章的“人文性”。然而他无比痛心地说道:“现在的人文类文章完全按照科学(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评判,而人文类的文章最忌讳的就是标准化制造!”他认为现在期刊的文章都是新八股,很多内容都是简单的、常识性的、立意非常浅的,但是符合标准化就成为了期刊文章的主流。他甚至直言痛批道:如果说现在的文章较之以前缺少了一种“味道”,其原因一定在于跨界不够,出现了同一化的问题,过分强调流程之后反而使文章混杂了一种不可知的、夹生的、诱导性的东西。面对人文类文章的衰败,如何重回思想性的“百花争鸣”局面呢?路云亭开了一个处方:“回归传统!”他表示,《体育与科学》当年引领学术思潮制胜的法宝有两个。第一个是先锋性、思想性。学术期刊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思想的载体,对于有立意高度和深度的文章应该重视,做有思想的学术,出有学术的思想,不可偏废。20世纪80年代,《体育与科学》正是敏锐捕捉到学术界的问题“火花”,组织与策划了一批有思想的人士进来,生成了流行于学界的学术热点。第二个是跨界性。在路云亭看来,跨界研究的魅力无穷,能把习以为常的东西轻易就解构,当年《体育与科学》是体育界跨界之楷模,各个学科的大腕都融合进来研究,为体育学界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跨学科研究不自觉地参与,呈现一种“星星之火燎原”的景观,从而“引领”了整个学术发展。

对于当年《体育与科学》的跨境魅力,金大陆同样回味无穷。他认为杂志可以好好继承这一传统,要有

前瞻性,主动走出去。比如在“学术工作坊”和“学术对话录”栏目,对于体育科学的前沿问题,可以与社会学、历史学、医学、健康学等一流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科学家、医生甚至是演员合作,扩展研究问题的专业视野。这样的跨界研究,会“让你的眼前一亮”!至于什么是跨界,如何通过跨界来创新,丘海雄从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两条建议:一要注重学科之间的比较,对于同样一个问题,社会学、经济学、体育科学、管理科学一定有不同的观点,对于学科之间的不同要进行比较与融合;二要注重国家、区域之间的比较,比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发现研究背景与变项的差异。

冯连世从体育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谈《体育与科学》的转型与发展,强调学科定位上要注重特色学科和主要学科的平衡发展。他认为,期刊现在形成了一定的特色鲜明的栏目,学术期刊必须结合自身传统优势,但也要充分发掘期刊所在单位和地域优质学术资源,依托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学术团队,从而实现期刊的学术引领作用,否则会动摇学术期刊的学术成长根基。继而,他建议期刊在策划引领性的学科选题时,除了体育社会人文学,所里长期形成的在竞技体育领域训练监控的理论和 method 创新方面的自然科学的选题也应该被重视。如“健康中国”战略,一方面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 method 技术方法,另外一方面也需要竞技体育和体育强国的建设理论和 method 的研究。他认为,期刊学科类别的扩充可以扩大作者群和读者群,同时也能扩大期刊在体育科研界的综合影响力。至于如何才能平衡“特色学科和主要学科”发展,冯连世提出不妨增大体量,办成月刊模式。“增大体量”一石激起讨论的千层浪。金大陆教授提出,体育人文科学类和体育自然科学类文章风格不一,“增大体量”可以借鉴国内一些其他学科杂志的经验,将杂志办成一刊两版的形式,分设人文社会版与自然科学版。路云亭教授亦附议此想法。“增大体量”面临保证质量、保持水平不下降的严格要求,继而有团队人力短缺、压力增大的现实担忧。但他认为完全不必要担忧,目前杂志办月刊的条件完全成熟,完全可以考虑办分设文理版面的刊物。“可以设计一刊两版,也可以选编优秀文章集辑出书,做文献回顾、书评或博士论文外,还可以致力于做外文版,形成多元创新的‘增大体量’模式”,丘海雄继续将“增大体量”的话题推向纵深。

“做好传承,坚持创新!”刘彤对《体育与科学》未来发展进行了定位。他强调,既然《体育与科学》的特色

是从研究体育史开始的,通过体育文化的研究确定《体育与科学》在全国体育期刊的地位和特色,这么多年来期刊也始终坚持这特色,未来可以结合体育文化研究坚持做传承。同时,对于冯连世提出特色学科和主要学科的平衡发展的建议,他表示非常赞同。所以在保持传承的同时,也要重视所依托单位的资源,围绕运动训练主体方向的研究有更多的成果。近两年运动训练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研究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要么侧重训练监控的方法及应用的研究,要么在训练当中更多体现的是运动康复的需求,他建议下一步要特别考虑如何将运动实践、保障方面的实际成功案例提升并形成研究理论和 method 进行整体的推广。

#### 4 学科引领:体育学科话语体系的规范化建设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受科研评价体系和期刊出版环境的影响,高水平论文稿源的国内外竞争愈演愈烈,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优秀期刊——《体育与科学》也深受影响和冲击。在这么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学术期刊如何才能保持生命力呢?如何才能占领学术领域的制高点,发挥引领学术潮流作用?这又是办刊人不得不面对的思考的问题。对此,各位专家也积极出谋划策。

贾齐认为学术期刊唯有抓住期刊学术质量,强调刊载文章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从而把握住学术前沿、学术命题的真伪与严谨的研究逻辑等问题,才是期刊竞争力的核心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什么文章才具有学术价值呢?“公有价值”,贾齐把学术引领的问题引向哲学层面的思考。在他看来,期刊是将研究者的文章公布于众的平台,公布于众的基准是期刊对该文章是否具有公有价值的判断,学术价值是研究的缘由,而研究方法是回答研究问题的具体的相应步骤,这两者属于表里关系,往往行为是可以被观察的,但是价值是一种思想性、认识性的存在,不是现象的存在,也难以被直接观察。因此,文章所具有的公有价值不属于可以观察到的具体操作行为本身,而是从具体的操作行为方式所依据的思维方式、立足点、基本观念或概念所构成的论证中体现出来的。任何操作行为都来自某种思维方式,依托于某个立足点,或借助于某些观念或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思维等是相关操作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只有当文章对具体操作行为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再思考,或有了新发现的时候,才意味着它具有公有价值。那么文章的公有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呢?贾齐继续揭秘:“文章的公有价值是通过论证方式

对相关具体操作行为之前提条件,乃至操作行为目的自身之追问、质疑、探寻和梳理体现出来的,而人文社会科学同样是通过揭示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所隐藏的原理来体现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对象。”对于目前学术界存在的许多错误的、不合理的操作行为,无论是战略层面还是战术层面的,他认为这往往与没有正确的把握相关行为的前提条件有关。因此,他提出期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力求将具有公有价值的文章公布于众,在最大程度上为正确的、合理的操作行为的前提条件给出相关的论证,避免因前提条件的错误而出现一些不合理的操作行为。在他看来,具有公有价值的文章,是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基于一定的事实(相关的现象或以往的研究),将自己的主张(独有性的思考),以合理的方式(按照论文的逻辑关联),提出一定依据的文章。

“最难就是研究问题的发现!”贾齐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经验发出肺腑之言。他认为,每篇论文都以问题的提出作为开篇,目的在于使读者明了该文章是围绕什么领域的什么问题而展开的,然而研究问题并不是可以直接通过观察得到的具体事实或现象,学术领域的研究问题通常是一个隐藏的存在,是经过研究者由表及里、层层剖析、推理抽象之后的产物。关于科研过程中的痛苦心路历程,贾齐直言不讳道:“发现问题的过程是研究写作中最为困难的环节,它必然伴随着研究者缜密的、甚至是痛苦的思考历程。”但是他也提到,科研的“苦尽甘来”——一旦发现了真正的问题,那么相应的答案其实呼之欲出,接下来的过程不过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论证,文章就娓娓道来。同时,他在审稿中碰到的一些不规范的研究具有极大共性:文章在开头就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问题所在,或者将可观察到的现象当作问题后就下笔千言、举措若干。在他看来,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具有公有价值,研究问题都没有搞明白,后面的研究肯定是一错再错,继续错下去。而研究方法、问题的解决或者假设的提出,在学术研究领域表现为推理、论证,取决于研究者把握的知识;逻辑关系的建立和立足点的选择、基本观念和概念的运用所表现出来的再思考与新发现,取决于是否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过,在他看来,所有的论证还是指向研究问题,否则一旦没有明确问题,那么所进行的论证就失去了标靶。研究问题如此重要,那么怎么从事实关联中发现真正学术意义的问题?贾齐慷慨地献出自己研究的宝贵经验:挖掘问题的重要性之一是避免从观念或概念出发,否则这种研究就是空对空,没有意义和

学术价值。

对于怎么提出或者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另外一位专家——丘海雄也分享了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珍贵的经验:从学术角度来讲,一个好的论文题目,首先必须是一个悖论、迷思,是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想去解答的谜,而且在解谜的过程中会引发争论,这样的题目才能获得比较大的影响力。比如在美国,种族是影响体育不平等的因素,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运动员当中有色人种增多,但是成功的运动员当中还是白色人种占多数,那么体育领域的种族平等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在今天,这个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不同的研究者持有不同的主张和见解。类似这类争论性的问题比较容易引起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也有创新的余地,一些重要的体育杂志就非常重视如何引领学术界对这类问题的批评和争议,批评和争议是学术的生命,也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其次,好的问题必须要有学术根基,也就是说做研究必须考虑“落叶归根”或者“认祖归宗”。发现一个新问题,从哪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很重要,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如果是社会学的话,是经济社会学,还是体育社会学,或是社会分层?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好的学术研究要有学术对话点。每一个分支学科都有它的理论脉络,有一个代代相传的问题值得讨论,研究者从现代也能追溯到它的历史渊源,找出关于这个研究问题最新的争论点。他表示,假如一个研究连学科立足点都不清楚的话,那么连文献回顾都很难进行,而一个好的学术研究至少有60%的时间要花在文献回顾上。所以一个研究者必须要找到自己长期的学术立足点,其学术题目不光是围绕热点问题,还要有自身的学术传统,更能够在研究之后对这个学术传统的发展有所贡献;第三个,好的问题一定要有创新。至于如何才能创新,他给出了研究创新一个可能路径:首先要明确思路,提出自己的分析视角,引入不同的变项。比如说,一个西方的命题、结论在西方背景下成立,但在中国的文化下不一定成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立,在计划经济过渡期未必成立。只要引入一些制度或文化的变项,那么原来的命题就会发生一定的改变,我们对原来命题就会有新的认识。

颜军接过“研究问题”的讨论,认为学术期刊应当关注问题的认识程度,可以概括为重大的、潮流的、前沿的,这其中包含了一种立足现在、追踪过去并展望未来的时空观念。至于学术期刊如何引领学术呢?他从学术刊物与学科建设的关系角度给出了发展方案——

“引领学科建设”。他认为,学科建设的前提是大量开展科学研究,以科研为引航,这样才能保证学科建设的方向正确、思路清晰、目标准确,而体育科研最终成果是发表,向社会推送,这即离不开学术刊物,学术刊物和学科建设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跟踪学术潮流”和“参与重大体育事件”,颜军将“学术期刊引领学科建设”的视野拉到实践层面。据他观察,学科建设是建立在理论与事实的互动基础之上,理论方法的建设,尤其是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学科得以发展的关键,理论越深化,对事实事件的考察和描述也就越深刻,反过来也促进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因此,学术期刊要发挥引领力,就要紧紧跟踪体育发展的潮流。对于这一点,他在肯定《体育与科学》的办刊敏锐性上又发出了一声叹息:不够深入!他举例:2014年国务院出台快速加快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若干意见之后,《体育与科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体育发展潮流,先后组建了三次体育产业相关专题,但是均不够细化。他期盼如果这三个能够更加细化,围绕一个核心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其学术影响力会更大。同样,参与重大体育事件,参与的过程不仅可以为重大事件积累资料,又可以扩大刊物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发布和交流的平台,学术性是其生命线和灵魂。围绕体育学科应该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丘海雄、贾齐和颜军基本持一致看法:学术期刊要引领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引导作者按照立论的逻辑规范地表述研究成果,完整展示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文献综述、数据获取的方法与途径、资料分析的理论框架、结论与讨论等内容,构建体育学科规范化学术话语体系。

## 5 制度创新:三大举措成就引领力引擎

在信息化和国际化的时代,学术期刊面临着如何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专家们就如何引领、怎么引领体育学术发展畅所欲言,认为除了办刊人要转变思想观念积极引领学术发展,杂志所嵌入的体制机制——人才、平台和商业模式等方面也需要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作者、读者的需求,从而成功实现学术引领。

丘海雄首先打开如何引领的“话匣”。他指出,借鉴美国经验可以看到,美国的新研究往往由一流的领军人才提出问题引导大家去做。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学术引领也要看是否拥有国内最高水平的团队,甚至要看有没有形成国际化人才的参与机制和国际合作的

网络,由这些优秀的领军人才来提出问题、组织研究和写作。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必须要有一篇高水平、全面的学术综述,文章的学术综述是针对一个领域的研究问题进行完整、系统、逻辑梳理和整理,综合分析,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再创造性研究工作,仅仅依靠一个人完成是非常辛苦的,且仅靠单个人还不一定能做得好,组织学术团队共同完成高质量的文献回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扶持青年学者!”颜军从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眼光提出了前瞻性的建议。从学术发展规律来看,青年学者的成长需要磨练,体育学的前途和命运就系在青年学者一代身上。在他看来,学术期刊是发现、培养学术新人的良师益友,《体育与科学》多年的杂志发行中,集结了一批年龄跨度很大的新老作者,大家在各自的学术研究道路上都得到了杂志的关注、支持和培养,对这个期刊都充满了感情,老作者也是从青年学者成长起来的。期刊品牌的塑造与延续在于期刊与作者“相知共舞”,共同打造学术共同体。

“文如其人”,对于学术杂志的办刊人与期刊风格而言也十分恰当。在学术期刊引领路上,与作者共同探索的还有背后默默耕耘的办刊人。期刊的发展融合了办刊人的胆识魄力、学术理念与情怀、胸怀气度、学术品味、操守格调,对体育学术传播具有独特的职业敏感,策划、组织体育学术前沿专题,开展系列学术活动,通过问题引领学界大讨论,创造新的研究成果,通过学术期刊平台进行传播,扩大学术影响力,使学术期刊成为引领学术发展的高端阵地。回顾《体育与科学》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刘彤认为高水平的、专业化的作者队伍是杂志能够实现引领学术的重要引擎,但编委会的优秀团队也功不可没。但面对期刊的发展要求和体制变革,核心办刊人团队及能力建设成为杂志发展的一大困惑,研究所在体制上不如高校灵活,如何在合法性机制下创新是编委会下一个阶段的重要任务。

“建设期刊平台”,颜军抛出了引领学术期刊发展的第二个方案。他认为,学术刊物要引领学术发展,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离不开期刊的平台,借助于这个平台才能够进行学术交流与思想的碰撞,学术建设才能够在学术交流与碰撞中得到发展。在他看来,一本优秀的专业化、学术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学术刊物,必须是学术前沿理论、国家视野、世界眼光和现代技术的融合。目前来说,《体育与科学》的现代化与国家化还不足,未来加强刊物的网络化平台建设有助于杂志加快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大数据’时代,数据为王!”丘海雄将期刊平台建设视野置于大数据时代层面。据他多年的观察研究,现在国内外的许多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不依赖于一手资料,而是基于大型共享的数据库进行开发分析,如国内的CGSS(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LDS(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他非常惋惜道:“可惜这些数据库有关体育的变量太少,缺乏高质量数据,即使有好的方法也无法做出高质量文章,更妄论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了。”共享大数据库是国际学术的趋势,但丘海雄也深知要在体育界建立全国性体育领域的共享数据库不易,且《体育与科学》也无法独立承担这样的重任,他建议杂志至少可以参与其中,向国家体育总局、省体育局提出倡导,或者与其他高校合作,在体育领域建设一个全国性的共享数据库,促进一批高水平文章的产生。对于现在不少组织掌握的体育领域的数据不公开的浪费现象,他大为遗憾道:好的问题缺乏数据支撑,数据的问题设计缺乏理论支持也缺乏深度,且数据具有一定时效性,不及时开发利用很快就失去时效。他指出,如果有大数据的支持,“健康中国”战略中的体育对健康的作用就会获得强有力的证据支撑,也不用遭受来自其他学科的异样与不屑眼光。最后,他殷切期望杂志借“健康中国”战略的东风扮演积极倡导与参与数据库建设角色。对于期刊平台的数据库建设,金大陆提出了一个设想:开设微信调查栏目,对热点、前沿体育问题开展微信调查,形成研究报告,并据此转化为智库形式报送到决策层,为推动体育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人才、平台和商业模式是学术期刊发展的三驾马车。高度信息化的“互联网+”的颠覆性和革命性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才和平台的冲击,商业模式的转型也不可幸免,“商业模式”的创新也被提上日程。丘海雄提出,商业模式的创新就是改变杂志发行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作者、编辑和读者等各方之间的关系。信息时代下的营销关系强调“用户体验”。可以通过座谈

会、问卷调查和大数据分析方法把握消费者对产品使用的体验,从而达成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商业模式的创新。

## 6 结语: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引领体育学术研究潮流

学术期刊把握学术发展脉动和走势,占领国内外学术领域的制高点,发挥引领学术潮流作用一直是《体育与科学》奋斗的目标。什么是学术引领?怎样才能引领当前的学术潮流?论坛专家对此进行了激烈思想交锋,纷纷建言献策探讨学术共建、期刊引领之路,既有战略高度的方向性意见,又有操作性的措施建议。专家们认为: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重要平台,对于促进学术交流、探索研究前沿、引领学术创新肩负着“顶天立地”的学术使命,体育学科的选题应该关注中国体育的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重视理论创新,既要坚守学术为本,也要服务政府决策;甄别发表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引导作者按照立论的逻辑规范地表述研究成果,构建体育学科规范化学术话语体系;坚持跨界性、思想性与开拓性的传承,走出独立风格的创新发展之路;与时俱进,适应新媒体环境下阅读习惯和传播方式的转变,坚持走数字化出版转型与融合的“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化之路,提高期刊学术质量,以数字出版模式提升传播力度和速度,扩大国内外学术影响力;加大人才队伍和期刊平台建设,积极探索灵活的商业模式,构建良性的期刊体制创新机制,助力学术引领。展望未来,《体育与科学》将始终不忘肩负顶天立地的学术使命,一如既往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守本真,持续传播学术研究的价值,保持专业性、前沿性、开拓性与创新性学术品性,甄选发表优秀学术成果,引领学术发展方向,规范学术风尚,构建本土体育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促进中国体育学的繁荣与发展,推动中国体育学术走向世界。

● 学术对话录

# “从喧嚣走向寂静”:转型期的体育治理与发展中的学科范式

——专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

王 成<sup>1</sup>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六届(2009—2013)、第七届(2014—2018)]、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先后出版《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等著译作20余部。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宝钢教师奖特等奖;2009年当选“国家级教学名师”;2015年入选“江苏社科名家”。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改革深水区,体育领域亦迎来转型发展和利益调整的关键时期。体育体制改革、体育治理体系、体育发展模式、体育社会组织等话题日益引发各界关注和思考。对此,《体育与科学》编辑部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进行专访,就现阶段中国体育发展的若干命题展开访谈。本次访谈既涉及体育强国、体育治理、金牌导向、社会心态等实践议题,也涉及学科范式、研究倾向、价值中立、研究方法等学科话题,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在议题喧嚣的背后通过社会学家的沉思与观察呈现观点与认知,希冀为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多学科和多视角的启发与借鉴。

**关键词** 体育强国;体育改革;体育治理;体育发展模式;体育社会组织;体育学科;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09-08

## “From Chaos to Silence”: Transitional Sports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Discipline Paradigm

—Interview with ZHOU Xiao—Hong, Dean of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WANG Cheng<sup>1</sup>

(1.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key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rest adjustment in sports field with the continued deepening of the social reform in China. Many topics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such as sports system reform,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sports development model and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etc. The Sports & Science editorial department mad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ou Xiao—Hong, Dean of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under this kind of background. The interview is not only related to practice issues such as 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s, sports governance, gold orientation, social mentality, but also involves subject topics such as discipline paradigm, research trends, value neutrality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interview presents the viewpoint and cognition from two aspec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meditation and observation of sociologists behind the chaos issue, and hoping to provide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 angle inspir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powerful nation; sports reform; sports governance; sports development model;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sports subject; research paradigm

收稿日期:2017-01-04

作者简介:王 成(1981—),男,安徽固镇人,博士后,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1. 南京大学 体育部,南京 210093。

## 1 体育强国认识与社会心态演变

**王成(以下简称王):**北京奥运会前后,理论界提出中国体育发展转型与改革问题,一度将北京奥运会作为转型的划分节点,甚至出现了“后北京奥运时期”这样的称谓。奥运会的成功仅仅是现阶段意义上的,当初中央提出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曾掀起一股“体育强国”研究热,各种评价指标体系被不断建构,后来又转变说法,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不再提及“迈进”一词,言外之意我们迈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迈进,近几年此类研究热潮减退。那么从社会科学界,如何来理解“体育强国”这一话题?

**周晓虹(以下简称周):**你刚才说的迈不进去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真正的体育强国并不仅仅是奥运会上拿了多少块金牌和奖牌,或某个项目上拿了多少。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其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类似这种象征性的国际赛事,如奥运会、单项的世界锦标赛等,在这些赛事中拿冠军、亚军,拿名次,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象征。第二个更为重要的就是体育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民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专业性的职业,并且这种职业的目的只是去为了拿金牌。包括像中国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东德等,很多年里,都遵循这样一个路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某些时期办某些事情时是比较容易的,集中把钱投入某一个领域,集中训练一批人,成果立竿见影。中国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的人事制度,工资制度,在改革,在市场化,但另一方面,体育的训练方式仍然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计划性的手段。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一个运动员结束其运动高峰,甚至没有进入高峰,那么后续的一生就会面临很多麻烦。你也看到,现在很多为国家立了汗马功劳的运动员,当他们退役的时候,甚至不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维持其生存的东西,职业都没有了,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你为国家拿牌子的时候,是计划在那起作用,等你拿完了,从这个体制出来,要继续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市场在起作用。做运动员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训练,那么进入市场后,什么都不会,任何生存技能都没有,这跟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的体育,是一种爱好,与职业没有任何瓜葛。即使高峰期过了,该当医生当医生,该当律师当律师,该当工程师当工程师,这个问题很重要。第三个,就是全民体育的问题。全民的体育,是体育强国非常重要的一环。近些年健身人数越来越多,健身开始是被一部分人接受的,随后慢慢拓展开来。你看跳舞,跳舞是健身的一种手段,一方面说明人有健身的意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中国人目前寻求的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

义上的健身,人们在寻求一个社会互动和交往的动机,跳舞的人都是成群的。但是,跳舞中有两个问题很有意思,一是性别比例失衡,男性太少;二是地方和空间缺少,容易引起矛盾,广场舞场地的问题曾一度引发各种矛盾,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引起矛盾这说明中国现在不仅仅是跳舞缺少地方,更折射出当前中国的体育设施场地问题很大,有的地方场馆即便是有,也是收费的,只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可以去,对普通大众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奢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很重要的就是应该转变金牌导向,将体育转变为普通大众的东西,把体育看成是和穿衣吃饭、衣食住行一样重要的东西。我们现在提倡经济领域不唯GDP,同样体育领域也应该不唯金牌,应该着眼于中国人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的变化。我也认为,这些方面都做到了,金牌应该是水到渠成的。

此外,还有体育的投入问题,国家不应仅仅投入看得见摸得着的奖牌,对普通人也应该有所侧重,如人均体育经费应该有多少,这些都应该与体育强国有关。还有中国人的幸福感问题,心理的幸福和生理的健康,和运动都是有关联的。以及从普通的业余时间或空余时间向闲暇时代转变的问题,休闲时代一个很重要的积极的生活内容或方式,就是体育活动,打球、远足、跑步或散步等。我想大致应该是这样子。

**王:**谈到全民体育问题,我想到德国。它的竞技与大众,或者说金牌与健身,协调得非常好,是当之无愧的体育强国。当然,大国与强国,现实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很多,国人希望能够借助某一节点事件实现体育的突发性改革,这种预期和心态可能本身就有问题。刚才您谈到,有关金牌导向的转变问题,中国这样的国家一贯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强调能够在体育尤其是金牌方面振奋人心。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女排夺冠,影响非常大,但是目前,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人们对金牌的渴望已经淡化,期望值已经降低,国家民众对体育比赛的心理期待和认知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不会像过去那么狂热和极端,虽然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偏执,但总体上还是平和的。

**周:**中国人需要金牌,这点毋庸置疑。毛泽东时代,因为急需向世人证实,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那个时期整个中国实际上也就两块金牌,庄则栋的乒乓球和陈镜开的举重,庄则栋的乒乓球打得好,最后得到了很高的声望,包括婚姻(女钢琴家鲍惠荞嫁给了他),他当时赢得的声望被国家看成是一种荣耀。而陈镜开,打破的是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创造了中国第一个世界纪录。今天的举重,女子就不说了,男女在一起有那么多级别。北京奥运会,已经证明了中国的金牌可以拿到第一,对中国这样的民族,一两百年来一直积

贫积弱,被别人视为“东亚病夫”,这样的一个国家,打鸡血的、振奋民族精神的事情,做一点是必要的,起码让我们的民众意识到我们也能做到,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东西做成最后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这个,应该是真正能够改变中国人的这种萎靡、不振,这种身体的羸弱,乃至国民性的羸弱,应强调这种竞争,大规模的竞技性的运动就提倡这个,另外还有 fair play,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比拿金牌在后北京奥运时期应该是更重要的。至于指望一届奥运会来改变中国的体育发展状况或者体育体制,那是不可能的,重大赛事带来的驱动力本身就不具有可持续性。

刚才你提到北京奥运会作为一个事件节点的问题,在我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倒是可作为判断社会心态演变的一个节点。2000年后,尤其是2008年后,社会心态中的负面感受增多,负面社会心态危机蔓延。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国带来的机遇有目共睹,对于国家凝聚力和 international 形象提升帮助很大。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数万亿一揽子计划,让世人感受到了风景这边独好,整个社会心态的消极部分被遮蔽。但是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喜庆之后,各种不正常社会心理逐渐增多,社会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社会矛盾的出现,并指出中国社会心理开始出现消极的心态,如浮躁、喧嚣、忽悠、炒作、炫富、装穷、暴力、冷漠。这一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王:体育的改革与发展究竟如何,除了重大赛事带来的影响力和驱动力以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民众对体育的理解是否深刻,这一点往往又和整个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甚至历史底蕴有关系。但是我们确实也发现,亚洲其他几个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如日本、韩国,都在奥运会举办之后实现了体育发展战略的转变,走向了另一条体育发展之路。

周:顶层的设计与底层的驱动,必须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既要有宏大的顶层设计,又要能够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老百姓需要什么?民众真正关注什么?供给与需求要能够对接起来。我记得韩国曾经有一个标语是这样打的:能够举办奥运会的民族是世界一流的民族。换句话说,它举办了奥运会,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民族是世界一流,那接下来的发展方式就应该有所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做过了,韩国做过了,现在中国也做过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必要再做那种急功近利的事情,应该着眼于我刚才说过的几个方面,真正通过体育强健身体,陶冶心灵,追求身心健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金牌是乐享其成,如果有,我们不反对,但是不唯金牌。中国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和精神上的振奋,比几十块金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重要得多。我们过去做到的是

少数人的“更快、更高、更强”,那么未来,应该着眼于更多人的“更快、更高、更强”,那就是一个全民的体育的精神,体育的爱好,乃至体育的习惯。

王:刚才你提到社会心态和民众对金牌期待的问题。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再次夺冠,“女排精神”又一次成为国家视野下的宏大叙事,一时间成为民众、媒体和官方热议的焦点。但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排五连冠给国人注入的“强心剂”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国人对女排精神的理解较之以往明显更为丰富,也更加饱满。我记得当时郎平主教练说了一句话,“不是只有赢球才是女排精神”。如果说以往的这种体育精神带给我们的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发声的话,那么现在则更多地体现出“开放”、“平和”以及“多元”的时代特点。那我们如何来理解和认识这样的一种社会心态变化呢?

周:在社会心理学的讨论中,“社会心态”是一个仅次于“社会心理”赢得广泛关注的概念,这是中国社会学从法国早期社会学中继承而来但却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概念,可以称得上是汉语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该学科的一个贡献。社会心态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心理态势,它不是哪一个人的,和我们日常说的“端正好你的心态”不同,它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宏观的社会心理状态。当然,在所有关于民族性格或变动中的社会心理的讨论中,“开放”都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者单个个体的精神世界的积极呈现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现代性的表征。直白地说,是开放还是保守,往往是一个民族自信还是自卑的象征。进入2000年以后,由于开放的力度加大,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进一步全面和深入。所以我们再面对某种东西的时候,往往能够从多方面和多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像刚才提到的金牌导向和民众反应的例子,他们尽管也会流露出一些不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总体上对金牌事件还是持有宽容和平和,甚至是理解的心态。(王:有时更多地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了解信息的渠道增多了,视野开阔了,而且可以关注的事情也比以往多得多。所以说,开放是中国人社会心态迈向现代的精神表征之一,也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精神文明领域取得的伟大进步之一。

## 2 体育体制改革和体育发展模式

王:正是因为怀有开放的社会心态,以及流动、竞争、平和与包容的精神品质,我们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其实体育运动中这样的精神品质随处可见,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sportsman-ship”(运动家风度)、“teamwork”(团队合作)以及“fair-play”(公平竞

争)是体育贡献给社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这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

**王:**体育可以培养人,有助于民众养成一种积极生活方式,而不是少数人训练的工具和手段。然而,在现实中,尤其是转型期,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各方利益盘根错节,勾连交错,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也很大,在社会其他领域亦是如此。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代表的体育行政机构,如果其工作重心不在训练和金牌,那么很多人和很多岗位就会面临重新调整与改变,自上而下的改革难以进行。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周:**这和我们的体制有很大关系。例如,国家体育总局,这样的机构,美国没有,美国为什么没有,而我们有什么?说白了,这就和我们国家这种计划的机制有关。有了这个机构,就必须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可以和你说一个与社会学有关的机构——计生委,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存在,就决定了他们对计划生育不可能有任何放松。当时很多人口学家呼吁要放开二胎,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有限的放开了,如果彻底放开,那么计生委的存在就成了一个多余的东西,所以计生委当时是不愿意的。此后,计生委并入了卫生部,更换了名称叫卫计委,这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十年以后,卫计委肯定会改名叫卫生部,这是肯定的,就像当年四川大学和四川科技大学合并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叫对方的名字,结果搞成了四川联合大学,用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四川联合大学的称谓不合适,最后统一又回到了四川大学。到这个时候,四川科技大学的人已经融入了四川大学中,对于叫什么已经无所谓了。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计生委现在融入卫生部,过若干年,他们对计划生育的认同度就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计划生育领域里有任何政策放开,或者人们建议把这个部门取消,或者即使不取消,而转型为关注人口素质,而不是人口数量,到那个时候,反对声就会降低。

所以,开句玩笑,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取消国家体育总局,而过渡的方式就是设立大文化部,文体在一个大部制里,如果能做到这一步,起码在行政的配套上,可以促进大家对金牌的淡化。正如刚才所言,有这个机构在,就必须证明这个机构的意义和价值,有其合法性理由,而要证明其合法性,提高中国人的健康和体育素质在短期内是看不到效果的,能看到效果的就是金牌数的多寡,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围绕金牌去运转。每一层都是这样,国家体育总局,各省各市的体育局,等等莫非如此。这就导致了总局和各省市体育局存在的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以金牌为核心。所以我极端点说,中国的这种体育改革就应当是将国家体育总局虚化,这种虚化并不是说在中国这样的国情背景下没有总局这个机构,而是这个机构没有必要这

么大,可以由部级转变为副部级,甚至再低一些。可能在开始的一段时间,会有各种嚷嚷的声音,但是,再过一段时间,这种声音就会变弱,人们自然地就会认为体育是大文化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到那时,从行政的角度而言,人们对金牌的重视就会降低。或者还有一种方法,转变名称,如在大文化部中设立大众体育局,或国民体质局,等等,这样的话其工作重心就会转变。现在是体育局,那竞技自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而金牌恰是竞技的重要体现。

**王:**中国体育体制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体育孤立地存在。西方很多国家,体育已经融入民众生活,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体育与其他行业或者部门截然割裂的现象比较明显。刚才您谈到总局机构降级或转化的问题,其实质便是行政机构体制改革,易剑东也曾提出“降级、合并、分拆”的观点,前两者和您的观点不谋而合,而第三个“分拆”指的根据总局下属部门的特点,将其拆分后转移到其他部委中,如学校体育进入教育部,竞技体育进入文化部,社会体育进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同时保留中国奥委会对接国际体育事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国内体育事物。

**周:**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你看中国很多县级甚至是地市级体育部门,不少已经并入文化、广电、教育部门,运作的都不错。这样一来,体育就能慢慢同社会其他行业融合在一起,现在就看能不能在国家层面进行调整。

**王:**体制的弊端往往根深蒂固,且受到利益牵涉,所以体制的惯性依旧强大。尤其是目前仍然要面临每4年一届的奥运会,总会使改革步履维艰。如果进行突变式的改革,势必会使得中国在国际大赛中的表现受到影响,这一点,恐怕是国人不愿看到的,也是无法理解的。除了中国的体育体制改革外,体育发展模式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有学者用“赶超型发展模式”来指代中国体育发展,您能否从社会学的角度谈谈对“赶超型体育发展模式”的解读和分析?

**周:**赶超型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当前我们国家整个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不光体育这样,其他行业大都如此。这种理念有其社会深层原因。刚才我提到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问题,就以焦虑这种社会心态为例来思考,可以发现,中国现在是“恐慢”:赶超别人,以不被别人赶超为逻辑。当然,很多社会病态相互之间很难区分,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中国社会的消极心态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出现的,这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物,其深层次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种:第一,社会转型的速度太快,使得我们对生活改变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眼光越来越高,不满就越来越深。第二,改革红利的不均衡性。人和人、群体和群体间的差距被拉大,

富者往往对获得的财富看得很重,有显摆的心态。第三,我们和欧美国家社会发展形态不同。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欧洲已经达到后现代社会。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哈特认为,只有我们真正占有物质后,才能生出超越物质的概念。第四,生活态度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在很多生活态度上比我们积极、从容,没有不安和焦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体育走“赶超型”发展之路是很正常的,在过去这段特殊的时期内也是无法回避和选择的事实。另外,我们和西方国家比,现代化程度不同,社会变迁也不同,我们处于起步阶段,“赶”的焦虑比别人多。当然,包括体育在内,整个中国社会只要继续沿着现代化道路前进,大体实现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实现相对的公平,很多消极的社会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甚至解决,解决了精神上“漂”的问题,其他就好办了。

### 3 体育治理体制和体育社会组织

王:体育治理目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提出对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明确了新方向,开启了我国体育治理的新篇章。社会上其他领域也有腐败,也有违规,但是根据我的观察,体育领域中一旦出现违规、腐败、假球、黑哨等事件,似乎更易引发公众的讨伐和抨击。在国家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体育界适时提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

周: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取代原先的“社会管理”,而且直接将社会治理与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结合在一起,申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育毕竟是观察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和缩影,或者组成部分,因此我想体育的这个治理命题就是在国家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从管理到治理,虽然两者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不仅为体育体制改革和创新指明了方向,也从根本上对国家和体育关系有了新的认知。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从社会治理和体制创新的角度看这一改革重任,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会组织。首先看转变政府职能。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体制是1949年后6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它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受制于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其他各类体制,如体

育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强,在应对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时办事效率极高。抵御“汶川地震”和主办“北京奥运会”都显示出它的强大威力。但是,这一体制在赋予国家和政府巨大权力的同时,也限制了社会的生存和活动空间,必然带来底层活力不足、封闭性强、政府负担日益加重的弱点。

再谈培育社会组织。在转变政府职能后,必须要谈培育社会组织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从政府身上“卸”下来的担子或事物,并非弃之不顾,而是要更好、更有效的承担起来,而承担市场和政府都有可能“失灵”区域的治理任务的最好对象就是社会本身,这就是社会组织的问题了,包括各种社区、非盈利组织、社团、人民团体等。因此,要真正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在取得合法地位和相应权利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组织自治、自主和自律的能力。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也应遵从同样的逻辑。

王:关于体育社会组织,我隐约有这样一种体会,最近一段时间在关注“体育城市”建设的话题,考察西方国家体育城市建设规律与经验的时候发现,作为公认的体育大国与强国,德国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均衡性发展的特点非常突出,探究德国体育良性发展的原因时发现德国体育俱乐部体制在德国体育中占有重要作用,那为什么它的体育俱乐部运作好,如果从德国社会文化中加以考察的话会发现,这又和德国社会久远的结社传统密切相关。德语中有一句谚语,“三个德国人,必有一社团”,意即德国人特别喜欢结社,过社团生活。可以说德国的社团,即社会组织、大众体育、体育生活化三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的关联。

周:德国人热衷社团、管理社团,不但把社团管理好,而且锻炼了管理才能,增强了社会的组织性。所以你看,德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市民社会高度发达,所以它的体育发展是有一定社会历史背景和动因的。

王:改革是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旋律,中国的体育改革势必持续深化。近期中国体育的一些热点事件也从一定层面显示出这种趋势,如中国奥委会打破常规、吸收优秀运动员出身的候选人进入领导机构,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当选为中国篮协主席,这些事件预示着体育事业持续推动改革创新、加大体育社团改革力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释放出积极的改革信号。再比如,中国足协长期以来政社不分、管办不分、权责不清一直都被外界所“诟病”。近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撤销,中国足协成独立社团法人,可以说足协与总局的“脱钩”在中国体育体制改革上已经迈出了扎实的一步。对此,您怎么看?

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其他体育社会组织、私营机构也可以作为权力主体参与其间,这本身就体现了“还权于民”的倾向。新型的体育治理体制应当强调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民众自治”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式的合作。虽然我对足球本身并不了解,但是足球改革的这种趋向是符合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要求的,我想这也是体育体制改革的一个“试验场”和“实验田”。

王: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体育也不例外,尤其是中国体育事业改革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从“体育管理”走向“体育治理”,是政府简政放权、多元治理、民主决策、实现共同利益的发展趋势。如果说中国足协的改革吹起了先锋号角的话,那么在培育体育社会组织上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呢?

周: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尊重这些组织在体育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切实加强对组织及公众的社会参与权力的法律保护。加快实施政社分开,让这些体育组织能够真正与行政机关脱钩,做到明确权责,依法自主,发挥作用,就像刚才谈到的足协一样,通过创新变为有活力的体育组织。其次,要能够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这种政策保障不是说下发几个红头文件,或者提供什么待遇,而是通过行政分权,一方面将无限政府自身转变为有限政府,另一方面与获得“分权”的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同时还要注意,分权之后,不必事必躬亲的政府仍需引导参与治理的各方,尤其是对体育组织和民众的意见、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就是要成为服务型政府。足协脱离总局后,总局相关部门并不能放手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闻不管,要服务于足协,毕竟有可能存在社会失灵的情况。最后,就是能够为体育组织提供资源供给。设立公益创投基金,实行政府外包与购买公共服务等,都可以。

#### 4 全民体育开展和身心健康促进

王: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面临很多障碍,其中一个困扰就是要面临每4年一届的奥运会,与此相对应,就不得不提在每届奥运会之后一年举行的全国运动会,其原意是为了国家的奥运战略选拔和锻炼新人。为调动省市积极性,国家体育总局在1996年前后还出台了“将奥运会成绩带入全运会”的举措。可以说从总局到地方,强大的体制惯性和利益牵连使运动会竞赛这种事情越来越集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大家都围绕培养尖子选手而开展工作。2013年沈阳第十二届全运会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国八条的颁布,强调开闭幕式精简,要节俭办赛等。以前争议的是设项问题,

运动会要不要办,现在是自我萎缩,媒体已经不太关注了,越来越变成一种自己玩的事情,并且提倡的口号和实践的行为相悖,2017年即将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主题是“全民全运,全运惠民”,我们能否这样理解,正因为现实中与“全民”渐行渐远,理念中才愈发强调和突出“全民”?所谓“全民全运”、“全民健身”,却看不到全民的影子。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周:媒体的导向与体育系统的导向,原本是一致的。毕竟只有高端的东西,才能吸引眼球,而且其中还有商业的因素,大众体育对它的吸引力不够,即便提倡“全民体育”,媒体对此亦不太感兴趣,觉得意思不大。刚才你说到全运会怎么样变成一个全民的事情的问题。依我看全运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赛事变成全民性的东西,其难度是相当大的,要把全运会变成全民参与的事情,不可能。全国性的运动会,不管怎么搞,其规模和人数都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其参与者必须是高尖端的,起码在省市一级都是最好的运动员。这个事情继续办下去也是有必要的,关键是总局也好,还是各省市体育局也好,如何进一步开展普通民众的体育活动才是根本。

例如,普通民众的体育场地,小区里面的体育设施,公园里面的绿道、健身带等,这样一些事情的推广应当是体育部门和规划部门重点关注的。现在盖房子,有一点必须要得到保证的就是人防工程。如何保证?必须交一定的钱,必须要有地下室,如车库,而这些车库战时可以做人防。除非有这些专门手续,否则房子动不了工。学校的配套、社会的配套也是如此。国家在这方面必须要注意的是,一个小区,必须要留出多少体育场所呢?例如,必须要有一个体育活动中心。费用从哪来?可以将前期售楼税收的一部分或者后期物业的一部分投入进去。应该把体育和教育同等看待,换言之,教育也应该看成大教育,包括文化的教育,体育的教育,也就是文化和武化,同样重视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钱投入完全一样,而是说必须要考虑进去。这样一来,可以通过中国目前城市化的进程,把我们的体育基础设施连带着建起来,甚至可以国家给一部分,小区开发商给一部分,民众自己给一部分,后期有偿使用,更为便利。这样未雨绸缪,在未来中国20年的城市化过程中把基层体育设施建起来,是很有必要的。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楼为例,一楼的活动中心里面有斯诺克、跑步机和乒乓球台,规划之初就有这样的设计和打算。所以,我们能不能把它作为开发商的准入机制来考虑呢?如果能,那他就必须去搞,如同人防工程一样,如果不达标,就不批,不验收,这些东西搞起来对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人民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甚至让我们成为一个更为积极活泼的民族,都更

有益处。

王:刚才你谈到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题,它与人的性格、心理都密切相关。我记得之前读过您的一篇文章《江苏广电“幸福”定位的社会意义》,您提出长期有规律的体育运动也有助于提升人的幸福指数和生活满意度。

周:那是当时周莉做台长时,我写的一篇应景之作。你看心理学家的很多研究都发现,长久的、规律性的体育锻炼对人的幸福感提升,甚至是减少精神疾患都是有好处的,其中涉及“内啡肽”等物质的分泌,最起码一个积极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其忧郁或抑郁的可能性要比那些天天窝着不动的人要少的多。

王:是的,以前我们曾开玩笑说,其他专业或学科从业者患有抑郁症的人比较多,而体育专业的则很少,甚至几乎没有。

周: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对于人格的锻炼也非常好。你看很多西方人都崇尚体育,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生活方式差的人,基本上都是社会的底层人士,那些大胖子、有病的、精神不良的,他们的职业都不太好。高端的或者说是白领人士,对体育大都比较重视,对身体的健康也比较重视,其克制力也比较强,但反过来,如果有比较好的身体素质,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其成功的几率也比较大,包括他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就不会那么狭隘,就会非常 nice,非常积极,负面的、消极的东西就会少一点。所以,我觉得体育是关于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我们现在对身的健康强调的多,尽管做的未必好,但毕竟强调了,但是体育对心的健康,我们还强调的不够,应该给与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 5 体育学科建设和研究范式分野

王:另外,我们还想从体育学科建设的角度听听您的意见和看法。目前,体育学有四个二级学科,而其中争议最大的要数“体育人文社会学”,这是由早年“体育理论”专业演变而来,我本人也是这个专业出身。体育人文社会学议题涵盖范围广,体育与人文、社会交叉能力强,但同时,往往也容易造成研究主题不知所云、研究方法生搬套用的尴尬局面,其学科理论与方法建设相对滞后,大都是母学科的简单移植。您能否从方法学的角度谈谈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周:我之前并不知道体育有这样一个二级学科,从你刚才说的来看,我觉得其实这种学科设置就是想在人文社会科学和体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换句话说,体育要借助人文社会科学而得到一种发展。关于这个话题我想首先要明确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本身就是有分野的。我们都清楚,如果说人文学科(humanities)是以人类的精神产品为研究对象的话,那么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则是以人类群体及其行为为研究对象的。这种分野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如果我们从人文的角度来看体育,可以把体育的观念,体育的想法,人们对强身健体的意识,看成是人类精神产品的一个部分。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体育,体育是社会中的一个现象,既然是一个现象,我们就可以客观地去研究。例如,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体育,可以研究现代社会建制对体育的影响,这是结构性的。而从行为性角度出发则可以研究体育观念、人们日常的体育行为,以及与人们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闲暇的支配,等等。所以从方法上讲,无非就是两个,体育史、体育观念史的研究,要用人文主义的手段去研究。把体育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的话,就可以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用实证的手段去研究。因此,我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在脑子里应该有一个人文和社会的分野,当然在具体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不主张把它们分的那么清楚,但是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意识到它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意识到这种差异。

王:就是说从方法上还是有所区分的,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特性,有所选择,有所侧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体育学”也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研究取向中虽然一直都在提倡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但是定量研究似乎风头更盛。换句话说,似乎只有数据、实证和模型才能使体育真正成为“科学”。事实上,人类运动行为的主观与能动特性始终是无法摆脱人文主义传统的纠缠的,体育想成为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周:有些东西只能用人文主义的一套,用解释学的那套,而有些东西只能用实证主义的那套。如研究国家或地区体育观念的变化以及闲暇的支配,一个体育观念强的民族,在闲暇时间里用于体育运动的时间就多于体育观念弱的民族,这是可以做假设的。还比如经济与体育的关系,我们也是可以做实证的,像GDP的增长与人们从事体育活动的频率,乃至和金牌数的多寡等方面的某种相关性。类似这些研究必须拿出材料来证实。或者利用现有的数据,例如一个GDP高的省份,能产生什么级别的金牌,甚至把模型做出来,多少钱、GDP多大的量可以诞生一块奥运会金牌,也许都可以做出来。量化的研究和质性的研究应有所区分,量化的东西我们是求一般,而质性研究往往用来研究个别,研究那些特殊的现象,所以学者们一般不把质性研究做整体性的推演,我现在研究的就是这个现象本身,别的地方是不是有,我不知道。但是量化的研究,就可以推演,比如推演出全国范围内怎么样。总之,是有这样一个方法上的差异。

## 6 价值中立解读和学科基础训练

王:专业的体育院校呈现出“人文萎靡”、“科学崇拜”、“技术之上”(易剑东教授观点)的特点,其实不光体育院校这样,整个中国的体育文化生态大体如此。现在很多体育硕士研究生论文,研究方法里都会罗列一条问卷调查法,搞得好像你不做问卷调查,你的研究就有问题一样,很奇怪。更有人抛出“价值中立”的辩护词来为实证主义研究做说辞。现在提倡大数据,这种趋向更为明显。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周:有关价值中立的问题,我曾专门发表相关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原则的提出和实证主义的盛行密切相关。以社会学为例,实证主义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仿效自然科学,强调客观性,以消灭主观偏见或保持价值中立为基本原则,提倡运用中性语言,不带价值判断地揭示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规律。从孔德到迪尔凯姆都是这样,当然,像库恩、波普尔、霍克海默等人也持有批判态度。需要指出的是,韦伯从理论上划分了研究过程中“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两种原则发挥作用的阶段,也就是说“价值中立”是有应用限度的。资料本身不会说话,但是它们必须由研究者来解释。也就是说,绝对意义上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存在的。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中不能用价值判断来代替事实判断,而应该尽可能地减少个人的主观好恶性和价值倾向可能导致的对事实的扭曲。事实上,奉行了这个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并不会抹杀社会科学的实践品格。从社会实践常常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层面看,显然不存在什么价值中立的问题,因为个人的研究兴趣或选题事实上都体现着你的价值和价值选择。从社会科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社会实践提供知识支援的层面看,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做到有限度的价值中立,因为无论这种社会实践在你看来有怎样的正当性,你都不能单凭你的赞同倾向就慷慨陈词,也不能按照这种倾向去为正当性寻找依据,更不能为了证明其正当性而歪曲事实或篡改经验事实。总之,就是在你的解释或者因果分析过程中,事实重于价值,哪怕这个从事实中推导出的结论严重地偏离了你的价值。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或者哪怕是从事与社会决策有关的政策研究,我们都不会因为某种现实的考虑而放弃科学的客观准则,不会将我们的研究作为对既定或将定的政策的一种被动解释,而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起到服务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王:当下的体育政策研究确实有“长官意志式”或“行政话语做注脚”的倾向,这是研究者务必要提高警惕的。体育学的学科发展,一方面需要向其他学科借

鉴,另一方面,也需要接受扎实的方法论训练。我注意到,在南京大学的其他文科院系中,有不少出自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如新闻与传播学院胡翼青、郑欣等老师,他们都是您带过的社会学博士,目前在传播学领域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周老师您本人也是史学专业的博士,对于接受不同学科的这种训练,您怎么看?

周:同一个学科内的交流和整合是必须的,不同范式甚至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也是必须的。刚才你提到的这两位,都是年轻的教授了,不管是在传播学还是社会学界,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年轻学者。郑欣老师曾研究过球迷骚乱,搞得非常不错,目前也在带博士。大体而言,在新闻传播学院,曾接受过我们社会学学术训练的学生,其综合能力方面确实强一些。

王:体育学的发展,不能仅仅从相关学科的做简单的理论移植和方法借鉴,在我看来,当前的体育研究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科学学科,而是一个横跨在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综合研究领域,这种学科性质决定了它所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也决定了体育研究不能从单一的视角切入或者使用单一的理论与方法,就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学科范式而言,您的建议是什么?

周:我觉得如果做体育研究,单纯从研究的角度而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对体育学是最有益的,因为它们都涉及到对行为的研究。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界定体育,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体育一定是关涉人的运动行为的学科,社会学侧重从群体的视角,心理学侧重从个体的视角,我认为这可能对体育研究或体育学研究最重要的。当然,单个学科之间不能太过于保守,从而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以社会学为例,科林斯就发现,尽管社会学可以分为不同的传统或范式(大体上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行为范式、社会批判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但是如果将每一个传统视为一条大河的话,“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四条大河在其河床的许多地方已经漫过彼此的边界”。这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每一种研究方法、理论相互之间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独自发展的。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将不同理论和范式间的相互渗透视为整合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社会学理论中可整合的资源 and 可能性是非常丰富的。社会学不能只恪守现有的基本范式,在现存的理论架构内亦步亦趋,其他学科可能也是这样。

王:体育学既然是关涉人的运动行为的学科,那么它就不仅仅是涵盖的议题可以非常广泛,多角度、多维度甚至多学科、多层次地展开体育研究,脑科学、认知科学、行为科学等等,都和体育有一定关联。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体育研究有可能会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具有原创性和原创能力的显学。

● 学术对话录

# 我的乒乓梦(七)

## ——《我与“国球”——徐寅生口述历史》章节选登之九

徐寅生(口述) 金大陆<sup>1</sup>, 吴 维<sup>2</sup>(采编)

**摘要** 从第34届到第35届世乒赛,直板一横板、正胶一反胶、快攻—弧圈、进攻—防守,各路打法的运动员竞相登场,说明竞技体育的胜负之间,存在着各种流派的消长和演变。而当各路打法拥挤一桌,混沌胶着时,则预示着此项运动正面临着新一轮的突破。

**关键词** 各路打法;技术流派;混沌胶着;整体突破

**中图分类号**:G8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17-04

### My Table Tennis Dream (VII)

#### ——Section Ninth of “I and ‘Table Tennis’——Oral History from Xu Yinsheng”

JIN Dalu<sup>1</sup>, WU Wei<sup>2</sup>

(1.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History Research, Shanghai 200437, China; 2.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Shanghai 200525, China)

**Abstract** From 34th to 35th world championship of table tennis, athletes who used a great of diversity playing methods competitively come on stage, such as pen hold—shake hand grip, pimples in—pimples out, smash—loop, attack—offence. It illuminates that every technique branch exists growth and decline in competitive sports. When differences branch stay on sitzkrieg and strong competitive it predicts this kind of sports is suffering from totally new break—though of its' existing technical.

**Key words** each playing styles; technique branch; sitzkrieg; whole break—through

### 1 水泥地的赛场

1977年,第34届世乒赛在乒乓球运动的发源地英国举行。在国际乒联成立50周年之际,乒乓球又回到了英国。锦标赛的地点是位于英格兰中部,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

赛场不在正规的体育馆进行,却安排在伯明翰的全国展览中心。这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展览馆,平时这里举行各种展览,使用率极高。

展览馆中心的第5馆是正式赛场,面积有25000平方米,等于5个并列的足球场那么大。为了迎接本届世乒赛,东道主临时进行布置,安装看台。比赛分为两个场地,决赛安排在一个略小一点的场地中举行。

与历届世乒赛不同的是赛场的地面是水泥地。

按说,水泥地是不符合国际乒联的规则要求的。尽管国际乒联的官员和各国运动员纷纷抱怨,也无济于事。展览大厅除了两块比赛场地外,还设有商店及各种展览及儿童游乐场。家长们把孩子放在游乐场尽情玩耍,就可放心地看比赛。经营中国轻工产品的英国伦敦出口公司,为了表示对中国乒乓球队的欢迎,特地在大厅的一角,安排了中国轻工产品展览,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该公司经理派利先生,还特地邀我们去参观。在异国他乡看到来自祖国各地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和轻工产品,感到十分亲切。派利先生还热情邀请我们去他家作客。比赛时他家里人也来观战,为我队加油助威。他的儿子还邀请我们去看了一场英国俱乐

收稿日期:2017-03-27

采编者简介:金大陆(1949—),男,上海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史与体育史。吴 维(1957—),男,上海市人。

采编者单位:1. 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437;2. 上港集团 龙吴工会,上海 200525。

部的足球赛,感受了欧洲风靡的足球气氛。

## 2 新人郭跃华直拍反胶“第二杰”

在中国男队参加团体赛的名单上,除李振恃、梁戈亮外,还有三个新人加盟,郭跃华是其中的一个。

郭跃华,福建厦门人,1971年底入国家青年队集训,当时才16岁。他是典型的近台快攻。他作风踏实,比赛拼劲足,体质很好。当时的技术并不突出。在欧洲选手突飞猛进前,如果郭跃华没有新的发展和突破,是很难达到高峰的。

教练员们都认为郭跃华比较合适改用反贴拉海绵球拍弧圈球。长年以来,主力队员都是用正贴打快攻,凡用反贴拉海绵球拍弧圈球的,只能充当“陪练”的角色。这已成了固定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我们对反贴海绵球拍缺乏研究,存在认识误区。当我们将反贴海绵球拍持有偏见时,国外选手几乎全部使用这种球拍,把它视为最先进的工具。没有反贴海绵球拍,就不会有弧圈球的出现。乒乓球技术就不可能有当今的飞跃。

郭跃华思想上当然接受不了。在与教练员们议论时,我曾不经意地说过:“这小子不改就叫他回家……”,这也许对他起到了刺激作用。教练员们对郭跃华作了不少思想工作,帮他分析利弊,加上郗恩庭率先换拍对他的影响,最终他同意换上了反贴胶皮。郭跃华最初有点委屈,当他尝到甜头以后,他对反贴胶皮就情有独钟了。

郭跃华训练非常刻苦。为了提高命中率,执意要创造一个新纪录,他和同伴连续对攻,一个球共打了7000多回合才失误。郭跃华改了反贴后,如鱼得水,掌握了弧圈球后,正手进攻,能拉能冲,能近台也能远台,该技术成了强有力的得分手段。他访欧比赛中连胜本格森等名将,世乒赛前成了公认的主力队员。

男团比赛对匈牙利队打成4:3的关键时刻,郭跃华拼掉了匈队主力克兰帕尔,中国队进入决赛。

决赛时郭跃华的弧圈球发挥了威力,把日本队的削球手高岛打得东倒西歪。两局的比分为21:8、21:7。接着又以2:0胜前沉。第2局在14:20落后情况下,郭跃华连追6分,最后以23:21获胜。

中国男队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除了李振恃、郭跃华任主力外,还有赖于梁戈亮和新人黄亮。黄亮来自河南,跟梁戈亮用同样的打法,他身高马大,攻击力强。他们两人特别在与瑞典、日本队比赛时,发挥了作用。

## 3 有志者事竟成

中国女队蝉联冠军,四名队员是葛新爱、张立、朱

香云和新秀张德英。

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的直拍快攻手张德英,在与朝鲜队、日本队和南朝鲜队的三场团体交战中,表现尤为突出,她共出战4盘单打,3盘双打,7战皆以2比0获胜。

了解张德英的人,无不为其的奋斗精神所感动。

张德英是上海人,幼时在少体校练打乒乓球。1966年曾随上海队获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团体冠军。文革开始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锅炉工、售货员……。待到国家恢复体育竞赛,她重新拿起球拍,被选进黑龙江省队。因球技荒废多年,参加1972年全国比赛成绩很差。张德英毫不泄气,立志要在三年之内,打进国家队。如愿后,又发誓要在三年之内拿世界冠军。

第一阶段,我队3:0击败日本队,将同南朝鲜队争夺冠军。

葛新爱、张立、张德英都力争要上场。

教练们考虑到上届世乒赛葛新爱出了奇兵,南朝鲜队已把她作为目标来研究,估计困难会更多些。大家倾向于出张立、张德英两个快攻,打阵地战。

宣布名单时,我肯定了三员女将勇挑重担的精神,说:“一共两场单打,总有人轮不上。谁让你叫葛新爱的,又‘葛’又‘爱’的,只好忍痛割爱了……”葛新爱听了哭笑不得。

决赛前,南朝鲜队教练用“长胶”帮队员适应葛新爱的打法,临阵磨刀,不快也光。这边葛新爱也煞有介事地上场练球。

名单交换后,看得出来南朝鲜队见葛新爱不上有些慌乱。有志者事竟成。张德英在比赛中打得很有章法,她与张立合作,单双打全赢。为中国队以3比0获胜,第3次拿下了考比伦杯,立了功。

## 4 中朝姊妹心相映

在女双比赛中,我队的杨莹和朝鲜队的朴英玉配合。这是第一次跨国组合参赛。两位姑娘体型相仿,打法相同,都是直拍反胶拉弧圈球进攻。不同的是杨是右手,朴是左手,是双打最佳组合。

中朝双方教练都格外重视,早就在一起训练沟通。前16名时,她们与南朝鲜的郑贤淑和李艾莉萨相遇。朴英玉会说几句中国话,两人在场上嘀嘀咕咕,还借助手势,互相通气鼓劲。南朝鲜两人都是主力,但一攻一守,用行话讲是“瘸子”,先天不足。中朝女将密切配合,在两国教练场外督战下,经过努力战胜对手。

进入前八名后对手全是中国的运动员。她们一路顺风,中朝女将手拉手,兴高采烈地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一位朝鲜记者说：“这座冠军奖杯是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结晶。”

女子单打决赛与两年前加尔各答世乒赛一样，是在张立与朴英顺之间进行的。结果也一样，朴英顺获胜。

发奖仪式上，抱着奖杯的朴英顺激动地向观众致意。张立伸出双手，再一次向朴英顺表示诚挚的姊妹般的祝贺。

## 5 连胜 11 分反败为胜

男双冠亚军决赛在两对中国运动员之间进行。值得称赞的是黄亮和陆元盛，顽强拼搏，在争夺前 8 名时，把卫冕冠军匈牙利的约尼尔和克伦帕尔淘汰出局。双方打成 2 : 2，第 5 局黄亮、陆元盛以 11 : 20 落后。在场的人几乎都认定匈牙利选手必胜无疑时，黄亮和陆元盛竟然一口气连追 11 分，最后反以 22 : 20 反败为胜。全场观众被中国运动员临危不惧、顽强奋战的精神所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匈队教练别尔切克以后每次见到我时，总要提起这场对他来说刻骨铭心的比赛。既佩服黄亮、陆元盛，又对约尼尔、克伦帕尔表示不满和无奈。

男子单打冠军由日本的河野满获得。

混合双打决赛，法国的塞克雷坦和贝尔热雷战胜了日本田坂和横田，为欧洲获得唯一一项冠军。

世乒赛前曾从非正式渠道耳闻中央领导同志有过议论：乒乓球一共七项冠军，拿了四项，还嫌不够，像个什么话呢。我寻思，本届世乒赛中国队获得三项半冠军，恰到好处。

## 6 千里马之邦

第 35 届世乒赛原计划在美国举行。乒乓球在不少美国人看来不是竞技体育项目，而是游戏。由于美国乒协经费拮据，最后撤回申请。南斯拉夫和朝鲜乒协随即争相承办。考虑到南斯拉夫举办过两次，而朝鲜还是第一次提出申请，加上朝鲜运动员朴英顺连续两届夺得女子单打世界冠军，提高了其在国际乒坛的地位，所以国际乒联赞成朝鲜举办。

朝鲜乒协在国家的支持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将一座可容纳两万观众的平壤体育馆装潢一新。这座体育馆外观雄伟，馆内三面看台，平时可用来举行集会和演出。参赛的运动员住在邻近的旅馆比较方便。平壤街头到处悬挂、张贴着世乒赛的横幅和宣传画，左手握拍的朴英顺打球的姿势尤其突出醒目。表明朴英顺“三连冠”志在必得。

朝鲜举办世乒赛，国际舆论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

南朝鲜队能否参赛。

朝鲜方面首先提出北南双方联合组队参赛的倡议。北南双方曾为此多次进行了会谈接触，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重视，但是会谈最后没成功。南朝鲜乒协表示单独派队参赛，但直到开幕之日仍未获得入境签证。虽然会谈没有成果，但体育比赛促成了朝鲜北南双方的对话。

朝方考虑到我既是团长，又是国际乒联的官员，非要热情地把我安排到很远的一座宾馆去住。

宾馆的条件很好，但对我来说很不方便。我再三要求跟代表团住在同一旅馆，朝方执意不肯，让我干着急。住宾馆外出很不方便，闲着就在大客厅里绕圈跑步，锻炼身体。我执意要搬朝方才表示同意。临走时宾馆的负责人阿妈妮热情地出来送行。她拉着我的手说：“刚住几天就要离开，真有点舍不得……”。

## 7 危机总爆发

参加男子团体赛的五名运动员是郭跃华、黄亮、李振恃、梁戈亮和新手卢启伟。

比赛办法同上届世乒赛一样。前几场比赛还算顺利。没料到在争夺小组冠军时，我队竟以 2 比 5 的悬殊比分输给了匈牙利队。

匈牙利出场的是“三驾马车”约尼尔、克兰帕尔和盖尔盖伊。约尼尔和克兰帕尔自 70 年代初就锋芒毕露，已连续参加五次世乒赛。约尼尔头发都快秃没了，过去，他的弧圈球左右开弓，显得凶而不稳。如今他加强了“过渡球”，减少了无谓失误，手中愈发有数。克兰帕尔技术全面，也越来越成熟。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第三号人物盖尔盖伊，有了长足的进步。匈队如虎添翼，实力大增。

对匈队的进步，我们估计不足。在上届世乒赛中，我男队蝉联了冠军，思想上有些放松。由于当时梁戈亮、黄亮这两块“怪板”起了较大的作用，使不少人产生了依赖和侥幸心理。

欧洲选手一直把我队作为研究目标。过去，总感觉他们不太善于总结，在比赛中吃了亏后，常常记不住。现在可以录相，他们就可以反反复复地分析研究。吃一堑长一智，他们比从前聪明多了。我们也有同样的条件可以研究欧洲打法，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居安思危，技术上又缺少创新，欧洲选手一旦适应了我们的打法，我们的优势也就不存在了。

这次小组比赛时出场的是李振恃、梁戈亮和郭跃华。尽管李和郭一胜一负，梁戈亮还是负了三分。

虽然这场比赛并不影响我队进入决赛，但士气受到挫伤。我队以 5 比 2 战胜了捷克斯洛伐克队后，争

夺冠军的决战,又一次与匈队相遇。

决赛李振恃和郭跃华肯定要上。这第三号人选上谁?李富荣教练颇费思量。再上梁戈亮肯定不行;若上黄亮,他的打法与梁属于一个类型,估计黄亮也难以打开局面。最后,大家不得不考虑让新手卢启伟上场。卢启伟来自北京,直拍快攻打法。一年前随队出访欧洲,曾战胜过克兰帕尔等名将。教练员们认为上卢启伟会有一搏。

4月30日晚,平壤体育馆里坐满了观众,人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前来观看这场世界最高水平的决战。欧洲各国的乒乓球人士和记者们,更是期待着匈牙利队能为欧洲取得荣誉。

决战开始,中国队打得过分拘谨,除了表明前一战失利的阴影仍然没有驱散外,打法上确实显得被动。我们的反手进攻很弱,而对方则能左右开弓。过去我们对付人家是两手打一手,现在变成了欧洲两手打我们一手,我们只能近台,战术上无回旋的余地。相反对方却拼劲十足,既能快攻,又能连续拉弧圈球,近台远台进退自如。这场比赛,中国队打得毫无生气,很快以1:5的大比分败北。匈牙利队终于夺走了团体冠军。

胜利到来的一刹那,并没有看到匈牙利队欣喜若狂,互相欢呼拥抱的激动场面。只见别尔切克和场外的运动员们推开挡板,走向中国队一方与李富荣等握手致意,似乎这个胜利早在他们预料之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看到这种场面,更加让我受到深深的刺激。

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直拍进攻打法危机的集中暴露。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先进打法,它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引领世界潮流。但是,如果它不发展、不进步,就可能变为落后,甚至淘汰。

赛后,有外国记者问李富荣:“中国队什么时候能把奖杯夺回来?”李富荣是个不服输的人,他真想明天就夺回来。但他还是含蓄地回答:“匈牙利队用了27年时间,重新拿到奖杯,这很不容易。我想中国队恐怕用不了27年。”

## 8 输出一句“俏皮话”

男子单打比赛,前8名中有4个中国队员:郭跃华、李振恃、鲁尧华和梁戈亮。经过1/4决赛,郭、李、梁三个各自战胜了对手,进入了前四名,形势非常有利。谁知,此时杀出了一个程咬金,这就是日本的新手小野诚治。

小野诚治貌不惊人,在国际乒坛上没什么名气。他与鲁尧华激战五局死里逃生,接着,又淘汰了打法相似的黄亮、梁戈亮。男单决赛在郭跃华与小野之间进行。然而,比赛还没有打完,我们夺冠的希望又成了

泡影。

第3局,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只见郭跃华的奔跑速度突然减慢。不一会儿郭跃华在跑动中突然跌倒在地,比赛不得不暂停下来,这时才知道他的大腿肌肉拉伤。裁判允许紧急处理。大会的医生给郭跃华喷了点药,他又上场了。

郭跃华在连输两局的情况下,带着伤痛坚持拼搏,居然把第三局给拿了下来。

稍事休息后再战,郭跃华拉伤的腿实在跑不起来了,只能再次要求暂停。我对郭跃华说:“如果坚持不了,就不要太勉强……”。郭跃华态度很坚决地说:“继续打,我站在那里也要想办法拿下来……”,说罢又一瘸一拐上场。

郭跃华的一番话,确实使人感动。然而他已经站在那里动弹不得,要取胜对方谈何容易。看到这种情况,不得不让他弃权。郭跃华含着眼泪默默地走下场来。

一场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最后以一方弃权而结束,这在世乒赛史上还是头一回,小野诚治靠他的实力,加上他的运气,摘走了男子单打的桂冠。

男子双打中国队全部失利。

在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包揽了冠亚军。当梁戈亮和葛新爱捧着奖杯从领奖台上下来时,李富荣苦笑着说:“托女队的福,咱们男队总算拿了半个冠军。虽然没有光着屁股回去,也只剩下了一条裤衩了。”

球输了,俏皮话仍然不少。

## 9 半边天

常言道,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女队在本届世乒赛中一举夺下了全部冠军。

先是在女团决赛中以3比1战胜朝鲜队,蝉联考比伦杯。在这场比赛中,张德英表现出色,她在葛新爱0比2负于朴英顺,中国队处于不利情况下,以2比0胜了朴英玉。在第3盘双打比赛中,她和张立又击败朴英玉/洪吉善。在第4盘中,她又从多次从落后的险境中摆脱出来,最终以2比1战胜朝鲜主将朴英顺为我队获团体冠军立下了战功。

张德英和张立、葛新爱和阎桂丽还分别夺得女子双打的冠亚军。

女子单打的冠亚军决战最后在葛新爱和朝鲜横拍削球手李松淑之间展开。葛新爱用搓球结合拉攻的战术直落三盘夺魁。国际乒联主席埃文斯对这场球一个劲地抱怨,“这场世界冠军决赛一点也不精彩”。这也

(下转第26页)

● 特邀论坛

# 对身体历史的反思

张之沧<sup>1</sup>

**摘要** 身体的历史无疑经历了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人类伊始,当然要以身体为本。而自奴隶社会起,奴隶的身体就异化为牛马不如的工具。从此,身体便开始受到至上性精神的控制。直到19世纪倍受凌辱的身体才开始觉醒,逐渐将“解构主体、解放身体、以身体为准绳、进到生命之心”的呐喊变成令人惊异的思想 and 行动。今天,伴随人类身体观念的巨大转变,已在全世界掀起呵护和提升身体地位的热潮,使愈来愈多的人既激烈反对伤害身体的战争和各类暴力,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投身体育事业,仰慕体育英雄,践行体育人生,并将美化身体、美化心灵、美化人格升达为体育之魂,掀开用身体之美来撰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关键词** 身体历史;反思;沉沦;觉醒;新身体观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21-06

##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ZHANG Zhicang<sup>1</sup>

(1.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body obviously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mankind, of course, it lives on the body. Since the slave society, however, the slave's body is degraded the tools as the cattle and horses. From then on, the body begins to be controlled and be persecuted by oppressive spiri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abused body had not a-waken and resisted until the 19th century, and gradually change the shouting of "deconstructs the main body, liberates the body, takes the body as the criterion, goes into the heart of life" into amazing thoughts and actions. Today, along with the big change of the idea of human body, the upsurge to defend and improve the body status has been taken around the world, make more and more people vehemently oppose to the war, violence, and all kinds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hurting the body,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ports, thrown himself into sports service, admire sporting hero, practice sports life, and to take the beautifying body, beautifying soul and beautifying personality raising the spirit of sports, from then on, also has opened a new chapter of the human history that is written remembered in the body.

**Key words** history of body; reflection; sink into; awaken; new physical perspective

在论及“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纲要时,习主席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这种理念不只符合人的身体历史发生发展的规律,代表整个生命的趋向和人类的未来,也表明只有健康、幸福和快乐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只有健康的身体作为人类至真、至善和

至美的载体,才真正使个体成为超越人类社会和宇宙万物之上的存在。换句话说,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没有人的存在,当然也不会有人的感知、思想和整个世界。然而回忆今天觉醒的人类对身体的本质和对其至上性的肯定,却经历了一个炼狱般的进程。现在反思身体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的历史,必将对认识人的本性、人格的塑造、人的理想目的,驱逐往日那由暴虐的精神对身

收稿日期:2017-04-1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重点项目《创新思维的理论与实践》,项目号:12ZXA00。

作者简介:张之沧(1948-),男,江苏邳县人,哲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身体哲学。

作者单位:1. 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23。

体的惩罚和加害,消除杀戮身体的战争和恐怖活动,促进世界和平,彻底解放身体,找回真人,实现人性的复归,开辟人类全新的历史,有着颠倒乾坤的价值。

## 1 身体的沉沦

身体原本为大自然所赐,代表着人的全部,也是评判万物的尺度,为此,古希腊的柏拉图才将延续至今的奥林匹克精神突出的“健康、美丽和智慧”的身体观置于首位。坚信“身体健康就是至上之善。……它本身就是一种终极的和内在的价值”<sup>[1]</sup>。以至在如何实现完美人格的途径上,他不仅把人的健康身体作为最高目的,而且认为要想“建成一个理想国家和强大的民族必须开始于人的健康身体”。然而正是在哲学家标榜“人之身体是任何高贵的身份与显赫地位都不能代替”的时候,身体在精神理智、政治权力、经济地位、荣誉名声、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外力作用下,被迫向对立面转化,导致人类精神对身体的否定和蔑视,使身体长期处于被奴役、压迫、排斥、打击、折磨及杀戮的地位,使其沦为精神施暴的对象,蜕变为低于动物的工具。仅在古希腊时代,占据总人口80%的奴隶的身体就陷入地狱般的深渊,从此将人的身体带进被随意买卖、剥削、规训和宰割的历史。具体表现:

1) 身体从主人沦为奴隶。特别是处于异化状态中的奴隶阶级和劳动阶级,由于深受各种国家机器的管制,使其隐藏在体内的潜能被耗费,欲望被幽禁,粗糙的肉体深受精神的蛮横压制。现实中包括律法、监狱和话语霸权在内的各种处罚机器都对活生生的身体起到摧毁性作用。特别是各类国家权力或部族权力总是肆无忌惮地将人变成奴隶。其突出表现是:长期以来,国家法律对囚犯往往施以惨不忍睹的酷刑和极端残暴的处决,诸如肢解、车裂、火烧、绞刑、砍头和四马分尸。这些对身体的毁灭形式既过分地暴露人类精神的专横、暴虐、以及用刑罚取乐的残忍,也证明人类没有认识到被惩罚的身体的无辜。以致法国思想家马布利曾为身体鸣冤叫屈:人类犯罪,“如果由我来施加惩罚的话,我一定打击的是诡计多端的灵魂而非朴实直白的肉体”<sup>[2]</sup>。因为肉体只做它需要和应该做的事。即便是现实中由于理智作用,引导人之肉体犯下罪过,也要从社会、历史和实践的高度,从感性和理性、精神和肉体辩证统一的角度,立足于人的情欲、情感、欲求、本能、变态、失控、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性地审视与裁决,而且裁决结果总是那自认为拥有理性的社会统治者拥有罪责或过错。因为理性对身体的超越,总是包含着对身体的专断性驾驭和武断性否定。

2) 身体从主体退化为工具。特别是私有制导致的劳动异化使身体作为劳动主体,付出的越多,得到的越少,也即“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sup>[3]</sup>。这样,他的身体也就不属于自己,成为他之外的存在。结果,灵魂越完美,身体越畸形;创造的物品越文明,自己越野蛮。劳动者作为身体,只是在执行其动物机能时,才觉得是人;“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sup>[4]</sup>。最终是把人变成非人。在这里,异化劳动“把劳动者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起码、最可怜的物质生活,而把劳动者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sup>[5]</sup>。由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部丰富性对异化的人来说都消失殆尽。

如此一来,工具性的身体也就自然受到精神的驾驭和统治,日益失去身体的内在本质,包括身体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选择性、适应性以及体力、耐力和韧性。在这种异化状态下,人的日常行为不是服从身体的本性,遵循身体的规律,而是服从精神编造的各种人生观、价值观和对权力财富的追求。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认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时刻准备摆脱肉欲和身体的纠缠,让灵魂得以解脱和独立。因为身体对于知识、智慧、真理、正义和美德来说,常常是通向它们的障碍。充满欲望、本能、烦恼、疾病、恐惧、冲动和不安情绪的身体总是不停地在打扰灵魂的思考。战争和金钱等种种贪欲也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搅乱灵魂的纯粹探索。诸如此类,实质上都是对精神的盲目崇拜和对身体的盲目贬低。

3) 如果说在阶级社会,劳动者的身体完全沦为被使唤的工具,那么一切剥削阶级或统治者的身体,则在各种欲望的刺激下日益变得纸醉金迷和腐败堕落。结果自然会使原本健康和充满野性的身体变得弱不禁风、百病缠身。有人把这归罪于充满欲望的身体。其实这是对身体的歪曲。身体原本只为生存而活,它固有的本能和欲求也只代表内在的生命力。至于私有制以来,人类滋生出来的无尽的欲望,类似物欲、财欲、淫欲、色欲、权欲、贪欲和妒忌之欲,那都是“性起而伪生”的结果;都是理性激发出来的无限欲求,使得人类变成千百种欲求的凝聚体。这种贪欲的滋生不仅导致许多王公贵族、有钱富人、纨绔子弟终日醉生梦死、萎靡不振,也导致一些堕落者为寻求精神的刺激被迫出卖肉身,导致身体完全沉沦。

特别是中世纪,身体完全被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大肆鼓噪的主体代替之后,精神对身体的长期奴役和否定,便使得身体完全处于被遮蔽、压抑和扭曲的状态。在这里,“人”已经变成精神主体煞费苦心虚构出

来的概念木乃伊。此时,人的身体因受到一种高尚主体的钳制和幽禁而丧尽生机。这种被神圣化的精神主体不仅利用干瘪的理性否定人类对感官的一切信仰,而且用人伦道德、法规秩序、纪律逻辑来宰杀生命,摧残肉体,熄灭活生生的欲望,压抑蓬勃的本能,制造虚假的人格。因为在虚假的主体中,肉体、感性、欲望和迷狂统统被拥有强权的虚假主体绳之以法。结果本真的人性不仅被各种繁忙所支配,而且在虚假主体刺激起来的各种欲望的支配下,堕落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消费机器、专制机器、生产机器,使人本身完全处在一种“不在家的异化状态”,一种精神奴役肉体、主体支配身体的对立状态。从此,身体陷入似乎永无出头之日的牢狱,任凭形形色色的精神枷锁、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器的胁迫与钳制。及至今天,人类身体依然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和状态,即如福柯所言,人类精神编造的知识和谎言仍然在“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sup>[6]</sup>。最终酿成现代人滋生幻觉、心乱意迷、郁郁寡欢,或是恣意妄为、颐指气使、挥霍无度,制造了混乱不堪的精神现象和社会现状,以至完全背离了身体自身的朴实本性和诉求,没有认识到“我们生活的关系应该尽可能简单,甚至单调的生活,只要这不至于产生无聊,都会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sup>[7]</sup>。

## 2 身体的觉醒

尽管迄今的人类身体在许多国家和人群那里仍然处于沉沦状态,但只要深入追踪其演变历史还是能够从中发现身体的原始活力、狂热行为,以及各类“性禁忌下面,显现的鲜活的欲望”<sup>[8]</sup>。换句话说,在世界范围,至少古希腊时代流行的“竞戏”,就完全是青年人展示自己身体之美的艺术形式和体育运动。这种竞戏最可爱和最具魅力的地方就在于以“最美丽的艺术照耀出它自身为一种完美无缺的形式,即裸体青年们之谐和动作的优美。这种竞戏不仅促动体育成为希腊人的第一需要,也成为今天全人类所热爱的身体艺术和体育运动。自那之后,尤其在文艺复兴时期,长期受压迫和被奴役的身体就开始逐渐觉醒,要求摆脱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和压制,挣脱上帝所制造的虚假实体和抽象精神,去除原罪说,恢复“原罪”之前的身体,回归身体固有的自由意志和自然本性,讴歌“复活之身散发的光辉”,赞颂“荣耀之身的大美”,并将人的身体之源追溯到那能够散发出生命之光的圣体和圣物。由此,不仅增加了人类的存在感和凝聚力,而且也

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和意识,那就是: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而言,他们拥有的是新的身体”<sup>[9]</sup>。这个洗心革面的身体主要靠的是自身的汗水争取面包,并力求塑造一个公共的身体,让其做到“自由、机敏、灵活”,达及“健康、强壮,有力”,而不是往日那个“不胜娇弱、耽于声色”的堕落的身体。

此时的世俗之人也开始普遍地关注养生,注重身体锻炼,发展体育事业。所以自17世纪起,在西方世界就普遍地发展起网球、槌球、台球、曲棍球、木球、游泳、滑冰、射击、舞剑、以及九柱戏、有牌戏等运动项目和锻炼形式。并有组织地开展了各种围绕力量、速度、灵巧、技艺和审美而展开的体育竞技运动。目标就是使“身体更健康,机体更强健,身心更愉悦”。“使人们的体质得到增强,……并力求在总体上完善人类的本质。”<sup>[10]</sup>

上述身体的觉醒,到了19世纪便激发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根据这一理论,人的本质是意志。正是人的意志、欲望、本能、情绪、直觉、潜意识或动物性意识在认识世界和驾驭着人类行为。而意志当中又当数生殖意志,人的身体的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以及人的所有器官都是生殖意志的体现。正是人的身体内部隐藏的生殖意志在鞭策着人们去生殖和行动。由此,尼采认为:以往蔑视身体的人实质上是本末倒置地将心灵看作大理智,把身体看作小理智。实际上,身体才是有着一个心灵的大复合体。对于真正的觉醒者来说,“我全是身体,灵魂不过是指身体方面的某物罢了”。人就是身体的存在。其中“最优秀的公众性的身体,乃是世界的尺度”<sup>[11]</sup>。摧残身体者终将导致自我毁灭。为此,人们不要只倾听精神的挽歌,宁可倾听健康身体的声音,那是更诚实纯粹和更具有感召力的声音。健康、完美而又正方形的身体更富有活力。所以,一个人只有否定以往的一切道德信条和理性法则,才能真正做到身体壮实,灵魂刚正。有史以来理性的最大错误就是扼杀了非理性的身体。与日神阿波罗相比,酒神才真正代表身体,真正热爱生命,希求幸福,才能成就真实人格,消灭虚假主体。

继尼采之后,哲学家萨特对身体有着更深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宇宙间真正的存在就是“人的存在”或“我的存在”,而“我就是我的‘此在、我的人为性、我的身体’”,也即我的“身体的存在”。<sup>[12]</sup>因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皆可怀疑,而“我的身体的存在”则恬然澄明。它是万物存在的前提,周围世界说到底也是“我的身体的世界”。比如“在我注视山谷的那一时刻,我获得了一个观点,而对这一观点的那个观点,就是我的身

体”<sup>[13]</sup>。正是它表征：现实中一切真理都同身体的存在相关联。正是身体活动指出源出的真理现象；也正是身体活动的展开才能达到源出的真理。这样一来，一切真理也都必然以身体对自身存在的领悟为转移。至此，在真理和身体的关系上，我们便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在最原始的意义上，真理乃是身体的展开状态。二是，身体在同样源始地在真理和不真中。”

人类精神对身体的长期压制和导致的人性异化，不仅在19世纪唤起已经千疮百孔、倍受凌辱的身体的觉醒和反抗，而且随着人类对身体的日益关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认为信仰实在的身体比信仰虚幻的精神或虚假意识更具有根本意义。所以，此时人类对身体的关注，当然不是只限于哲学家主张的抽象理论，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也早已开始关注人类的身体。比如早在19世纪，诸多国家就普遍“承认公民生病的权利，而且将这一权利由国家福利加以保障。”到了20世纪则迎来人的又一项新权利——健康权。它被认为是人充分发展的一部分。由此导致整个“20世纪身体的历史就是前所未有的医学化过程。西方医学将超出从前想象范围的一些日常生活行为也囊括其中，并纳入研究领域。它已经不仅仅是人们生病时主要的求助对象，而且也变成能够与传统意识方向相抗衡的一种生活导向。它制订行为规范，审查人们的乐趣，把日常生活紧紧地束缚在医嘱之网中”<sup>[14]</sup>。

至于文化艺术领域，面对人性的堕落、与日俱增的暴力及苦难的现实，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立足身体美学，指出，人的本质是爱欲，人的解放是爱欲的解放；社会革命就是要通过艺术审美解放人的爱欲。因为人在本质上是感性身体的存在；他拥有自己的情欲和需求。特别是情欲，那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理想”。人类长期宠爱的自我和超我实质上一直受着本我——身体的支配。“本我是最直接、最根本、最广泛的层次，这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的本能的领域。本我不受任何构成有意识的社会个体的形式和原则的束缚。”<sup>[15]</sup>人的本质活动就是满足身体的欢乐；目标就是要维持作为快乐主—客体的整个身体。这样，爱欲自然就要求要不断完善有机体，发展感受性，培养审美和快感，“消除苦役，改造环境，征服疾病和衰老，建立安逸的生活。”<sup>[16]</sup>由此，他提出，自由社会必须建立在本能需要上。当爱欲得到彻底解放时，人类也就进入一个更高级的进化阶段。至于解放爱欲的途径，就是符合人性的艺术革命。艺术既能够使人获得比多的满足，也能够产生一种非压抑性的本能。因为艺术的最高使命就是从属快乐原则，以至“当肉体完全成为一个

对象，成为一个美的东西时，它就可能预示一种新的幸福。在美的肉体的艺术展示中，……预示了一种人类从理想中释放出来而达到的快乐”<sup>[17]</sup>。一旦人成为真正的审美主体，便可使人的自由感、完整性和肯定性，亦即幸福和快乐得以真正实现，从此开辟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

### 3 身体观的转变和实践

人类进达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者便竭力倡导“解构主体、解放身体”；认为“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进到生命之心，已经成为身体本能发出的令人惊异的思想”。这种主张“身体至上”的观念，在二战后便引发许多深受战争残害的国家和人民发出“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反对屠杀、珍惜生命、呵护身体、捍卫和平、维护安定”的呼声。特别是近些年来鉴于世界性恐怖活动的猖獗，联合国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联合起来打击各种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号召各国裁减军队，限制各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试验、使用和发展，以避免对人类生命的血腥杀戮。在这同时，许多国家针对战争对身体的伤害，也在积极地发明制造各种“机器人战士、新型男兵、电子人”，以及较之以前更坚固的“伟大身体”。

也正是在践行捍卫人类身体的基础上，现代国际上各种人权组织、慈善组织、经济组织都在积极介入和关注，以解除世界上仍然普遍存在的饥饿、疾病、战乱，以及各类天灾人祸对人类生命及身体的伤害，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生命死亡，保证人的身体正常发育。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世界医护人员联盟等也都在竭力支持各国政府发展现代医学，研究、推广和应用诸多疑难病症的防治技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与此同时，各个国家也都在开发养生学、人体工程学和运动卫生学，强化劳动医疗服务，以强身健体，延长寿命。

为了提高人的生命质量，达及由美的身体、美的心灵、美的精神、高贵的天性、精明的头脑、乐观的气质、爽朗的禀性，以及健康完善的体魄构成的美的人格，当今世界还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强化了具有内在情感力量和审美能力的美育，并将其上升为体育之魂。认为美育不仅能够培养和展示人的形体美、语言美、声音美、情感美、形象美，还能够塑造各种美好的德行，及至愉悦身体，美化人生。认为真正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快乐和持久不变福祉的因素就是美的人格。它虽不是银行里的支票，却是换取幸福的现金。所以今天人们普遍地从审美高度，关注那能够享受快感的身体，以及那

使人具有崇高境界和超凡魅力的身体美学;重视那对常人具有极强说服力的“情感之爱”与热情洋溢的身体语言;认为它可以解放人类久被禁锢的身体,释放久被束缚的激情,丰富长期单调的灵魂,让生命尽情享受自由;使人类生活日益变得温馨、美丽及合乎本性。为此,随着当代信息网络和虚拟技术的兴起以及后人类社会的到来,人们开始普遍关注自己的容貌、形象、体魄、健康和生存的质量。以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各种身体技术,如护肤术、整容术、整形术;举行各种造美运动,如时装秀、模特业、纹身刺青、日光浴、自然美、古铜色革命等,以美化身体;也提倡性爱与婚姻、生育和家庭的分离,使更多的人根据需求和兴趣来包装自己,使精神成为肉体的流露和外溢。

再就是,世界休闲组织、民俗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等各种文艺组织和团体,还大力提倡和开展情人节、音乐节、狂欢节、以及各种节日中的亲情活动,以推动世界各国、各民族大兴文艺活动,发展影视艺术,倡导身心合一。与之相应,“感觉与想象在此展开无尽的、优雅的交谈,激发出各种表演和诸多关于感觉的传奇故事,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充满诗意的身体”<sup>[18]</sup>。使长期隐蔽、羞涩、怯懦的身体一反常态朝着光明正大的方向勇敢前进,使其日益变得更天真烂漫;使“活生生的肉体变得更美妙、更动人、更真实和更具肯定性”。

至于各种国际性体育组织和各国奥委会等,为了提升全人类的身体素质,建立和谐健康的全球大家庭,当代承担的最繁重任务就是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深入发展体育竞技,普及身体教育,繁荣体育事业,培养体育人才,奖励体育英雄。迄今为止,这些国际组织除了普遍开展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以及各种职业联赛外,就是鼓励世界各国广泛兴起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另外,在世界范围开展的全民健身运动也是多种多样,类似旅游踏青、郊游散步、科考探险、以及各类游戏活动、环境运动等。以至今日“家庭百科、家庭用书以及实用生活词典上突然出现了不计其数的体育活动种类。它们的方法也前所未有的细碎,而且号称能够给你‘一个更加柔软、更加和谐、更加漂亮的身体’”<sup>[19]</sup>。

伴随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诸多国家各级政府不仅数十倍地增加各种体育运动场所、身体锻炼器材和体育运动设备,而且也都普遍地开设了身体锻炼课及体育培训课。而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都是为了人类身体的健壮和完美。此外,为了增加人们的身体锻炼时间,世界各国也都在尽可能地以立法形式缩短人们的工作劳动时间,增加节假日,延长节假日时

间,减少工作量,减轻劳动强度,减少体力消耗,改善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杜绝使用童工,发展劳动保护事业,减少职业风险,杜绝工伤事故。掀起厨房革命,家居革命和厕所革命,将妇女从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加强身体保养,提升身体素养。

基于人类普遍追求身体享乐主义及其自主行为,既使人体在极短时间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也使得今天的人类“身体已经成为日益明显的彰显个人身份的筹码”<sup>[20]</sup>。并由此带来个人锻炼目标的转向,即人们锻炼身体“不仅仅是为了卫生或者精神,而且是为了一种自我确认;不仅仅是追求力量,而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锻炼追求发展和坚韧的精神”<sup>[21]</sup>。特别是“身体真实性的感觉,这需要持久的、力量和运动方面的主动活动”<sup>[22]</sup>。为此,人们不仅关注内部身体,也关注外部身体,认为只有美好的自然环境、新鲜的空气、清洁的用水和美丽的动植物生命才能让人拥有“春天般的身体”,享受乡野粗犷的快乐,使身体变得美不胜收。

人们由关注外部身体,进到外表的保养:保持体重适中、皮肤光洁、头发亮丽、姿态美观、走路姿势大方;进而进到关注内部的身体:注重呼吸匀称、肌肉有力、动作轻盈、行动敏捷,一心想使自己成为“身材雕塑师”;并在观念上确信“美丽、力量与命运是一回事”;坚信“整洁、坚强、勇敢和有风度的外表可以后天培养”;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训练获得身体的强壮和快乐;并由此产生“运动文化趋向于成为最高程度的身体文化展示”。

眼下人们对身体的关注和地位的抬升,也使他们在追求时尚身体的过程中,导致感觉发生革命,那就是过去人们引以为荣的通常是“权力地位、功名利禄”,今天人们引以为豪的是身体健康,身姿美丽,生活美满,生命长寿。由此也形成一种对“深层身体的信仰”,即“通过关注身体来解放精神,回归自我”。这不仅使得养生、美容成为新的圣经,也推动社会上相关职业的繁盛,使得审美业、服装业、美容业、整形业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类似追求身体舒适、快乐的“健康俱乐部、健身俱乐部、轻捷疗养所、海洋护理中心、活力洋溢培训班、柔软体操、身体记忆训练”等职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使人的身体成为内在体验的中心。

上述所有努力,不仅继续提升和改变着人们的身体观、运动观、生活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使更多的人自觉积极地参与体育锻炼,投身体育运动,确立体育理想,践行体育人生,也在现实上引起20世纪以来人类身体发生重大改观:带来婴儿成活率提高,健康指数提升,总体寿命延长,生活质量改善,人类普遍变得更俊

美高雅,一些国家取消死刑,妇女生育完全自由。对许多女性来说,“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使女性地位在男权社会得到普遍提升。

也正基于二战后人类对身体的高扬,使得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在人的界定中用身体取代理性;认为身体可以只根据自身的力量竞技去从各个角度对世界做出解释。因为“意识除了是身体外不是任何别的什么,剩下的是虚无和寂静。身体的意识可以与姿势(signe)的意识相比较。此外,姿势是在身体方面存在的,是身体的本质结构之一。”<sup>[23]</sup>因此身体完全能够在它的生死盛衰中带着对全部真假的确证,霸道地主宰知识、道德和审美。他们认为,用身体驱走思想迷信,赶走传统道德,抬高欲望机器和快感的力量,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他们说,以往是理性蔑视和压制身体,今天将是反其道行之。因为从来的文化和物质生产者都离不开欲望和身体。正像乳房是产生乳汁的机器一样,身体也是产生整个人类文明的机器。身体中永远流动的欲望常常激发出惊人的强力,推动着积极的生产活动。因此是欲望创造了世界,是力生产了现实。因此人类史就是身体和欲望的历史。人之身体处处都铭记着历史的痕迹。

## 参考文献:

[1] 杜威. 哲学的改造[M]. 许崇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94.

[2]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处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17.

[3] [4][5]马克思. 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M]. 刘丕坤,译. 人民出版社,1979:44,48,87.

[6] 孔子. 论语[M]. 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36.

[7] 叔本华. 意志决定命运[M]. 韦启昌,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109.

[8] 福柯. 权力的眼睛[M]. 严锋,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4.

[9] [10]乔治·维嘉埃罗. 身体的历史,卷1[M]. 张立,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9,223.

[11] 彼德·布鲁克斯. 身体活[M]. 朱生坚,译. 新星出版社,2005:21.

[12] [13][23]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2:399,407,408.

[14] [18][19][20][21][22]雅克·库尔第纳. 身体的历史,卷3[M]. 孙圣英,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307,112,111,121,306.

[15] [16]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黄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7,155.

[17]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李小兵,译. 三联书店,1989:28.

## (上接第20页)

难怪,两个女削球手碰一块,泡蘑菇,没法精彩。我想,管它好看难看,能赢球就好。

女单决赛虽然没看头,但有一场比赛却打得惊心动魄,高潮迭起。

那是朝鲜的朴英顺对中国的童玲。

朴英顺是两届世乒赛冠军。现在本土作战,朝鲜人民对她再次蝉联冠军抱有极大希望。赛前观众早早地结队入场,啦啦队活跃在每个角落。

童玲来自四川自贡,横拍削球防守打法。1977年第一次访欧比赛,与曹燕华合作组成中国二队。在斯堪的纳维亚公开赛中,战胜了所有的外国对手,最后还赢了队,获得冠军。

比赛一开始,朴英顺猛打猛扣,如入无人之境,连胜两局。全场观众欣喜若狂,掌声、欢呼声响彻赛场。这时只见童玲不动声色,你喊你的,我打我的。观众席上的掌声逐渐稀少,代之以遗憾的叹气声。奇迹终于发生,童玲连扳三局,将如日中天的朴英顺淘汰出局。

事后有人问童玲,场上观众叫喊那么厉害,你当时是怎么想的?童玲嫣然一笑,说道:“我把它当作是为我加油,他们越喊我越起劲……。”童玲用“精神胜利法”来控制情绪,不受外界的干扰。

朴英顺失利,观众几乎全部离场。有人看到场外不少阿妈妮围在一起伤心流泪。

● 特邀论坛

# 体育统计学新视角:数据级数推断

刘鸿优<sup>1</sup>, William G. Hopkins<sup>2</sup>

**摘要** 抽样研究通常是对抽取的样本进行测量,根据测出的样本数值对总体参数值进行推断,假设检验、置信区间和数据级数推断的方法都被运用来进行这一研究推断。本文采取了一个体育学的抽样研究案例,分析和探讨了以上三种方法在做出研究推断时的优缺点。主要结果包括:基于传统的假设检验提供的p值进行推断时,推断结果具有较大的误导性,只能获得一个“二元结果”:显著或不显著,同时还面临着“I型误差”和“II型误差”带来的干扰。置信区间的添加可以对p值进行一定的补充,但并不能对研究结果推断提供实质性的、进一步的信息。通过加入一个“最小有意义阈值”,数据级数推断方法能给出一个“三元结果”:有意义正差异/相关、有意义负差异/相关和无意义微小差异/相关,并基于置信区间推算出总体值落在每一个结果区域的可能性,从而能让定量研究结果的推论更加丰富和准确,同时大大降低I型误差率和II型误差率,减少发表偏倚。

**关键词** 数据推断;定量研究;三元结果;最小有意义阈值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27-05

## Magnitude—based Inference: A New Statistical Approach in Sport Science

LIU Hongyou<sup>1</sup>, William G. Hopkins<sup>2</sup>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 Sports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 Institute of Sport, Exercise and Active Living, Victoria University Melbourne)

**Abstract**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normally to estimate the population value from a measured sample value. Null—hypothesis test, confidence limits and magnitude—based inference are used to achieve this estimation, which we name it to make the statistical inference. By taking an example of sport science, the current study compared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methods in mak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 Main results include that: inferences based on the p—value from null—hypothesis test are misleading, because it provides only a two—level scale of results: significant or not, and it often faces the problem of Type I and Type II error; confidence limits to some degree add more information to p—values, but based on confidence limits or combining p—values provides no decisive inferences; magnitude—based inference can provide a three—level scale of results by accounting for a “smallest worthwhile change/difference/correlation”: positive, trivial, and negative difference/correlation, and base on the confidence limits, magnitude—based inference can calculate the likelihood of the result being in any of the three scale, thus make the statistical inference richer and more accurate. Meanwhile, magnitude—based inference is proved that it can reduce the Type I and Type II error rate, as well as to reduce the publication bias.

**Key words** statistical inference;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ree—level scale result; smallest worthwhile

在体育学的定量(抽样)研究设计中,研究者们往往会选择一个样本进行量化测试,之后对测试出来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与总结。在几乎所有的抽样研究中,不同的样本都会给出一个不同的值,但没有任何一

个值是可以直接作为总体值(或称真实值、实际值)的,因此,研究者们只能采取一定的统计学推断方法通过样本值对总体值进行推断<sup>[1][2]</sup>。

传统的统计学推断方法是利用假设检验得出一个

收稿日期:2017-04-10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足球大数据分析方法与实证运用》,项目号:2016WQNCX015。

作者简介:刘鸿优(1986—),男,江西赣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统计学。

作者单位:1.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2. Institute of Sport, Exercise and Active Living, Victoria University Melbourne。

p 值来界定数据的显著性或非显著性,然而,基于假设检验( $p < 0.05$ )得出的数据推断往往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数十年来一直受到各种质疑<sup>[1-5]</sup>。美国统计学协会在 2016 年的申明<sup>[6]</sup>中提到,仅仅基于假设检验提供的 p 值无法估测一个研究结果的效果大小和重要性,也无法对一个模型和研究假设提供足够的证据。

为了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推断结果,各学术期刊陆续要求论文作者们提供研究结果的置信区间。但是仅仅提供置信区间是无法做出数据推断结论的,因而,在置信区间的基础上,新西兰的 Hopkins 教授提出了“数据级数推(Magnitude-base Inference)”这一全新的统计学推断方法。

本文将采取一个体育学定量研究案例对假设检验、置信区间和数据级数推断进行分析与探讨。

### 1 体育学定量研究案例

本文将围绕以下研究案例进行讨论:实施 3 个月的全新训练计划 A,能否有效提升初中二年级男子二百米运动员的运动成绩?

定量研究中,首先要对研究总体进行界定。本案例的广义总体可认定为所有的二百米运动员,而可取的研究对象总体则可界定为初中二年级男子二百米运动员(如图 1)。因此,本案例研究希望通过抽样研究

的方式,随机抽取 n 名初中二年级男子二百米运动员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测试,通过测得的样本数据推断训练计划 A 在研究对象总体(所有初中二年级男子二百米运动员)中是否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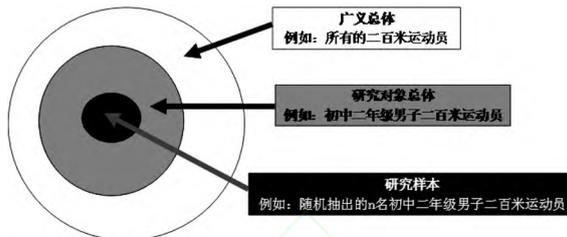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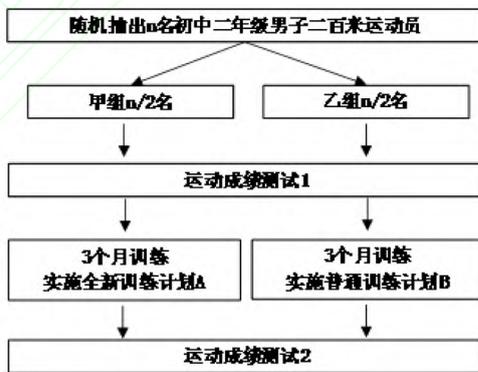
图 1 体育学中的定量研究实例

Fig. 1 An Example of Quantitative Study in Sport Science

在界定好适当的研究对象总体之后,则需要设计一定的研究计划来验证研究假设。本案例的研究假设可描述为:实施 3 个月的全新训练计划 A,能够有效提升初中二年级男子二百米运动员的运动成绩。基于此,可设计如图 2 中的实验方案。很显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验方案 2 是优于实验方案 1 的。但为了本文的数据推断方法讨论,本文假定本案例采取方案 1 进行研究。



方案1



方案2

图 2 研究案例的可能实验方案

Fig. 2 Possible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in the Example Study

在案例研究按照方案 1 实施之后,可获得以下数据:n 名运动员在绩测试 1 中的成绩,例如:26. 1、26. 8、27. 4、...、26. 4、28. 5 (单位:秒,下同);n 名运动员在绩测试 2 中的成绩,例如:25. 9、26. 7、27. 1、...、26. 4、28. 2。在此基础上,可算出每名运动员在测试 1 和 2 成绩的差值,例如:0. 2、0. 1、0. 3、...、0、0. 3,进而可获取 n 名运动员的成绩差值的平均值,例如:0. 2。此处的成绩差值的平均值,即代表了训练计划 A 在 n 名运动员组成的样本中的平均训练效果。

研究人员需要做的是对获取的这个差值的平均值进行数据推断,从而判定训练计划 A 在研究对象总体

(即所有的初中二年级男子二百米运动员)中的平均训练效果如何。

### 2 假设检验

在此研究案例中,传统的假设检验方法需采取配对样本 t 检验。检验的基本过程是:假设运动员在测试 1 和测试 2 中的成绩是无差异的(即零假设),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数据推算(可由数据软件完成)可得出一个 p 值。若 p 值  $< 0.05$ ,则零假设不成立:即运动员在测试 1 和 2 中的成绩有显著性差异,两者差值的均值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而得出结论:“该训练计划有正/负

面效果,建议/不建议教练员采用”;若  $p$  值  $\geq 0.05$ ,则零假设成立:即运动员在测试 1 和测试 2 中的成绩无显著性差异,两者差值的均值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而得出结论:“该训练计划无效果或该训练计划效果不显著,不建议教练员采用”。

对于  $p$  值的定义是及其复杂的,但现实中的研究者们往往错误地把它解释为检验中的零假设成立的可能性,进而错误地阐述自己的研究结果<sup>[1]</sup>。抛开对于  $p$  值定义的复杂性,假设检验也是不符合现实逻辑的,因为它仅仅得出一个“二元结果”:显著和不显著。若结果为显著,则代表差异或相关性存在,若结果为不显著,则代表差异或相关性不存在。但在现实世界,完全没有差异或者完全不相关的两组事物(数据)是不存在的<sup>[1]</sup>。作为研究人员,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差异或相关性的大小和重要性,而非其存在性<sup>[1,5]</sup>。

例如本文的研究案例中,假定出现两个实验结果:(1)实验测得运动员在训练前后(测试 1 和 2)成绩差值的平均值为  $-0.005$  秒,而  $n$  值足够大,假设检验的结果为  $p < 0.05$ ; (2)实验测得运动员成绩差值的平均值为  $-0.5$  秒,而  $n$  值相对较小,假设检验的结果为  $p > 0.05$ 。基于假设检验下结论时,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研究者们会陈述:“运动员在接受训练计划 A 后,二百米测试成绩有显著性提升,该训练计划有效果,建议教练员采用”;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研究者们陈述则为“运动员在接受训练计划 A 后,二百米测试成绩的变化不显著,该训练计划无效果(或效果不显著),不建议教练员采用”。但常识告诉我们,  $0.005$  秒的成绩改变在二百米运动项目中是没有意义的,相反,  $0.5$  秒的成绩提升则会是非常重要的改变。这其实就是统计学中的“I 型误差 (Type-I error)”和“II 型误差 (Type-II error)”带来的干扰,在大样本量的前提下,假设检验的 I 型误差率较高,而当样本量相对较小时,假设检验的 II 型误差率往往会高到令人难以接受<sup>[2]</sup>。

### 3 置信区间

在假设检验遭到各种质疑后,置信区间开始出现在各种研究论文中作为数据推断结果的一个补充<sup>[1]</sup>。

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是指由样本统计量所构造的总体参数的估计区间。一个概率样本的置信区间是基于此样本对某个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展现的是这个总体参数的真实值有一定概率落在样本测量结果的周围的程度。简单来讲就是置信区间可以通过样本测量值给出总体参数值可能的取值范围<sup>[1][5][7]</sup>。例如本文的研究案例中,实验测得  $n$  名运动员在训练前后(测试 1 和 2)成绩差值的平均值为  $0.5$  秒,  $95\%$  置信区间为  $0.1-0.9$  秒(可书写为  $0.5; \pm 0.4$ ),即代表在  $n$  名初中二年级二百米运动员组成的

样本中,训练计划 A 对运动员成绩的平均改变为  $0.5$  秒,而在研究对象总体(所有初中二年级二百米运动员)中,训练计划 A 的平均训练效果有  $95\%$  的可能性会落在  $0.1-0.9$  秒的范围内。

虽然置信区间的展示能让读者更加明确研究结果的取值范围,但是仅仅展示置信区间或者联合展示  $p$  值,对研究结果的推断并未在假设检验的基础上取得更多的进步<sup>[1][5]</sup>。

结合本文的研究案例,实验测出的  $n$  名运动员成绩差异的均值可能为  $0.2$  秒、 $0.4$  秒、 $0.6$  秒、 $-0.2$  秒、 $-0.4$  秒或  $-0.6$  秒,根据  $n$  值的大小,可以推算出测出数据的  $95\%$  置信区间(例如:  $\pm 0.4$  秒)。图 3 以置信区间的形式展示了以上 6 种测试结果,图中的横线代表  $95\%$  置信区间,横线中间的黑点代表实验样本测出的  $n$  名运动员在训练前后(测试 1 和 2)成绩差值的平均值。不难发现,第(3)和第(6)种测试结果的  $95\%$  置信区间内都不包括 0,等同于假设检验中的“显著性差异 ( $p < 0.05$ )”;第(1)、(2)、(4)、(5)种测试结果的  $95\%$  置信区间内都包括 0,等同于假设检验中的“非显著性差异(第 1 和第 4 种情况  $p > 0.05$ ; 第 2 和第 5 种情况  $p = 0.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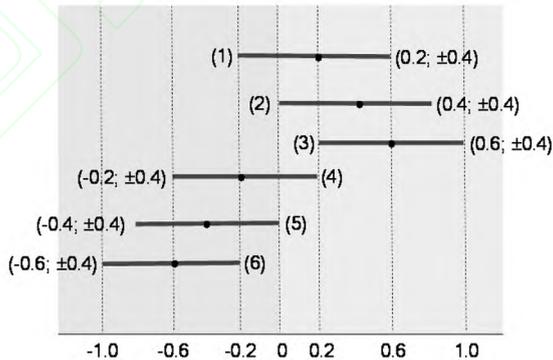


图 3 研究结果的置信区间展示

Fig. 3 Research Results Shown with Confidence Limits

### 4 数据级数推断

由上述分析可知,基于假设检验提供的  $p$  值对定量研究进行推断,只能获得一个“二元结果”:显著或不显著、相关或不相关、是或否、有或无等;置信区间的添加并不能对研究结论提供实质性的、进一步的信息。

在“二元结果”的基础上做出的研究结论往往无法避免以下问题:有些显著性的结果(差异或相关性)由于差异值或相关性太小,并不具备临床或实际意义,如本研究案例中的二百米运动成绩的  $0.005$  秒提升。

最简单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加入一个“最小有意义阈值”,形成一个“三元结果”:有意义的正差异/相关、有意义的负差异/相关、无意义的微小差异/

相关。这也就是“数据级数推断”方法的基础<sup>[1]</sup>。

本文将结合研究案例,通过图4来阐述这种包含“三元结果”的“数据级数推断”方法。与上文中的图3类似,图4中的(1)至(16)号横线分别代表了案例实验可能测出的16种结果,横线中间的黑点代表实验样本测出的n名运动员在训练前后(测试1和2)成绩差值的平均值,横线则代表该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与图3不同的是,图4添加了一个“无意义微小差异区”,即-0.2至0.2秒区间。本文假定0.2秒以内的运动成绩变化对于二百米运动员的成绩改变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提升或降低,因而将0.2设为研究案例中的“最小有意义阈值”,因此可以界定本案例中的“三元结果”: $<-0.2$ 秒,有意义的负差异区间; $-0.2-0.2$ 秒,无意义的微小差异区间; $>0.2$ 秒,有意义的正差异区间。由于二百米运动员的成绩为时间,时间增加为降低成绩产生有害训练效应、时间减少为提升成绩产生有益训练效应,因此,可以将三个区间划分为:有益效应区间、微小效应区间和有害效应区间(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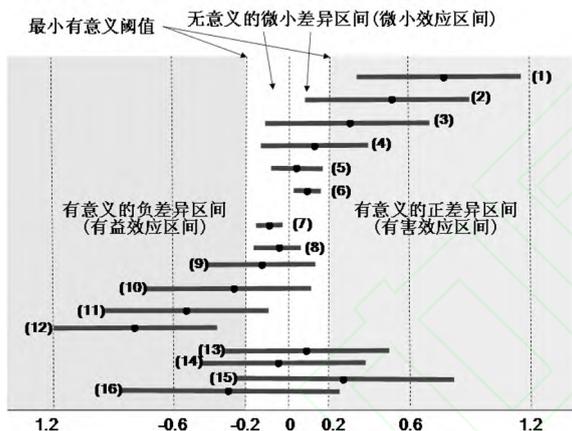


图4 加入“最小有意义阈值”后的研究结果展示  
Fig. 4 Research Results Shown with a Threshold of “Smallest Meaningful Value”

若案例实验的测试结果出现第(1)和第(12)种情况:实验样本测出的n名运动员在训练前后成绩差值的平均值及其95%置信区间完全落在有意义的正/负差异区间,则对研究结果的推论非常明确,即训练计划能带来有害训练效应、不可取(第1种结果)/有益训练效应、可取(第12种结果);若案例实验的测试结果出现第(2)、(3)和第(4)种情况:实验样本测出的n名运动员在训练前后成绩差值的平均值及其95%置信区间同时落在有意义的正差异区间和无意义的微小差异区间,对研究结果的推论亦相对明确:即训练计划会带来有害训练效应或只能带来无意义的微小效应,该训练计划不可取;若案例实验的测试结果出现第(5)、(6)、(7)和第(8)种情况:实验样本测出的n名运动员在训练前后成绩差值的平均值及其95%置信区间完全落在无意义的微小差异区间内,对研究结果的推论

依然明确:即训练计划只能给运动成绩带来无意义的微小效应,该训练计划不可取;若案例实验的测试结果出现第(13)、(14)、(15)和第(16)种情况:实验样本测出的n名运动员在训练前后成绩差值的平均值及其95%置信区间同时覆盖了有意义的正、负差异区间和无意义的微小差异区间,对研究结果的推论依然明确:即基于本实验测出的数据,该训练计划带来的训练效应不清晰,我们需要更大的样本量或者更精准的测量方式来进行推论。

问题在于,当案例实验的测试结果出现第(9)、(10)和第(11)种情况时,我们该如何对研究结果做出推论呢?可以看到,在这三种情况下,运动员在训练前后成绩差值的平均值及其95%置信区间覆盖了有意义的负差异区间和无意义的微小差异区间,数据结果相对明确:即训练计划能有意义地提升二百米运动员的运动成绩或只能给运动成绩带来无意义的微小改变,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做出“训练计划可取”的推断。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第(10)和第(11)种结果中,训练计划出现有益训练效应的可能性是高于微小训练效应的,而在第(9)种结果中,训练计划只能带来无意义的微小训练效应的可能性是高于有益训练效应的。然而我们需要明确的另外一点是该置信区间为95%置信水平下的区间,若取值为99%置信水平甚至更高,则三种情况都有出现有害训练效应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纳入有害训练效应出现的可能性即可做出相应的推断。当有害训练效应出现的可能性低于0.5%(即实验测试结果的99%置信区间的有害端——如图4的右端,不进入有害效应区间/有意义的正差异区间),与此同时,有益训练效应出现的可能性高于25%(即实验测试结果的50%置信区间的有益端——如图4的左端,进入有益效应区间/有意义的负差异区间)时,则可作出“该训练计划有可能带来有益训练效应”的数据推断<sup>[1][5]</sup>。

前文已论述了置信区间可以通过样本测量值给出总体参数值可能的取值范围,那么根据置信区间推算出的总体参数值落在有益效应区间、微小效应区间和有害效应区间的可能性皆可获取。Hopkins等(2009)<sup>[5]</sup>将总体参数值落在各个区间的可能性大小做了以下划分: $<0.5%$ ,极其不可能; $0.5-5%$ ,非常不可能; $5-25%$ ,很不可能; $25-75%$ ,可能; $75-95%$ ,很可能; $95-99.5%$ ,非常可能; $>99.5%$ ,极其可能。基于以上分类,我们可以对案例中的某些研究结果做出类似以下的数据推论:“训练计划A非常可能为初中二百米运动员带来运动成绩的提升”(如第12种情况);“训练计划A很可能给初中二百米运动员带来有害训练效应、降低运动成绩”(如第2种情况);“训练计划A极其可能给初中二百米运动员带来无意义的微

小训练效果”(如第6和第7中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研究案例中的实验推断属于临床推断/应用推断,即差异值(或相关性)的正或负体现的是实验干预给实验对象带来的效应是有益或有害(如训练方法能否提升或降低运动成绩,药物治疗是否促进或危害身体健康等),因此需要满足“有害效应出现的可能性低于0.5%而有益效应出现的可能性高于25%”的条件时,才能做出研究结果可能出现有益效应的结论。但现实的研究中往往会出现非常多非临床推断的案例,即差异值(或相关性)的正或负体现的只是不同组别的实验对象的 $\text{区别}$ 或者联系(如男性平均身高与女性平均身高、身高与体重的相关性等)。在此类非临床推断中,只需满足实验观察值的90%或95%或99%置信区间不同时覆盖有意义的负差异/相关、无意义的微小差异/相关和有意义的正差异/相关三个区间(只覆盖其中1-2个区间),即可做出明确的数据推断。

在以上讨论中不难发现:数据级数推断的核心与关键在于“最小有意义阈值”的介入。那么最小有意义阈值该如何确定呢? Batterham 和 Hopkins<sup>[1]</sup>认为,研究人员和专业从业人员是界定最小有意义阈值的最佳人选。如本文的案例中,有经验的教练员可以清晰地认定,到底多少秒钟的成绩提升(最小有意义阈值)才能给自己的运动员带来一个实质性的、有意义的进步。而当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无法直接定义最小意义阈值时,最佳的界定方法则是采取标准化均值差异(即Cohen的d值,由均值差异或差值的平均值除以恰当的标准差求得)来界定。

Hopkins等<sup>[5]</sup>结合Cohen<sup>[8]</sup>的标准将相关性大小的阈值界定为:无意义微小相关 $<0.1$  $<$ 轻度相关 $<0.3$  $<$ 中度相关 $<0.5$  $<$ 高度相关 $<0.7$  $<$ 非常高度相关 $<0.9$  $<$ 极其高度相关,并在此基础上推算出了标准化均值差异大小的阈值:无意义微小差异 $<0.2$  $<$ 小差异 $<0.6$  $<$ 中度差异 $<1.2$  $<$ 大差异 $<2.0$  $<$ 非常大差异 $<4.0$  $<$ 极其大差异。

有了这样的阈值划分之后,研究人员可以做出更加丰富的研究结果推断。例如:“训练计划A非常可能为初中二百米运动员运动成绩带来小到中度的提升”(如上文中的第12种情况);“男性平均身高非常可能的大于女性平均身高,两者呈现出小到中度差异”;“身高与体重呈现极其可能的高度到非常高度相关”等等。

Hopkins和Batterham<sup>[2]</sup>通过模拟数据的方法,

对比了假设检验与数据级数推断方法在做定量数据推断时的优劣,结果证实后者能够大大降低I型误差率和II型误差率,且需要的样本量大大减少,同时,后者还能有效地降低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

## 5 总结

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们对样本进行测试,并希望通过样本测量值推断总体值(真实值、实际值)的大小。基于传统的假设检验提供的p值进行推断时,推断结果具有较大的误导性,只能获得一个“二元结果”:显著或不显著,同时还面临着“I型误差”和“II型误差”带来的干扰。置信区间的添加可以作为p值的一个补充,但并不能对研究结果推断提供实质性的、进一步的信息。通过加入一个“最小有意义阈值”,数据级数推断方法能给出一个“三元结果”:有意义正差异/相关、有意义负差异/相关和无意义微小差异/相关,并基于置信区间推算出总体值(真实值、实际值)落在每一个结果区域的可能性,从而能让定量研究结果的推论更加丰富和准确,同时大大降低I型误差率和II型误差率,减少发表偏倚。

## 参考文献:

- [1] Batterham AM, Hopkins WG. Making meaningful inferences about magnitud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Physiology & Performance*, 2006(1):50-57.
- [2] Hopkins WG, Batterham AM. Error Rates, Decisive Outcomes and Publication Bias with Several Inferential Methods[J]. *Sports Medicine*, 2016(10):1563-1573.
- [3] Zhu W. Sadly, the earth is still round ( $P < 0.05$ ) [J]. *Journal of Sport & Health Science*. 2012(1):9-11.
- [4] Cohen J. The earth is round ( $p < 0.05$ )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12):997-1003.
- [5] Hopkins WG, Marshall SW, Batterham AM, Hanin J. Progressive statistics for studies in sports medicine and exercise science [J].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 2009(1):3-13.
- [6] Wasserstein RL, Lazar NA. The ASA's Statement on p-Values: Context, Process, and Purpose [J]. *American Statistician*, 2016(2):01.
- [7] Batterham AM, Hopkins WG. The case for magnitude-based inference [J].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 2015(4):885.
- [8] [9] Cohen J. *The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M]. Lawrence Erlbaum: Hillsdale NJ. 1988:14.

● 特邀论坛

# 从师徒关系到约定契约:武术文化传承机制演变的价值审视

李凤成<sup>1</sup>

**摘要** 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以“师徒”传承和“师生”传承的演变为研究对象,研究武术文化传承机制的变迁。认为:以“师徒传承”为主体的宗族和血缘关系传承是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主体形式;社会变迁改变了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方式,传承的主体结构开始向契约关系转化;武术文化主体传承方式的演变促使文化构成的结构发生改变。具体表现为:传承方式的改变促使武德和武礼等民间礼俗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和淡化;“师生”传承代替“师徒”传承后,促使现代武术文化教育呈现“批量标准量化生产模式”和“打”、“练”分离的内容体系;现代“师生”传承的理性认知代替了“师徒”传承的感性体认;“师生”传承的多元动机组合冲淡了传统“师徒”传承的价值认同。研究进一步认为,传统与现代各有利弊,有必要实现两种模式的融合与创新;深入发掘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仪式化认同是实现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有效途径;传统武术文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是对现代武术“过度竞技化”倾向的有力调和。

**关键词** 血缘关系;师生关系;传承方式;仪式认同;契约关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32-06

## From the Mentoring Relationship to the Contract: On the Values of the Evolution of Martial Art Culture Inheritance Mechanism

LI Fengcheng<sup>1</sup>

(1.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350300, China)

**Abstract** Apply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 of martial art culture with the relevant documentary method, and we focus on studying the evolution of “master—apprentice” and “teacher—student” inheritance. The study states that the clan and kinship inheritances mainly represented by “master—apprentice inheritance” which is the main inheritance form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culture. Social evolutions have changed the inheritance mode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culture. The main structure of inheritance has started to change towards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The evolution of the main inheritance mode of martial art culture has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culture. Its concrete reflection is that: th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 inheritance mode has led to fault and dilution in inheritance of folk customs and cultures such as morality and etiquette of martial arts. After the “teacher—student” inheritance had replaced the “master—apprentice” inheritance, the “mass standard quantitative production mode” and the “fighting” and “practicing” separation content system have emerged in the modern martial art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rational cognition of modern “teacher—student” inheritance has replaced the perceptual cognition of “master—apprentice” inheritance.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motivations of “teacher—student” inheritance has diluted the value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master—apprentice” inheritance. The study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 modes of inheritance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o it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ir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Deeply exploring the ritualized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cultur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theories of th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will strongly reconcile the “excessively competition—oriented” tendency of modern martial arts.

**Key words** kinship;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heritance mode; ritual identity;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武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关乎自身的延续。武术文化的传承实际上也是受众

收稿日期:2017-03-21

作者简介:李凤成(1975-),男,山东海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

作者单位:1. 福建师范大学 福清分校,福清 350300。

对武术文化的深入体验过程。这种传承方式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身体力行的过程,因此武术文化的传承被称之为“活态文化”传承。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武术文化的传承已经脱离简单的技术传承之列,进而上升到制度、理念和文化的传承体系。然而根植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的武术文化也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武术文化也开始受到体育全球化的影响和冲击,进而在传承关系和传承方式上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基于此,本文以传承关系和传承方式为切入点对武术文化传承机制进行研究,以期揭示“师徒”传承到“师生”传承给武术文化带来的改变,为武术文化的传承提供理论参考。

## 1 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武术文化传承的主体关系经历了师徒制向契约制的转变过程

### 1.1 以“师徒传承”为主体的宗族和血缘关系传承是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主体形式

以宗族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体系的根本源于我国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生产方式<sup>[1]</sup>。在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家庭和宗族是构成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而家庭和宗族是依靠血缘关系来维系的,因此族群传承是我国民俗文化传承的主体形式之一。在这种宗族传承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拜师学艺是外姓人实现技艺传习的主要途径,也即是说通过仪式实现了由普通人向模拟血缘关系的跨越和转变,进而加入“族群”传承的序列<sup>[2]</sup>。在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体系之下,师徒传承的武术技艺传承方式促成了一种新型的民间习武组织的建立,这种习武组织形成了以“师父”为中心,由众多弟子组成的具有高度凝聚性的民间习武团体。比如在《文安董公墓志》中就这样记载,“常数十百人,游于董海川门下”(董海川为八卦掌传承人)<sup>[3]</sup>,历史上这种以宗族关系维系的民间习武组织构成了传统武术传习的强大社会力量。以宗族为主体的武术传承方式在组织管理、行为约束与团队凝聚上具有鲜明的特征。

第一,通过血缘关系和模拟血缘关系维系的武术传承方式具有明显的家长制管理特征,并体现了严格长幼尊卑的等级差序。族群传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家庭”管理的扩大化,这里既有通过血缘关系实现的父子传承,也有通过模拟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师徒传承,在族群传承之中形成了以师父为中心的模拟家庭结构体系。弟子之间也按照入门的先后顺序形成了“兄妹”的“血缘”关系,师父以及与师傅同辈分的“师娘”、“师伯”等,晚辈的“师兄”、“师妹”等共同形成了具有明显“差序特征”的关系网络,每一个人都在这张“差

序格局”的网络之中有自己的定位,并且按照定位角色履行责任和义务。这种习武团体在传统社会之中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结构体系,周而复始传承不断。

第二,传统的族群传承结构体系保持着较高的角色期许和准确的定位。角色期许和定位在入门伊始就已经确立并且不断得到强化,“遵师命、守师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若有三心二意、天打五雷轰”,“教武要认真、不得把人误”等等一系列门规誓言和行为准则成为维系族群认同和组织行为的基本准则。师徒之间在传习武术技艺的同时也在进行严格的社会化过程,“师徒如父子”生动的描摹了民间技艺族群传承的关系。正所谓“正父子、明长幼”将“师”与“父”并列于同等的社会地位,将武术技艺的传授者称之为“师父”,将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不同的个体整合起来实现了模拟血缘关系的跨越。这实际上印证了武术文化传承是传统宗法社会家族制度的翻版。

第三,强烈的价值认同奠定了师徒传承的基础。“只有不是的徒弟,没有不对的师父”。对于族群传承的价值认同表现在教育认同和自然认同两个方面。教育认同则表现为对师傅传授技艺的高度认同;而自然认同则表示对生活环境和外在因素的高度认同,要想维系传承结构的相对稳定,二者缺一不可,反之则自身的群体凝聚力将会发生涣散,技艺传承与族群组织将会面临瓦解的风险。从本质上而言,对于族群的高度认同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尊祖敬宗以及宗族观念的根深蒂固。因此,以师徒传承维系的习武组织内部的上下等级界限极其森严,师傅在这一组织中享有绝对的权威,智慧与经验在师父和师兄之中具有绝对的意义。这种单向度的族群传承背后则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自然、族权和祖先的绝对适从与崇拜。建立在族群传承基础之上的传统武术文化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内部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建立起了“师徒”如父子般的情谊与血缘和模拟血缘关系的价值体系。这种传承体系在传统社会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传承体系和人际关系,也践行着独特的社会化认知体系。但是,这种传承体系内部较高的凝聚力促使武术文化传承的过程相对保守,不便于横向的流动与传播,从文化的影响力角度而言则不便于打开门户界限进行跨越区域和种族的传播。因此也就形成了武术文化“传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保守认知理念。实际上这彰显了传统武术文化传承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不利于拳种之间的融摄和取长。纵观古代琳琅满目的拳种和门派,虽然以纯粹血缘关系维系的传承方式几乎不存在,但是通过师徒传承的模拟血缘关系建立的传承体系占据了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可以说以血缘关系和模拟血缘关系为主体的族群

传承体系构成了传统武术文化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

## 1.2 社会变迁改变了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方式,传承的主体结构开始向契约关系转化

恩格斯说:“劳动越不发展,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受到血族关系的支配。”<sup>[4]</sup>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的不断变迁,依靠血缘关系建立的传统文脉传承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从人类社会组织演进的规律来看,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演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况且在传统的武术文化传承体系之中,由于传承人对技艺享有独特的权力,一旦传承人离世或者不愿意进行传承必然会导致该文化的消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文化的传承与普及。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迁,传统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推动社会变迁和人们风俗习惯改变的动力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通过政府的宏观控制;第二是通过市场调节;第三则是通过社会变迁的无形推动。社会变迁的推动被李培林教授称之为“第三只隐形的手”,社会变迁不仅仅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重要的是带动了人们观念意识的改变,传统的文化形式在人们的心里已经不再那么根深蒂固、无懈可击,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体育需求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向。武术文化传承的群体也开始愈发不稳定,族群传承的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体系也开始受到现代学校教育的“契约化”形式所冲击,并呈现逐渐被取代的趋势。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化进程开始逐渐加快,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向城市涌入,原本作为“乡土中国”民族体育活动主体的人群也开始逐渐消失。在市场经济思维和体育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原本在传统社会中依靠血缘和模拟血缘关系实现传承的传统武术文化影响力日渐衰微,这种传承体系虽然并未消失,但是就文化传承的比重而言已经脱离了传承的主体地位,进而被现代教育引导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

所谓契约是指依据利益关系和理性原则所订立的必须遵守的协议<sup>[5]</sup>。社会变迁带来的习武受众由开始占据被动地位的“徒弟”跃升为占据主体地位的“学生”。在“契约”的约定之下,教师和学生都有了相对明确的责任和义务,学生在传统教育时期被动的客体地位被打破,以学生为主体成为现代教育倡导的主题。师生之间平等的倡导和契约关系的约束促使双方责任和义务更加清晰明确。现代武术教育的“契约”关系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契约传承的典型代表就是学校武术教育,契约的开始实际上是以学生进入学校成为正

式学生为标志的,无论是普通的学校武术教学还是体育院校的武术专修学生都是在一定的培养方案的约定下进行的,教师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进行授课,学生则根据需求进行课程的选择,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契约关系的显著表征就是平等的关系,在这种契约的约束之下,师生之间的关系告别了传统的依靠血缘和模拟血缘维系的“族群关系”,转而进入了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的良师益友的新型关系。

由传统的依靠血缘和模拟血缘维系的族群传承关系向现代的“契约”关系的转化实际上是社会变迁的结果,而且这种变迁的结果也是不可逆转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传统武术转型和广泛普及的发展需要。同样,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主体结构与传承方式的改变也必然会给武术文化的传承带来深远影响,必然会推动武术文化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这种转变所带来的“文化堕距”也是当今武术文化传承尴尬境遇的表征之一。

## 2 武术文化主体传承方式的演变促使文化构成的结构发生改变

### 2.1 传承方式的改变促使武德和武礼等民间礼俗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和淡化

在相对封闭和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之下,武术文化根植于传统哲学体系之中,其理论认知和哲学思维均与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高度契合,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儒学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价值认识始终是中华武术文化的理论根基所在,这种稳定的习俗深深根植于武术传承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千百年来始终延续不曾动摇。正是因为如此中华武术才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才具有区别于现代西方搏击技艺的显著文化基因。在中华武术文化的体系之中,“武德”和“武礼”等文化体系形成了对习武者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的理论标准。武德和武礼文化也成为了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武术文化体系之下,武德文化与武礼文化正是体现“师徒”传承与习武者行为规范的关键。“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学艺先学礼”等武德的行为规范正是在传统师徒传承的关系之下建立的。对师徒关系的强化和确立正是民间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民间礼俗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在一定程度上民间礼俗也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消失和淡化。人际关系也开始发生改变,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冲击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礼俗习惯。特别是随着现代体育教育的普及,武术也被列

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族群”传承体系开始日渐衰微,现代教育所倡导的师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师徒关系。传统的“一对一”的师徒传承被现代的“一对多”的师生传承所取代,武术教育过程中的武德和武礼教育在实践中也被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规范性武术套路和搏击竞技技术的教学。究其本质,这实际上是武术传承方式改变所引起的文化结构变异,一方面标准化的竞技武术文化传承在推动武术项目的普及和开展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传统文化形式的消失和重组。

## 2.2 “师生”传承代替“师徒”传承后,促使现代武术文化教育呈现“批量标准化生产模式”和“打”、“练”分离的内容体系

传统社会的师徒传承实际上接近于现代社会的精英教育,原因有两点。第一,对徒弟经历了严格的入门考验,这一点几乎近似于今天的入学考试,但是不同的是在传统的武术文化传承过程中更倾向于对徒弟精神品质和思想道德的要求。第二,师徒传承本身就是“一对一”或者是对应少数群体的传承过程,传承体系也相当于家族似的管理。现代的武术传承则是“一对多”的传承过程,一个老师对应几十甚至上百名学生。在传统的武术文化传承过程中,技艺往往是师父毕生所学,徒弟的学习过程完全依靠模仿和体认,在内容的教学选择上往往没有固定和统一的教学模式。传统武术的某些技巧往往不能用语言进行表达,往往是一些隐形的、经验性的技术传承,对技艺的习得往往依靠“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长期揣摩和深度体认。这种隐形的技术经验往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表述性,因此决定了传统武术文化“传拳不传意”的教条特征。也就是说,在武术技艺的习得过程中技术是可以教的,但是经验的累积是不可直接传授的。从本质上来讲,也就是说没有量化的标准,不同的传承和习练者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这就造就了中华武术种类繁多,流派众多,拳种浩如烟海的局面。比如就太极拳而言就有陈、杨、孙、武、吴、和等诸多门派,拳种套路更是成百上千种。现代武术的标准化传承改变了原有的武术传承内容和状态。首先,从内容上看,国家根据武术传播和普及的需要制定了标准化的武术套路和技术体系,这些内容和体系有着统一的标准和动作技术要求,特别是对于场地要求、技术标准、竞技裁判、服饰等均有严格统一的要求。其次,在传承的事实上,“批量化的生产模式”成为武术教育的主体,“批量化生产模式”也就是在同一标准的前提下,遵循普及为主的要求严格按照市场化的模式进行武术教育与传播。这种传承方式在武术的普及中表现了较大的优越性,但是在一定程

度上也产生了文化流失的风险。最主要的是在借鉴西方体育竞技的过程中形成了“打”和“练”分离的武术内容传承状况,进而形成了“院校派”与“国标”武术的新称谓。

## 2.3 现代“师生”传承的理性认知代替了“师徒”传承的感性体认

传统武术的习练过程是习武者对技术进行理解和认知的体认过程,需要不断地参悟、习练和超越才能够感知武术文化的精神内涵。在传统武术的传承过程中,武术文化与传统哲学、医学、兵法等诸多理论相互融合形成了“内外兼修”、“文化、精神与技艺并重”的复合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的传承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次,而跃升为依靠体认和熏染的长期实践过程。传统武术的习练在内容上还体现了“打”、“练”同一的整体性过程,通过以“练”为基础、以“打”为目的,以及练为了打、打为了练的习练过程,对武术招式的“精练”,即拟想技击理念的体认,进而达到“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的武学境界<sup>[6]</sup>。

总体来看,传统武术的习练过程是建立在师徒传承基础之上的文化体认过程,因此没有固定的标准和技术统一化测量体系。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西方体育的认知和竞技模式占据了人们的主流认知体系,在现代西方体育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武术认知与传承体系。“批量标准化生产模式”下出现了“国标武术”和“院校派”的新型武术内容体系和传承机制。呈现“国标武术”和“院校派”等称谓的原因是武术现代进程改良的结果,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体育的影响之下,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武术结合现代西方体育的竞技形式整合出了以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为代表的新的竞技形式。同时,现代竞技武术的出现也导致了武术理论认识的基础发生了改变,以现代西方的体育理论为依托的武术认知体系得以呈现,其依靠理性的人体科学系统主导了现代竞技武术的认知,这成为现代体育的关键。为此,在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和传承方式的改变进而引起了武术传承方式的变化,现代“师生”传承的理性认知代替了“师徒”传承的感性体认。

## 2.4 “师生”传承的多元动机组合冲淡了传统“师徒”传承的价值认同

涂尔干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中将社会组合的方式称之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种形式。传统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相对单一,人们接受的外界事物有限且重复着同一生活和生产规律,因此这种社会组织结构被其称之为“机械团结”。而现代社会人们的可选择机会较多,社会给予人们的选项也相对较多,人们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趋势,这种在社会变迁中形成的组

织形式被其称之为“有机团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利益格局和价值选择均呈现了多元化趋向。在传统的师徒传承之中,依靠“族群”所维系的习武团体具有较高的凝聚力和价值认同,其深层动力在于对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的高度认同。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国家和政府行为的介入,但是族群中的成员在面对如神般的师父和祖师均能找到自己的角色,严格恪守着本门的规矩。特别是传统武术传承过程中仪式化活动(比如拜师、祭祀等)更加强化了对族群的高度认同。在经历了诸多仪式之后,传承群体之中便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和价值认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价值理念也开始伴随着门规成为习练者终生恪守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要求。这是传统“师徒”传承的关键所在。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种“师徒”传承的影响力开始逐渐缩小,取而代之的是“师生”传承。在现代教育体系之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武术文化传承的实践过程中仪式性和祖先的认同已经被现代的思维理念所排挤,原本在传统社会之中牢固的传承关系体系以及对师父忠心不二的认知体系开始变得十分脆弱,甚至不堪一击。特别是传统的“师徒”传承,一般所恪守的是自愿原则,传承组织多为民间自发形成,而现代的师生传承更多的是在政府、教育机构或者为了经济利益而形成的传承体系。相比之下,以师生为主的现代传承体系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果,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师生”传承的多元动机组合冲淡传统“师徒”传承的价值认同将成为时代变迁的结果。

### 3 延续师徒文化传承的体认和仪式认同是对现代武术“泛化”教育与受众群体社会化进程的有力弥补和积极促进

#### 3.1 传统与现代各有利弊,有必要实现两种模式的融合与创新

从现代武术发展的实践来看,竞技武术的改良所带来的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改良实现了与西方现代体育有交集的欣赏与评判平台,这极大地改变了武术文化的传播态势。同时创造性地对武术内容进行统一规范,增加了受众的接受能力,为武术文化的横向传播和大众化普及推广提供了有效途径。第二,“院校化”的武术人才培养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后备武术人才的培养效率,使理性和科学化的思维方式运用于武术理论之中。第三,武术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标准化的武术竞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具有个性化的传统武术发展模式,促使以感性思维为主体的传统哲学思维影响力日渐衰微。从整体上

看,传统的武术文化传承从师徒制发展到现在的师生传承,背后的推动力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的变迁。今天“院校化”的师生传承模式虽占据了武术文化传承的主体,但是师徒传承的体制也仍然存在。理性地讲,师徒传承与现代的师生传承均具有优点和缺点。简单来看,传统的师徒传承的弊端是相对保守,而且缺乏科学的认知依据和系统理论,其优点在于具有较高的价值认同和文化丰富性特征。现代的师生传承的优点在于标准统一、易于操作,特别是具有东西方共同的价值认知,其弊端在于对武术文化削足适履般的改良所带来的后果——传统文化的边缘化。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把二者进行整合将会实现较好的文化传承效果,既能实现文化的广泛普及又能兼具文化特征。因此,实现师徒传承与现代院校派的师生传承的跨越和重组将是武术文化传承的关键<sup>[7]</sup>。实现两种传承方式整合的前提是建立在两种传承方式的整合思维基础之上,摒弃相互诋毁与对立的情绪认知。只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武术文化在现代社会变迁中才会找回新的生命力,从而化解文化堕距和边缘化态势。

#### 3.2 深入发掘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仪式化认同是实现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有效途径

仪式的形式有限,但是其释放的意义是无限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基于图腾宗教信仰的,因此仪式性身体活动便成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概括<sup>[8]</sup>。正如人类学家卡尔·迪姆所言,“所有身体运动在一开始都带有祭祀性质”。这与 Susan Birrell 提出的“仪式化体育”的称谓不谋而合<sup>[9]</sup>。在传统的武术传承活动之中,仪式化的行为活动始终与之相伴,比如拜师、祭祀、传承等等都需要庄严的仪式来烘托。这是因为仪式所营造的神秘、神圣的气氛可以极大地激发参与个体和群体的情感体验和感情表达的冲动。涂尔干就把所有的宗教现象划分为“仪式和信仰”两个范畴,仪式在人的社会化和道德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或者团体如果通过周期性的举办仪式性的活动,就能够使人们的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得以进一步规范和巩固。实际上,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仪式化体现也正是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的进一步彰显,其意义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仪式化的传承过程正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祖先认同、族群认同的重要途径;第二,仪式化也是个体传承者和集体传承者完成社会化转型的有效形式,从而达到由仪式规范各种行为和道德。仪式的重要特征是遵循一定的周期和规律(周而复始地举行),同时仪式还具有族群和社会文化传统的所限定的规范化程序。仪式所独有的权威性注定了对参与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仪式人们也实现了个体、族群与国家伦理关系的有效调节和治

理<sup>[10]</sup>。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仪式化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记忆的强化和认同,在传承活动中不断进行的仪式性活动也是对受众群体良好的文化教育,通过仪式化的文化认同进而实现了传统族群的强大凝聚力,这本身就是文化自觉的过程。因此,深入发掘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仪式化认同是实现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有效途径。

### 3.3 传统武术文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是对现代武术“过度竞技化”倾向的有力调和

过度竞技化实际上是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现代化推广过程中的异变表现,随着体育全球化的发展,体育开始呈现为集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元符号为一体的复杂文化现象。竞技体育的发展早已脱离了体育的本身,开始逐渐向复杂的文化系统发展。锦标主义和过度竞技化现象就是体育过度政治化、商业化所带来的弊端。传统武术在经历了西方化竞技体育模式革新之后,过度竞技化也同樣在武术的身上得以表现。比如竞技武术套路对“高、新、难、美”的过度追求,竞技散打中暴力和商业化符号的过度呈现,结果都是以失去传统武术文化元素为代价。过度竞技化也同樣带来功利主义心理和世俗化的加剧,与之伴生的将是武术文化的异变。从根本上来讲传统武术文化的竞技化倾向实际上也是武术文化西方化的集中体现,是在近代以来,武术与西方现代体育融合的结果。与泰拳、拳击、击剑等一般的搏击术不同的是,自武术产生伊始就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中,中华文化内敛崇德的思想蕴意使武术受到“仁”、“义”、“礼”、“智”、“信”等武德思想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武术脱离了单纯竞技的模式从“野蛮”走向了“文明”<sup>[11]</sup>。武术所追求的“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不断探索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对人、技艺、自然深层地理解与感悟。武术思想中所蕴含的这种“内敛崇德”的精神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天人合一”、“形神一体”的武术思想蕴意正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竞技体育所欠缺的精神内涵。我们今天看来传统的武术哲学思想中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形神一体”哲学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武术“过度竞技化”的消弭。同时这种思想也可以中和西方体育的过度竞技化发展倾向,为现代体育文化融入新的生态思想内涵。

## 4 结语

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武术文化也开始受到体

育全球化的影响和冲击,进而在传承关系和传承方式上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以“师徒传承”为主体的宗族和血缘关系传承是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主体形式;社会变迁改变了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方式,传承的主体结构开始向契约关系转化;武术文化主体传承方式的演变促使文化构成的结构发生改变。具体表现为:传承方式的改变促使武德和武礼等民间礼俗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和淡化;“师生”传承代替“师徒”传承后,促使现代武术文化教育呈现“批量标准化生产模式”和“打”、“练”分离的内容体系;现代“师生”传承的理性认知代替了“师徒”传承的感性体认;“师生”传承的多元动机组合冲淡了传统“师徒”传承的价值认同。研究进一步认为,传统与现代各有利弊,有必要实现两种模式的融合与创新;深入发掘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仪式化认同是实现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有效途径;传统武术文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是对现代武术“过度竞技化”倾向的有力调和。

### 参考文献:

- [1] 王智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源、特征与传承方式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5(1):1-9.
- [2] 王智慧.社会变迁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忆与传承研究——沧州武术文化的变迁与启示[J].中国体育科技,2015(1):81-95.
- [3] 周伟良.师徒论——传统武术的一个文化现象诠释[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5):583-588.
- [4] 王林,赵彩虹,黄继珍.传统武术传承的社会人类学解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12):21-27.
- [5] 朱光磊.从身份到契约——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与性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1):35-40.
- [6] 王岗,刘帅兵.中国武术师徒传承与学院教育的差异性比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55-61.
- [7] 王智慧.传统惯性与时代整合:武术传承人的生存态势与文化遗产[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5):71-76.
- [8] 王智慧.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精神力量[J].体育与科学,2012(6):12-17.
- [9] Susan Birrell. Sport as Ritual: Interpretations from Durkheim to Goffman[J]. Social Forces, 1981(2): 354-376.
- [10] 高丙中.民间的意识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2-50.
- [11] 王岗,张道鑫.中国武术“度”之要义诠释[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5):8-13.

● 特邀论坛

# 从《白宫老龄会议报告》管窥美国老年体育政策的演进特点

湛 冰<sup>1</sup>

**摘要** 美国20世纪40年代步入老龄化社会,白宫老龄会议作为总统直接参与讨论美国老龄化问题的重要平台,对体育促进老年健康有建设性指导价值。本文通过梳理1950—2015年间美国七次《白宫老龄会议报告》中老年体育文本,深入探讨美国老年体育政策的演进过程;揭示美国老年体育政策经历萌芽期、定位期、专门化时期以及联合推进期;提出美国老年体育政策的发展呈现出目标渐进明晰化、循证科研先导化、跨界跨层协作化的特点。

**关键词** 白宫老龄会议;老年体育;健康老龄化;医体结合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38-07

## On the Developing Features of PA Policies for Older Adults in U. S. by Analyzing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f Aging

ZHAN Bing<sup>1</sup>

(1.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America enters into aging society in 1940s and the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f Aging(WHCOA) serv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platform and the valuable access for the president in accelerating the physical activity policy for older adults in promotion of health. The paper combs the content of PA policies for older adults in WHCOA from 1950 to 2015 and reveals that the process of PA policies for older adults undergoes preshaping, enlightening, developing and reinforcing periods. In the end of the paper, we put forwards that the PA policy for older adults in U. S.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e clarifying aim at tailored healthy promotion, guided transform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multi-sector and multi-layers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f Aging; PA for Older Adults; Healthy Aging; Medical and PA Integration

### 1 美国老龄化现状及挑战

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是该国家和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美国20世纪40年代步入老龄化社会<sup>[1]</sup>,自1900年后,美国的老龄人口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1950年以来人口增长迅速(图1)。到2007年,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美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正经历以前所未有的增长,到2030年,

婴儿潮出生的最后一拨65岁的老年人出现后,全美到时将迎来7200万老年人(即全美1/5的人口为老年人)<sup>[2]</sup>。

美国老龄化呈现城乡差异性。美国绝大多数老年人(80.5%)生活在城市,只有19.5%生活在农村,这种区域城市分布不均等现象与中国的老龄化率的不均等性也是相似的<sup>[4]</sup>。美国老龄化人口呈现多民族和多种族特性,到2030年,65岁以上的白种人占总人口的71.2%,而西班牙裔65岁以上老年人占12%,黑人和亚洲老年人分别占到10.3%和5.4%。美国国家卫生

收稿日期:2017-03-20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面上项目《北美和欧洲老年体育政策研究》,项目号:SQSM2011510029003;北京市委组织部青年项目《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北京市老年人体育活动的推进模式研究》,项目号:2014000020124G148。

作者简介:湛冰(1980-),女,湖南岳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体育与体育政策。

作者单位:1. 首都体育学院 管理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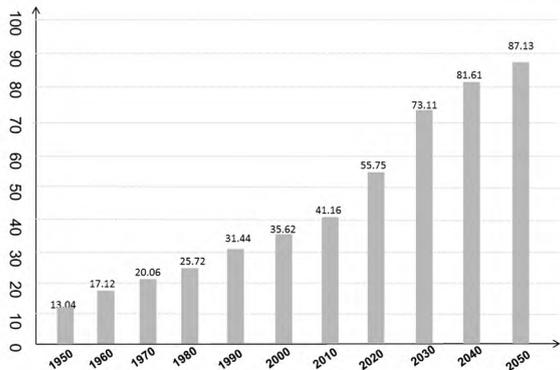


图 1 1950—2050 年间美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sup>[3]</sup>(预测; 单位: 百万)

Fig. 1 1950—2050 Population of Older Adults Aged Above 65 (Forecast. U. Million)

医疗支出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越来越多的花费主要源于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数的大幅增加。超过 1/4 以上的美国人和 2/3 的老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治疗这些慢性疾病往往需要花费全国医疗保险的 66%<sup>[5]</sup>。

## 2 美国白宫老龄会议的起源

二战后期,美国为积极应对战后的军人复员的就业和住房危机,杜鲁门政府非常重视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在杜鲁门总统的倡议下,1950 年美国第一次召开了全国性老龄会议。白宫老龄会议由美国国会提出法案并经总统批准,每隔 10 年一次。会议由各州政府机构和老年组织代表参加,总统和国会代表

在会上阐述老龄问题的主张,并提出一个时期内关于老龄问题的政策和立法建议。1950 年的白宫老龄会议秉承“宽泛”的原则——力求关注老龄的各领域的问题。此次会议囊括了老年领域的所有问题:老龄过程和老年疾病的研究、老年健康和康复、老年家庭生活、老年社会教育和老年娱乐活动、老年宗教活动、老年经济援助等内容。其中针对老年人娱乐活动的问题,并没有科学地论证体育活动与健康的关系,而是与会代表的亲身经历的回顾,其结论是体育活动对于老年人而言没有绝对限制,取决于各自的兴趣和个性特点。杜鲁门总统执政期间提出的 2 项重要社会保障法的修正案内容:公共援助的改进计划、老年和遗属保险的改进以及为伤残而丧失工资收入者提供保险的计<sup>[6]</sup>,这是美国老年福利和医疗照顾政策的雏形。

## 3 美国白宫老龄会议中老年体育内容简述

白宫老龄会议是 20 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商讨国家重大问题的传统举措,“每次白宫会议都有总统的认可和参与,会议受到高度关注,与会代表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建议成为政策决策的重要内容和参考”<sup>[7]</sup>。自 1950 年以来,美国共召开七次白宫老龄会议,分别在 1950 年、1961 年、1971 年、1981 年、1995 年、2005 年和 2015 年。具体针对老年体育的相关文本内容如表 1 所示。本文旨在通过透析七次白宫老龄会议报告中老年体育内容,探讨美国老年体育政策的发展特点。

表 1 1950—2015 年间白宫老龄会议中的涉老体育政策

Table 1 PA policies for Older Adults in WHCOA

时间	关于体育活动内容变化
1950	提及老年人娱乐活动,但只提出老年人娱乐活动因兴趣而异、因个性而异,没有绝对的限制和要求。
1961	会议报告提及老年人健康保持不仅需要营养方面的教育项目,而且需要持续性体育活动和身心锻炼。
1971	会议关注的九个需求领域:收入、营养、退休角色和活动、住房、教育、精神健康、身体健康、交通、就业和退休。本届老龄会议还特别关注老龄失明、老龄黑人、老龄印第安人、长期护理、老年贫困、宗教类社区、年轻人与老年人关系。
1981	会议关注 14 个议题,仅在在第 4 议题“健康促进和健康保持”中谈及体育健身和体育锻炼的益处。
1995	作为社会保障法的第 60 周年纪念年,此次白宫老龄会议提出了 45 个决议,其中第 19 号决议“生命历程中的预防和健康”中提及第 12 条建议为:鼓励一切促进健康的方法,其中首条即健身项目,其次为日常牙齿护理、营养评估和咨询、压力管理、用药管理和心理健康服务。第 24 号决议“增加联邦对老龄研究、老年疾病、老年护理、特殊老年人群等领域的科研资助”中提及“到 2000 年将针对老龄相关研究的联邦支出增加到所有公共卫生的 1%”,主要用于生物医学、临床学、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研究;营养和体育活动研究等。

续表 1

时间	关于体育活动内容的变化
2005	<p>1. 体质与体育健身总统委员会在全国老龄游戏协会的协助下开展的健身项目——“健康生活大庆典”活动展演成为本次会议前的重要环节。通过太极、舞蹈、抗阻训练活动和有氧健身活动展现了老年体育活动的吸引力。2. 在决议 10“提高联邦和地方开展协作一体体制推行就地养老”执行策略建议中提到:在“适合居住的社区安度晚年”,应使老年人在经济稳定性、健康、体育活动、志愿服务、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六方面得到保障。3. 在改善老年人心理疾病和认知能力方面提到,体育活动对其的益处。4. 在决议 19“协同健康与老龄化网络”中提及执行策略:联邦和州政府应加大资助健康促进项目,除了体育活动、老年福祉、心理健康筛查与治疗,还包括基于网络的健康和护理信息库建设。5. 决议 20“设计和建设可居住社区”中,执行策略提及通过资金机制和规章制度建设,改善符合老人居住的社区以利于老年人的学习宗教、文化和体育活动参与。6. 决议 22 条“健康营养促进和慢病预防管理”中提到实证研究表明,体育活动和合理饮食有助于慢病预防,改善老年人运动不足现象。老龄署应加快体育活动和营养资源库建设。</p>
2015	<p>1. 在美国老年人公共投入上,健康老龄化主题中谈及的老年宜居社区建设不仅包括住房、健康服务、户外娱乐设施环境、便捷交通、体育活动网店、认知行为健康服务等。2. 健康老龄化主题中,促进健康防治疾病和受伤的首要预防措施是体育活动。体育活动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体育活动减少老年人的疾病如:早逝、心血管疾病、中风、糖尿病、各类癌症、抑郁、认知功能障碍和摔倒。2008 年体育活动指南的益处。3. 在健康老龄化的 13 个典型案例中,提到 2 个体育类促进健康老龄化个案。(1) 国家健康研究院和其他社会组织联合开展的“走向生活”项目对促进老年日常体育活动的益处。(2) 美国卫生总署联合青年基督徒开展的社区跨际体育活动有助于积极生活方式形成的个案。</p>

## 4 美国白宫老龄会议中老年体育政策的演进

从历时上分析,美国白宫老龄会议对老年体育促进老年健康的关注呈现“积极应变,稳中扩展”的渐进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了萌芽阶段(1950—1960)、定位阶段(1961—1995)、专门化阶段(1996—2004)和联合推进(2005—2015)的四个阶段。

### 4.1 萌芽阶段

“令人惊讶的是,相比其他国家,美国的老年体育活动的数量和研究热情远不及其他国家”<sup>[8]</sup>,基于美国大众体育发展的“政府不过多干预”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初期美国的老年体育发展较为缓慢。1948 年至 1995 年间,美国对老年体育的关注仅限于学界,该时期老年体育的学术领域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7 年一篇名为“体育锻炼在老龄中的地位”的文章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发表揭示了体育活动会对老龄化中产生的问题有积极意义<sup>[9]</sup>。四年后,1960 年发表在《健康、体育教育和娱乐杂志》的“体育活动与老年人”,这两篇文章打开了美国学界关注老年人和体育的大门,但随后十年,美国老年体育研究进展缓慢。

美国老年体育政策孕育于美国的老龄政策和健康促进政策。50 年代到 60 年代间,美国老龄政策在美国经济、政治、老年组织、老年学的推动下,备受政府和公众的关注。首先,杜鲁门政府主张预算平衡、力求控制二战以后的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此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和高失业率使美国老龄政策在经济稳健发展和财政压力的夹缝中生长。但 1935 年美国《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和社保制度的执行直接启动了联邦政府承担救济贫困者和老年人的程序。第二,老龄组织悄然

兴起,1941 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老年学研究中心,在 1942 年和 1948 年间,美国陆续出现了 2 个专门研究老年人的组织:美国老年协会(AGS)和美国老龄学会(GSA)。20 世纪 50 年代新成立的团体还包括国家福利委员会(NWA)。国家老龄化委员会的前身和西部老龄协会(WGS)[后改名为美国老龄化协会(ASA)]拥有大量的会员从事老龄化研究。1956 年,联邦老年协会成立。1958 年,美国体质与体育总统委员会(PCPFS)成为早期美国老年体育发展的最主要推进机构。1968 年,美国体质与体育总统委员会以篇名为“New Exercise Guide Geared for the Aging”的文章,提出“老年的健身挑战”指南,由美国老龄局出版并印发 15 万册发至各州老龄机构<sup>[10]</sup>。该指南提出,为了身心健康和快乐终老,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重要性、如何进行体育锻炼以及参加体育健身和锻炼的原则。

尽管在 1950 年的白宫老龄会议上提及老年人娱乐活动,但并未提出任何政府需要开展的项目和支持,因此,真正对美国老年体育活动关注的政策始于 1961 年的“白宫老龄会议”。这次会议首次从政策的角度构建了“身心健康”、“需求”与“老年体育”之间的桥梁。

### 4.2 定位阶段

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老龄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物质保障。“老年公民”成为肯尼迪上任总统后关注的主要问题。1965 年,《美国老年人法案》、《医疗保险法案》和《医疗救助法案》三大法案的颁布成为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旗帜,也为老年体育政策的发展保驾护航。1961 年白宫老龄会议中“健康”和“需求”的人本位定位激发了该时期体育促进老年健康的科研热情,为争取老年体育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实

证基础。1971年的白宫老龄会议进一步讨论了老年人的需求并提出开始实施老年公共新政,如完善养老保险政策、美国老年人法案(OAA)、医疗补助计划、增补安全收入等保障老年可持续性健康发展的政策。

通过交叉学科研究体育对健康影响的局面突破了老年人随意参与体育活动的“粗放式”或“放任式”建议的局限,而且拓宽了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的研究视角。同时,多学术领域的丰硕成果成为老年体育开展和相关政策的推进提供了重要依据。1971年,以总统委员会为主,在健康服务和精神健康局(公共健康服务)的资助下,与国家统计局共同首次在全美开展“成年人体质和体育活动习惯”的调查。调查总报告显示,4900万美国人不锻炼身体,即45%的美国人参加锻炼。57%的美国人认为自己锻炼够量,在被调查的人群中,39%为60岁以上老年人,66%的老年人“认为自己锻炼够量”(其中,50—59岁占62%,60岁以上占71%)<sup>[11]</sup>。

1973年,老龄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ging)首次资助总统委员会举办“50岁以上人群的体育锻炼”为主题的会议。1975年,Raymond Harris也曾在参议院老龄小组委员会上呼吁美国政府应在体育活动项目中投入经费以推动中老年人的体育参与,促进美国中老人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需求。同年,“联合60岁以上老年人积极活动起来”(Joint The Active People Over Sixty)在老龄局、国家人类发展协会、总统委员会的协助下,组织了7万名老年人参加此项目。同时,在老龄署的资助和国家人类发展协会、总统委员会的协助下,老年体育活动健身指导的培训项目启动。1977年3月,体育锻炼总统委员会的实时通讯报道:1976年隶属总统委员会的“商业和工业部门体育锻炼专门顾问团”一直大力促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协作,发展老年人的综合体育活动计划。

此后,在1979年,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发布的《健康美国人—卫生署长报告》中提出:“老年人需要加强锻炼和健身,以有效地锻炼改善老年人智力和身体能力、提高老年自理能力。”“学界多项长线研究的证据表明在60岁或70岁以上积极参加有组织的体育锻炼的老年人,身体能力强于40岁人群。”1981年,白宫老龄会议上关注的第4议题“健康促进和健康保持”中谈及体育健身和体育锻炼的益处。在这以后,美国将“体育活动促进老年人健康”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美国老年法》在1987年修订时再次将老年人健康教育与促进的问题列入法案。在1987年《美国老年法》修订

了加强体育活动参与,促进老年身心健康的政策后,老年体育活动受到各界的关注,老年体育活动的发展迅速,各州先后推出多样的以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体育活动,老年体育活动参与率较高。1995年白宫召开第五次老龄会议,作为社会保障法的第60周年纪念日,此次白宫老龄会议提出了45个决议,其中第19号决议“生命历程中的预防和健康”中的12条建议为:鼓励一切促进健康的方法,其中第一条为健身项目。其次还有日常牙齿护理、营养评估和咨询、压力管理、用药管理和心理健康服务。第24号决议“增加联邦对老龄研究、老年疾病、老年护理、特殊老年人群等领域的科研资助”中提到2000年将针对老龄相关研究的联邦支出增加到所有公共卫生支出的1%,主要用于生物医学、临床学、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研究、营养和体育活动研究等。

#### 4.3 政策专门化阶段

2005年白宫老龄会议是美国老年体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次会议6次谈到老年体育问题。这主要源于90年代后期,老年人运动不足现象凸显、体育促进健康研究的成熟、“体育促进健康”在公共卫生政策领域的定位、老年人医疗成本居高不下的现实,老年体育成为美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

据数据显示,2000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高达3500万人,占总人口的13%;75岁以上的老年人平均至少患有三种慢性疾病。这不仅增加了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负担,而且由于治疗不及时还导致了很疾病性致残。同时,肥胖给人们带来巨额医疗费用压力<sup>[12]</sup>。据美国退休老年人协会统计,每年因为肥胖流行病产生的医疗成本、工作能力丧失、残疾以及其他费用,高达1170亿美元。令人堪忧的老年人体育运动不足现象成为老年体育政策推进的内在动力。在1990年至1998年间,美国的体育活动增量未得到明显增加<sup>[13]</sup>。根据2000年制定的《健康公民2010》,美国在1997年闲暇时间不参加体育活动的45至64岁人群达31%;65至74岁人群占51%;7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占65%。截止2000年,全国仅16%的美国人达到每周进行5天以上的30分钟中等强度锻炼,75岁以上的老年人仅有12%的人数达标<sup>[14]</sup>。不同社会背景的老年人健康状况也呈现差异。体育活动量不足的现状促使“体育活动”成为健康公民2010国家健康目标的首要指标<sup>[14]</sup>。其中,每周参加体育运动的比例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数比例有所下降,如表2所示。

表2 老年人每周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sup>[15]</sup>

Table 2 Proportion of Participation of PA for Older Adults Every Week

年龄	参加体育活动 每周参加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 30分钟*5次	每周参加中等强度体育活动20 分钟*3次
45-64岁	14%	30%
65-74岁	15%	31%
75岁以上	12%	23%

1999年至2003年,在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的资助下,美国退休老年人协会在美国五个地区开展了六组老年人健康与体育活动的研究,该项目以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共计15000老年人的接受了调查。其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对待体育活动中态度的研究中,98%的50岁老年人认为体育活动对健康很重要,并认为体育活动是保持健康“最好”(best thing)的手段,但是体育参与率很低<sup>[16]</sup>。根据AARP“美国2005年50岁以上老年人状况 The State of 50+ America 2005”报告,28.8%的50-64岁的老年人、25.6%的65-74岁老年人、16.3%的75岁以上老年人积极参与体育活动。肥胖问题在老年人中也较为严重。根据国家卫生访谈调查2005年的报告,24.8%的50岁以上的人参加某些类型的体育活动。定期的体力活动是指从事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五次或以上;或从事剧烈运动20分钟或以上至少每周三次。而最老年组参加比例为16.5%,最年轻的老年人组参加比例为27.5%(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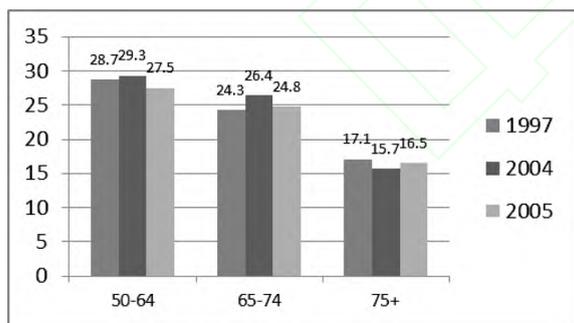


图2 1997-2005年老年体育参与比例<sup>[17]</sup>

Fig. 2 1997-2005 Proportion of Participation of PA for Older Adults

趋于成熟和稳定的美国老龄政策和公共卫生政策是老年体育政策发展的外部动因。美国的公共卫生政策中提及体育活动不仅有利于培养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且有助于保持老年阶段的独立生活能力。2001年的《美国老龄署行动计划2003-2007》的老龄政策、《健康社区设计措施“健康居所”计划》、《全国环境与健康跟踪网络项目》、《社区改善少数民族健康资助计划》、《健康老龄化研究网络(CDC-

HAN)的最佳实践推广计划等健康促进政策》,以及2007年制定的《向前走:计划、执行、保持社区有效老年人体育活动指导策略》、《美国老年人体育活动资源指南》等都相继实施。2001年《国家蓝图:50岁以上老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以下称《国家蓝图》)在老龄会议的呼吁、卫生健康政策的健全和运动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应运而生。在50个国家组织的协作下,美国首个综合的促进全国老年体育的计划问世。该蓝图的目的是从科研、社区和家庭、医疗系统、公共卫生、和市场宣传六个领域确立推进消除老年体育活动中的障碍,并分别在这六个领域提出可行的共计18项实施策略。在2001年后,这些策略将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身、体育和营养总统委员会、全国老龄委、美国运动医学学会、美国退休老年人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

4.4 政策联合推进阶段

2001年以来《国家蓝图》的全国实施以及该计划2011年纳入美国《国家体育计划》的举措表明美国老年体育正式进入全面联合推进阶段。鉴于美国没有专门的体育政策制定部门,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负责老年体育推进的部门实际上主要包括体育健身与运动总统委员会、国家公园管理局、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房屋和城市发展部、环保署和美国消费品安全协会等。

从老年体育政策制定上分析,《健康公民2020》单独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健康目标、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和当前老年人健康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根据2009-2010年BRFSS统计的全国成年人口健康状况,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达到“健康公民2020”目标的占32.6%。以健康指标“在过去一个月没有休闲体育活动”为例,65岁以上老年人口高达31.4%。另外,在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别行政区中,只有25个州的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状况达到“健康公民2020”目标。根据2011年BRFSS调查数据的分析, [BRFSS数据是对全美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别行政区的18岁以上的成年人健康状况进行的随机电子电话播报统计分析。该数据是依据BRFSS数据结果的年龄分类,并分析得出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45-54;

55—64;65) ]达到《2008 年全民体育活动指南》目标的比例情况如图 3.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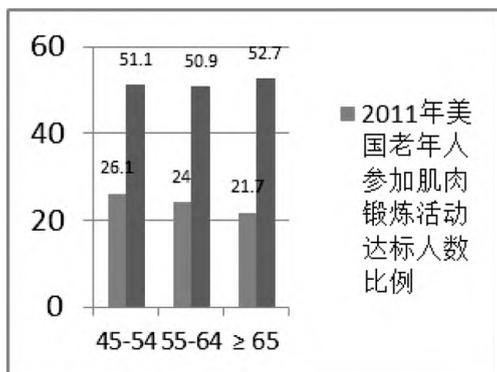


图3 2011年老年体育参与达标人数的比例

Table 3 Proportion of PA Participation for Older Adults

社区体育促进建议成为促进老年人参加体育、促进健康的重要策略<sup>[18]</sup>,2011年《社区发展体育活动策略指南》,2012年《社区和改善老年人疾病预防的诊所护理的融合框架报告》、《社区生活管理局行动计划2013—2018》,2014年《健康老龄化,生活更美好—医保受益者社区预防和健康项目的评价》等陆续出台。2015年白宫老龄会议报告重点关注“老年宜居社区建设”和“健康老龄化主题”,明确指出体育活动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体育活动能减少老年人的疾病,如心血管疾病、中风、糖尿病、各类癌症、抑郁、认知功能障碍和摔倒。自此,美国老年体育政策已经形成了在《老年人法案》为法律指导,以《国家蓝图》(2001)、《向前走:有效计划、执行、保持社区老年人体育活动指导策略》(2007)和《老年体育活动指南》(2008)“计划—社区推进策略—体育活动指南”为支点的稳定的核心“三角结构”,为美国老年体育政策制定指引了发展方向。

## 5 从白宫老龄会议管窥老年体育政策的演进特点

### 5.1 目标渐明确化:放任式的自由娱乐到有的放矢的健康促进

美国联邦政府在老年体育发展初期一直处于协助推动的边缘地带,老年体育虽无全国性“遍地开花”的盛景,却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老年体育发展只在局部各州带头发展。例如1976年,以“60岁以上老年人的体育锻炼”为主题的南卡罗莱纳州会议在查尔斯顿的南卡罗莱纳州医科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州立体育健身委员会、医科大学继续教育部、公园、娱乐和旅游部门的官员以及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以座谈的形式讨论了对老

年人来说体育活动的本质。还有诸如密歇根州开展的“健身一年龄无极限”活动,德州和马里兰州的体育活动主要在全州内的所有的营养所(nutrition sites)和养老院(nursing sites)开展体育活动项目等等。这些有政府官员参与,社会组织共同推动的老年体育活动也对“通过体育活动促进老年人健康”的政策定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老年体育活动的正式法律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老年体育法律最早见于1977年《老年人法案》的修订内容,提出“为老年人提供公共服务,促使老年人参加日常活动和体育锻炼,保持身心健康<sup>[19]</sup>”。

从1961年白宫老龄会议中老年体育仅凭兴趣,自由娱乐的“放任式”的陈述到1971年会议中提及“老龄黑人、老龄印第安人、宗教类社区”的分类健康促进,再到2015年有针对性的根据心血管疾病、中风、糖尿病、各类癌症等不同病种,提出通过体育进行改善的具体措施。政府逐渐成为除个人、社区、工作场所、社会组织等推进老年体育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老年体育参与对象的分类和细化、体育促进健康老龄化的理念的形成、政策文件数量的增加、政策内容的逐渐深化使老年体育在2001年至2010年如火如荼,成为美国体育发展的重点。

### 5.2 循证科研先导化:反哺老年体育政策的补充和修订

1995年白宫老龄会议第24号决议提出“增加联邦对老龄研究、老年疾病、老年护理、特殊老年人群等领域的科研资助”。此后,2005年该会议的第22条决议再次重申基于健康营养促进和慢性病预防管理的实证研究,老龄署应加快体育活动和营养资源库建设。循证科学研究反哺老年体育政策的补充和修订是政策制定的前提条件,美国学界老年体育专门研究始于1950年,有体育与老年健康的关系研究、体育促进老年健康和延缓老年疾病研究、少数民族老年人体育参与动机研究等。该时期,体育改善老年人慢病管理能力、延长老年人寿命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已得到深刻认同。转化型科学研究在地方的适应性推广是政策制定的基础环节,美国的老年体育政策制定是一个问题“导向”科研—科研走向“应用”—应用扩展到“推广”,不断地验证和发现“需求”,最终走向政策形成的过程。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一个科研先导的“倒推式”政策形成过程。在机构设置上,美国的老年体育科研主要推动机构是卫生部下属的老龄研究院(隶属国家卫生研究院)。此外,美国许多大学设置了老年与体育促进健康的实验研究室,积极申报完成政府(老龄署和老龄研究院)委托的项目研究。例如德州农工大学

健康科学中心、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老龄多样化实验室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术团体与大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转变为政策制定提供的多样化支撑服务。

而我国政策制定目前还存在科学研究基础不扎实和科学研究支撑“证据不充分”两种现象。因而,推行循证基础的政策制定首先应建立一个完善的科研支撑决策的制度规范,制定老年体育循证研究指南,指导科研机构 and 大学开展系统的长线循证研究,减少不同部门和机构的重复研究。

### 5.3 跨界跨级协作化:老年体育促进健康管理重心下放社区

2005年白宫老龄会议第10条决议提出“提高联邦和地方开展协作一体体制……应使老年人在经济稳定性、健康、体育活动、志愿服务、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六方面得到保障。”从纵向机制运行和协作上分析,以美国老龄署为例,1965年起,美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基于联邦政府和地方老龄所的有效合作关系的老齡工作行政网络—联邦老龄署、州老龄署和县老龄署,主要是在《老年人法案》指导下实现总体规划和调控,这也成为推进全美老年体育发展的重要政府机构。从横向部门协作制定政策的角度分析,41个以“老年体育”命名或包含“老年体育”、“老年体育活动”、“老年娱乐活动”的政策文本内容的老年体育政策中,政府部门协作联合发布的政策为26个,占总数的63%;其中卫生部牵头的为15个,占26%,其下属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社区生活管理局、营养体育与肥胖部、国家老年研究所都是主要的推进主体部门。

自2012年4月美国合并老龄署、残疾人办公室和发展残疾人管理局,成立美国社区生活管理局(ACL)的举措来看,美国老年的健康促进呈现出集中在社区政策中开展的趋势,社区将是老年体育政策执行的主要推动主体。换句话说,老年人成为社区健康促进和管理的主要人群,美国老年健康促进成为社区健康促进的主要内容。从微观层面分析,社区老年体育推进体现了“体育”与“卫生”结合的重要策略,早在1995年,美国预防服务任务组(PSTF)就建议医院等机构为病人诊治时给出日常体育活动建议。2001年《国家蓝图》的老年体育发展策略中信息咨询和教育支持策略提出“内科医生的体育评估和咨询;建立和评估健康项目,培养联合健康专家”的建议。

张发强在2015年老年体育协会工作会议上提出:“大胆的突破了体育圈、不离体育线、走向社会化”,同时“突破了行政管理、坚持党政主导、倡导公共服务”<sup>[20]</sup>。随着国家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体育领域和卫生领域等相关部门实现体制和机制的良性协作后,

我国老年体育在社区的推进也可尝试“内动力式”融合协作方式,由体育和卫生联合的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需求在社区基层和社区医院建立老年人健康咨询机制,科学指导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

## 6 结束语

面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国际社会常态的现实语境,美国白宫老龄会议见证了政府在老年体育促进老年健康道路上经历的“无为”、“有为”至“大作为”渐进发展方式。美国老年体育政策在深度和宽度上形成了以专门的老年体育国家蓝图为核心、健康促进政策为辅助的政策系统结构。我国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20年,恰逢《“健康中国2030”纲要计划》和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契机,如何从国家战略和制度保障出发,逐步形成全面而科学的政策体系,明确政策理念,加强科研力度,深化和细化政策内容,实现公平的社会资源配置与调节,促进健康老龄化,是进一步政策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方向。

## 参考文献:

- [1] US Dep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ealthy People 1979: Conference edition[R]. Washington: US Dep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79:7.
- [2] Wan H, Sengupta M, Velkoff VA, DeBarrow KA. 65+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5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EB/OL]. [2015-12-20]. <http://www.census.gov/prod/2006pubs/p23-209.pdf>.
- [3]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 The 2008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R]. New York: Working Paper, 2009:210.
- [4] 陈茗.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和形成要因的中日比较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01(10):21
- [5]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older Americans: benefits and strategies;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EB/OL]. [2016-05-10]. <http://www.ahrq.gov/ppip/activity.htm>.
- [6] Arthur J Altmerer. The Formative Years of Social Security[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8:170
- [7] Dale Vinyard. White House Conferences and the Aged [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79:65.
- [8] Leslie K, McLure, JW. Exercise for the Elderly[M]. Des Moines: The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75:58.

(下转第57页)

● 新探索

# 古希腊奥运会“神圣休战公约”的原则与实践

## ——以莱普瑞昂事件为例

王邵励<sup>1</sup>

**摘要** 公元前420年第90届古希腊奥运会召开前夕,东道主伊利斯人宣布将斯巴达人逐离奥林匹亚,禁止其在此祭神和参赛,理由是斯巴达人违背“神圣休战公约”,在上一届奥运会召开时出兵莱普瑞昂。面对伊利斯人开出的罚单,斯巴达人据理力争,拒不认罚。双方剑拔弩张,奥运会在“人人恐慌”的氛围中举行。经由古希腊经典史料的文献学分析和历史实证考察可知:作为古代奥运会“第一原则”的“神圣休战公约”在名义上广受希腊城邦的认同;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休战的原则常被用作权力争夺的工具与利益交换的筹码,在奥林匹克“体育和平”的理想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经由实利世俗因素干扰而造成的落差。莱普瑞昂,就是伊利斯与斯巴达借用“神圣休战公约”之名而展开的实利争夺的目标。从奥林匹克运动源头出发的历史回顾再一次提示:“Olympic Games”绝不仅仅是作为“游戏”的“Games”——这虽有悖当代体育价值观的精神向往,但却是不争的历史实际。由文明交往而产生,又被刻意发明和利用的体育,往往负载着更为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内涵。

**关键词** 古希腊奥运会;神圣休战公约;奥林匹克和平;斯巴达;伊利斯;莱普瑞昂

**中图分类号:**G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45-06

##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the Olympic Sacred Truce: A Case Study on the Event of Lepreon

WANG Shaoli<sup>1</sup>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Just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90th ancient Greek Olympic Games in 420 B. C., the Spartas were forbidden to sacrifice and attend the races at the Olympia by the Elis as the host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invaded the Lepreon at the previous one and violated the Sacred Truce. Facing the penalties from Elis, the Spartas argued against strongly and refused to pay the fine. The confrontation by force aroused much fear in that Olympic Games. Through the analysis to the Greek original sources and the approach of history demonstration, the paper argued that a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the Greek Olympic Games, the Sacred Truce were nominally recognized by the Greek city-states, bu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he ceasefire rules were usually used as the ways of power struggle and interests exchanges. The real gap original from the materialism elements outside the playing ground did existed between the Olympic Peace and its practices. In the name of the Sacred truce, what the Sparta and Elis really contested for was Lepreon. The retrospection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Olympic Games reminded that the Olympic Games meant more than Games in the sense of pure fun. It was a solid history reality although it was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spirits pursuit by the modern sports. When being utilized as the communicating way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sports as the human inventions and the products usually were invested more pregnant social characters and cultural senses.

**Key words** ancient greek Olympic games; sacred truce; Olympic peace; Sparta; Elis; Lepreon

“和平”是古希腊奥运会的传世精神遗产,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主流价值观。“奥林匹克和平”的经典

文本可以追溯到“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公约”(Olympic Sacred Truce,其核心词的古希腊语原意为“住手”)。

收稿日期:2017-03-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体育史学基本理论研究》,项目号:15BTY085。

作者简介:王邵励(1978-),男,吉林白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体育史。

作者单位:1.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春 130024。

赛会的发起者及后世实践者视其为奥林匹亚竞技的“第一原则”<sup>[1]35</sup>。公元前8世纪中叶,正值希腊世界战事频仍、邦际对抗加剧,以祭神之名召开的泛希腊竞技会,恰表达了希腊人对于纷争的疲倦。然而,体育理想与体育现实之间素有差距,落笔为纸面上的和平原则亦不能轻易等同于落实为历史的行动实践。散见于希腊原典文献中的史料确实证明“休战公约”影响了希腊半岛的邦际纷争局势,但其发挥作用的实际过程、方式与结果,却很难一言以蔽之。本文即以史料相对集中的“莱普瑞昂事件”为观察切口,以小见大地考量“休战公约”的约束性主张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了古希腊奥林匹克体育和平的具体实践,是哪些现实的变量影响了希腊城邦参与邦际竞技的选择,期望在城邦时代政治文化的“总体史”语境中细描古希腊体育的深厚历史内涵。

## 1 为体育而休战:“公约”的基本原则与有限影响

据古代作家鲍桑尼阿斯《希腊游记》的记载:“休战公约”的莫立者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奥林匹亚圣地附近的三个最有实力的城邦首领——伊利斯国王伊匹托、斯巴达国王莱库古和披萨国王克琉斯涅斯。公元前776年,他们听从德尔斐的神谕,决定一同恢复古老的奥林匹亚宗教传统,隆重祭祀主神宙斯,重建奥林匹亚竞技会,并共同拟定“神圣休战公约”,誓约竞技会期间严守和平。此后,每逢奥运会举办当年的春季,作为主办者的伊利斯人就派出三名传令官,遍访希腊各邦,发布奥运会的开幕的日期,邀请各地民众赴会,同时敦促各邦遵守“神圣休战公约”。一个以伊利斯国王伊匹托之名命名的圆环上,就刻有“公约”的内容,鲍桑尼阿斯见到了此物,还说那上面的文字不是排成直线,而是曲折环绕<sup>[2]399,497</sup>。

### 1.1 神圣的“体育和平”:“公约”的基本原则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罗马时代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和鲍桑尼阿斯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过“休战公约”。综合相关原典史料推知,“休战公约”的内容包括:重申并维护伊利斯人作为竞技会唯一组织者的权威;敦促各邦为节庆的献祭和竞赛作好准备;协调各相关城邦在通往奥林匹亚圣地的主要道路上,为参加节庆的行人提供某些物资与人身安全保障;提醒处于交战状态的城邦,在竞技会期间暂停军事敌对行动,以全身心支持奥林匹亚的公共庆典;奥运会召开期间,不得携带武器穿行伊利斯和奥林匹亚圣地;声明对于那些违犯上述条令的城邦及个人,将剥夺其祭神和参赛

权利并处以一定罚金<sup>[3]97, 91[4]103-105</sup>。公约最初的生效期只有一个月,后来又增加到两个月至三个月<sup>[5]9,12</sup>。

“公约”中的体育和平主义理想得到了一部分具有“泛希腊”情结的希腊思想家的回应。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演说家伊索格拉底在奥运会上发表《泛希腊集会辞》,盛赞泛希腊赛会带来的体育和平:“祖先给我们传下这样一种习俗,使我们停战议和,化除现有的仇恨,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使我们在共同祈祷、共同献祭的时候,想起彼此间的血族关系,感到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更加亲善。”当时的演说家高尔吉亚和莱希阿斯也先后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畅言和平,呼吁各城邦搁置争议、并肩对敌,以解决希腊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sup>[6]122-123</sup>。

### 1.2 作为借口的“休战”:“公约”的有限影响

从希罗多德《历史》等古希腊原典作家的记述得知,“公约”确实对某些希腊城邦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的战争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恰如现代研究者所言:关于赛会休战的协定以一种特殊方式参与形塑了古希腊的政治形势,并改变了相关希腊城邦的外交决策轨迹<sup>[7]239</sup>。典型的案例如:慑于“公约”明令赛会期间免开战火,斯巴达及其联军在铁尔摩批莱之战时延缓发兵<sup>[8]523</sup>;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与波斯交火于萨拉米海湾,斯巴达人组织伯罗奔尼撒同盟修建地峡工事,有几个城邦本不愿参与,但因奥林匹亚“公约”生效期已过,再无拒绝和拖延的托词<sup>[9]69-71</sup>;另据古代希腊作家色诺芬《希腊志》载:公元前386年,斯巴达人欲惩罚其盟邦曼丁尼亚,理由是后者以遵守“神圣公约”为借口,拒绝参加斯巴达主导的战争<sup>[10]25-26</sup>。仅就这些史料看,“公约”的作用多是局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其更广泛的影响,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从地缘角度讲,“公约”对希腊各地的影响力是有差别的。作为奥运会的起源地,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自然受“公约”约束更强<sup>[11]230</sup>。尽管有一些奥林匹克运动史专家坚持认为,“公约”对希腊各城邦的影响是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的<sup>[12]100</sup>。但这种结论尚需历史实证的检验,而莱普瑞昂事件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具体案例,可由之判定“公约”的实际影响力。

## 2 莱普瑞昂事件始末与“公约”生效条件之争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莱普瑞昂事件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记载,通过和其他原典史料的比对与综合,有助于深入了解古代体育与城邦政治的真相。

### 2.1 触犯“公约”:伊利斯人开出罚单

在公元前420年的奥林匹克竞技会上,东道主伊

利斯人断然拒绝斯巴达人的赴会申请。修昔底德是这样记载的：“这年夏天，奥林匹克竞技会举行了……伊利斯人不允许斯巴达人进入神庙，所以斯巴达没有参加祭祀典礼，也没有参加比赛。原因是，伊利斯人曾经按照奥林匹亚的法律处罚了斯巴达人，而斯巴达人没有缴纳罚款。”<sup>[13]99-101</sup> 斯巴达人到底法犯哪条，惹得伊利斯人如此不悦？修昔底德也有记载，公元前424年，斯巴达因在“公约”生效期间发兵莱普瑞昂(Lepreon)而被罚2千米纳<sup>①</sup>。斯巴达人拒付罚金，于是伊利斯人彻底关闭了奥运会的大门，将斯巴达连同莱普瑞昂一起逐出公元前420年的奥运会。

## 2.2 抗辩：斯巴达人拒付罚金的理由

饶有意味的是，斯巴达人拒付罚金并非毫无理由。在关于奥运会参赛权谈判最终破裂之前，斯巴达人曾与伊利斯人论理，焦点就是斯巴达人出兵莱普瑞昂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公约”。修昔底德是这样记述的：

伊利斯人认为：斯巴达人不应该在奥林匹克赛会的休战时期内，派遣他们的重装步兵开入莱普瑞昂，以进攻菲尔卡斯要塞，所以依照定章，每个重装步兵判处了两个米那的罚款，总共罚了二千米那。

斯巴达代表提出抗议：当我们派出重装步兵的时候，休战文告还没有在斯巴达宣布出来。

伊利斯人回答说：在伊利斯已实行休战之际，我们都处在和平状态中，没有提防别人的进攻，所以斯巴达人的侵略行为使我们措手不及。

斯巴达人答辩：如果那时伊利斯人真的认为斯巴达是做错了，他们就没有必要再到斯巴达宣布休战了；但是他们还是宣布了，可见他们原来不认为斯巴达人有错；并且宣布休战之后，伊利斯的领土就没有再被进攻了。<sup>[13]99-101</sup>

## 2.3 僵持：“公约”生效条件之争

概括起来，双方都认为“公约”具有合法性——即使是武力占优的斯巴达人，也在原则上承认伊利斯人宣称的“公约”对它有约束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体育和平”原则在希腊诸城邦中具有较普遍的影响，奥林匹克竞技会在希腊人心中亦占有神圣地位。但是，双方对“公约”生效的细节标准存在分歧：伊利斯人坚持“属地标准”，而斯巴达人则坚持“属时标准”。也就是说，前者认为，“公约”已经在包括莱普瑞昂的伊利斯地区生效，那么任何破坏该地区和平安宁的军事行为，都应当受罚。后者则声称：“公约”对伊利斯人生效在前，对斯巴达人生效在后，其间，“公约”仅对伊利斯

人有约束力，斯巴达人动武则不受“公约”约束。斯巴达人还补充了两条证据。第一，他们抓住了伊利斯人的自相矛盾之处，既然事发时明知斯巴达人违背“公约”，又何必在事发之后又向斯巴达人宣布“公约”开始生效，岂不多此一举？第二，当伊利斯使者到斯巴达宣布公约生效之后，斯巴达人马上停止了对莱普瑞昂的军事行动，可谓充分尊重了“公约”的权威约束力。

双方的论辩提示我们再次注意“公约”生效环节中的两个重要细节。其一，伊利斯人是“公约”的传布者，伊利斯使者到各邦宣布奥林匹克竞技会即将开幕之际，也就是休战开始在当地生效之时。因奥林匹亚圣地就处在伊利斯地区，尽管身为小邦，但伊利斯借助奥运会东道主之利而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文化资源，并据此在希腊城邦世界中立足。由于奥运会以敬神的名义主办，伊利斯使者所传布的“公约”便凭添了几分神圣气质，他们既代表伊利斯，更代表全体希腊人所敬奉的宙斯大神。在宗教文化甚为浓郁的古希腊，伊利斯使者往往被视为圣使，在各邦——无论是否与伊利斯为敌，均受到礼遇。实际上，毋宁说，伊利斯是在利用本邦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号召力，借助本邦圣使的对外舆论宣传，以奥林匹克的神圣名义，扩大它在希腊城邦世界中的影响力。其二，希腊各地多山川阻隔，尤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由于出行不便，所以伊利斯信使到达各邦传布公约的具体时间有先有后，这就造成了“公约”生效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剪刀差，伊利斯和斯巴达人由此各执一词。关于公约生效的这一“真空法规地带”，也为争执双方提供了更富于弹性的谈判进退空间。

## 2.4 破裂与对峙：谈判的结果

我们接着来看修昔底德对于谈判进展的记述：斯巴达人拒不接受伊利斯人开出的罚单，无奈之下，伊利斯人第一次让步，提出一个妥协方案。按公约规定，斯巴达人的罚款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付给受害者伊利斯人，另一部分敬献给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伊利斯人开出条件：如果斯巴达人还回莱普瑞昂，他们就不要自己应得的那份赔款，甚至还会自掏腰包替斯巴达交上那份奉献给神庙的罚款<sup>[13]99-101</sup>。为了讨回失地，伊利斯人甚至不惜以牺牲“公约”的原则立场来和斯巴达人作交易。

对于这个实质性让步，斯巴达人还是拒绝了。于是，伊利斯又作出更大的妥协，如果斯巴达人实在不愿还回莱普瑞昂，那他们就不要了，但是斯巴达人必须在宙斯神庙祭坛前，当着全希腊人的面向神发誓，承诺将

① 米纳(Mina)为古希腊货币单位，2千米纳约合现今的3.8万美元。

来一定缴付罚款。最后,这个建议也被斯巴达人拒绝了,已无退步的莱普瑞昂只得剥夺了斯巴达人进入奥林匹亚圣地的权利。由于担心斯巴达人报复,伊利斯人在赛会期间组织本邦及盟邦进行了武装戒备,以防事态有变,在“人人恐慌”的氛围中举办了一届奥运会。

## 2.5 尾声:赛场上的风波

这届“人人恐慌”的奥运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修昔底德之外,鲍桑尼阿斯还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历史细节。有一个名叫卡利斯的斯巴达人,其父阿塞息雷斯曾两度夺得奥运桂冠。子承父业志在夺冠的卡利斯隐瞒了自己的斯巴达人真实身份,以底比斯人的身份参加赛车比赛并赢得胜利。当他把桂冠放在战车御手的头上,以示自己是战车的主人时,他的真实身份被人认出,斯巴达裁判员当即惩罚了他并剥夺了他的冠军资格,理由是:赛前已有定论,斯巴达触犯“休战公约”而拒不悔改,因此任何斯巴达人都无权参加奥林匹亚的竞技。以此为借口,斯巴达人又以武力威吓伊利斯。被逐出赛场的卡利斯为自己修建了纪念物,以志斯巴达人夺冠壮举。但伊利斯人则另有说法,他们只承认此项比赛的胜利属于底比斯人<sup>[14]9</sup>。伊利斯人如此“严格”的赛场执法,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他们与斯巴达人的新仇旧恨。

## 3 莱普瑞昂:以体育之名展开的政治博弈

### 3.1 莱普瑞昂:竞争的焦点

奥运东道主伊利斯人在谈判中的不断让步耐人寻味。伊利斯人始终是以“休战公约”为合法性依据来向斯巴达人施压,但仔细分析又不难发现,他们更为关注的,其实是多次强调的“莱普瑞昂”。



图1 伯罗奔尼撒地区古代希腊城邦分布图

Fig.1 Map of the Ancient Greek Polis in Peloponnese

奥林匹亚(Olympia) 伊利斯(Elis)

莱普瑞昂(Lepreon) 斯巴达(Sparta)

作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莱普瑞昂”为何地?据鲍桑尼阿斯所记,莱普瑞昂为毗邻伊利斯的一个小邦,素在伊利斯的治下。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夺冠的那些莱

普瑞昂人,希腊裁判都都会把他们的身份公布为伊利斯人<sup>[15]403</sup>。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在第26届奥运会之后,伊利斯人曾向莱普瑞昂移民<sup>[4]95</sup>。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著名的戏剧作家阿里斯多芬也在自己的戏剧作品中,把莱普瑞昂称为一个伊利斯的小镇<sup>[16]35</sup>。如此看来,莱普瑞昂是伊利斯人的“核心利益”,难怪斯巴达人的举动会引来伊利斯人的报复。但同时值得注意,斯巴达人觊觎莱普瑞昂亦有历史渊源。据修昔底德所述,公元前421年,斯巴达人也在莱普瑞昂安置了他们所控的希洛人<sup>[13]65</sup>。可见,此地亦为斯巴达人的利益关切。

莱普瑞昂是一颗棋子,围绕这颗棋子而布设的棋局反映了觊觎奥运会主办权的斯巴达人和实际拥有奥运会主办权的伊利斯邦之间的政治博弈。据修昔底德记载:莱普瑞昂本受伊利斯人庇护,在后者的支持下,前者从阿卡迪亚人那里抢来一些土地,为回报伊利斯人,双方约定莱普瑞昂要由耕种收入中拿出一塔兰特(希腊货币单位)的租金奉献给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后来,莱普瑞昂借口与雅典开战停付租金,引来伊利斯人施压,莱普瑞昂只得另寻雇主,向身为伯罗奔尼撒霸主的斯巴达伸冤。未等斯巴达人仲裁此事,伊利斯人就先行教训了莱普瑞昂并拒不接受斯巴达人的仲裁,于是斯巴达人派重装步兵控制了莱普瑞昂<sup>[13]57-61</sup>。这样看来,当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邦际关系可谓错综复杂。野心勃勃的伊利斯人绝对不能容忍一个背叛自己的城邦在斯巴达人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而它又无力挑战斯巴达的霸主地位,于是,只好在自己能占主动的奥林匹克竞技会参与权上大做文章,以报失地受辱之仇。

### 3.2 法外特权:“公约”之“不公”

伊利斯人在这场风波中如此卖力,到底是为夺回莱普瑞昂,还是为维护奥林匹克“公约”的神圣合法性,抑或二者兼具?如果斯巴达人侵犯的不是莱普瑞昂,而是动了与伊利斯人丝毫无干的他人的势力范围,伊利斯人还会不会如此讨价还价,如此拿“公约”作为谈判的准则?较为中肯的看法是,“休战公约”应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少是在名义上,没有哪个城邦敢公然挑战其合法性,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理想化的原则不可避免地与实际利益纠葛在一起,有时甚至沦为城邦政治交易的抵押物。就伊利斯的行动选择而言,维护“公约”的神圣性为名,夺回爱普瑞昂为实。若为自身利益而计,伊利斯人宁愿在“公约”生效期间动武。翻检伊利斯人的历史,无论是他们在莱普瑞昂事件之前即公元前7世纪武力抵抗阿尔戈斯僭主庇冬<sup>[4]105</sup>,还是此后于公元前364年与阿卡狄亚人在奥林匹亚赛会正酣之际公然交手<sup>[10]309-313</sup>,都说明伊利斯人视为尚

方宝剑的“休战公约”其实是为他邦所定。在“公约”面前并不人人平等,伊斯力人似乎独享着法外豁免权。“公约”的执行遵循着非对等原则,他邦在赛会期间用兵就是违背“公约”,伊利斯在赛会期间动武就是维护“和平”。为体育而“休战”的前提是维护伊利斯人独掌奥运会的举办权,挑战这一前提就是对“公约”的不敬,理所应当受到责罚,这就是伊利斯人的逻辑。

### 3.3 抵制“公约”:斯巴达人的动机

既然希腊世界如此敬重奥运会的权威,斯巴达人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不理会伊利斯人的判罚,甚至顶住被逐离赛场的压力,就是不肯吐出入口的美味?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权威奥运史家提供的数据:公元前6世纪时,斯巴达人拿到了奥林匹克竞技会上40%的冠军,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人所占的奥运冠军比例下降到了20%<sup>[17]70</sup>。解释这组数据变化的思路有两条:一是竞技会的规模扩大了,最初斯巴达人独霸赛场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伯罗奔尼撒地区以外的他邦运动健儿的挑战;二是斯巴达人自身对奥运会的兴趣有所减弱,进一步的原由,或者是以穷兵黩武为荣的斯巴达人更看重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厮杀,不屑于再沉溺于赛场上这种斯文得多的较量,或者是斯巴达人自身遇到了难缠的麻烦,无暇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准备比赛。从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邦内局势来看,尤其是此起彼伏的希洛人暴动,以及它与雅典等提洛同盟城邦的紧张对峙关系来看,这种解释可能更具说服力。无论如何,斯巴达人对奥林匹克竞技会有所轻视的态度,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会接受被逐奥林匹亚的代价。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处在伯罗奔尼撒内战中的斯巴达,有足够的军事乃至政治资源来顶住伊利斯人施加的压力,在它身后,有实力雄厚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盟邦皆由它调遣,奥林匹亚圣地乃至伊利斯所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皆为斯巴达的传统势力范围,以伊利斯区区弹丸之地的微力,任凭其高声叫板,也不能撼动斯巴达人的霸主地位。

第三个原因恐怕更为根本,那就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控制莱普瑞昂对于巩固和强化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领头羊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两相衡量,以失去奥林匹克竞技会祭祀权和参赛权为代价来换取一个更具实际利用价值的筹码,对斯巴达人来说不算是个亏本的买卖。

斯巴达敢于以武力恫吓伊利斯的事实说明,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公约”对城邦行为的约束效力并非绝对是绝对的。有些城邦在决定是否遵守“公约”时,充分考量了自身的实力与既得利益。

### 3.4 利用“公约”:伊利斯人的心态

探讨过斯巴达人的隐秘动机之后,我们再来分析伊利斯人的政治心态。伊利斯乃区区小邦,一度身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但它为何又敢用奥林匹克竞技会的参与权为筹码,以微卵之力对抗穷兵黩武的盟主斯巴达?这背后又反映了希腊邦际间,尤其是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大邦之间怎样的政治关系?

众所周知,希腊历史上最辉煌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时代,开启和结束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为两场战争。如果说希波战争的胜利将希腊推向了社会发展的巅峰,那么,作为城邦内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则将希腊人引向了下坡路。当战争进行到第12个年头,也就是公元前420年的时候,雅典与斯巴达两雄对立的敌对状态稍有缓和。原因在于,亮剑十年并未决出高下。雅典人在安菲波里战役中吃了败仗,斯巴达人起初的求战野心也遇重挫,双方皆疲于征战,遂一拍即合,于公元前421年签订了“尼西阿斯合约”,商定保持50年的休战。正是在希腊两大对立城邦握手言和的背景下,公元前420年的奥运会开幕了。

本来期待着能与雅典人同场竞赛,并借助奥林匹克竞技会这一全希腊最盛大的体育公共空间,在诸多城邦面前扬威露脸。斯巴达人可能怎么也没想到,偏偏又被自己的属邦伊利斯人捉弄,结果未能如愿参加竞技会。斯巴达与雅典势不两立可以理解,如何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亦不团结?原来,伊利斯虽为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但对自己的盟主并非事事俯首帖耳,一俟触动自身核心利益,它绝对敢于动用全部资源予以反抗。斯巴达入侵了伊利斯的属地,伊利斯就敢将斯巴达开除奥林匹克竞技场外,无论之前是否有约在先,无论侵犯者是不是它的盟主。看来,希腊邦际间所结成的同盟,也并不都是铁板一块,而是同样存在着复杂的利益斗争关系。所谓同盟,只意味着盟邦之间存在着暂时的连带利益,而不是永恒的共同利益。

与斯巴达关系日渐紧张的时候,伊利斯人另寻帮手和靠山,旋即与斯巴达的宿敌阿尔戈斯和雅典等城邦签订“百年合约”,并商定把刻有盟约内容的铜柱,竖立于即将召开的奥林匹克竞技会上,时为公元前420年<sup>[13]97</sup>。雅典及其提洛同盟这个新后台,无疑为伊利斯人提气壮胆,所以才有前述发生于赛会之前他们与斯巴达人叫板的那一历史场景。

## 4 结论:体育与政治的胶着

### 4.1 沦为城邦实利交易品的“休战公约”

这是一场以“休战公约”为包装的政治交易,其本质是:在武力上不敌斯巴达的伊利斯人本欲借“公约”

解释权的舆论压力迫使斯巴达服输认罪,但是,当所有的妥协都无法达到真实目的,也就是明确得到斯巴达人拒绝交还莱普瑞昂的时候,伊利斯人才又回到维护“公约”神圣性的原则立场上,承认了无力挽回实利损失的现实,同时又无奈地期盼能最后获得一点道义上的满足,乞求斯巴达人当众道歉。斯巴达人毫不让步,将“公约”置于实利之后。伊利斯人借助奥林匹克赛会主办权而欲图收复失地的政治绑架,最终以斯巴达人的“撕票”而告终。

#### 4.2 作为战争常态间歇的“体育和平”

奥林匹亚竞技场上的纷争,实质上反映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两大敌对集团的较量。“和约从未阻止希腊城邦间的战争,它只是在避免战争打断赛会。”<sup>[18][113]</sup>处在一体多元格局中的希腊诸邦往往貌合神离,所谓的和平只是战争的间歇,场内的竞技联通着场外的较量,凡此乱象深刻折射出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邦关系,也为100年后希腊人在内讧中不能自拔最终由马其顿铁骑的一统江山,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

#### 4.3 Olympic Games 不仅仅是“游戏”

希腊奥运会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遗留了丰厚的体育文化遗产,其中既包括体育与运动自身方面的借鉴,也包括体育与文化互动方面的经验。在古希腊的历史中,类似莱普瑞昂之争的诸多邦际政治交往,都是以体育之名进行的,这深刻反映了体育的社会交往本质。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体育,理解体育与政治及社会的复杂关系。这种回顾再一次从历史的原点提示我们注意,Olympic Games 绝不仅仅是作为“游戏”的 Games。作为“游戏”的 Game 仅仅是体育的一重功能或表层存在,抑或是一种充满怀旧气息的理想。由人际交往而产生的、被刻意利用的体育往往负载着更为深刻和丰富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内涵。

#### 参考文献:

[1] Raubitschek A E. The Panhellenic Idea and the Olympic Games[A]. RASCHKE W. J.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ympics[C].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2]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Vol. 2) [M]. Cam-

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 1926.

[3]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3) [M].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4] Strabo. Geography (Vol. 4) [M].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5] Swaddling J.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6] Isocrates. Panegyricus (Vol. 1) [M].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122-123.

[7] Raubitschek A E. Essays on Greek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Literature[A]. OBBINK D ed. The School of Hellas[C]. Oxford, 1991.

[8]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Vol. 3) [M].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9]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Vol. 4) [M].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10] Xenophon. Hellenica(Vol. 2) [M].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11] Marinatos N, HAGG B eds. Greek Sanctuaries, New Approaches[M].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12] Zaidman L B, PANTEL P S.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Greek C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3) [M].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14]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Vol. 3) [M].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15]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Vol. 2) [M].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 1926.

[16] Aristophanes. Birds [M].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 2000.

[17] Finly M I, Pleket H W. The Olympic Games: The First Thousands Years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6.

[18] Easterling P E, Muir J V eds. The Greek Religion and Socie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新探索

# 巴蜀图语与民俗活动的身体认知探析

## ——以古彝文字为例

孙德朝<sup>1</sup>, 赵明<sup>1</sup>

**摘要** 采用知识考古学、文字学和口述史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从身体认知(体认)的视角,以巴蜀图语中的古彝文字为例,筛选动静各两个图符(“摔跤”与“赛马”)探讨古彝文字与身体活动的关系。研究认为:身体活动与古彝文字的形成具有契合性,即:身体活动导引古彝文字的衍生与形成;古彝文字进一步规训彝族人的身体活动行为,促成彝族人对民俗活动技能的习得并延续教育传承功能。

**关键词** 巴蜀图语;知识考古学;口述史;身体认知;古彝文字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51-07

## Research on Body Cognition of Bashu Figure Language and Folklore Activities

### ——Take the Ancient Yi Characters for Example

SUN Dezhao<sup>1</sup>, ZHAO Ming<sup>1</sup>

(1.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such as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hilology and oral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cognition,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Yi characters and physical activities by taking the ancient Yi characters in Bashu figure language as example and screening each two dynamic and static symbols (wrestling and horse racing) from those ancient Yi characters. The thesis shows that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Yi characters have the compatibility, which means physical activities guide the deriv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Yi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ancient Yi characters further regulate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of Yi people. They both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folk activity skills of Yi people and extend its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function.

**Key words** Bashu figure language;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oral history; body cognition; the Ancient Yi Characters

古彝文字是巴蜀图语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文字,已获相关研究专家的证实。关于古彝文字的起源,在神话思维和文化符号学启示下充满神话色彩。其假设和传说如:凉山彝族洛龙传说——歌布曲神鸟教阿苏拉吉写字;云南建水彝区传说——苞惹夫妇从蟒蛇肚子里得到天书,在神人指引下学会了文字写法;武定、禄劝等地传闻——彝文从天上来;另有古禄老人从刻画家禽、野兽的形象以致纪年纪月,渐而形成彝

文<sup>[1]</sup>。上述关于古彝文字形成的假设和传说,使古彝文字起源的神话主题(神、想象出来的人或英雄是古彝文字的创造者)充满神秘色彩,也使得古彝文字的文化符号神话思维浓郁。在古彝族文字起源逐步得到破解的多维视角下,寻溯其与身体活动相关的文字形体的来源,追溯古彝文字与身体图画的关系,为彝族文字起源和演进,孳乳分化规律具有一定的补充价值和意义。

收稿日期:2017-04-02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藏彝走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研究》,项目号:14BTY077。

作者简介:孙德朝(1971-),男,四川会理人,教授,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及民族传统体育。

作者单位:1. 四川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成都 610101。

## 1 身体认知视角拓宽了巴蜀图语研究的维度

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提出：“较为深刻的真理必为神话的阴影所笼罩”<sup>[2]</sup>。一些逻辑或科学的神话是因真理没有表达出来而做出的预想和假设。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演进依赖于某些身体行为，在客观存在的身体对文化和文明构造的认知思维下。随着时间推移和空间转置，我们会发现神话的局限性。身体是我们认识的对象，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sup>[3]</sup>。在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看来，科学认知（身体认知）是在世界原初体验基础上的一种间接“构造”，现象学的学科特点和属性就是要“走向事实本身”，身体“图式”是沟通纯粹知性范畴和感性现象之间的中介<sup>[4]</sup>。古彝文字起源与身体的行为关联甚深，部分古彝文字是以绘制身体简图的形式来表达彝族先民思维方式、观念和主张的，这些简单、直观的图案，可认为是介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写意图形符号<sup>[5]</sup>。身体图式描摹记录了身体认知的思维方式，可弥补文字衍生神话思维的认知局限。以身体认知的视角来探讨身体活动与彝族文字的关系能拓宽文字学研究维度。本文筛选静态古彝文字符号汉意“摔”字、“赛”字和现存鲜活的彝族民俗活动“摔跤”和“赛马”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二者的关系，旨在对巴蜀图语与身体活动的契合性进行初步探究，为文字起源于图画<sup>[6]</sup>，尤其是彝族文字起源于身体图画作实证演绎，对人类学与文字学进行跨学科对话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摔跤”（摔）和“赛马”（赛）动静身体“图式”筛选，可从时间和空间佐证古彝文字的形成与《说文·叙》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古文字形体来源一致，也表明彝文造字法与许慎《说文解字》上象形字（通过描摹具体事物而来的图形）造字法匹配，同时为彝文六书的定义拓宽了解释路径<sup>[7]</sup>，加强了尤其彝文象形字：画成其物，随体诂诂的文字同源和分化的说服力。

身体认知是哲学的本体论，身体认知是人类智慧、本源的认知工具。“身体才真正是人类创生精神、欲望和文化的最能动、最伟大的生命力，身体既是感觉、经验、认知也是真理”<sup>[8]</sup>。在原始彝族社会中，古彝族人的生命观、认知观是综合的、整体的、动态的，基于对神灵之虔诚和图腾崇拜之敬畏，身体认知凸显“生命一体论”和“身心一元论”。在这样的认知思维启示下，身体应成为文化和文明衍生、形成的本源。文字是文化和文明形成最典型的标志，在感通思维下，从身体认知的视角出发，运用知识考古学和口述史等跨学科方法，契合文字学研究方法和基本规律，探讨巴蜀图语——古彝文字的衍生与形成具有本体论的原生属性。阿余铁日<sup>[9]</sup>（1996）认为彝文也有象形（如𠄎 𠄎 gE<sup>3</sup> 𠄎<sup>3</sup>）、指事

（如 𠄎 𠄎 gE<sup>3</sup> 𠄎<sup>3</sup>）、会意（如 𠄎 Zi<sup>3</sup>）、形声（如 𠄎 k<sup>3</sup> 𠄎 pA<sup>3</sup>）、转注（转位如 𠄎 Z<sup>3</sup> 𠄎 tsi<sup>3</sup>）、假借等六种以上造字法，是远古彝人先民在石板、树皮、胛骨（甲骨）、兽畜皮等平面物上描绘的原始图画演变而来，一个字就是一副体现某个事物主体骨架轮廓的图画。彝文初造为表意文字，在使用过程中，随新事物的发展而增添许多新涵义。巴蜀图语中的古彝文字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其衍生与形成无法回避身体认知的能动作用。身体在认知世界过程中作为被认知的最初对象，在此情境下身体活动被人们作为图像进行描绘和记忆；身体通过“身体认知图式”投影为对世界的认知，此时身体又具有认知世界的工具属性。古彝族人对身体图像的描绘与记忆是非线性思维认知，研究阐释古彝文字的非线性特质，旨在强调身体认知对古彝文字形成的发生学意义，将巴蜀图语形成的情境通过“感通思维”的认知方式进行还原，将古彝文字的形成上升到身体的本性认知，对巴蜀图语衍生、嬗变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2 从身体认知视角探析巴蜀图语与民俗活动拓宽了文字学研究的新路径

以身体认知作为研究动静身体图式和符号的视域，以身体活动作为身体认知与古彝文字的研究中介，两者具有契合性。身体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作用与价值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在工具与对象双重角色和属性的作用下，其对以非线性特征为主导的巴蜀图语（古彝文字）的形成具有客观指向性。身体认知与古彝文字形成的契合实证研究模型的构建，建立在知识考古学、口述史、文字学和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之上。知识考古学是借用田野作业寻找发掘历史遗迹的一项比喻的说法，实际是指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在现存知识空间中拾取历史时间因子，从而发现被现存历史埋没的珍贵的历史线索，进而对现行知识作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sup>[10]</sup>。口述史作为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身体图符衍生、嬗变及转换性生成个案<sup>[11]</sup>，能强化弥补其文献记载的伪饰性和局限性，起到去伪存真，还原身体图符本源的的特质。人类学则帮助我们理解文字和进行文字研究时，能以“文字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把握作为地方性文字体系的符号内质。多学科方法和知识应用加强了跨学科对话的学理性。研究在田野考察和文献梳理基础上，综合运用知识考古学和口述史等方法，从身体认知视域对古彝文字意符<sup>[12]</sup>（彝族文字所说的象形、指事、会意这几种字所使

用的字符,跟这几种字所代表的词都只有意义上的联系。)进行挖掘、梳理和描绘,挖掘彝族文字形符和意符的表意内质,建构身体活动与古彝文字形成契合实证模型(如图1),旨在探讨身体活动与古彝文字形成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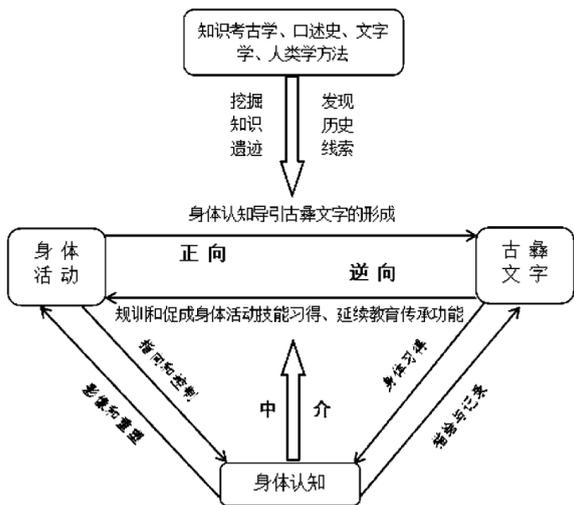


图1 身体认知视域下身体活动与古彝文字形成契合的实证研究模型图

Fig. 1 The fit empirical research model diagram related physical activity to the ancient language 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cognition.

唐兰(2005)<sup>[13]</sup>就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指出,文字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众人的创造。真正的初文,应当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由图画演化来的,每一个图画文字的单位,原本是一个整体。繁复的图画文字,其意涵是丰富的,其整体意涵是不能剥离和拆分的。在远古彝族氏族部落里,彝族先民用图画的方式记录下来的象形字,是图画文的递进和升华,而形意文字又是象形字的递进和升华,其表意重于表形本身。彝族“摔跤”与“赛马”鲜活图符整体观、“摔”和“赛”古彝文静态象意图符意涵,动静身体图符的筛选对身体活动与民

表1 契合实证中所筛选古彝文字(静态图符)与鲜活民俗活动(动态图式)表

Table 1 The table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Yi (static symbol) with vivid folk activities (dynamic schema) selected from the fit empirical research

序号	静态图式	动态图式	读音	汉意
1			gep[ke <sup>33</sup> ]音同汉字“革”	摔(跤)
2			zzy[dzg <sup>55</sup> ]音近似于汉字“仔”	骑(赛)马

生命力的功能,在彝族人眼里,我的诞生、我的家之、我的民族、我的生理结构、我的个性、我的过去,所有这一切,作为我在我的在世中存在之综合而加以超越的东

族文化和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价值及意义。基于在身体社会学视域,我们认为,“摔跤”能够作为以彝族个体身体存在为载体的项目,可以凸显彝族族群的集体认同功能、家之村寨的集体凝聚功能和个体的生命力展演功能。从整体上使得民俗身体活动在彝族个体自我认同上得以展现、族群认同上得以强化,国家认同上不断升华。若能通过文字意符强化三大功能继而融通,便能溯源彝民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赛马”作为以人马为“和谐共同体”的彝族传统体育项目—“人马”力与美、美与健的和谐生态图片,若能通过文字意符凸显民族和谐、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诉求,其民俗活动对文化和文明传承的补偿效应便能增强<sup>[14]</sup>。这两种民俗乡土身体活动式样具有较好演绎历史静态遗存图符“摔”和“赛”的认知本体性。而静态身体图符“摔”和“赛”作为彝族身体文化和文明形成的标识,对彝族身体活动的规训和教育传承功能之延续具有促成性,能较好表达民俗身体活动的原生性、建构性和历史记忆性。从“摔跤”与“赛马”造字的象形和会意属性来看,能较好演绎和佐证彝族图画文字的产生和其内在在富含的整体文化符号特质。

### 3 探析巴蜀图语与民俗活动促成了人类学与文字学跨学科沟通与对话

本研究通过筛选两幅民俗身体活动的动态图式与当今遗存的两幅静态古彝图符文字进行契合实证分析。契合实证分析具有突显和表述历史知识(遗迹)与现存鲜活民俗身体活动的关系之效用,研究力求达到言之及物。研究所选取的古彝文具有社会表征、群体表征、个体表征特性,如表1。从个体表征来看,彝族摔跤是参与者个体力量和技术相结合的竞技较量,具有突显彝族个体

西,就是我的身体。从“体认”范式来看,摔跤是最能突显和展演我的身体存在的民俗活动,是个人追求荣誉,炫耀武力,显示英雄气概的身心集中体验和感悟。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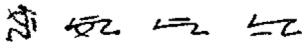
族赛马是最能体现彝“人与马”和谐的展演项目,人与马对运动快感的本能追求,是地地道道的“寻欢作乐”和“享乐主义”,摔跤和赛马正是彝族个体生命力的表达。从群体表征来看,摔跤和赛马,其输赢对村寨、家之的荣耀、对村寨、家之的凝聚力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彝族克智“摔跤不辨左右向”,客方语:“火塘下方在座主人家,贤能的我们这家人,历代出不平凡的木呷。说不平凡都不平凡吗?九代人手持戈和矛,宝剑明亮闪金光;七代人成名‘德谷’,‘德谷’说话像布谷声;八代人都骑骏马,骏马腾飞起黄尘。这样的人才是木呷。我们这家人啊,负重不怕上陡坡,跑步不怕下斜坡,摔跤不辨左右向,若说摔跤会显鸡翅纹<sup>[15]</sup>。”从“体认”范式来看,他对村寨、家之的情感宣泄和凝聚力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从社会表征来看,彝族属尚武民族,崇武力,习武练武,崇敬勇敢,仰慕英雄,其摔跤与赛马为彝族打上了清晰的尚武“体认”的民族烙印。

彝族象形文字的出现,是以图画文为基础的符号叙事之抽象和提炼。图画文字即以绘制简图的形式记录和表现思想的写意图形。随着原始图画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成为图画艺术,主要是表现美感,另一方面成为文字技术,主要是表现思想和观念<sup>[16]</sup>。古彝文字可分为:刻符、岩画、文字画和图画字。刻符、岩画都是分散的单个符号,没有上下文可以连续成词,一般不认为是文字。但是,刻符有“指事”性质,岩画有“象形”性质,它们具有文字胚芽的性质。文字画(文字性的图画)使图画开始走向原始文字图画字(图画性的文字),是最初表达长段信息的符号系列。原始文字一般兼有表形和表意两种表达方法,称为“形意文字”。在试图

将对手的身体进行控制(摔倒)的身体行为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图像画面,正如我们从不同角度拍摄影采集的图片资料一样丰富。图片要成为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信息,就需要人们对图片本身产生图式认同,继而使图片本身的符号意涵显现。彝族人摔跤图式共同认知的视觉信息聚集,是古彝人以非线性的思维方式描绘和记录的一系列的写意图形文字及其衍生。由彝文指事字  (彝族自称,用弓箭之形表示彝族)与彝文会意字  (抱,  是手,两个手合起来表示抱)、 be<sup>55</sup> (绊,  是藤,两根藤合在一起表示绊)等字组合转换便形成了古彝文字:“ gep[ke<sup>33</sup>](意为摔跤,音同汉字“革”)。四川越西、喜德、甘洛、昭觉等县的主要动作有下绊、挑、缠腿、过胸摔等。下绊,当把对方的重心移动后,用脚和膝别住对方,使其失去重心而被摔倒。挑,在双方移动的过程中,抓住有利的时机,将对方抱在空中,用膝或自己的腰和胯的扭转,将对方摔倒在地。缠腿,用肩将对方抵紧,用腿将对方的腿紧紧缠住,使对方被迫失去重心而倒地。过胸摔,在移动中,突然用力将对方抱住,自己后倒,扭身将对方摔倒<sup>[17]</sup>。云南彝族摔跤采用从站立式转位跪撑摔的循环式动作,使用抓对方腰带、抱单腿、过背、夹背翻等主要动作使对方肩着地而获胜<sup>[18]</sup>。在彝族文字发展和嬗变中,这种图画象形文字便成为彝族文化传承的媒介,它具有促进彝族人摔跤活动习得的外在功能和在身体活动的践行之中不断学习和重塑身体的默会认知功能,如表2。

表2 古彝文字“摔跤”契合实证分析表

Table 2 The fit empirical analysis table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Yi"wrstling"

身体认知	身体活动图式	古彝文字	身体学习与文化传承
基于对自己身体场域守护的理性诉求;对控制(征服)对手身体的渴望。		 gep[ke <sup>33</sup> ]音同汉字“革”意为:摔跤	促进和激励彝族人摔跤活动技能的习得与传承,不断学习和重塑身体的本源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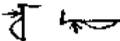
彝族摔跤这一身体活动式样,作为探讨古彝文字“”形成的身体认知中介,也是彝族文化的重要因子。摔跤是人与人之间身体的直接较量,是彝族人在特定时空场域内身体认知对身体存在的表达。无论是家之的荣耀,还是赢得姑娘的爱情都是对制服他者身体(摔倒)的渴望,“输”、“赢”的评价通过身体表达来完成,此时,身体的存在和展演是崇尚竞争与征服对手的民族的文化表达。摔跤不仅是纯力量的比试,其对身体场域的守护是摔跤的“体认”。彝族把宇

宙分为八个方位:东、西、南、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在宇宙八方中有三大害人物,叫“勒讫藤毕”、“年伙阿魔”、“藤革”。“藤毕”一天换一个方位,阿魔一月换一个位置,藤革三年换一个位置。这三大害人物均往顺时针方向运转不穷,若是人和畜遇见它都要丧身<sup>[19]</sup>。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做田野考察时,我们曾与毕摩交谈,美姑县档案局局长阿牛史日翻译说,摔跤选手他们总在寻找英雄“支格阿龙”击妖降魔的方位和翻转的时机,这就是摔跤手对方位的“体认”。这

种凸显彝家男子英雄崇拜和鬼神崇拜的身体认知,在彝族古籍《玛牧特依》也有记载,“不学摔和斗,不可能战胜别人;不学射和击,不可能成为英雄。”从“体认”范式来看,摔跤选手对方向的捍卫和守护是否对彝文字“”形成具有启示意义?一则传说是否说明摔跤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相关联?传说彝族摔跤源于“磨枣”三兄弟放牧时,看到牛和羊对顶头、角力及摔滚,便模仿其顶头、摔斗、滚翻等动物本能进行打闹嬉戏,这一模仿让三兄弟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同时也发现经常顶头、角力的牛羊肥壮<sup>[20]</sup>。熊志冲(1988)认为:

表3 古彝文字“倒下去(输)”契合实证分析表

Table 3 The fit empirical analysis table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Yi "fall (l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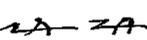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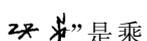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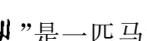
身体认知	身体活动图式	古彝文字	身体学习与文化传承
在竞争与对抗的过程中,认为身体被对手击倒或射杀(倒下去),意味着失败		 dji <sup>33</sup> 音同汉字“井” 意为:倒下去(输)	警醒着彝人关于斗争和对抗的身体活动学习和传承,具有启示和规避身体伤害的箴默意义。

身体是古彝人适应自然、征服自然的载体,也是社会存在延续和本源。身体作为认知世界的工具,是竞争与对抗最直接的载体。在彝族史前时代,为争取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家之械斗时有发生。在此过程中,彝族人认为身体被对方(手)击倒或射杀,意味着失败(即输的意思)。古彝人对这种由站立到倒下的身体行为进行了直观形象地描绘和记录,形成的文字画(文字性图画)使图画走向了原始形意文字。古彝文字“”jji[dzi<sup>33</sup>],音同汉字“井”意为:倒下去,输的意思。倒下去,即为输,直白而又形象。现今彝族摔跤有在婚礼上和葬礼上举行的。在婚礼上进行的身体活动,分别在新娘和新郎家进行,其在延续“婚礼上摔死食婴儿魔鬼、减除彝家危难”“仪式剧”时,摔跤不但具有除魔降瑞“敬神驱鬼”的鬼神信仰功能,还体现了彝族男子英雄崇拜之目的。而在葬礼上进行的摔跤仪式,则具有借逝者之名展示生者家之强大之意。在彝族人的生死观念中,摔跤仪式具有表达祖先与生存者的身体内在关系之逻辑功用,强化表达了死者留下“尚武”精神和肉体结构<sup>[22]</sup>。古彝文字“”警醒着古彝人关于斗争和对抗的身体活动学习和传承,具有强烈的教育启示和规避身体伤害的箴默意义。“”是古彝文字中具有警惕性的文字。而今家之械斗已远离彝族的日常生活,赛马、摔跤等民俗身体活动逐步转换成日常生活方式,摔跤在婚礼上往往以平局告终,以起到婚礼喜庆热闹之目的。正如焦现伟,焦素花(2017)受程志理“体认”范式启示,遵循现象学方法论规范、运用跨学科方法对现代体育“业余精神”

“原初人和动物追求运动快感的本能冲动相似,其意旨不是功利性的,而是与生命运动的内在目的相符,这种本能的运动欲,称为‘娱乐原欲’。”<sup>[21]</sup>娱乐原欲的体认范式,对彝族摔跤作为“游戏”促进彝人身心健康和彝族文字的衍生之阐释起到了发生学作用。如表3所示,古彝文字中“摔跤”是典型的象形和会意文字,这种形意文字可以直观表达摔跤式样以及身体胜负状态,对彝族摔跤活动的学习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利于彝族文化教育功能的延续和传承。

溯源的研究认为:“原始社会先民的世界观受各种超自然力量束缚,祭祀和巫术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在现代社会,伟大的英雄生而不凡,血管中流淌着神的血液,一切价值、判断、行为、技艺和天赋,无非是解释人(身体)如何获得荣誉,如何博取荣誉之手段<sup>[23]</sup>。彝族身体活动或许就是这些尚存“游戏”仪式的再演,对参与者、观赏者来说,其本质就是消磨时光。“”凸显出彝民族竞技(尚武、争胜)文化符号特质,规训和引导着彝族人身体活动技能的习得,赛马、摔跤等文化知识的学习与传承,具有不断深化和重塑彝族人的身体认知功能之价值,在时间的有序性里,人们品尝和玩味着“游戏”的身体,消磨着身体存在的时光。

古彝人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不断完善,对自然的了解不断深入。由于自然地域空间的广泛性、人身体能力的局限性,彝族人开始驯化和使用动物(马匹)来达到自己适应自然、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目的(包括:交通工具、家之械斗等等)。彝文与马有关的许多字都以马的主体躯干形状作为主笔,古彝文“”字读作“[mu<sup>33</sup>]”,上面的部分表示马,下面的一横表示地面,马的四只脚简化为一只,此字本义是指马。驮马、骏马、骑马、赛马都可以用此字表示。现代彝文中多数写成“ [mu<sup>33</sup>]<sup>[9]</sup>。“赛(骑)马”这一身体活动成为彝族人生存、生产和生活之必需。“赛(骑)马”是人在马匹之上,以自己的身体能力来驯服和驾驭它,并与之形成和谐共同体。古彝人

由图画会意字 (指背子, 后背上有点表示东西) 和图画会意字 (骑,  是马身体的示义符号, 上面的叉跨过马的身体表示骑) 构成古彝文会意文字“”zzy [dzg<sup>55</sup>]<sup>[9]</sup>, 彝语称“木子”, 汉意为赛(骑)马, 音同汉字为“仔”, 是典型的形意文字。“”是乘马横坐的形象。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 “彝人乘马横坐”<sup>[9]</sup>。彝族毕摩扎草人时, 也扎这样的草人, 骑马之状表示人乘在马上。“”是一匹马背上有鞍的形象, 中间那一点表示马蹬。此字意指马鞍。彝族格言“穷人想骑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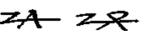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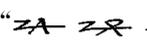
有马无鞍”这句中, “鞍”字的彝文就用此字。”此字由花马演变而来, “”指马的躯体, 小点表示花样繁多, 多种颜色错杂的意思, 本义指花马, 引申义泛指花色品种<sup>[9]</sup>。现行彝族赛马具有不同的种类和样式, 分为: 鞭西(伟)、都西(国)和马术表演<sup>[24]</sup>, 见表4。均可认为是人马和谐共同体展演的不同表达, 是“体认”范式的表达, 与彝族文化具有不可剥离的依附性关。我们由此可以对古彝文字进行反推与描述: 人骑坐在马背上, 有不同的姿势。”字使得彝族人更加便捷地

表4 彝族“赛(骑)马”“体认”一览表

Table 4 The table of the "ride a horse" "cognition" from Yi nationality

赛(骑)式样	“体认”解析	主要举行节日	民族文化意涵
鞭西(伟)	追求“伟”, 即“快”, 比赛时在要求的跑道上, 跑得最快者获胜。	火把节 彝历年	英雄崇拜 送祖神灵
都西(国)	追求“国”, 即“匀”, 比赛时, 在装饰美观的前提下, 马四蹄交叉平步, 快而匀速, 平而稳, 姿态姿势优美, 人马配合默契者为佳。	大理三月节 婚葬嫁娶 祭祀祖宗 超度亡灵“大轰鸠” 氏族家之召集会议	崇尚黑色 毕摩文化 刀耕火种 山地经济
马术表演	追求“灵”, 要求有规范的拟人化表演动作, 有作秀作美的姿态。		

学习骑马这一活动的不同行为方式, 同时对人们进一步重塑对身体以及对骑马的认知, 起到图像记忆、反馈整合的作用。“”字本意为“骑”, 后因为社会发展需要, 骑马不仅用交通工具和家之械斗及战争需要, 也成为保留优良畜种的重要方式。一字随着人们对身体认知的变化而产生了含义延伸。赛(骑)马为彝族人喜爱的身体活动式样, 它引导和促进彝族人生活技能的习得, 同时重塑和建构了身体

行为方式、观念及主张。彝文古籍《西南彝志》载: “骑士到来了, 骑上这骏马, 跑在广场上, 威武如妖行, 行动如飞仙, 像云里奔月, 像天上流星。戴斗笠的汉、着披毡的彝, 云集看跑马, 大家都夸耀, 彝给汉增荣、汉予彝增威, 来往的人群, 都点头称赞。”<sup>[25]</sup>从“体认”范式来看, 赛马已成为表达彝族人重大节日庆典活动的身体展演内容之一, 并具有促进民族团结和区域民族和谐的综合功能价值, 见表5。

表5 古彝文字“赛(骑)马”双向实证分析表

Table 5 The two-way empirical analysis table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Yi "ride a horse"

身体认知	身体活动图式	古彝文字	身体学习与文化传承
基于对人自身身体能力的局限性的认知, 开始驯化和使用动物来建构“人马和谐共同体”来达到适应自然、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目的。		 zzy [dzg <sup>55</sup> ] 音同汉字“仔” 意为: 赛(骑)马	引导和促进彝族人赛(骑)马人马和谐共同体活动技能的习得, 同时重塑和建构身体行为方式、观念及主张。

#### 4 结语

以知识考古学、文字学、口述史和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身体认知的视域探讨巴蜀图语中具有典

型性和代表性的古彝文字与身体活动的契合性特质, 对拓宽文字学的研究维度、加强人类学与文字学领域的对话有一定价值。即: 身体活动导引古彝文字的衍生与形成; 古彝文字进一步规训彝族人的身体活动行

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身体认知视角研究巴蜀图语的衍生、形成具有重要发生学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孔祥卿,史建伟. 汉字与彝文的比较研究[M].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6):16-17.
- [2] [英]怀特海. 思维方式[M]. 刘放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5.
- [3] [日]中内敏夫. 教材と教具の理論[M]. 東京:あゆみ出版社,1990:3.
- [4] 莫伟民,姜宇辉,等.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4-182.
- [5] 叶启晓. 诠释人类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09.
- [6] [美]丹尼丝·施曼特一贝瑟拉. 文字起源[M]. 王乐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
- [7] 郝仕宏. 古汉字同源分化研究[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1.
- [8] 张之沧. 论身体和智慧[J]. 体育与科学,2006(05):11-13.
- [9] 阿余铁日. 彝文字形探源[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1-3,56,57,58,59.
- [10] 郝庆军. 作为研究方法的知识考古学[J]. 天津社会科学,2004(4):112-116.
- [11] 万建中. 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39-143.
- [12]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9

- 20.
- [13] 唐兰. 中国文字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4-90.
- [14] 孙德朝,孙庆祝. 彝族体育文化符号阐释[J]. 体育文化导刊,2015(3):203-206.
- [15] 阿牛木支,吉则利布,等. 彝族克智译注[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63.
- [16] 周有光. 世界文字发展史[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3.
- [17] 中国体育博物馆,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M]. 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114.
- [18] 周伟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12.
- [19] 吉克曲日. 彝族研究论文集[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346.
- [20] 罗建新,王亚琼. 对彝族原生态传统体育文化历史流变与发展的研究[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6):48-52.
- [21] 熊志冲. 从本能的嬉戏到文化的体育:体育起源新论[J]. 体育与科学,1988(6):14-17.
- [22] 花家涛. 民族民间体育的性别教育——以彝族摔跤为例[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2):100-104.
- [23] 焦现伟,焦素花. 现代体育“业余精神”溯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重生[J]. 体育与科学,2017(2):61-71.
- [24] 孙德朝. 多维视角下的体育文化研究[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48.
- [25]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西南彝志选[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18.

## (上接第44页)

- [9] Paul D., White, M. D. Boston. The Role of exercise in the aging[R].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57(9):165.
- [10] President's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 Newsletter[J]. Nasnewsletter, 1968(8). Vol. 5:2.
- [11] President's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 Newsletter[J]. Special Edition. 1973(5):2.
- [12] Bureau of the Census. U. S. 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 1988[R]. Hoffman, Rice, and Sung, 1996:15.
- [13]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hysical Activity Trends—United States, 1990—1998[R]. Morbid Mort Weekly Rep, 2001(9):166,169.
- [14] Healthy People 2010, 2nd edition, with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health" and "Objectives for improving health," 2 vols. [R].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11):12,16.
- [15] US Dep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ealthy People

- 2010; Conference edition[R]. Washington: U. S. Dep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0:23.
- [16] Exercis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 Survey of Adults 50-79[R]. Washington D. C., 2002(5):12.
- [17] President's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 Newsletter [J]. Nasnewsletter, 1977(5):8.
- [18] Kahn EB, Ramsey LT, Brownson RC, Heath GW, Howze EH, Powell KE, Stone EJ, Rajab MW, CorsoP.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increase physical activity. A systematic review [J]. Am J Prev Med. 2002(2):73-107.
- [19] US Dep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ealthy People 2010; Conference edition[R]. Washington: U. S. Dep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0:11.
- [20] 张发强. 在 2015 全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 <http://chinaIntx.sport.org.cn/>.

● 新探索

# 超级马拉松、圣徒与内在体验:兼论面向未来的体育哲学

任慧涛<sup>1</sup>

**摘要** 在运动项目中,长跑及马拉松运动具有明显的哲学蕴涵,能够让体验者体验到哲学中涉及“人人”的东西。研究从巴塔耶的内在体验出发,考察了精神苦恼与肉体疼痛的统一与对立,分析了超级马拉松跑者与宗教圣徒及其行为之间的相似性,说明了肉体疼痛对于人,尤其是之于提升人的精神状况的积极价值。超级马拉松给了普通人获取肉体疼痛的仪式化、神圣化途径,并将领受肉体疼痛的过程与超我习得之结果等同,使身体运动本身成为一种深刻体验。超级马拉松的苦难体验带来了对于存在无意义的接受,增强了人亲身认知的能力。研究还以自我叙事回顾选题背景,认为通过运动体悟形而上问题,是哲学亲近普通人的重要桥梁;与神学研究之间的勾连和关联,是未来体育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关键词** 长跑;超级马拉松;体认;体育哲学;内在体验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58-05

## Ultra Marathon, Saints and Inner Experience: Also On a Philosophy of Sports for the Future

REN Huitao<sup>1</sup>

(1.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 Marathon has remarkabl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the implication can give assistance for a person experiences which involved the inter-person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inner experience of Georges Bataille, this paper examines unity and opposition of mental distress and physical pain, analyze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ultra marathon runners and religious saints and their behavior, and explains the physical pain for people, especially The positive value of ascending people's mental condition. The ultra marathon gave ordinary people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physical pain, the sacred approach, and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physical pain and supernatural learning results are equivalent, so that physical action itself into a profound experience. Ascetic experience of ultramarathon perhaps not worth the results, but good value judgments. It brings meaningless acceptance, be full of human perceptions, to face absolute gravity, death and other absolute mobility exist. This study also reviews the background with self-narration method,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port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lose ordinary being and philosophy. And how to development the interdependent with theological studies, which will be a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orts philosophy.

**Key words** running; ultra marathon; body cognize; sport philosophy; inner experience

### 1 精神苦恼与肉体疼痛

人把自身分裂成精神和肉体,并始终使自己与自己对立<sup>[1]</sup>。痛苦亦是如此,精神苦恼与肉体疼痛,两者很少并行出现,如无捕食、繁衍等生理驱动,没有一种生物愿意体验肉体疼痛。物欲被满足,肉体不再遭受冲击,人之精神却愈发苦恼。思想上的痛苦来源太多,

且成因复杂,但本质上都是起源于人试图“质问一切、改造一切或成为一切”。而我们明显不是一切,“意识到此,一种无法呼吸的空虚就揭示了自身,一种难以承认的痛楚就出现了”。<sup>[2]4-5</sup>

为了摆脱精神苦恼,人不惜自残自杀,以身体损伤来获取片刻精神麻痹。与精神苦恼不同,肉体痛苦通常拥有其它附带的恩赐,正如路易斯在其《痛苦的奥

收稿日期:2017-04-02

作者简介:任慧涛(1986-),男,开封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治理与体育伦理。

作者单位:1. 泉州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泉州 362000。

秘》所转引 R. 哈福德医生的临床观察<sup>[3]</sup>：

尽管困难重重,在医学实践过程中还是逐渐形成了关于痛苦的某些看法,随着实际经验的生长,这些看法得到了进一步确认。身体疼痛即使短时间爆发,也会十分剧烈。患者通常不会大发牢骚。他只会请求医生减轻疼痛,不愿意花气力长篇叙述疼痛的状况。患者很少会丧失自控能力,也很少陷入癫狂、失去理智。从这个意义上讲,严重身体疼痛很少变得完全难以忍受。在短暂的重度疼痛消失后,患者行为不会发生明显改变。长时间持续疼痛的后果则较为明显。患者往往会接受疼痛的事实,极少抱怨,或者根本不发言,患者的品格力量和驯服精神会大大增长。患者会从骄傲变为谦卑……这可能未必是因为患者品格力量的增长,而是由感染所引起的轻度自我兴奋。

从临床观察可以看出,疼痛让肉体突显,从以往被忽略变得更受关注。无论肉体疼痛多么剧烈,患者主观上都不会对它持否定、消极评价——对于人来讲,任何肉体疼痛都是可以忍受且需要尊重的。肉体疼痛能够掩盖精神苦恼,让思维和逻辑暂时退居次要地位,让人放弃改变世界(只会请求医生减轻疼痛),认同失望现实(往往会接受疼痛的事实),甚至对自己的无能表示赞赏(由感染所引起的轻度自我兴奋),这些都有助于减轻精神苦恼。尽管这仿佛与柏拉图的观点<sup>[4]</sup>相悖,美好的灵魂并没有因为它的优点,让身体得以保持在它最好的状态,反而是遭受折磨的躯体,帮助灵魂摆脱重负。

祛除思想苦恼,肉体疼痛成了一个狡猾却又实用的选择。

## 2 “超马”圣徒们的苦行

或许是神的安排——为了引出圣徒,姑且使用这一假设——除了坏途径之外,人类开始使用一些好的方式,例如游戏或体育,来让肉体(假装)疼痛。超级马拉松,便是其一。超级马拉松(ultra marathon)又称极限马拉松,一般指超过 42.195 公里的所有长跑运动,超级马拉松通常都会超过 100 公里,最长有 200 多公里,往往在山地沙漠、戈壁险滩等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中举行。超级马拉松很少有物质或金钱方面的奖励,因此参赛者鲜有职业选手,大多是普通人。

超级马拉松运动过程十分艰难,其中不乏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出现,参赛者却越来越多,如果回顾人类历史,有些人群的行为与之极其相似,如基督教的圣徒们。在基督教史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尽管基督教长时间漠视甚至唾弃身体,但若信徒在教义辩论和传承上,无法胜出或胜任,便选择将身体奉献出来,

通过肉身成道。长篇累牍地表达宗教思想的训诂和学说,当然在宗教传播价值上更胜一筹,但身体弃绝是一种更为直接、且更加震撼的选择。为了追逐信仰,或显示自己优异于其它教徒,圣徒将把肉体当做“超自然力量的战场”,弄伤自己的身体,以示领受了圣痕。

参加超级马拉松的人,同样把身体作为战场,与地心引力——重力这一物理存在哲学认识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在《长跑、马拉松以及体育的哲学向往》(《体育与科学》,2014 年第 6 期)<sup>[5]</sup>中已有所阐释,我将在下篇文章《重力之于体育哲学的价值》中尝试更深入的讨论。在这一斗争中,仪式感和神圣性十足,人们将领受肉体疼痛的过程与习得超我体验之结果等同,例如提姆·努阿科斯(Tim Noakes)在谈及对马拉松的认识时,说道:“是跑步让我知道了我是谁,而同样重要的是,它还让我知道了我不是谁……每个人在内心深处,想来就是个受虐狂,这种受虐狂总是一定要对自己做点什么……病人们都相信,最苦的药就是最好的药;而朝圣者则相信,流血的膝盖能把他们最快地引向通往神的道路。在这种意义上,运动员怀着这种信念折磨自己:此乃走上胜利的铁定的道路。”<sup>[6]</sup>

这些话至少表现出以下观点首先,长跑成为被个体定义为一种方式、一种途径,是主动(自己对自己做点什么)进行的、让肉体疼痛的行为,目的是让人认清自我,并明确自己的局限(知道我是谁……同样重要的,知道我不是谁)。其次,在病人、朝圣者和跑步者的类比中,我们还自然地发现,跑者把长跑中所领受肉体疼痛的过程,与获得超我认知的结果等同起来。最苦的药就是最好的药,流血的膝盖能最快通往神,这都是将一个超验的目标,放置于肉体疼痛仪式中同时发生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拉松运动被从长跑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仪式化的、(假装)肉体疼痛的方式。在马拉松运动过程中,身体所遭受的疼痛被自我感觉神圣化为一种苦行,带来极大的美妙。而关于身体疼痛的作用,巴塔耶在苦行与体验关系的讨论也有所涉及<sup>[2]34-36</sup>：

我不否认苦行有助于体验。我甚至坚持它。苦行是将一个人自己从对象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肯定的手段;它要杀死那种把一个人和对象相连的欲望。但同时,它也把体验变成了一个对象(一个人没有杀死对对象的欲望,只是为欲望提出了一个新的对象)。通过苦行,体验注定要获得一个肯定性对象的价值。苦行要求解脱,拯救,占有最可欲的对象。在苦行中,价值无法摆脱快感或受难,单独得到体验;它总是我们努力为自己争取的一种至福,一种解脱。在可能的极限处,体验无论如何要求一种弃绝:停止想要成为一切……对

许多人而言,苦行在自身当中拥有某种迷人的、令人满意的东西;如同一种完成了的掌握,但这是最困难的掌控,是对一个人自身、对全部本能的掌控。苦行者能够从高处俯视底下的事物(无论如何是通过他对自己怀有的轻蔑,来俯视人性)。他想象不出一一种谋划形式之外的生存手段。

尽管苦行带来肉体疼痛,但超级马拉松跑者就像拥有了“空洞幻觉的圣徒”<sup>[2][11]</sup>,忽略肉体疼痛,或者享受着因疼痛带来的自我兴奋,通过跑步来占有那些高出自己的存在——至少把这些存在当做已然触及的东西,通过马拉松运动中连续的、流动的、感受的、陶醉的、不确定的、幽暗的、无垠的<sup>[7]</sup>具身认知,将那些高出自己的存在与自身紧紧相连。许多参加超级马拉松的人,都在其自传中,提及当时的无我状态<sup>[8][9][10]</sup>。但很明显的是,上述状态只是“忘我”,而非“无我”。即便是忘我,也是一小部分人所能体验到的身体之美妙——感受到因运动而带来的一切妙处。但这些妙处却不能与他人共享,因为除了运动着的人之外,身体并不提供任何关于肌肉、血液、感官以及情绪方面的变化给观者或听者。

实现无我必须将“我”与“我的对象”区隔开来,正如巴塔耶肯定苦行能够分离“我”与“我的对象”那样,让那些难以捕捉、划分和表达的对象化事物从“我”中剔除,不再暧昧与混沌,这是马拉松运动的哲学起点。在跑步中,身体由于跑步出现向前、向上两个矢量运动以抗拒重力。随着时间增加,生理机能和神经系统开始反馈厌恶和排斥给大脑,强烈的艰难感随着时间持续而增加,“每一步都似乎要用极大的勇气、力量来支撑”,苦行出现。此时,内在体验、自我意识或者其它符号性指涉依旧共存的,因为此时,长跑依然伴随着人之主体所试图说服自己的抗争、勇气、坚毅等诸如此类的标准。“跑过七十五公里,疲劳感突然销声匿迹后,那段意识的空白之中……我不是人,是一架纯粹的机器,所以什么也无须感觉,唯有向前奔跑。”这种对成为一切或改变一切的放弃,让人从那些作为“自己本身的拟态”存在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在所能体验到的另一侧去进行认识,并基于身体认知,对原有的符号化的价值判断体系进行调谐。

这一过程,正如生命长河,人皆在黑暗之中,或不自知,时刻想改造世界,征服世界。当认识到不可能之后,对自己失望,陷入无聊与痛苦的钟摆,如何逃脱?身体超越愉悦和痛苦的限制,感觉无物(nothing),要失去感觉,要超脱欲望之外……身体要对自己的生理完全漠然,通过这种身体的弃绝……打断与空间的情感纽带<sup>[11]</sup>。通过放弃手段和工具,放弃解释欲和控制

欲,在苦行的可能极限,出现了一种美妙的弃绝。运动着的人迎来认识上的豁然:“我非无机、无用的机器,不过是一介洞察了自身的局限,却经历长期保持自己的能力与活力的(动物)”,完成了对一个人自身、对全部本能的掌握。

### 3 与无意义独处

人之存在,最基础的是时间存在和空间存在。时间上是从生到死、从幼儿到垂暮,空间上则是从母亲怀抱到各地流浪。我们的求学、就业和成家等等,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悲欢喜乐等等,都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都是这两个“不动飞矢”上的附着物,即便接近全知全能,也无法暂停或减缓两者的流动。忽略正在走向死亡这一现实,寻找转移注意力的目标,是防止自我迷失的一种途径,因此人积极地伪装建构和陈述生存价值,在现实世界“闭着眼摸索”,封闭自我,杜绝外界世界与内在灵魂的真切连接,严格防范可能引发内部变化的各种外部事物。同时,接受(或者说必须接受)自我在“灵魂温室”中的不断膨胀,以我的获得、我的愉悦来作为是否达到生存价值的标准。

对欲望膨胀的约束,无法通过心灵调节实现,只能求助于肉体的改变,肉体改变带来的关键——亦即我们要说到的另一种防止自我迷失的途径,是向内而非向外追问,因为语言和思想对向内的追问非常乏力。这种追问必须以超越极限生理行为作“触媒”来实现,因为只有苦行的极限之处,启示(revelation)才会把非知的(non-savoir)答案显露出来。人的生理构造,使身体运动本身成为一种可能达成深刻体验的工具,并深深依赖,在不断的运动——尤其是对身体的肌肉、骨骼、神经等带来挑战的竞赛性身体运动中,人的意识将在新的肉体情况下思考和反省,这不同于日常获得,更类似圣徒们在祈祷和赞美、狂喜(ecstasy)与出神(trance)、神迹(miracles)与道成肉身(incarnation)仪式的参与中,所声称获得和感受到超验——例如感受到指向神之实在性的某种东西,将之降维为可获得的先验性认识,拓展和深化那些超我的东西<sup>[12]</sup>。

正如俄狄浦斯在弄瞎双眼之后,漫游着,并对他所看不见的世界有了全新的直觉……他变得谦卑,因此更接近众神<sup>[13]</sup>。让“一切理智运作暂时中止”,精神(esprit)才裸露出来,内在体验是“在狂热和痛苦中追问(检验)一个人关于存在(être)之事实所知道的东西,而非解释——尤其是话语或者词语。”强调生命的无意义、语言的无意义,让最终价值判断走向消解,或者说:内在体验,是唯一的权威,唯一的价值。在这样的状况下,内在体验不再是一个教条(一种道德态度)、

一种科学(知识既不能是它的目标,也不能是它的起源)或者一种对充实状态的追寻(一种实验的、审美的态度)中获得它的原则,除了它自身外,它不能有其他任何的关注或目标……一切的价值、一切的权威都置于其中……由于它事实上是对其他价值和权威的否定,所以,具备一种肯定性存在的体验本身就肯定性地成为了价值和权威<sup>[2]13</sup>。

亦即说,用思维或逻辑来进行最终价值判断是无用的,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超级马拉松给个体所带来的东西,奔跑的人在持续克服重力、向终点进行矢量运动时,极其短暂地将“忘我”等同“无我”。用强烈的情绪体验来判断“真与假”、“得与失”,以及先哲们用无数逻辑和语言符号所给出的指涉。精巧语言、普世道德使马拉松运动工具化,并将跑者的行为目的化,是对个体内在体验的贬低。相对于语言的传达,其所无法传达的一个状态、一次出离等,都是身体完成的纯粹的、哲学性的理解,在瞬息、刹那、须臾之间所感受到的存在,虽然无法用语言、词汇和逻辑进行延展,但强烈的切身性——类似于意识的物理爆炸——所给个体带来的充分性和完整性,丝毫不亚于任何一种亲近哲学的方式或途径,至少我们不再将话语认知的事实等同于事实本身,把文本描述出来的体验当做自身体验。

或许可以用更通俗的表达来说明“内在体验”:它批评每一种依赖于语言、符号和逻辑的“手电筒哲学”,这些指涉性讨论即便驱除了所有的黑暗,也无法让人之肉体本身被照亮,或者说无法让人对“存在的绝对流动性”的态度乐观起来。正如巴塔耶肯定苦行,肯定内在体验,将之视为改造人成为光本身——无论光的亮度以及它能照耀外界多大范围,至少在“作为主体的人”这一范围内,是透彻且温暖的。

#### 4 尾论:面向未来的体育哲学

2015年10月,在《体育与科学》编辑部筹办的“体育元理论与方法论——跨学科体育方法学建设”学术工作坊论坛召开前夕,有幸与多位学者就体育学之发展漫谈,得益于活跃且激烈的氛围,我在会场上抛出了“如果全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资本主义所宣称的社会最终状态,体育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和地位,体育学又将在研究什么”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富有想象力,引起了一些讨论,但主要集中在实现的可能性上,并不深入。

之后,这个问题时常浮现。尽管并不从事体育史方面的研究,但我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宗教与体育之关系非常感兴趣,包括古代体育与宗教的对抗与融合、跨国福音主义(Transnational Evangelism)与现代体

育传播、现代奥林匹克产生的宗教背景、体育运动中的宗教信仰等。尤其是在跟随易剑东教授进行奥林匹克治理研究<sup>[14]</sup>中,发现顾拜旦深受宗教影响,基督教教义在顾拜旦所设计的奥林匹克精神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可能跟其所处的社会背景相关,历史上的法国素有“天主教的长女”之称,天主教一直作为法国国教存在,基督教教义是社会意识主流,宗教控制着哲学、政治、法律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宗教控制一切的状况,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才有所减弱。而到十九世纪末期,法国社会充斥着金钱至上的利己主义思想,公共意识尚未普及。出生于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家庭的顾拜旦,在尝试将奥林匹克精神(以及复兴的奥林匹克运动)本身放在宗教的高度上来对待<sup>[15]</sup>:

既然确实存在一种运动宗教,存在一种后来屡次笨拙或不很笨拙地、持久或不很持久建立起了祭坛的运动宗教,我们就应该了解为什么运动宗教是在希腊确立起来的,希腊人对运动宗教的理念是否适宜其他人类。

顾氏的言论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爱弥尔·涂尔干的判断一致——随着社会发展而复杂化与分化,传统类型的神圣宗教将会逐渐被社会的其他部门所取代,或者蜕变成另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形态宗教<sup>[16]</sup>。这种所谓的新形态的宗教,或许与社会上所惊叹的“长跑是中产阶级的新宗教”等言论并不等同,但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只要体育运动与宗教能够出现一定或某种程度上的耦合,那么,体育学的发展或许就可以有一个更大胆的推论,那就是:面向未来,无论体育与宗教之间是否存在勾连或融合,体育学可以从神学研究中汲取养分,生长出新的研究领域或分支。

尤其是在体育哲学的发展上,作为“万学之母”,哲学的重要性毋须赘言,但越来越趋向于解释学和还原论的趋势,打破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平衡。心灵和肉体作为与分离而具体的诸事态组成的生命史相关,两者之间的创造过程——肉体生命中的物质事态和心灵生命中相应的精神事态之间的联系<sup>[17]</sup>——被打破,从肉体事态向精神事态的过渡被否定,让身体体验所产生的价值难以输送到实际世界。而神学作为“与哲学共用历史、共用真理且存在系统关联”的学科,在世俗化的今天,可以更多地去反思具身认知、彰显自我价值,例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认为“上帝”是人的最高理想的投射,神学(关于上帝的思想)成就了人类学(在人的生命中能够希望的美好的东西)。在神学的关照下,我们在“体认”<sup>[18]</sup>研究上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当然,不仅是逻辑学、阐释学和现象学的“真空”内

分析,而是将其放在一种生活哲学的“半空”中,对人的身体本真和运动体验进行诠释,去解读“那种近乎宗教的妙趣”。正如卡尔·雅斯贝斯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哲学发展的描述:

人们期望“生活”,盼望“体验”。人们追求“现实主义”,主张不要单单知道而要亲身经验……在最卑微的人身上,人们也能发现真实的和存在着的(哲学的)东西……对腐朽的哲学感到失望,而走向实际的科学,又从不涉及价值的科学,重新返回到真正的哲学……苏格拉底以前那些哲学家的崇高和伟大,在于哲学幼童时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深刻朴素性。而今天的复杂现实,需要我们吸取一切时代的一切哲学里所呈现的内蕴,才能找到现在的真正哲学<sup>[19]</sup>。而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为一个游戏定下了规则——一项技巧——当我们跟从规则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却与我们原来设想的不一樣。于是我们就像被我们自己的规则绊住了……真正的发现是这一发现——它使我能够做到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打断哲学研究——这种发现给哲学以安宁,从而它不再为那些使哲学自身的存在成为疑问的问题所折磨<sup>[20]</sup>。

真正的哲学直接产生于个体哲学家在其生存环境及历史环境中所遭遇的问题<sup>[21]</sup>。虽然有人质疑哲学的社会科学化趋势,批评对体育运动的哲学思考太过于浮在浅层次,不过,如果哲学涉及具体的人,必须努力变得通俗易懂,简短传达,进而让人从哲学中感觉到一些涉及人人的东西。同时,体育反馈或发展哲学,未来还有更多可能,并不悲观——无数的星星的存在,更容易让我们认识到天空的存在,但无论何种深刻的哲学认识,都是“夜晚的星星”,而不能武断地将其“天空”。现代体育是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在浩瀚的哲学天空中,必然有其位置,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或者仅只“看见”它发光的一小部分罢了。

## 参考文献:

- [1] 卡尔·亚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3:172.
- [2] 乔治·巴塔耶. 内在体验[M]. 尉光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3] 路易斯. 痛苦的奥秘[M]. 林菡,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64—165.
- [4] 柏拉图. 理想国[M]. 顾寿观,译.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0:135—136.
- [5] 易剑东,任慧涛. 长跑、马拉松以及体育的哲学向往——从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谈起[J]. 体育与科学,2014(6):14—20.
- [6] 米达斯·德克思. 健身狂想曲——非运动生活的幸福[M]. 比亚,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41,165.
- [7] 孙周兴. 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62.
- [8] 村上春树.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M]. 施小炜,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 [9] SCOTT JUREK, STEVE FRIEDMAN. Eat and Run: My Unlikely Journey to Ultra-marathon Greatnes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2.
- [10] MARSHALL ULRICH. Running on Empty: An Ultra-marathoner's Story of Love, Loss, and a Record-Setting Run Across America[M]. New York: Avery, 2011.
- [11] 恩斯特·布洛赫. 希望的原理[M]. 梦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16.
- [12] 约翰·鲍克. 神之简史[M]. 高师宁,等,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2—20.
- [13] 理查德·桑内特.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M]. 黄熠文,译. 2006:12.
- [14] 任慧涛. 善治:奥林匹克运动及全球体育秩序新起点?——从任海教授《国际奥委会演进的历史逻辑》谈起[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4(6):506—511.
- [15] 顾拜旦. 奥林匹克主义——顾拜旦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6.
- [16] 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汲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62—576.
- [17] 路易斯·P·波伊曼. 宗教哲学是什么[M]. 黄瑞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0—121.
- [18] 王水泉. 身体认知的的方法论意义——《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体认与体育学学科定性”主题沙龙述评[J]. 体育与科学,2016,(04):1—5+22.
- [19] 卡尔·雅斯贝斯. 生存哲学[M]. 王玖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11.
- [20]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58—60.
- [21] 杨俊. 哲学:生存之爱——雅斯贝尔斯的元哲学研究[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224.

● 新探索

# 互构共变与失范:休闲体育演变的生成逻辑

周芳<sup>1</sup>

**摘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以吉登斯的结构化和消费社会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梳理休闲体育的历史渊源和地位变迁演变,探寻休闲与体育互构背后的本质动因,并针对休闲体育的异化提出了救赎的对策性建议。研究认为:纵观休闲体育的历史渊源和变迁,休闲体育的发展和变革顺应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休闲与体育的边界日益模糊,在后现代背景中发生了相互解构和建构;休闲与体育的互构既是个体化和反叛化的集体行动也是人们对身体赋权和人的主体价值的重新审视;在这一过程中,休闲体育一度丧失了其理想维度,被工具化和消费化,进而造成阶层固化和人的异化。由此提出了树立人本主义休闲体育理念和行业恪守自觉与自治的伦理救赎原则。

**关键词** 休闲术语;宗教身体;世俗化;哲学思想;体育休闲;文化反叛;伦理救赎;身体操演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63-06

##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Change and Misconduct: the Generative Logic for the Evolution of Leisure Sports

ZHOU Fang<sup>1</sup>

(1.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nd status changes of leisure sports by using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nd consumer society as the analysis tools to explored the essential motives behind inter-construction between leisure and sports, gave the suggestions on the redemption of the alienation of leisure sport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leisure sport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leisure sports conformed to the social culture at the specific era. The boundary between leisure and sports is increasingly blurred, and they were mutually deconstructed and constructed in the postmodern era. The inter-construction between leisure and sports is not only the individualized and betrayed collective action but also people's body empowerment and reexamination of subject value. In this process, leisure sports has once lost its ideal dimension and has been toolized and consumerized, resulting in class solidification and human alienation. We have proposed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leisure sports and the principle of ethical redemption that the industry should abide by consciousness and autonomy.

**Key words** leisure terms; religious body; secularization; philosophy; leisure sports; cultural rebellion; ethical salvation; physical exercise

人们对休闲价值重要性的认知早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了一种共识。早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就已经把休闲活动确认为一种人权,甚至在一些国家中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给予其制度化的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体育活动作为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个人发展、家庭生

活、服务业乃至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2016年中国从国家战略层面也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健身休闲产业”服务于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为目的的“健康中国”建设。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无论是体育活动的内容还是形式都逐渐超出了纯体育的范畴,开始明显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休闲和生

收稿日期:2017-03-12

作者简介:周芳(1982-),女,湖北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1. 安徽工程大学 体育学院,芜湖 241000。

活中,呈现出了显性的体育生活化和休闲化特征。那些不断涌现的新的体育项目在国内泛指的是“极限体育”、“休闲体育或体育休闲”,“户外运动”其实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有“leisure sport”、“extreme sport”、“alternative sport”以及“life sport”等诸多表达,凸显了休闲体育变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人们对休闲体育的文化认同在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不同国家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在十多年前的中国,一些新型体育项目甚至被贴上了“冒险”和“不要命”、“活腻了”的文化标签<sup>[1][2]</sup>。然而,像从事蹦极,高空速降,攀岩等这种曾经被称“T型性格”的个体和组织在中国也越来越多,曾经作为非主流的小轮车运动竟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我们究竟该如何全面而客观的审视它?那么不同时代的体育和休闲耦合是否具有明显的社会时代烙印、究竟那些是其变迁背后的本质、一味的追求娱乐至上和技术至上究竟有无失范行为?为此,本文在考察休闲体育的历史渊源和演进的基础上,探寻其背后变迁的动因和特征,进而在宏观上赋予休闲体育健康发展以自觉性。

## 1 休闲体育的历史渊源、地位变迁

### 1.1 历史演进中的休闲术语与体育耦合的内涵流变

格拉顿(Gratton)曾说休闲的定义足以写一本专著<sup>[3]</sup>,足见其定义的复杂程度。因为无论是在历史语境中生成的休闲还是体育,它们二者的概念本身都是相当复杂的,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出不同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想对休闲体育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就显得更为棘手。为此国内学者在究竟是“体育休闲”还是“休闲体育”的称谓上也出现了争论。但是休闲和体育概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不会否定休闲和“休闲体育”或“体育休闲”内涵的普遍性特征。提出“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休闲是人生的一种自由状态,“成为人”的一个过程。随后人们在“自由”的维度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拓展,突出了休闲主体的自主和自由。比如熊欢<sup>[4]</sup>认为,休闲的内涵核心是自由、内心体验、以活动为依托的一种存在状态,也是人类发展的需求。马惠娣<sup>[5]</sup>认为,不管是体育休闲还是休闲体育本质上都是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那么究竟休闲的终极服务对象是谁呢?它究竟如何和体育发生的关联?席勒认识到游戏对人的重要性,提出了“只有在游戏时人才能成为完全的人”的论断。亚里士多德和席勒尽管分别从休闲和游戏的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性,但落脚点都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把休闲和游戏进行了明显的耦合。确实,游戏性是兼具有休闲和体育活动的共同本质属

性,把休闲和体育结合在一起进而服务于“全人”这一终极目标。

### 1.2 休闲体育的历史渊源:宗教身体操演仪式的世俗化变迁

考察原始社会的人类活动可以发现,休闲和体育都寄生于生存手段和早期宗教活动仪式中。体育起源的宗教说、生产实践说都凸显了狩猎和舞蹈中所兼有的体育和休闲元素。但此时的狩猎活动和舞蹈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能等同于现代人眼中的休闲体育活动。因为无论是采集活动中的狩猎行为还是借助于舞蹈等身体活动来和神进行舞蹈和仪式沟通,都具有神圣化特征。早期人类信奉万物有灵论的朴素思想,借助于狩猎巫术仪式而获得想要捕获的猎物。据记载<sup>[6]</sup>,俾格米人在狩猎出发前会在山顶上举行庄重而严肃的巫术模拟仪式。除了狩猎,舞蹈在早起的原始社会中也很有兴盛,其重要性远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认知。人们在特定的节日中借助于各种形式的舞蹈来进行图腾崇拜、祭祀和祈祷活动。这些带有宗教色彩的狩猎和舞蹈都是体育休闲的早期雏形。具有强烈表达人类激情的宗教舞蹈随后逐渐分化为求偶、烘托节日欢乐,存储成功狩猎或格斗经验的世俗性舞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眼中的单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狩猎活动逐渐与社会阶层及其身份联系在一起,成为特权阶层的休闲体育活动。例如在古埃及,只有法老有权猎杀犀牛、狮、象等大型动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狩猎的对象和领域上都有严格的规定。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在各种固定的节日时那些欢庆和祭祀的舞蹈和游戏逐渐显现了人的狂欢特征,变成了神圣与世俗的杂糅。从古希腊奥运会可以发现,最初以跑步等运动形式是以宗教性的庆典来表达对诸神的敬意,在随后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了战车赛,投掷等具有明显的军事元素运动项目。最初各城邦的人们以舞蹈和竞技等方式来祭祀宙斯的竞技会,逐渐超出了竞技大会的范畴,发展成全希腊最盛大的狂欢节日。无论是考察原始社会中那些具有休闲体育元素雏形的狩猎和舞蹈活动变迁,还是古希腊奥运会的变迁,均可以发现休闲体育最初呈现出了从混沌到有序、神圣化到世俗化的趋势。

### 1.3 历史中娱乐价值的风向标摇摆

早期人类活动中的原始巫术、原始宗教、神话的产生和发展就是通神和娱神、娱人的过程。尽管不是有意的,但在这一世俗化的过程中,游戏成为了人们的原始娱乐形式。其实源于希腊和拉丁语的法语词“Leisure”(休闲)从语义学的角度传达了人们从娱乐中受益的信息,表明休闲最早其实不是与工作对立的。当然

从宗教仪式中逐渐显现出来的世俗性身体操演活动和随后的发展出的娱乐和狂欢特征愈发明显。尽管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宣扬休闲的重要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中世纪,深受基督教禁欲主义和劳动赎罪思想的影响,人们信奉劳动和工作至上的理念,休闲逐渐成为懒惰的代名词,在社会上受到鄙视。在此时期,体育活动同样也遭受了基督教的遏制。基督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把体育娱乐活动视为异教,古罗马皇帝费奥多西一世和二世在历史上颁布过废除古奥林匹克竞技会的法规。其实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也反对人们的歌舞活娱乐活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人们开始反思质疑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开始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和追求现世生活中物质和肉欲满足等世俗性要求。此时人们普遍把娱乐活动作为对中世纪基督教的一种反抗,开始为娱乐的合法性地位进行抗争。进入工业社会,娱乐和休闲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此时仅仅是作为一种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进入21世纪后,休闲娱乐的社会地位复归到亚里士多德倡导的理想状态,娱乐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出现了“工作是为了更好的娱乐或工作本身就是娱乐”新的娱乐价值观。所以,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工作与娱乐的关系以及对人的主体性认识不一导致了休闲娱乐的社会地位摇摆。

## 2 中西方休闲体育活动的流变:礼乐教化与娱乐至上

### 2.1 中国哲学思想下的身体休闲——修身养性和寓教于乐

中国最早的休闲体育活动可以追溯到那些具有身体运动特征的乐、射、御“六艺”和中国传统的养生活动。此类活动深受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熏陶,表现出了注重修身养性、伦理和教化的特征。除了那些诸如骑马射箭狩猎的少数休闲活动来彰显自己王公贵族特权地位以外,大部分非生产性的身体活动都追求个体身心修炼,注重社会的伦理教化作用。无论是射箭、中国传统格斗、拳法都讲究和追求不射之射,人剑合一、天人合一等,突出了道和礼统摄于技。中国传统导引术,五禽戏、气功、太极拳等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极高的休闲养生价值,同时也包涵了一定的伦理教化作用。除了伦理教化以外,中国许多休闲体育活娱乐活动都寄生于诸多民俗节日中,比如每逢春节前后的扭秧歌,清明节的踏青活动等。进入工业革命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休闲体育活动深受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体育元素,如跑酷、户外,轮滑、蹦极等休

闲娱乐项目。从上述中国休闲体育变迁的历史轨迹看,早期我国体育休闲自成体系,强调内敛,这种注重精神修养的身体观念具有浓厚的社会教化特征。而到了近现代,休闲体育逐渐被西方的休闲体育价值文化所主导,呈现出了明显的娱乐化,挑战自我的趋势。

### 2.2 西方休闲体育流变多元化——挑战自我、娱乐至上到个体幸福的复归

在西方文化在价值上强调把个体身体的强力等同于德性和精神寄托,所以古希腊的人们在“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会中实现全民狂欢。这也奠定了西方后来诸多虽然冠名休闲体育但以冒险、追求刺激和挑战人类身体极限的形式而出现。被称为休闲之父的亚里士多德倡导把休闲的价值维度作为个人幸福和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拓展了人们对身体养护、卫生保健以及人本家庭的关注。因此,像户外长时间徒步或骑自行车,甚至把滑板作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生活化的休闲体育在西方也应运而生。由于娱乐是休闲的本质属性,因此休闲体育从一开始就具有娱乐的内在特性。与古希腊的娱神竞技会相比,古罗马的斗兽等竞技会则更是彻头彻尾的娱人活动,表现出了功利主义思想。到了中世纪,世俗性的身体活动和游戏被视为对神的亵渎而被打压和限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给予休闲身体活动以合法性,凸显了娱乐的重要合法性地位。工业革命后的休闲体育快速发展,这主要缘于人们对工作、对人类过度束缚而异化的一种反抗。此时,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人把更加自由、随意的户外运动作为理想的休闲体育手段。此时休闲体育又开始复归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休闲价值旨归,即追求自由和幸福。当然,随着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体育休闲,体育休闲产业也逐渐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争相仿效和大力发展。

## 3 休闲体育化与体育休闲化互构

依据 Gilchrist<sup>[7]</sup>等的研究,在欧洲以及北美国家,休闲体育愈发占据了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位置,甚至大有取代传统体育的势头。的确,进入现代,特别是后现代社会以来,休闲和体育的边界日益模糊,表现出了休闲体育化和体育休闲化的趋势。休闲体育化作为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与此同时,体育也出现了生活化、休闲化的特征,有些身体活动甚至很难分辨究竟是属于体育还是休闲的范畴。比如众所周知的跑酷运动,它兼有体育和休闲的元素,同时还是艺术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即便没有既定的规则和比赛,现在也逐渐融入校

园和社会团体且备受青年人欢迎。即便曾经是非传统体育的小轮车运动现在都纳入了奥运会的范畴。从近几年的奥运会主题“绿色奥运”、“人文奥运”、“激励下一代”以及学校体育的口号“每天锻炼一小时,快乐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都可以看出传统体育的内涵和外延正在扩大,传统体育日益朝向关注人的生存环境、人文环境以及人的生活质量发展。著名社会学学者郑杭生<sup>[8]</sup>认为互构就是对参与主体相互建塑与型构。体育休闲化与休闲体育化均是源于体育和休闲的互相形塑,彼此互相借鉴和吸收合理的内核,出现了互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难以分割的共同体。

#### 4 结构化:闲体育化与体育休闲化的互构动因及其实质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尽管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在关于社会结构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方面超出了既往的诸多主客对立的社会学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现存的社会结构兼有稳定性和流动性,这一点为理解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对于理解休闲与体育的互构实质提供了借鉴作用。因此休闲体育化和体育休闲化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互动的社会结构既是人们休闲运动实践的中介也是这种实践的结果。人们在休闲和运动中追寻个体化的集合行动、身体地位及其赋权、对文化进行反叛和解构,这些实践活动实质上就是社会秩序的再结构。

##### 4.1 个体化的集合行动

人类对自身展示生命权力的反省赋予了休闲和体育以内在超越性和个体化。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个体化”所描述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转变思想最早发端于在文艺复兴中对人的主体性的反思。随后个体化已超出了社会学专业术语,形塑着新的个体与群体乃至国家社会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可逆的趋势。体育领域也是如此,涌现出了大量的像滑板、跑酷、冲浪、小轮车等个性化的体育项目,改变了以配合为基础的传统群体项目。个体不再热衷于传统的和社会认可的体育项目主要是缘于体育去政治化趋势、国家规训与个体福祉的博弈或自我实现与群体束缚的博弈。随着人们对大众体育和个体的体育权利逐渐觉醒,特别是在对体育有限资源的竞争中,体育的去政治化过程表现的更为明显。不同国家都开始重视建设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其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处理好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协调发展的问题。一味的追求奥运会等世界大赛中所获得金牌数量,而忽略大众体育,充其量只能是体育大国而不是体育强国。以日本为例,

在上世纪就开始反省自己的体育发展战略,一部分民众和学者甚至抗议申办奥运会,这种情形最终把日本“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体育战略让位于以“国民和大众为中心”。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化,身体的功能开始出现了多元化,虽然身体依然被赋予伦理教化意义但更多的融入了世俗生活,表现出了强劲的个体化特征。体育个体化强调体育人的自我建构和自由发展特征,推动了大众体育的历史进程。张洪东<sup>[9]</sup>认为极限运动兼有“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个体象征意义和集体社会认同的功能。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对传统的注重社会价值的体育进行了解构,开始朝向在体育中追求个体自由表达、冒险和享受的多元体育价值观,是体育在个体化时代发展的特征。

##### 4.2 身体地位及其赋权

身体的社会地位极化及其属性认识。休闲体育以身体活动为载体的特性决定了不同的身体赋权程度直接制约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体育休闲。然而纵观整个中西方历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身体一直被视为工具或是手段而加以开发。无论是最早的狩猎、采集活动还是原始宗教身体操演,这些身体实践活动都缺乏自主独立性,深深地烙有社会属性。即便是在古希腊城邦中最具竞争力的斯巴达人眼中,尽管特别重视男女的身体训练,但这种对身体的青睐仍然是赤裸裸的为了军事、优质繁衍等现实生存和工具展演而出现。宗教在历史上更是对娱乐性的身体活动加以限制,甚至在西方基督教中把身体视为欲望和原罪的化身而加以诅咒。在古代中国,身体的社会地位和赋权也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身体及其尚武精神被弱化进而形成了长期的重文轻武的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貌似能彰显身体社会地位的“武举制”和“武术救国论”,但其实质仍然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作为“工具”而匆忙地加以应用来应付危机,其影响和效果甚微。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人们的身体意识开始觉醒,后来尼采更是强力的表达了“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的身体抗争口号。从此,身体开始超出了其单一的生物属性和实用功能,与社会文化和非实用性发生关联。

古特曼<sup>[10]</sup>在《从仪式到记录》一书中认为:“现代体育是一种普遍且特殊的非功利性身体竞赛。”与其说现代体育逐渐摆脱了实用的工具主义,不如说是人类的身体真正被赋权,摆脱了长期的束缚,转而走向个体自由的休闲娱乐。

##### 4.3 文化反叛和解构的符号

在历史上,休闲和体育曾经在世界范围内一度被视为有悖于社会主流价值的“不务正业”。在中国曾被

视为“玩物丧志”、“游手好闲”、“业精于勤荒于嬉”等非主流的社会符号。西方的清教徒们把休闲视为工作和劳动的对立面而等同于一种罪孽并加以诘问和取缔。休闲以及带有社会和文化属性的身体运动都承载了一定程度的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反叛和解构。Dawson<sup>[1]</sup>在谈到休闲的反社会属性时说,“它是一种自由和自我的表达,内含了一种潜在的革命性力量”。借助于物质身体之上的不同运动方式可以表征某种与主流的社会文化价值符号相反的行为规范。纵观美国的街舞、小轮车等极限运动的诞生与当时社会兴起的青年文化运动以及不同意识形态冲突的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青年文化运动对强调职责、服从和生产劳动的传统主流文化进行了反叛和颠覆。因此,这些新的休闲体育项目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传统体育所代表的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意义,而是侧重于挑战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街舞和小轮车运动项目的诞生就是黑人人权运动在体育领域的一种实践和抗争。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抗争以外,休闲体育对传统体育主导的竞技价值观和运动方式也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和反叛。比如隶属休闲体育的跑酷、高空速降、蹦极等极限运动没有固定的竞赛规则 and 对抗特征,强调的不是竞技体育所倡导的“更高、更快、更强”,而是“自由和勇敢”。郑浩然<sup>[1]</sup>认为极限运动不追求那些外在的破纪录和奖牌,而是注重个体心理所体验到的超强成就感、刺激感和满足感。

在休闲体育对社会意识形态和竞技体育抗争和反叛后,体育与休闲的边界日益模糊,互构更加频繁,这一方面归于青年叛逆文化开始朝向大众休闲文化多元化变迁,更为重要的是深受后现代社会所秉承的解构主义影响。这些新的体育运动所蕴含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和内容特征都与传统体育存在偏差甚至背道而驰。足球比赛中球员偶然抱着球跑的越轨行为后来就发展成了橄榄球运动项目,水上摩托、水上篮球运动、kaya-polo,等都代表了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形式,传统体育项目的跨界搭配、调整和改良甚至反叛无处不在,体现了包容性和开放性。这种被解构的、碎片化的运动项目经过再建构,逐渐与商业和技术相结合,进行符号的再生产和包装后在社会上逐渐从非主流跃升到主流位置。曾经被视为“吃饱了撑着的、不要命的”的一些极限运动逐渐从体育的边缘走向中央甚至有些项目已经被奥运会列入正式比赛项目。综上所述,休闲体育符号的社会实践从早期的被压制、叛逆和抗争,逐渐转向了以解构和重新建构为目的的多元价值取向。因此,后现代休闲体育表现出了愈发宽泛的社会适应功能。

## 5 休闲体育异化及其救赎

### 5.1 休闲体育异化

#### 5.1.1 技术至上的机械化、赛博化

从古代奥林匹克推崇人体的“力与美”到现代“科技奥运”的变迁,折射了技术在体育场域中的介入和主导。确实,人在历经了工业社会的异化后,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休闲体育出现了机械化和赛博化的趋势。赛博作为一种新的认识客观世界信息的方式,其具有强大的管理、控制、甚至主宰世界的新手段,逐渐构建和演化成新的休闲内容和运动形态。借助于机器动力的各种赛车以及以编程技术为支持具有动漫特征的电子竞技已经成功攻陷传统体育阵营。尽管赛博化可以虚拟地弥补和增强身体活动能力,但这是一种被限制在某种程度上的有悖于健康的自由。因为科学技术日趋工具化,那些所谓的“休闲体育”者们逐渐沦为硬软件或标准化程序操作的奴隶。人们会乐此不疲地快速移动鼠标和敲打键盘,痴迷地去追求动漫的感官享受和刺激。但这些坐着的甚至不会出汗的休闲体育运动会导致人们心理成瘾,以“休闲和运动的健康名义”而沉沦于游戏的刺激和享乐而丧失自我,这有悖于健康积极生活方式的休闲体育本质。在体育休闲中一味和过度的对机械或信息技术的力量必然有悖于大肌肉群身体运动的体育原则。休闲体育本来立足于人的身心健康行为,但机械化和赛博化会适得其反,弱化自我创造性,使人再次异化,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

#### 5.1.2 炫耀性消费、工具化和阶层区隔化

休闲体育大众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然而社会分层却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的客观事实,因此不同的休闲体育实践形式就是不同阶层和地位符码的体现。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休闲体育也难逃其被消费的运作方式,逐渐成为“有钱和有闲”阶级的炫耀性符号。休闲体育的阶层与消费相关联主要由交换和差异性决定。前者主要指的是体育休闲方式的获得越来越呈现出以金钱购买为主,而后者主要指的是被消费的差异性。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获得高尔夫球俱乐部准入资格,持有VIP卡的会员可以享受更多个性化和高端化的服务。此时的休闲体育消费意味着具有结构性等级的社会进行了再分配,社会等级的符号意义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和凸显。最近几年运动自行车运动很受欢迎,甚至在大众阶层中都有相应的俱乐部。但由于运动自行车与以往的传统代步自行车在设计理念、辅助设备、高科技含量均有差异,因此要加入骑行俱乐部,必须在装备、会员卡费等上进行消费。一个普

通高校的自行车俱乐部会员坦言,大家跟风太厉害了,自己5000多元的自行车都不好意思骑了。没办法,加入这一行,这玩意就是烧钱的。还有一些像F1赛车、高尔夫球等贵族休闲体育运动,准入消费门槛太高,普通民众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回顾历史上的古罗马水上休闲运动和古埃及的大型动物狩猎,最早都只是少数贵族权重阶层的特权,消费社会的一些休闲体育项目同样异化为货币化权力符号。此时的消费性休闲体育项目异化为阶层区隔的工具,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也沦为消费的工具。

## 5.2 休闲体育异化的伦理救赎

人本主义休闲体育理念认为,无论是休闲还是体育,从它们的价值主旨而言都是为了确立人的主体性,谋求人的本真自由和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休闲与幸福、快乐以及美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在休闲体育实践中,应借助于人本主义理念,克服工具理性思维,重新认识和肯定人的价值主体。除此之外,休闲体育行业应该恪守自觉与自治的原则。以休闲体育的理论研究为例,诸多学者甚至错误地把休闲体育的领域泛化。例如,肖焕禹<sup>[12]</sup>认为以心智类为主的围棋、象棋、桥牌、国际象棋等活动都属于体育休闲的范畴。这主要源于我们体育理论研究方面关于体育活动的应然性和实然性的失范。我国国家体育总局早在2003年把“实况足球”、“CS”等电子竞技归入了体育序列并称之为第99个体育运动项目,甚至组建了自己的国家代表队。休闲体育主要就是参与者借助于物质身体的活动,进而塑造身体美并在精神方面获得良好的修养和历练。真正的休闲体育一定不能包含有不利于甚至悖于促进个体身心健康行为的智力性游戏活动。

## 6 结语

德国著名的泛爱主义者巴西多早在1774年认为人一天要进行至少3小时的身体娱乐活动。当前休闲体育可以化解我们社会存在的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间的矛盾和冲突。纵观休闲体育的历史渊源和变迁,休闲体育的发展和变革顺应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休闲与体育的互构既是个体化和反叛化的集体行动,也是人们对身体赋权和人的主体价值的重新审视。在这一过程中,休闲体育一度丧失了其理想维度,被工具化和消费化,进而造成人的异化。在2015年,中央

电视台做了中国人的休闲调查,数据显示,国人平均每天的休闲时间是2.55小时,但多达1/3的休闲时间是用在了手机或互联网<sup>[13]</sup>。因此休闲体育要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树立人本主义休闲体育理念和恪守自觉与自治的行业原则。人本主义休闲体育理念指的是,克服休闲体育的工具理性思维,重新认识和肯定人的主体价值。另外,在理论研究方面必须树立真正的休闲体育就是借助于人类自主物质身体的大肌肉群运动,在个体身心方面获得良好的精神修养和肌体历练。

## 参考文献:

- [1] 郑浩然,刘嘉丽.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青年文化与极限运动的发展[J].体育学刊,2005(3):135-137.
- [2] 铁军.“极限运动”:美国人有点活腻了[J].中国青年研究,2001(5):86.
- [3] 卿前龙,什么是休闲?——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休闲的理解[J].国外社会科学,2006(4):34-38.
- [4] 熊欢.“自由”的选择与身体的“赋权”——论体育对女性休闲困境的消解[J].体育科学,2014(4):11-17
- [5] 马惠娣.休闲、休闲体育、后北京奥运会[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8(2):1-3.
- [6] 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6.
- [7] Gilchrist P and B Wheaton. Lifestyle sport, public policy and youth engagement: Examining the emergence of parkou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 2011(1):109-131.
- [8] 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21-32.
- [9] 张洪东.青少年极限运动亚文化探析[J].体育与科学,2013(4):64-66.
- [10] Allen Guttman. From ritual to record[M].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1978:3.
- [11] Dawson D. Leisure and social class:some neglecte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J]. Leisure Science, 1986 (1): 47-61.
- [12] 肖焕禹.休闲体育的演进、价值及其未来发展取向[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1):6-11.
- [13] 央视:调查显示中国人每天休闲2.55小时1/3时间在玩手机 [EB/O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332541.html>.

● “体育与法制建设”专题

# 从江苏法院裁判看校园足球伤害的学校责任之最新动向

赵毅<sup>1,2</sup>, 陈刚<sup>3</sup>, 王家宏<sup>1</sup>

**摘要** 晚近以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校园足球运动,缺乏从运动伤害层面进行的预警与反思。对于学校在校园足球活动中是否尽到了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法院在具体的个案司法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判断模式。江苏法院近年来的裁判动向显示,整体而言,对校园足球伤害中的学校责任认定并不严苛,法院对于学校的足球工作组织给予了相当的理解。而且,法院裁判在校园足球伤害案件上基本实现了对学校损失分担义务的豁免。这对于江苏省的学校开展校园足球运动是一个好消息。然而,法律风险的存在也要求我们审慎对待当前校园足球普遍化发展的态势和保险万能论调。

**关键词** 校园足球;伤害责任;学校责任;江苏法院;裁判动向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69-07

## The Latest Trend of School Liability on the Injury of School Football Activities in Cases of Jiangsu Province

ZHAO Yi<sup>1,2</sup>, CHEN Gang<sup>3</sup>, WANG Jiahong<sup>1</sup>

(1.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2. *Jiangsu College District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 Innovation Center, Nanjing 550018*; 3. *Sports Bureau of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The recent heated campus football activities are short of the reflection on the sports injuries. Concerning the issue whether the schools satisfy th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duties in campus football activities, the court has its own judgment model. The trend from the case of Jiangsu courts shows that the work of schools in organizing campus football are largely understood by the court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school liability accounts are unstrictly. Furthermore, the court are exempt from the duties of loss distribution of schools, which is obviously good news for developing this sports in Jiangsu Province.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legal risks are also requirements for the current fact of widespread of campus football and universal insurance theory.

**Key words** campus football; injury liability; school liability; Jiangsu courts; sentence trend

## 1 研究缘起

### 1.1 问题的提出

晚近以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校园足球”运动<sup>①</sup>,

缺乏从运动伤害层面进行的预警与反思。须知,足球是一项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运动项目,它以脚支配球进行集体对抗为特征,比赛场地大、时间长、技术复杂、运

收稿日期:2017-02-17

基金项目:2015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校园体育伤害责任认定及江苏法院裁判之反思研究》,项目号:15TYB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项目号:2017M610345;2016年度《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号:1601184B。

作者简介:赵毅(1979-),男,江苏江阴人,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体育法。

通讯作者:陈刚、王家宏

作者单位:1. 苏州大学,苏州 215006;2. 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550018;3. 江苏省体育局,南京 210029。

① 较早对“校园足球”这一概念的提炼,可见于羊城:《校园足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首届飞利浦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断想》,载《中国体育报》2001年6月5日,第3版。校园足球在我国的全面展开,则始于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于2009年4月14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该通知要求今后将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个阶段都将开展足球联赛。2013年2月18日,两部门又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意见》。相关评论,参见王格:《我国校园足球活动开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载《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99-102页;陈军、李献青:《我国校园足球发展的时代意义和战略构想》,载《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第81-85页。在2014年7月11日习总书记就足球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批示。新一轮足球改革开始后的校园足球活动,又被学界称为“新校园足球”。参见毛振明、刘天彪、臧留红:《论“新校园足球”的顶层设计》,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58-62页。

动量大,常须头部、腰部、膝关节、踝关节等身体部位不断进行旋转、外展、内收、伸屈活动,极易造成关节及其周围的肌肉处于超负荷状态。由此,足球运动成为伤害发生率最高的运动项目,“几乎每场比赛都会有球员受伤倒下接受治疗。”<sup>[1]</sup>以2006年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为例,在总共64场比赛中,球员伤害事件达到131件,这些伤害大部分(共98件,占74.8%)皆非犯规引发,可见该项运动伤害频率发生之高<sup>[2]</sup>。世界顶级的职业球星尚且如此,业余和校园足球的参与者更是处在一种高度危险的情境中。有实证研究显示,爱好足球运动的学生虽然直线上升,但由于专业训练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弱,相互碰撞和损害的频率极高,加之学生对运动伤害预防知识知之甚少,更是使得足球伤害问题变得普遍化<sup>[3][4]</sup>。

心理学的研究指出,运动损伤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大,因为一个劣性刺激往往会在人的大脑皮层中留存一至三个月的痕迹<sup>[5]</sup>。这可能是校园足球开展的一个巨大障碍。最近的一个研究显示,校园足球在江苏——特别是以苏州为核心的苏锡常经济带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长不愿意看到因为过于剧烈的足球运动导致身体伤害事故<sup>[6]</sup>。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立足于法律视角审视校园足球伤害争议就具有了特殊意义。这其中,学校在足球伤害事故中承担的法律 responsibility 显得至关重要。正如韩勇所指出的那样,一旦出现运动伤害,家长就会认为,学生是在学校受伤的,应该由学校承担全部责任。而且,随着家长法律意识的增强,家长起诉学校,与学校对簿公堂的情况也日益常见。一个高额赔偿事故的发生常常使学校处于缺乏经费的巨大压力之下,校长们普遍反映:“现在别的不怕,就怕学生出事。”<sup>[7]</sup>

这似乎造就了一个悖论:来自于顶层的校园足球设计要求“各地中小学把足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以此“作为扩大足球人口规模、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础性工程”<sup>①</sup>,但是作为具体实施者的家长(考虑到学生大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家长的态度至关重要)和学校则在实践中顾虑重重。此时,法律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它能给参与者一定的预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又在什么情况下获得

免责。与一般的对抗性运动伤害不同,校园足球活动一个重要参与方为学校。学校在这其中扮演什么样的法律角色,承担何种责任,如何获得豁免,学校法律角色之发掘又能为我们审视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带来什么样的反思?这就是本文的问题意识。

## 1.2 既有文献梳理和研究方法

目前专门就校园足球伤害法律问题进行的研究还相当稀少。在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10月23日)通过“高级检索”以“校园足球”为主题搜索法律类论文,只可见于李永刚、谷平于2015年发表之《校园足球开展中运动伤害事故的法律认定探析》一文。该文对于学校在校园足球伤害中的责任认定持相当严苛的态度:学校被认为需要对一、二年级学生的全部伤害承担全部责任,对其他年级学生非教学时间的伤害承担次要责任,对学生自己动作不到位或者其他意外原因产生的伤害也要承担责任<sup>[8]</sup>。显然,如果按照这样的法政策行事,没有学校愿意开展校园足球活动。

黄璐近期对社会足球伤害归责的研究对于我们审视校园足球法律问题颇有借鉴意义。按照黄璐的说法,“法院对于社会足球伤害案件的致伤事实认定、行为的合规性以及赔偿责任等,必须建立在运动技术合规性审查基础之上,应为法院判案提供来自体育特殊性的规则支持和客观依据”<sup>[9]</sup>。但是,这一结论主要运用于当事双方皆为足球运动参与人的社会足球领域,对学校责任的认定并无指导意义。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个案出发,讨论了校园足球伤害的法律适用问题<sup>②</sup>。整体上看,一些个案评论已经触及了校园足球伤害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如:在各方当事人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学校被认为比个人有更强的赔付能力,由此学校即使无过错也要根据公平责任原则分担损失,造成学校无论有无过错都陷于被动的局面<sup>[10]</sup>。新近的一些《侵权责任法》著作也开始关注我国法院的校园足球判例实践。有学者注意到了一例校园课外足球比赛伤害案例,认为我国司法实践将足球伤害列为《民法通则》第132条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作者批评这一原则的适用,因为其“毫无道理地增加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概率。”<sup>[11]</sup>

① 这些都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明确要求。

② 如杨立新:《学生踢球致伤应否承担侵权责任》,载《侵权司法对策》(第3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赵毅:《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的二元适用——由“石景山足球伤害案”引发的思考》,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11—15页;韩勇:《学生踢球伤人:谁之过》及《足球伤人:体育运动中的风险问题》,载氏著:《体育与法律——体育纠纷案例评析》,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244页及254—257页;韩勇:《【案例】足球前锋比赛伤人: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案例】足球比赛各方均无过错受伤案(一)》及《【案例】足球比赛各方均无过错受伤案(二)》,载氏著:《学校体育伤害的法律责任与风险预防》,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7—71页。

显而易见,在校园足球活动开展一片繁荣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股对法律政策预期不确定性之担忧。由于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规定一切情势,且个案差异巨大,法院在校园足球这一特定领域的裁判见解就显得极为重要。为了重点集中,笔者只选取了在校园足球方面近来着力巨大的江苏省作为法院裁判实证的考察对象<sup>①</sup>。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10月23日)之检索对校园足球伤害案例进行逐一筛查,笔者精选了江苏法院在2012年至2015年四年间宣判的7个典型案例,以此纵观法院裁判发展趋势,并提炼校园足球法律适用的最新动向,以为校园足球参与各方开展这一运动提供必要之预警。

## 2 学校“过错”之判定

### 2.1 立法与学理见解

足球运动伤害归责,与其他体育运动伤害归责一样,都适用过错归责原则。这也意味着,有过错的行为人才需根据过错大小向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而无过错者无责任。过错责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体育运动参与者在运动中的自由,同时又能对因运动而产生的伤害提供合理救济<sup>[12]</sup>。就足球运动中的学校责任而言,我国法律将其列在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下予以讨论。《侵权责任法》第38—40条专门分三个条文就教育机构之侵权责任作了具体规定<sup>②</sup>。教育机构之所以承担侵权责任,就是因为其过错所致,也即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在法律适用中,何为教育机构之教育、管理职责,须结合具体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讨论。比如,按照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要求,学校如果未提供给符合国家标准的场地和设施、足球教师如果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安排学生从事了不适合其年龄特点的足球训练课程等,都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然而,学者也指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也条件各异,因

此,受害人的年龄、损害发生的时间、直接加害人是谁、教育机构的种类与管理模式、收费高低等,都应是法院对教育机构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进行全面考量的因素<sup>[13]</sup>。显然,在作为危险活动的校园足球活动中,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应重于一般课堂教学;而学校在足球课堂上的教育、管理职责也应重于学生在课间进行足球活动的教育、管理职责。

### 2.2 江苏法院的裁判动向

对于学校在校园足球活动中是否尽到了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法院在具体的个案司法裁判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判断模式。在作为样本考察的七个校园足球伤害案件中,有三个案件学校被判过错成立。依案件是否存在加害人,这七个案件又可分为有加害人的案件和无加害人的案件。在前一种案件中,学校和加害人是共同被告;在后一种案件中,学校是唯一的被告。

先看较为简单的无加害人案件(表1),此处只涉及受害人与学校两方之间的关系。

很明显,在建湖第二小学案中,学校之所以被判过错成立并须承担全部责任,在于其场地设施存在缺陷。就南京泰山小学案和南京工业技术学校案而言,法院对学校教育、管理职责的要求并不相同。就前者而言,对象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8条的规定,学校责任为更为严格的过错推定责任。申言之,只要学生在校期间遭受了伤害,法律就推定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就应承担侵权责任,除非教育机构证明自身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在南京泰山小学案中,被告仅主张原告的伤害是其上课时未按照老师要求、自行玩耍造成的,但并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身已尽到了相应职责,反而球网的安全隐患通过因果关系被推定出来,学校由此被法院判定过错成立。而在南京工业技术学校案中,由于受害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9条的规定,举证责任转为受害人承担,此时学校所负之注意义务比之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情形时要低。故而法院认为,要求在课外的足球活动中也安排教师监督指导,显然加重了学校义务,学校并不因此而导致的伤害承担责任。

① 江苏的校园足球开展情况,可见于江苏省体育局:《江苏校园足球运动蓬勃开展》,载《运动》2014年第24期;袁泉:《江苏校园足球发展简况与发展理念探讨》,载《当代体育科技》2014年第17期,第118—119页。2015年11月12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了《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振兴行动计划纲要(2015—2020年)》,要求从该年起,足球成为包括幼儿园在内所有学生体育课的必学内容。

② 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第3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表1 无加害人案件情形学校过错之认定

Table 1 Identification of Fault of School in the Cases of Without—Offender

案件简称	受害人主张	学校主张	法院立场	结果
南京泰山小学案 <sup>①</sup>	原告作为一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在校的行为理由由学校监督,其在学校组织的足球训练中受伤,应由校方承担相关费用。	原告受伤并不是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而是原告在上课时未按照老师要求,自行玩耍造成的,相关后果由原告自行承担。	虽然在体育活动中被告老师对原告在球网中玩耍的行为已予以制止,但因原告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有限、对自身行为所带来危险性预估不足,被告老师虽对原告在球网中玩耍行为予以制止,但在原告从球网中走出来后,被告老师未对球网设施进行检查,对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防备不足,最终导致原告在正常的体育训练中被球网绊倒受伤,被告未尽到管理之职,应对原告因此造成的伤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学校过错成立
建湖第二实小案 <sup>②</sup>	原告在被告校园内课间活动时,被突然倒塌的足球门砸伤。	无	原告受伤系被告的足球门突然倒塌所致,被告存在安全管理上的疏忽,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学校过错成立
南京工业技术学校案 <sup>③</sup>	事发时,被告没有安排教师在场监督指导,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系在课外学生自发的娱乐活动中受伤,并且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系不慎扭伤非摔伤,原告的受伤完全是由于其自身原因造成的。	原告踢球系课外学生自发体育活动,其要求学校安排教师在场监督指导,显然过于加重了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且原告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参加足球运动可能会造成伤害。	学校无过错

在有加害人案件中(表2),出现了三方乃至多方法律关系,因为受害人往往同时混合主张加害人的过错和学校过错。然而,学校过错仍然是一个单独审查的问题,加害人过错成立与否只影响与学校的责任比例分担。

从表2的四个案件可以看出,法院对学校过错之判定持相当审慎之态度。首先,由于上述案件受害人皆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情形,举证责任需要由受害人自行承担。在南京一中马群分校案和南京春江学校案中,法院皆因受害人无法证明学校怠于行使教育、管理职责而未支持其主张。其次,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第3项,对于学生在放学后自行滞留学校发生的运动伤害,学校不承担责任;《江苏省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第22条第3项进一步规定,学校亦不对学生在非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发生的伤害承担责任。在南京一中马群分校案和高淳高中案中,学校即因此而获得了免责。再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2条第5项和《江苏省中小學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第22条第8项专门规定,

学生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或者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学校不承担责任。校园足球活动正好具备对抗性和风险性特征,南京春江学校案即是一种在足球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典型意外伤害事件,学校因此而获得免责。但是,正如“南通工贸技师学院案”所示,如果学校在校园足球的课堂开展活动中有怠于行使教育、管理义务之事由,比如教师擅自离开教学现场、未进行足够的安全教育和指导等,学校将就此而负过错责任。

江苏法院近年来的裁判动向显示,整体而言,其对校园足球伤害中的学校责任判定并不严苛,对于学校的足球工作组织给予了相当的理解。对于判定学校承担责任的三个案件,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涉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学校不能证明完全尽到管理职责(南京泰山小学案);学校设施存在缺陷(建湖第二实小案);教师擅离教学现场(南通工贸技师学院案)。除此之外,法院都没有认可对学校怠于行使教育管理职责的过错指控。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学生年龄与学校责任之间似乎呈现一种反比例关系,学生越

① 详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3)浦少民初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

② 详见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4)建少民初字第0011号民事判决书。

③ 详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4)江宁汤民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

表2 有加害人案件情形学校过错之认定

Table 1 Identification of Fault of School in the Cases of With—Offender

案件简称	受害人主张	学校主张	法院立场	结果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案 <sup>①</sup>	无	案涉足球运动是同学之间自发组织,并非学校授课内容,没有理由要求老师现场指导和组织。	工贸技师学院作为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职责,在学生上体育课时,教师离开教学现场又未妥善安排教学活动,对学生组织的足球运动未给予安全教育和指导,存在一定过错。	学校过错成立
南京一中马群分校案 <sup>②</sup>	被告鲁某甲飞腿抢球无度,其行为是造成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被告马群分校在刚开完运动会后,对学生管理、安全教育不到位,与原告受伤也有一定关系。	原告的受伤是发生在放学后,学生自行组织的活动中,与当天进行的校运会没有任何的关系。在原告受伤后,我校的老师发现后,及时进行了处理,尽到了相关的管理职责。	学生在非教育教学活动期间擅自进校或者滞留学校期间发生伤害事故、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或者竞赛活动中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不承担法律责任;原告吴某甲无证据证实被告马群分校的行为在原告吴某甲受伤过程中存在过错,也无证据证实其具有未尽到管理职责的行为、而该行为与原告吴某甲的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	学校无过错
高淳高中案 <sup>③</sup>	原告与被告刘某某在被告高级中学操场踢足球过程中发生碰撞,导致原告脾脏破裂。	1. 原告受伤是在课外活动期间,进行足球运动时,与被告刘某某相撞行为所致。 2. 事发当时,原告所在操场是标准操场,面积相当大,也有其他学生在进行体育活动,学校安排的2名老师在周边巡逻,相撞时恰巧不在附近;且相撞后,原告、被告刘某某与同学均未察觉伤情的严重程度,仅是由被告刘某某陪伴原告在场外休息,其他同学继续踢足球,致使巡逻老师未能发现原告异状。后原告感觉疼痛难忍,由被告刘某某陪同去校医务室途中,行政值日老师发现异状,立即联系校医,校医检查后立即派车送往医院、通知家长、垫付医疗费,让原告得到了及时治疗。	原告陈某在被告高级中学就学期间,选修足球,接受了相关内容教育,学校尽到教育职责。原告陈某受人身损害确是在最后一节课外活动课期间。众所周知,课外活动课,学校并不安排教师授课,仅提供场所及活动器械,由学生自行选择是否活动、活动内容。被告高级中学出借足球、提供标准操场让学生进行体育活动,在损害发生后积极救助,其管理并无不当。	学校无过错
南京春江学校案 <sup>④</sup>	受害人在学校上体育课过程中受伤,学校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受害人当时骨折是由于自己踩在足球上摔倒导致,学校平时注重安全工作方面已经尽到义务,对本次事故没有任何不当、不存在任何过错。	受害人在学校进行正常体育教学活动踢足球过程中意外受伤,事发时体育老师在场,具备相应的教学资质,且在发现孙某受伤后及时将其送至医院通知家属,学校亦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同时受害人未能证明事发的场地设施存在安全瑕疵,亦未能证明学校对其受伤存在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形,故学校对孙某的受伤不存在过错,不应对孙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学校无过错

① 详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民终字第01213号民事判决书。

② 详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5)栖民初字第423号民事判决书。

③ 详见江苏省高淳县人民法院(2012)高民初字第1196号民事判决书。

④ 详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少民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

大,认知能力越强,学校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就越低。在南通工贸技师学院案中,学校虽然被判过错成立,但只承担了20%的责任,受害人和加害人则分别承担60%和20%的责任。

### 3 学校无过错时的损失分担情况

#### 3.1 既有实践及批评

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在校园足球伤害案件中,如果学校(也包括了加害人)被法院认定为没有过错,则应由受害人自担损害。甚至,受害人对自身从事足球运动而发生的伤害也谈不上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学校统一购买了保险或者受害人自购了保险,损害可以在保险所承担的限度内解决。如果没有,伤害就是天意,不构成法律上的损害,无论是学校还是加害人都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过错责任是体育归责的核心原则,它渊源于古老的斯多葛哲学理念:凡是符合自然理性的都是正确的,违背自然理性的行为则应受到处罚<sup>[14]</sup>。对自然理性的违反对应着行为人在主观上的过错,因此,有过错者应当根据过错大小向受害方承担责任,无过错则无需承担责任。在罗马法上,参加者自己承受对抗性运动中的风险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原则,因为参加者既然加入了竞赛就意味着他甘冒此等风险,由此造成他人死亡或者伤害也不具有不法性<sup>[15]</sup>。

然而,在我国法上,《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的公平责任原则和与之一脉相承的《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的损失分担规则打破了上述平衡。按照该两条的规定,即使加害人和学校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他们也会被强制要求对受害人进行适当补偿。这在世界各国立法中是一个孤例,因为无论《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还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于公平责任都只规定适用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极个别的、具体的情形。而在我国法,由于两条对之一般性、模糊性的规定,公平责任的适用被大大扩张了,体育伤害就是这一扩张的典型领域。

按照一些法院的做法,学校即使无过错,也需分担受害者一定的损失<sup>①</sup>。这一做法的理论基础是,损失分担比自承风险更能起到促进和谐、定纷止争之效,贯彻的是对弱者权益保护之矫正正义理念<sup>[16]</sup>。还有学者认为,公平责任的本质是以国家干预对经济权利的再分配,因为不同于自由主义法律体系中侵权法贯彻的无过错即无责任原则,公平责任目的在于提升经济弱势群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sup>[17]</sup>。但是,无论对于法

律理论还是法律实践,这一原则之确立都受到了极多批评。即使公平责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完全以财产之有无、多寡而作为责任分担的根据,体现的事实上是分配正义而非矫正正义,本质上为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在实践中,这也会导致法院不加审慎地认定加害人是否具有过失,而仅是处于方便、人情或其他因素的考量就向公平责任逃避,最终导致侵权法传统上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预防损害功能上的弱化<sup>[18]</sup>。这一规则适用于学校体育领域的弊端也已显现,与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人厌讼不同<sup>[19]</sup>,家长面对子女在学校体育中的伤害极为好讼,法院不分过错皆让学校分担损失助长了这一风气。有媒体报道,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让校方分担损失的加重倾向,学校只能通过压缩体育课实践进行规避<sup>[20]</sup>。

在体育界学者看来,不区分过错地要求运动参与方和学校分担运动伤害损失忽略了体育特殊性的要求<sup>[21]</sup>,催生“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观念<sup>[22]</sup>。也许是学者们多年批评与呼吁产生了一定效果,江苏法院最新的一些判决在此问题上实现了一定立场转向。

#### 3.2 江苏法院的裁判动向

在上述学校无过错的四个案例中,只有南京一中马群分校案要求学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规定,补偿受害人一定损失。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该案的两个被告——即加害人鲁某甲和学校而言,法院虽然认定它们都不负过错责任,但在损失分担问题上,法院对它们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致。对于加害人,法院的态度是,“原、被告对原告吴某甲所受损害均没有过错,考虑到原告吴某甲确实因足球比赛而受伤的事实,故本院按照公平原则,酌情认定由被告鲁某甲对原告吴某甲的实际损失按照40%的比例予以分担。”这似乎显示,加害人进行损失分担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于学校,法院则充满了同情的理解。首先,法院认可被告在原告受伤后在校内举行的义卖和捐赠活动,被告筹集的6517.9元被法院在损失分担计算时予以扣除。其次,法院似乎也并未强制学校进行损失分担,法院的表述是:“被告马群分校表示,其在无责任基础上,从人文关怀角度考虑,可以补偿原告吴某甲3000元,此举是其自愿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这似乎暗示,如果学校不愿意分担此项损失,法院可能就不会强制它那么做。

与这一判决形成呼应的是高淳高中案。法院同样既未认定加害人也未认定学校的过错责任。但是,法

① 比如: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4)邳民初字第4787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2)长少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

院指出：“虽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但原告陈某的损失巨大，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由此，法院判定原告与加害人案7:3的比例分担了此次伤害损失。至于学校，法院未置一词。那么，为何法院在损失分担这一问题上将学校与加害人区别对待？这可能并非出自支持学校体育发展的理由。在判决书中，法院谈到，利益获取、风险的开启与维持、受害人自我保护的可能性都是损失分担参考的要素。“原告陈某在作出扑球的动作时，即开启了风险，其扑球的方向、方式、力量等细节，很大程度决定了风险控制的可能性以及自我保护的可能性；而被告刘某某作出膝盖顶球的动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控制的可能性以及原告陈某自我保护的可能性。”相较而言，双方课外进行的足球活动风险很难被认为是由学校开启的。

在南京工业技术学校案中，法院直接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完全没有考虑损失分担问题。但在南京春江学校案中，法院立场经历了一个反复。在一审中，法院认为，“本案孙某在事故发生时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人身保险，南京市春江学校亦未投保相关校园意外伤害保险，故宜依照民法通则该项规定基于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损失。”由此双方被判各承担50%的损失。但春江学校旋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撤销了前判，转而支持了春江学校的主张。理由是：“孙某应当自行承担其在踢球过程中意外摔倒造成的损失，本案并不符合公平责任的适用条件。”虽然这一理由严格来说也只是一种价值判断上的决定，但显然，这是自承风险理论相较于公平责任原则在南京这一司法辖区的胜利。

考虑到南京一中马群分校案法院对于学校分担损失立场上的软化，我们可以认为，晚近的江苏法院裁判（巧合的是，这四个案件都是南京法院审理的）在校园足球伤害案件上基本实现了对学校损失分担义务的豁免。这对于江苏省的学校开展校园足球运动而言，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 4 基于法律视角对校园足球运动开展的展望

上述通过法院裁判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校园足球运动伤害风险大，由此造成的法律诉争多。校园足球运动是否要普及到每一个学校——甚至幼儿园或者小学低年级，以及不加体质评估地普及到其中的每一位学生？值得反思。因为年级越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成本就越大，面临的法律风险也越高。这种成本并不会在学校内部消化，而必定转嫁给社会，由此可能导致边际递减效应，最终并不利于校园足球的发展。

从法律角度看，开展校园足球的学校需要具备合格的场地、专业的教学管理水平和卓越的师资力量，由此才能避免出现怠于行使教育、管理职责指控。但是，现有的教育部门和各类大中小学是否真的具备了相应的师资，能够合规地开展校园足球教学活动？仍有疑虑。教育部2015年新出台的《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得以减少体育活动的做法规避体育运动风险。江苏法院最新的裁判动向似乎对此提供了一定支持，但法院在更长的时间段和更广的地域范围内持何种态度，尚待观察。

保险被认为是一种解决校园足球伤害风险的万能办法。《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振兴行动计划纲要（2015—2020年）》要求：“建立健全涵盖安全教育培训、活动过程管理、保险赔付的青少年校园足球风险管理制度。”然而，从本文考察的案例来看，江苏尚为发达地区，要将保险覆盖到各个学校，仍然前路漫漫。而且，保险的作用是否真的那么大，也值得商榷。有的情况下，即使保险公司赔钱了，家长仍然会跟学校过不去，因为他们认为钱是保险公司赔的，这与学校无关<sup>[23]</sup>。还不能忽视的是，一旦学校认为保险是万能的，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身的注意义务，这显然对于校园足球运动的发展是一个负面消息。

颇有趣味的是，以上七个案例中，有五个集中于南京市，另二个出现在苏北地区，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南京市和苏北的校园足球基础强大。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少有这方面纠纷出现，到底是学校工作做得非常好了，还是校园足球的基础本身就不足，将是未来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

#### 参考文献：

- [1] 周思洋，毛立群. 足球运动损伤的调查与分析[J].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2010(13): 51-53.
- [2] 王峰，付海燕，蒋宁，张颂. 足球运动员伤害风险研究——以2006年德国世界杯决赛阶段中的伤害事件为研究对象[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7(2): 17-19.
- [3] 黄峰，赖炳森，杜光宁，古文东. 中学生足球运动损伤情况的调查研究[J]. 体育成人教育学报, 2004(2): 64-66.
- [4] 王海霞，郭海莲，张自强. 杭州市小和山高教园区大学生足球选项课运动损伤的调查研究[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8(17): 298-299.
- [5] 王德浩. 运动损伤对学生的心理影响及防治[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05(1): 83-84.
- [6] 姚轩. 影响足球运动在苏州市区中学校园内开展的几点因素[D]. 苏州大学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2015: 10-11.

(下转第107页)

● “体育与法制建设”专题

# 中英足球协会财权之比较

宋亨国<sup>1</sup>, 周爱光<sup>1</sup>

**摘要** 财权作为足球协会自治的一项基本权力有着明确的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依据,本文着重对中英足球协会的财权进行了比较,针对性提出了中国足协财权改革的建议。研究认为:国家法律赋予足球协会独立的“社团法人”身份,规定了财产权的性质、宗旨及权能,而行业规范进一步细化了财权内容,提供了协会运行的主要依据。足球协会财权具有自治特征,需要建立均衡的财权制度,将多方主体纳入到行业利益秩序的“共建”中。英格兰足协与英超联盟采取“财权分置”,分别享有足总杯、慈善盾杯和英超联赛的所有权。英足协财权集中,实行财务管理和经营分离,依托专业团队建立起了完善的市场运营体系,财权配置能力突出。中国足协的自主财权缺失,财权关系较为复杂,所建构的市场运营体系矛盾突出,亟需系统优化。在国家足球战略布局中,应建立职业联赛利益共享制度,推动中国足协财权合理配置,优化经营及利益分配制度,切实提高管理能力。

**关键词** 足球协会;财务管理;行业利益;合理配置;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76-08

## The Comparison of the Property Ownership in Football Assoc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ngland

SONG Hengguo<sup>1</sup>, ZHOU Aiguang<sup>1</sup>

(1.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property ownership is a basic autonomous right for football associations, based on specific the States Laws and industry norms. This study presen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s' property ow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England,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ideas to construct the independent property ownership for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s. Some conclusions could be drawn after research as follows: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property ownership of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s given by the State Laws depend on the identity of association as legal person. The State law grants the dependent property rights and powers, and industry norms further to add the refinement of the property content,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operation. The property rights of football association has the obvious feature of autonomy, the equilibrium of system and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which brings about the interests order to the so called "mutual building system". The Premier League retains the ownership by themselves, the England football association has the FA series, and also the ownership of the charity shield. Their property ownership and the managements are divided. The FA enjoys independent property right and takes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in separation, by relying on professional team to establish a perfect market operation system, so as to have the ability to highlight the allocation of property ownership. The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 does not enjoy such autonomous property ownership, and relationships are complicate. The market system is also not normative, and requires system reform in general. At present, by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al league interest sharing,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could initiate certain special operations, to optimize the running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to improve business management skills.

**Key words** football associ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industry interest; distributing authority; operating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17-04-07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国非政府体育组织自治的法学研究》,项目号:13CTY018;2016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课题《中英足球球迷组织文化的比较研究》,项目号:GD16XTY09。

**作者简介**:宋亨国(1974-),男,新疆奎屯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法学与体育文化。

**作者单位**:1.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州 510006。

财权是足球协会对自身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构成了财产权的核心内容。足球协会的财权决定着行业利益分配的秩序建立以及足球公益实现的程度,因此需要国家法律明确其性质、宗旨,同时需要完善的行业规范细化具体内容,为其运行提供依据。英足协享有自主财权,将打造赛事品牌、挖掘足球文化无形资产价值作为拓展财力的重要手段。我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中国足协虽然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商业运营,但自主财权缺失,与多方主体的利益矛盾突出,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步入自治阶段,中国足协应充分借鉴英足协的成熟经验和做法,厘清财权关系,合理配置财权,为实现足球战略改革目标提供财力支持。

## 1 足球协会财权的国家法律及行业规范

足球协会的财权有着明确的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赋予足球协会“社团法人”身份和自主财产权,而行业规范进一步细化了具体内容,为各类财务关系的有序运行提供了执行标准和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国家法律法规赋予足球协会“社团法人”身份,明确了其财权的性质、宗旨及关系。足球协会享有的“社团法人”(也为公益法人、非营利性法人)身份是自主决策和开展各类财务活动的前提条件。各个国家的法律对“社团法人”(非营利法人)及其财产权有着明确规定。英美法系注重实践判例,要求以完善的《章程》作为非营利法人成立的先决条件,强调组织的目的、实体权利及社会责任。《英国公司法》规定,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目的应当是为了促进商业、艺术、科学、教育、宗教或任何职业,以及这些目的附带产生或有益于这些目的的任何事物;建立备忘录或章程;要求公司利润或其它收入用于促进这些目的;禁止向股东分红;要求将股东本可得到的财产,在公司清算时,转让给与本公司有类似目的的任何其他团体,或者其目的是促进慈善事业的任何团体<sup>[1]</sup>。《英国衡平法》规定:非营利法人衡平法上的财产利益包括信托、抵押人在衡平法上的赎回权;衡平法上的抵押和负担,动产与合同中衡平法上的利益,产生于衡平法上的土地利益和衡平法上的转让利益。《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规定:(1)除非特别规定推迟的生效日期,法人于章程备案时开始存在;(2)非营利法人享有购买、接受、租赁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拥有、改进、使用和以另外方式处置动产或者不动产的任何法律权益;(3)为了公共福利或者为了慈善、宗教、科学、教育以及为了促进法人权益的其他目的,从事不违反法律的捐赠<sup>[2]</sup>。大陆法系注重通过成文法设定社团法

人的非营利性质、公益宗旨及财产所有权。《俄罗斯社会团体法》规定:(1)社团法人是有由共同利益、追求该团体章程规定的共同目标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公民成立的一种非官办的、自治的、非商业性的团体;(2)社会团体法人可以拥有若干土地、房屋、设施、房屋基金、设备、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财产、资金、股票、其他有价证券或任何其他为从物质上推进其章程要求进行活动所需要的财产<sup>[3]</sup>。《奥地利社团法》规定:本联邦法所指的社团是为实现某种共同的非营利目的,二人或者二人以上根据章程而自愿组织起来的、长期存续的联合体。社团享有法律人格,其财产只能用于社团目的事业<sup>[4]</sup>。我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社团法人、财产权能及行使也有着明确规定。依据《民法通则》,社团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以谋求成员共同利益为宗旨。社团法人依法享有对自己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社会团体在行使所有权时,必须遵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不得超越登记批准的业务范围及活动地区进行活动<sup>[5]</sup>。我国《物权法》第69条规定:社会团体依法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sup>[6]</sup>。

足球协会享有国家法律赋予的社团法人身份,这是依法治会的基础。足球协会的财权要契合“非营利性”的主体性质,以行业利益、足球公益为宗旨,这既是核心的功能向度,也是运行时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足球协会的财权如果丧失了“非营利性”和“公益宗旨”,就会引发利益导向的矛盾和冲突,出现严重的行业和社会信任危机。从法理上看,财权表现为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即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构成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为决策权、收益及分配权、筹资权、投资权、资金使用权等<sup>[7]</sup>。结合上文各个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明确,财权是足球协会财产权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决策、执行、收益及分配、监督四项权能。其中,决策是指足球协会对营利性经营活动的自主决定权;执行是指采取具体经营、筹资的权利;收益及分配是指获取收益并对收益进行要求和分配的权利;监督是指对财权行使及经费使用进行监督和评价的权利。足球协会财权的运行依赖于良性的法律关系。作为社团法人,足球协会财权关系的主体资格、权利义务及社会责任具有特定的内容和形式,目的是依据体育法律规范有机联结和调整多方主体的利益诉求建立稳定的行业利益秩序。足球协会的财权关系主要包括“社团法人”人格权关系、财产所有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商事合同关系以及财务决策、执行和分配关系等。

第二,行业规范细化了足球协会财权的内容,提供了运行依据。各国足球协会均制定了完善的行业商务规范细化财权。《英格兰足协章程》(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Limited)规定:(1)足协享有足总杯、社区盾杯(Community Shield,前身为慈善盾杯)等赛事在《衡平法》上赋予的所有权;(2)社区盾杯比赛的所有门票收入用于社区的慈善事业;(3)董事会享有国家队的商业运营权及管理权,包括赞助、转播及许可权、比赛条件、任命主教练、教练团队及专业工作人员等。英足协“商业会议议事规程”(Standing Orders For The Conduct of Business at Meetings of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Limited 2013)规定:(1)足协赋予商事执委会项目和议题的审议权和决议权;(2)不限制委员会通过投票解决全体执委会的商业议题。《德国足协章程》规定:(1)会员代表大会审定职业足球联赛的商务规则。足协负有监管职责,以保证俱乐部资产、财务安全,避免破产风险;(2)足协负责国家队的管理和商业运营,收益的5%拨付给德甲德乙职业联赛。德甲德乙联赛门票及电视转播收入的3%交足协。《德国足协青少年人才发展规划》规定:(1)每年拨付1000万欧元用于青训基地运营;(2)足协与俱乐部共同出资建设各俱乐部的青训中心。《中国足协章程》(2016)规定:(1)本会作为中国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是本会管辖的各项赛事、活动所产生的所有权利的最初所有者。这些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赛事权利、知识产权、市场开发和推广权利以及财务权利等;(2)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3)经费来源:会费、注册费、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和服务的收入、比赛收入、捐赠、财政补助、国际组织专项补助、利息、其他合法收入;(4)经费支出包括年度预算中规定的支出,会员大会批准的其他支出,执委会因履行职权产生的支出,为更好地实现本会目标产生的其他支出。以上各国的足球行业商务规范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现为足球协会将财权作为一项核心权力,通过分类细化财权内容,建立起了涵盖资产管理、财务决策、经营、收益、分配、监督等各个方面的规则运行体系。

综上,财权是足球协会行业治理的一项基本权力,有着充分的国家法律及行业规范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赋予足球协会“社团法人”身份及自主财产权,确立了财权的主体性质及公益宗旨,提供了构建其财权体系的导向性依据。行业规范则进一步细化了足球协会的财权,为优化财权配置,推动各类财务关系的良性运行提供了运行依据。

## 2 中英足球协会财权的比较

中英足球协会的财权存在一些共同点,主要包括均享有协会、直属职业赛事品牌以及国家队标识等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全面负责国家队的管理及市场开发;享有职业联赛利益分配制度的建构权,采取“股份制”进行利益分红。但二者在财权分置、监督、决策、执行及经费支出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2.1 财权分置及监督的差异

第一,财权分置的差异。英格兰足协与英超联盟各自经济独立、自负盈亏,采取“财权分置”模式。英超联赛由英超联盟公司负责,所有权属于20家俱乐部,甲级、乙级、丙级联赛由足球联盟负责。英足协享有“足总杯”系列赛事、“社区盾”杯赛等的所有权,并负责国家队的管理和市场开发。主要赛事包括:足总杯(FA Cup)及系列赛事、社区循环赛(Community Shield)、足协茵宝赛(Umbro Fives)等,其中涵盖职业、半职业、业余三个层次的足球联赛。英足协作为“掌舵者”不干预联盟市场经营,也不从中分红,但享有规则制定权、利益分配制度建构权。《英足协足球管理手册》(Regulating The Game, Football Rules of The F. A. Handbook)规定:协会的规则和条例由足协委员会制定,负有英超联赛规范运行的责任,目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平的行为规制结构。规则范围涵盖球员转会、俱乐部资产、财务记录、金融交易和仲裁等。《英足协联盟手册》(Premier League Handbook 2007)规定:俱乐部可进行分配的收入包括全国比赛转播、国外比赛转播、商业赞助以及联盟所属运动员商业广告收入等,其中转播收益的50%由俱乐部均分,25%用于奖励,25%用于转播场次分配。《英格兰足协章程》规定:(1)足协授权股本为102英镑,共有2000股,每股面值5便士,分成99个普通股和一个特别股。普通股只能在英超联盟、足球联盟、完整会员俱乐部、县级足协中分配和流转。足协享有足球联盟和英超联盟的特殊股;(2)董事会可以向任何合适的人[符合部门法案(section,(2)1985)规定的对象]分配和提供有价证券,但股份不得折价,不得违反其他物品的发行备忘录或相关法令。“英足协对英超联赛各俱乐部的商业开发权限制很小,除了转播权和联赛冠名权统一出售外,其余全部由各俱乐部自行运营。这种分配方式不仅创造出了世界一流的俱乐部,同时也运用‘降落伞’制度保证了弱小俱乐部的生存发展。”<sup>[7]</sup>中国足协全面掌握着职业赛事的商务权力,并由其统一经营与分配。《中国足协章程》(2005)规定:(1)中国足协的商务权利

包括各种财务权利,视听和广播录制、复制和播放版权,多媒体版权,市场开发和推广权以及无形资产和版权等;(2)本会根据需要享有独自使用赛事的权利,同第三方合作使用的权利,完全通过第三方来行使的权利。依据《中超公司章程》,中国足协持有中超公司36%的股份,“均配”进行赛季分红。从以往看,由于权力集中,中国协和俱乐部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后者作为市场主体未能发挥显著作用。为了缓解矛盾,中国足协采取了调整商务运营架构、“限薪令”等措施,但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与俱乐部的关系,俱乐部商业开发自主性没有得到解放。同时,中超的豪门俱乐部虽表面上财务独立,但实际受到母体企业的极大制约,进一步引发了混乱。

财权分置的核心在于“权属关系”,即赛事的权利归属,其决定着职业足球利益秩序的建立和优化。英国职业足球赛事的所有权关系清晰,英格兰足协与英超联盟、足球联盟分享足总杯和不同联赛的所有权。英足协通过制定规章、俱乐部准入标准以及行使重大事项的否决权进行财务管理和监督。在“足球为每个人”的发展理念下,英足协、英超联盟及足球联盟致力于打造赛事品牌、拓展社会基础,建立起了均衡的行业利益秩序。为了推动英超联盟、俱乐部践行社会责任,英足协充分发挥理事委员会的作用,赋予多方话语权,其92位成员代表中英超联盟有权每年任命8名。理事委员会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是不同赛事主体“共治的根基”,以“维护足球良好形象”为宗旨,切实推动了英足协、英超联盟财权的规范运行。英足协合理进行财权配置,突出了足协委员会、董事会、职业联盟以及俱乐部的主体地位,分类赋予其规则制定权、利益分配权以及商务开发权,同时采用“股份制”均衡多方利益诉求,这和中国足协存在显著差异。

我国职业足球中虽然有多个利益主体,但始终未能明确权属关系。统管中,中国足协与会员是“科层上下级关系”,对等性较为缺失,“会员大会”的作用不显著,相关主体的话语权不足。当然我国情况不同,目前尚不具备照搬英足协财权分置的条件,但进行财权优化配置则是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2016年新修订的《中国足协章程》虽然提出了保障和维护俱乐部自身拥有参加比赛时所产生的商务资源权利,同时赋予会员大会、执委会、俱乐部一定的权力,但相关条款并不清晰,尤其是对俱乐部“商务资源权利”缺乏实质性规定,也未就会员的商业传播权等予以明确。《中国足球协会总体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了成立“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全面负责组织和管理职业联赛,以实现“管办分离”。但是这一改革还未进入落实

阶段,尚面临与中国足协权力配置、组织机构重置、赋予俱乐部话语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二,对协会及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督的差异。为了规范财务支出,英格兰足协实行财务公开,接受各界对协会资产、赛事商业运营及经费支出的监督。为了使联赛一部分收益重新回到联赛,英足协制定了严格的“经费预算和监管机制”,要求俱乐部必须于赛季前提交预算监控计划和方案,报足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执行。董事会执行和监督专项基金和其它收入在英超联赛和俱乐部的分配,其中70%的约定总基金分配到英超联盟的俱乐部,30%分配到南北足球联盟的俱乐部,但不限于清盘和破产的俱乐部。英足协对俱乐部的财务监督途径主要包括:审查财务记录及门票收入;独立足球发展委员会提取发票,审查联盟和俱乐部比赛官员的花费;审查球员转会时两家俱乐部的财务状况;董事会审计检查财务报表;成员委员会定期审查财务标准规则、行为标准规则等<sup>[9]</sup>。中国足协对协会及中超联赛财务的审查权以及监督内容、程序、形式等均进行了规定。比如《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商务管理的实施细则》(试行)第28条规定,监事会享有下列职权:检查公司财务,监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等。同时对中超比赛商务监督员、比赛监督员的监督和协调,股东会审议等进行了规定。中国足协能够采取多种途径对协会资产、经费、中超联赛财务、经营等进行监督,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构,未能建立起财务公开和监督制度,暴露出不少问题。

监督的核心在于“公开、透明”,这是足球协会优化财权运行的制度基础。作为专业治理机构,足球协会的经费来源多样,应遵循社团法人“财务公开”的基本要求,这是整合社会资源,提升社会公信力的重要手段。英国法律对非营利法人的财务公开有着明确的要求。英格兰足协作为自治组织,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主导,建立了针对职业联赛以及“草根足球”的监督和评价体系,体现出较强的透明性。我国国家法律对社团法人“财务公开”的此类义务和责任的规定较为缺失,监管不力、财务混乱是此类组织的共性问题。2014年11月中央巡视组向国家体育总局反馈:职业赛事开发经营混乱,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监督;总局直属单位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权力高度集中,利益关系复杂。中国足协作为试点改革单位,在2016年修订的《章程》中将“财务审计监督”作为重要内容,提出建立严格资产管理制度,实行专项委员会经费决算、会计监督,接受会员大会和财政部门监督,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和社会监督等。应该看到,中国足协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已经认识到了规范财权关系运行的重要性,

积极寻求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自我发展路径,后续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完善的细则和落实机制。但是其中并未涉及“财务公开”这一问题,公众知情权并未得到充分体现,不利于中国足协提升社会公信力。

## 2.2 财权决策的差异

英格兰足协是自负盈亏的非营利法人,负责足总杯及管理国家队的管理和市场运营,自主决策,建构起了高效的“规章制度体系”。英足协在细化董事会职责以及“商事执委会”责权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制定了商事细则。比如《英格兰足协足球代理人条例》对国家队代理合同,协议程序、内容、解释,豁免律师规则和要求,双重代表权和相关利益的冲突、球员允诺,多个代理人、代理机构的权利义务,运动员、俱乐部、代理人履行责任,授权代理人注册等进行了详细规定。《英格兰足协电视转播细则》(Sports TV Rights Agreements)对多方权利(the Exclusive Right and the Additional Rights)、赞助商(Sponsor's Credits)、转播范围(Territory)、控制和调度(Editorial Control and Programme Scheduling)、赔偿(Mutual Indemnity)、协议到期和延续(Termination and Expiry of the Agreement)等进行了细化规定。英足协“2011—2015 战略发展规划”提出了“使足总杯成为最受欢迎赛事”的计划(Making the most of England and The FA Cup)。重点是通过前瞻性的商业和公共合作计划与赞助商、广播电视媒体、私人、公共部门、俱乐部等开展广泛的合作。中国足协依据体育行政部门规章制定了一系列商务细则,细化了财务决策权。《中国足协章程》(2005)规定:(1)积极开展与本运动项目有关的活动和咨询服务,广开经费来源渠道,增强自我发展能力;(2)代表大会可指定审计师事务所审查中国足协账目。财务报告提交会员代表大会审定。《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商务管理的实施细则》(试行)对多方主体的经营权、职责、运动员商业开发、利益分配、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开发以及中超联赛名称使用、冠名权益实施、赞助商产品和服务类别、独家保护和排他性规定实施、赞助商电视广告拍摄权益实施、电视转播权益实施等进行了规定。《中国国家足球队运动员手册》(2011)对国家队的商业广告监督、审查、要求、利益分配、着装等进行了规定。

足球协会财务决策以独立的组织机构和自主的财务关系为核心内容。英足协与政府在《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下是一种合作互动关系,与成员是“镶嵌式”的契约关系。由于关系明确,英足协自主财务决策,建立起了分类、分层的商务运营体系,其中财务预算、听证及公开制度完善,做到了公平、透明。

英足协的商事规范涵盖球员广告、赞助、职业赛事版权、转播、知识产权保护、足球公益等各个方面。1903年英足协依据《英国公司法》(Companies Act)注册成为一个非营利性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使英足协开始运用现代化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模式。英足协董事会、商事执委会分别负责国家队、温布利球场及直属赛事的商业审议和决议。英足协以“全民参与足球”为目标,财权实现了“管理与经营分离”,创造出极大的商业价值。中国足协是典型的“半官方组织”,与会员是特别权力关系——由于特别的法律目的和原因,而以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别立场,其与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公共团体相对应,在必要的限度内,权力一方具有支配另一方,而另一方必须服从的关系<sup>[10]</sup>。由于受到多方牵制,中国足协难以发挥专业机构作用,未能建立起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财权关系运行不畅。2005年,中国足协虽然成立了中超公司负责职业联赛的管理和经营,但其独立性和自主性饱受争议。由于架构混乱、权责不清、运营人才缺失、经营手段单一,中国足协建构的市场运营体系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新修订的《中国足协章程》在明确赋予会员大会“决议财务报告、财务计划和预算”职权的基础上,突出了“执委会”的作用,赋予其重大事项的“商议权和审议权”。可以看到中国足协初步确立了“民主决策机制”,试图改变以往统管的局限。但是作为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执委会并非最佳经营决策机构,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应建立符合职业赛事市场运营要求的专业商事机构进行系统决策,这是中国足协财权改革的重要内容和路径。

## 2.3 财权执行的差异

英足协每年能够从英国体育理事会获得3000万英镑的体育专项基金,此外每年还能够获得数额不等的社会捐助。英足协的经营性收入主要包括商业赞助,国家队、足总杯系列赛事版权以及温布利球场商业运营。英足协致力于赛事品牌和足球无形资产开发,依托足总杯、温布利球场、知名球员、协会及国家队标识等广泛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开发了一系列高附加值的足球文化产品,财力基础扎实。在财权合理配置下,英足协依据完善的商务细则全面实施国家队及足总杯赛事的商务运营,获得了极大的收益。2008年度英足协营业额为2.618亿英镑,净利润为1660万英镑。2012财年,英足协总收入为3亿英镑,2013财年为3.29亿英镑<sup>[11]</sup>。中国足协每年可以获得大约3000万人民币的国家财政拨款,市场经营主要包括国家队的市场开发和职业联赛许可经营两方面。国家队的商业开发起伏伏,但随着我国足球深化改革以及国家队成

绩提升,其商业价值也日益显现。职业联赛商业经营也是足协主要的收入来源。中国足协主要的经营形式是联赛媒体版权外包及商业赞助。2015年在国家足球战略改革下,中超联赛电视转播权及冠名赞助呈现爆发式增长。经过20多年的摸索,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市场价值得到了提升,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根据《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告》,2008赛季中超联赛媒体价值评估达到25.65亿人民币,2014赛季则突破了40亿元。2012年中超赛季收入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2013年收入为3.7亿元,2014年收入突破了4亿元。

英格兰足协财权执行的显著优势在于执行机构明确,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基础扎实。英足协将国家队、足总杯及温布利球场的市场运营分别交由职业经理人、协会足球总监及公司总经理负责。职业经理人一般是“职业化企业经营的管理专家”,与英足协间是雇佣关系,能够自主决策经营。英足协的市场运营团队依据相关法律对商业赞助的各类权利和义务问题进行了明确。主要包括:权利赋予;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类别;合作领域;保证,尤其是主办机构的广播传媒覆盖网络;赞助权的选择和更新;财务条件;活动组织者的责任;赞助商的义务;公共责任和社会影响;保险、赔偿;进场场馆人数;活动取消及不可抗力;终止以及终止后的安排和限制性条款;重新选择权;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sup>[12]</sup>。英足协足球总监充分发挥国家队和足总杯等优势资源,不断拓展收益渠道。主要措施包括:加强与赞助商和广播电视企业的密切合作;拓宽全球市场,吸引私人 and 公共部门等共同推动和资助足球发展规划;通过广泛的营销、新媒体渠道,拓展消费群体等<sup>[13]</sup>。英足协总经理深入挖掘温布利球场的无形资产价值,每年能够获得5400万英镑的收入。英足协依托强有力的机构及团队获得了丰厚的收益,目前主要的问题是重建温布利球场欠下巨债,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

中国足协全面负责职业联赛的运营。2004年,“G7革命”事件后,中国足协成立了中超公司,采取股份制经营。2012年为了拓展俱乐部利益,中国足协将中超和中甲的商业开发剥离。目前,中超联赛已经形成了冠名赞助商、主赞助商、媒体合作伙伴、指定供应商的商业运营模式。但中超公司缺乏自主性,市场执行主体的作用并不突出。“理事会设立执行局作为常设办公机构,执行局再设立若干分项管理委员会,执行局也负责指导中超公司运作。这种复杂而繁琐的机构设置,除了体现出足协的行政权力外,看不出任何‘管办分离’。”<sup>[14]</sup>由于高质量的市场运营人才匮乏,经营手段单一,中国足协的财权执行存在严重的问题,“垄

断式经营”致使多方利益矛盾突出,足球市场管理混乱,严重制约了其它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根据公开数据统计,2001年至2008年由于人为干预职业联赛升降级、赞助商逃离、俱乐部罢赛等原因,中国足协累计损失超过12亿人民币<sup>[15]</sup>。深化改革阶段,中国足协面临执行机构优化重组,中超公司实体化改造,构建高质量运营团队的艰巨任务。

## 2.4 经费支出的差异

英格兰足协的收益主要用于国家足球和、职业足球及下属协会拨款。国家足球主要为发展“草根足球”、青少年教育及扶持球迷组织。拓展足球基础是英足协的重点工作,能够为其打造赛事品牌、挖掘无形资产价值以及拓展财力提供重要的支持。主要包括:一是推动草根足球发展。每年英国体育理事会及英足协提供4000多万英镑用于发展“草根足球”。2015年英足协宣布一项新的全国足球参与发展战略,计划在4年内投资2.5亿英镑发展草根足球。二是拓展球迷群体。英足协整合社会资源,拨出专款建立“球迷导航”组织。英足协于2005年与英超联盟发起“支持者运动”(supporters direct movement),采取开放日、公益活动等途径广泛听取球迷意见,优化球迷和俱乐部间的良好关系,这为俱乐部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运营模式<sup>[16]</sup>。2011年英足协联合商业伙伴发起了“球迷声音计划”(Listening to fans of football),目的是将球迷融入足球发展中,提高其对足总杯的认可度及扶持和创建关系更为密切的球迷组织,其每年拨出100—150万英镑资金用于推广实施。职业足球投入主要用于奖励,扶持中小俱乐部,专项进行场馆修缮、人才梯队培养、人员培训等。下属协会拨款主要以足协“应付金额”以及参加竞赛俱乐部的奖金构成,具体比例是足总挑战杯半决赛奖池中的5.5%和决赛奖池中的2.5%,以及足协慈善盾杯半决赛和决赛收入中的6.3%。

中国足协不享有自主经费支配权,均由国家体育总局财务结算中心作出。足协每年的经费预算大约为1.2亿人民币,主要用于国家队、青少年足球、教练、裁判员培训等方面。中国足协每年对国家队的投入大约为3000万人民币,大部分用于聘请外教及国外交流费用。中国足协用于青少年方面的支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用于青少年梯队建设。2001年足协在对青少年足球投入820万元的基础上,每年递增5%,用于U-21岁、U-19岁和U-17岁三个年龄组队伍的集训和竞赛,同时建立对一些省市重点支持和边远地区扶持的专项资金<sup>[17]</sup>。二是用于青少年足球教育和普及。主要用于修建场地、项目推广、扶持足球学校等。

“绩效”是经费支出的重要评价指标。英格兰足协

规范经费支出,均衡发展国家足球和职业足球,细化了经费使用范围、额度、成效等。英足协每年能够获得1亿英镑的收益,其中50%投给国家足球,50%投给职业足球<sup>[18]</sup>。国家队支出单列,主要从赞助、比赛奖金的预留部分支出,主要用于教练员薪资、比赛奖金等,其中参赛成绩决定奖金数额。英足协董事会全面负责经费预算的审议以及支出范围、内容及效果的评价和建议,任何重大事项的变更或实施都要举行听证会。在财务公开、听证会等主体制度下,英足协的经费支出规范、有序,注重实践效果。而英国国家体育理事会负责对专项资金预算及支出的审议,主要依据是“草根足球”的场地、参与人数等数据,如果连续2年统计数据不达标,则提出警告并减少资助额度。

中国足协经费大部分支出在国家队、青少年足球方面,其中聘请外教的花费达到30%。作为基础性建设,我国对青少年足球的投入和发达国家比差距巨大,经费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到青少年足球教育和普及,足球人口逐年降低。从聘请国家队外教情况看,由于职责不清、管理不当、法律经验不足,出现了多起纠纷,中国足协损失了大量资金。中国足协在接受相关部门审计时,暴露了很多问题。2004年,审计部门对中国足协(并足管中心)的财务进行了审计,提出了资产负债表重大分类错误,内部控制形同虚设,显露出明显不能持续经营迹象等严重问题。2008年,北京市审计局对中国足协的财务进行了审计,主要内容是针对2006年爱福克斯冠名中超的5400万费用尚未收回。

### 3 完善中国足球协会财权的途径

英格兰足协享有自主财权,在财务决策、执行、分配、拓展球迷群体等方面形成了成熟的经验和做法,这为优化中国足协的财权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第一,赋予中国足协自主财权。自主财权是中国足协自治转型的前提条件之一。英格兰足协享有足总杯赛事以及国家队市场开发的决策权、执行权、支配权。由于财权集中,英足协配置资源合理,在不断拓展“财力”的同时,系统开展足球公益活动。当前,国家战略改革赋予中国足协自主的人事权、财权,下一阶段的重点应放在出台配套制度规章以全面厘清财权关系,切实落实各类权力上。中国足协财权的核心是“财力”,即拥有和支配的经费,这就要求改革方案要以此为中心,从赛事品牌、无形资产开发、市场运营、资产管理、利益分配等方面通盘考量,提出针对性的建构维度、保障及实施步骤。同时,中国足协应充分借鉴英足协权力机构设置的成熟经验,赋予会员大会实质性的“立法权”,充分发挥其决策及监督作用。“会员大会”

是建立我国足球赛事共享制度的根基,也是中国足协自主行使财权的载体。

第二,建立利益共享制度,合理进行职业联赛的收益分配。利益共享的实质是实现足球赛事资产的合理分配,将多方主体纳入到“共治体系”中,分类赋予其决策权、执行权、收益权。英格兰足协与英超联盟、足球联盟明确的权属关系能够充分发挥多方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全面进行市场运作。新形势下,建立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俱乐部为主体的利益共享制度是当务之急。中国足协作为宏观管理主体,联赛理事会作为独立业务主体享有职业联赛的无偿使用权、无形资产开发权及收益权,而职业俱乐部作为市场主体,也应享有各类商务资源权利。明确赛事权属关系是建立我国职业足球利益秩序不可或缺的环节。用发展的眼光看,职业赛事水平决定着市场化程度,依赖多方的共同推动。目前的改革并未明确我国职业足球赛事的权属关系,也未对联赛理事会的重构以及职业俱乐部的话语权提出细化的措施,这将会造成治理合力的不足。利益共享要求合理进行利益分配,多方均享有职业联赛的剩余价值索取权。从以往看,中国足协分配比例过高是导致多方矛盾的主要原因。为此,应重点赋予各方实质性的收益权,这就需要在降低中国足协收益比例的前提下,通盘设计收益分配,如果不能顺利解决这一问题,均衡的足球行业利益秩序就难以实现。

第三,优化中国足协“财权配置”,实现管理与经营分离。英格兰足协合理进行财权配置,这种典型的管理与经营分离模式形成了协会内部的权力均衡关系,提升了凝聚力。中国足协自治改革中,财权配置是重点。中国足协享有职业联赛的“无偿使用权”,需要整合多方力量才能充分挖掘其市场价值。联赛赞助、广告媒体版权、国家队商业运营是中国足协重要的收入来源,为此需要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财权配置架构及制度体系。结合英足协的经验,中国足协应着重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成立职业联赛商事委员会,将俱乐部、中超公司、企业以及经济、法律权威人士纳入其中,建立协会内部的权力均衡制度。“商事委员会”享有职业足球赛事的商业决议权,这就要求其必须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基础。二是将足球市场开发及商业运营交由中超公司。中超公司由足协及16家俱乐部共同出资成立,关乎多方主体的利益诉求。现阶段应推动中超公司的实体化改造,厘清职责,充分发挥其作为经营执行主体的作用。三是完善中国足协的建账权、核算权、支配权、监管权行使制度。中国足协财务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产管理制度缺失,不能进行“规则治理”。资产制度的核心在于“公开、透明”,是

中国足协优化财权运行的制度基础。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足协应着力建立财务公开、利益分配及经费支出制度,将拓展足球基础作为重要使命。

第四,严格职业足球俱乐部准入制度。英格兰足协通过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规范俱乐部的商业行为,其中对俱乐部资产、负债、场馆、后备基地、球员转会、财务监管等制定了完善的细则,同时建立了长效的审计和监督制度。我国虽然情况不同,但职业足球俱乐部作为职业联赛主体,也享有市场开发的权利。中国足协虽然制定了较为规范的俱乐部准入标准,但落实存在不足,一些不具备资质的企业也进入到职业联赛中,出现了俱乐部频频更替投资者的情况。当前,中国足协应借鉴英格兰足协的做法,建立严格的俱乐部准入和监督制度,引入激励机制,夯实职业联赛运营的基础。同时,依托政府及行政力量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吸纳多方投资,减少对母体企业的财务依赖。

#### 4 结语

财权是足球协会的基础权力之一,决定着行业利益秩序的建立及足球公益的实现程度,其运行依赖于良性的法律关系。足球协会享有国家法律赋予的“社团法人”身份及自主财产权,这规定了其财权的性质及宗旨,体现出有别于其他法人的典型特征。在行业治理中,足球协会需要制定完善的商务规范,这是细化财权内容,优化财权配置,实现各类财务关系有序运行的主要依据。英格兰足协享有自主财权,在财权配置、市场运营、践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形成了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中国足协虽然掌控着广泛的资源,但以往受制于体育行政机构,财权关系运行不畅,整体收益不高,尤其是在各类经济纠纷中损失巨大。在行政主导的自治改革进程中,应进一步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赋予足协自主财权,明确赛事权属关系。同时,中国足协应全面吸纳英格兰足协“财权配置”的优势经验,全面厘清财权法律关系,夯实财务决策权、执行权和支配权运行的行业规范及制度基础,为自治提供“财力”支持。

#### 参考文献:

[1] Companies Act 1985,s30(1)(2)(3).转引自葛伟军.英国公司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 《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1987)[Z].中国社会组织网.  
 [3] 《俄罗斯社会团体法》(1995年4月4日国家杜马通过),

转引自李本公等.国外非政府组织法规汇编[M].北京:中国出版社,2003:131.

- [4] 《奥地利社团法》(联邦法律公报 1. I 2002 年第 66 号)[Z].中国社会组织网.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Z].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1986 年 4 月 12 日通过,自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Z].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7] 伍中信.现代财务理论与产权理论的相关性研究[J].湖南财政与会计,1999,(12):3-5.  
 [8] 梁伟,梁祝平.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经济收益分配机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4(05):515.  
 [9] The Football Conference Limited FA Standardised Membership Rules 2014/2015 Season[EB/OL]. <http://thenationalleague.org.uk/uploads/docs/Rules.pdf>.  
 [10] 刘嗣元.论国家赔偿法中的国家追偿制度[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9(02):19-21.  
 [11] FA 2008-2014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ents.  
 [12] Sports Sponsorship Agreements' Legal Issues of UK". Ian S. Blackshaw. Sports Marketing Agreements: Legal, Fis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Published by T. M. C. ASSER PRESS[M].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2012:126.  
 [13] The FA Group Strategic Plan 2011-2015.  
 [14] 郎效农.回归足协体制,充实中超联赛公司[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53597010104p1.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53597010104p1.html).  
 [15] 肖良志.解剖足协[J].中国经济周刊,2009,(45).  
 [16] Stephen Hope.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nationwide league football clubs 2002-2003[M]. Brikbeck College, London: Football Government Research Centre,2003.  
 [17] 孙文新,候会生.中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运动面向 2010 年发展目标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10):1427-1433.  
 [18] 岳东兴,王子江.英格兰的“足球金字塔”——对话英足总[N].新华网伦敦,2013年4月10日体育专电.  
 [19] 宋亨国,周爱光.体育权利的分类[J].体育学刊,2015(3):25-28.  
 [20] 王智慧,池建.体育强国的指标评价体系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11):15-22.  
 [21] 宋亨国,周爱光.体育权利的内涵及形态[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1):11-17.

● 研究报告

# 走向相互在场：“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之仪式性体育管窥

## ——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的口述历史

杨海晨<sup>1</sup>, 吴林隐<sup>2</sup>, 王 斌<sup>3</sup>

**摘要** 在体育人类学领域,极少有学者借助于案例研究去思考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具体场景中的体现。本文以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为对象,运用田野考察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历史地探讨了在仪式性体育变迁中所体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研究认为:由仪式性体育观之,1949年前,国家权力试图沉降到村落,偶尔会看到国家符号向社会的延伸;社会改造工程时期,国家权力下渗到农户,社会生活被各种国家仪式所占据;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与社会都在寻找一种较为适当的发展之道,二者处于相互试探与调适的博弈状态;当下强调改善“治理”状况的时期,国家与社会在互惠、双赢的理念下形成了“相互在场”局面。通过这样历史性、过程性地诠释演武活动所映射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如何从“皇权不下县”走向“相互在场”的个案呈现,大致可以缩影式地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路径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 国家—社会;相互在场;国家下沉;政府下乡;仪式性体育;演武活动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84-10

### Toward Coexistence: A Study on the Shifting Role of “State—Society” in the Ritual Sports

#### ——A Case Study on the “Performance—oriented Martial Arts” in Heinni Tu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with Oral History

YANG Haichen<sup>1</sup>, WU Linyin<sup>2</sup>, WANG Bin<sup>3</sup>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2. School of Social,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of sport, few scholars have turned to the means of case study to shed light on the presence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its evolution. This paper, by using such methods as field work and oral history, takes the performance-based martial arts in Heinni Tun, Guangxi as its subject and aims to researc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state in the evolution of ritual sports. This paper holds that: 1) Attempts to widen state influence over the local environment was made through all the period till 1949. There is a sporadic infiltration of state power in county. 2)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zation, the ideology of state along with the standardized ritual form wielded its influence on households; the society is absent in its evolution. The state power took the hold. 3) Upon the arrival of reform and opening period, both state and society are looking for a right way for development and both parties are engaging in a tug game in which they tired to gain balance. 4) During the good governance period, both parties are taking part in a win-win-situation-oriented negotiation and the ritual sports a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existence of both parties. the paper sheds light on an individual case, the historical and diachronic study of which offers its readers a knowledge of a shift from “absence of influence in county” to “mutual influence”. it is carried out in an attempt to give readers an access to the trajectory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its miniature form.

**收稿日期:**2017-04-02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等资助项目《体育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项目号:2015M570636。

**作者简介:**杨海晨(1977-)男,回族,湖南武冈人,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人类学。

**作者单位:**1.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州 350108;2.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武汉 430079;3. 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武汉 430079。

## 1 国家—社会：探讨仪式性体育运行逻辑的可能视角

“仪式性体育”是“附带着一套程式化的、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由文化传统所规定了特定行为方式的民间体育活动”<sup>[10]34</sup>，其中一般蕴含了未被当前中国意识形态所制度化的灵魅元素。按常理来说，在以马列主义为执政基础的中国，人们在举行这样的活动时，会尽量远离政府的监管，活动过程中不大可能出现象征国家意志的符号；国家在举行各种庆典时，同样不应该出现民间仪式性活动的内容。但是，笔者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田野作业中“惊奇”地发现，大多数仪式性体育举办期间，都会看到政府官员出席或代表国家意志的宣传口号张贴在场地四周。在政府部门举办的“正祀”活动中，也会看到一些仪式性体育元素嵌入其中。从何时开始，是什么原因，使得民间仪式性体育活动有国家的符号在场？社会又是什么原因进入到国家活动场景中的？之前的社会或国家仪式中，二者是否也相互在场？这样的变化体现了何种国家—社会关系变化趋势？基于这样的困惑，笔者计划从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整体视角出发，以广西南丹黑泥屯的仪式性体育“演武活动”<sup>①</sup>为对象，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国家—社会”(state and society)是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理论界研究社会变迁的一个主导性视角<sup>[2]</sup>。一般认为，“国家”是指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通过合法垄断暴力的使用权而对其居民进行强制性管理的各种组织机构及其体现的强制性等级制关系的总和；“社会”则相应地指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居民及其群体的非国家组织与关系的总和<sup>[16]</sup>，也有学者用“民间”而代之。参考高丙中及郭于华等人的观点<sup>[4][6]</sup>，在讨论到实体对象时，笔者使用“民间”一词，如“民间组织”、“民间仪式”。在讨论象征体系时，使用“社会”一词，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符号”。但二词在意义上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中，学界有“传统中国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补充的组织与关系”<sup>[12]</sup>的观点。但进入现代社会后，在国家力量的笼罩下，国家既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取缔那些被视为非法

的民间组织，也可以促使社会自动放弃这些组织，或者以自觉改造活动的方式符合国家给出的定义。为此，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有可能在内部主动引入国家的“象征符号”<sup>[27]</sup>，而国家为了展示其现代性的一面，往往也主动地把社会纳入各种规划之中。由此，社会和国家与其说是分离的，不如说是共生的<sup>[5]</sup>。

人类学借助仪式、宗教来讨论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如高丙中通过河北赵县一座建筑物从创意到启动再到完成的民族志叙述，细致地呈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多种紧张关系在此情境中被缓和、解决的过程，由此得出“中国传统文化技巧创造性地成为一种政治艺术而被运用到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来”<sup>[5]</sup>的观点。同时，他还发现民间仪式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入其中，实际上是“治理”的行政方式的演练<sup>[4]</sup>；黄剑波阐释了国家力量在社区的事务、变迁和权力分配中的特殊影响，并提出今后将会出现国家与社会达成一定程度共谋的趋势<sup>[8]</sup>；熊迅认为“‘刀杆剧场’体现出了丰富的国家意蕴以及边境族群主动呈现出来的强烈国家认同”<sup>[24]</sup>。

体育人类学通过微观体育实践探讨宏观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具体到以仪式性体育为载体管窥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更少。孙睿诒、陶双宾等人呈现了“在女子举重参与者中，国家是如何通过家庭实现具体的权力实践，迫使个体本身也参与到这场权力的建构中，而参与其中的个体既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受害者，同时也成为建构者本身”<sup>[14]</sup>；苏珊(Susan Brownell)指出中国1980年代的运动员的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一种建构国家意识(fashioning of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的工具<sup>[30]</sup>；万义、杨海晨等人认为村落女性体育参与工具理性行为的形成是由地方政府对话语权力的垄断、女性体育参与意识的“误识”及二者之间恰当地“合谋”而产生的<sup>[17]</sup>；李志清指出“国家政治生活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正是通过诸如抢花炮这样具体而现实的民间仪式性实践活动而实现的”<sup>[10]304</sup>。

从以上研究发现，通过仪式观照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的进入及如何进入的过程，可以使微观研究跟整

① 鉴于本文所涉及的地名和事件都是被公布的，加之对地名和事件采用真名书写，也是他们为推动乡村旅游，寄希望外界学者对演武活动所做的宣传，所以笔者没有依学界惯例而全部采用假名。不过在引用事实、陈述观点时并没有采用真名，希望这样的做法既能够提出真凭实据，又尽量不给被引述者带来困扰。

个社会与文化的格局连接起来,已经成为认识宏观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环节<sup>[6]</sup>。但是,前人大都关注了国家是如何进入社会的,却少有关注社会是如何进入国家的这一维度;此外,多数研究采用了共时性的视角,却缺少了历时性的变迁视角来考查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路径。杨海晨,王斌等人认为,要想较好地把握研究对象的缘起动力、传承脉络及变迁原因,应该尽量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历史比较法<sup>[26]</sup>,历史与变迁纬度的引入,不仅有助于研究仪式活动本身,而且可藉此认识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和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sup>[6]</sup>。有鉴于此,笔者计划在本研究中采用历史比较的研究进路,借助“演武活动”这样的仪式性体育活动小事件来映射国家—社会关系的张力变化。

## 2 田野简述:西南边缘的黑泥屯与演武活动

黑泥屯,也称黑龙古溪峒,处红水河上游东畔,属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者村(图1),因屯后山有一黑龙潭长年山泉不断,泉水灌溉之下的全屯泥土呈深黑色,故而得名。该屯是一个典型的壮族村落,也是一个以黄姓为第一大家族的主姓村落,期间杂有莫、郁、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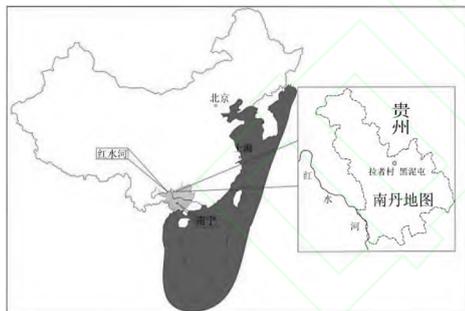


图1 黑泥屯区位图及尚未完工的雄伟寨门

Fig. 1 The Layout of Heini Tun and the Gate Under Construction

笔者自2009年1月30日起,5年多来对该地共进行了150余天的田野考察与访谈,全程参与了4届演武节及2届“南丹·丹文化旅游节”的筹划、训练、展演。因参与式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在时空上的局限,加之民间对于演武活动的文献记载极少,为此,笔者主要是凭借出生于1920年代以后的黑泥屯村民的回忆口述、南丹文体工作人员的访谈、对黑泥屯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进行分析。于是,本文将所要探讨的演武活动中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起点定位于20世纪初期,终点定位于当下阶段。鉴于一些重大的历史时期或事

苏、陆、周、吴等姓氏。在红水河流域农历三月三这天,人们都会搭歌棚,赶歌圩,举办歌会。由于三月三几乎与清明(寒食)重合,受汉文化流播的影响,一些地方在举办歌圩的同时,还会进行祭祖、扫墓、修谱等活动。而黑泥屯的三月三,村民除开展对山歌、祭祀祖先和神灵等活动外,因近千年的土司文化及尚武传统的濡化(enculturation)影响,还会举行包括有山歌拳、板鞋竞速、舞竹篙龙等众多表演项目,比武、角力、佷兵双刀及阵法等实战项目的“演武活动”。据黄氏族谱记载,演武活动自宋初就有开展,当初是为了庆祝击败唐朝军队进攻黑龙山寨而举行的纪念活动,后来逐渐演变成南丹莫氏土司进行“征兵、训练、展演”的军事活动,至明朝中期达到鼎盛。进入清朝中期以后,西南边陲政局日趋安定,加之八旗军战力较强,清政府开始不再征用土兵,改为用绿营军和办团练予以取代<sup>[1]</sup>,演武活动由此逐渐失去了征兵、训练功效,但因其长期传承过程中融入了黑泥屯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多数项目与地方神灵如蚂拐、黄帝<sup>①</sup>、英雄祖先等产生了联系,且各有传说流传于民间,兼具象征与展演意义,已经成为了黑泥人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而每年定期开展。



件对于社会转型起着比较明显的影响,笔者把这近100年的历史大致分为1949年前、社会改造工程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当下强调治理改革时期。

## 3 国家下沉:1949年前行政力量向社会的延伸

1912年以前的中国,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将社会纳入管控体系之中,如自秦汉以来,采取了“什伍连坐”、“编户齐民”、“保甲”等一系列户籍制度。但因国家的行政力量力较弱,这些制度并不能达到对

① 对黄帝的祭祀,主要是在黄氏族人中开展。黄氏虽然族属上为壮族,但他们自认为是黄帝之后。

社会的有效控制,现实是不仅在中心地带“皇权不下县”,还表现为边疆地区的“皇权不到边”<sup>[25]</sup>。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公共生活的运行主要依靠乡土精英主导的地方宗族自治<sup>[29]</sup>,较少受来自国家意志的影响。1912年后,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现代化推进的努力,如从1931年起,新桂系在广西推行了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1931)、重新启用保甲制度(1934)、实行改良风俗规则(1936)等一系列“开化”改革,试图使国家力量沉降到村落中间。由于此时民族国家所建立的科层体系较之前封建国家的官僚体系在对乡土社会的控制上有所增强,为此,那些以宗族、宗支为家庭之上进行传统组织生活的社会基本单位开始受到冲击,原来以寨老、布老等地方性权威来开展的民间公共活动,逐渐改为由代表国家力量的保长、甲长参与组织,并融入了国家的意志。

HYJ:45年底,保长说上面希望各屯搞抗日胜利庆祝活动。我们黑泥商量就搞一下演武节,一来敬一下祖宗,二来庆祝抗日胜利。以前三月三我们每年都搞演武节,但那时连饭都没得吃,加上国民政府颁布公告禁止大家搞以前的那些封建迷信活动,因此,屯里很难组织人来做大点的演武节,一般只是很小规模地比一下武,敬一下祖先神灵,告诉大家要讲“仁义礼智信”,并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45年,屯里面觉得可以用演武节来好好的贺喜一下。原来老祖宗用演武节训练民兵打倭寇,现在我们用演武节来祭祖宗、搞庆祝。

YDG:那时候,演武节主要由民国前做过哨目,民国时做甲长、保长的人在组织。他们都是原来土司家族的,既代表了政府,又代表了我们屯,说的话比较有威信。村里对于外面的战局形势、政府新政策的了解,都是从他们那里听说的。由于政府要他们兴办民团,训练壮丁,而且那时候当兵就意味着至少不会饿死,我们这里又有习武传统,他们在屯里面搞民团还是比较有号召力。所以当提出准备搞演武节时,屯里面都还是很支持的,那些民团成员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MZW:那时候政府虽然不准搞封建迷信活动,但管得并不严,我们学演武节的东西时还是按老规矩,是要关门拜师的。除了教武术,师傅还教了我们怎么样做师公道场。但那时候我们刚学,道行不够,不能在演武节中用,只能是看师傅们用。

吴毅指出,点祖、时祭、清明及公共祭祀等,在村落仪式化生活的反复强化下,增强了宗族血缘网络的交往和内聚力,是维系宗族秩序的重要内容<sup>[21]33</sup>,充分体

现了传统时期乡村秩序的“自在”实质。笔者也发现,1949年以前的整个演武过程均掺杂有祭祖、敬神等内容,兼具了“点祖、清明、公共祭祀”等仪式性质。黑泥人通过年复一年的三月三演武操演,在强化族群记忆、传承家族文化、建构宗族伦理秩序上起到其他村落活动无法企及的功效。而且,由于当时在人员、文化及物资上的流动性较弱,在黑泥屯这样以宗族为聚落的熟人社会中,这种内源性的文化传承方式为演武活动之类的乡土知识濡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为族群记忆、家族文化和伦理秩序的稳定延续创造了条件。而在缺少与外界接触的前提下,“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在村民的经验世界里是不可见的。为此,访谈时村民提到之前的演武活动只是“敬一下祖先神灵,以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而没有“国家符号”也就可以理解了。

相对于仪式生活秩序中的社会在场,保甲制度无疑是国家意志在村落中的具体实践。新桂系重拾保甲制度时,是希望以此加强对农村的控驭与治安,并“以兵法部伍其民”<sup>[20]</sup>,完成“剿匪”清乡工作。到了抗战期间,“举凡征兵、征工、征粮、征税等人力物力的动员和汲取,莫不凭借保甲这一管道,致使保甲逐渐由单一的社会控制工具演变为全能的行政工具”<sup>[19]</sup>。在黑泥屯,由于甲长大都来自于土司官族,兼具国家符号与民间权威双重合法性,在公共生活上由他们办理或协办较为便利。于是,保甲成为承载村政职能的制度化权力,成为国家官治系统借以对社会进行更深入渗透的工具<sup>[21]35</sup>。加之恰逢日本入侵,村民们的“中国”意识在华夏族群与日本和族的交战基础上,通过保长、甲长的信息传达被建构和强化起来,国家符号也藉此下沉到村落中间,而像演武活动这样的仪式生活则成了国家符号下沉的极佳载体。在演武活动中,一方面通过对历史事件(如祖先抗倭)的宣扬、国家观念(如中国、日本)的强调,来实现民众对族群和国家的感知;另一方面通过对祭祀活动的领导或参与而使国家进入世俗的政治结构<sup>[9]</sup>。于是,当国家希望民间搞庆祝活动等等时,往往应者云集,而且,演武活动也被创造性地运用起来,以此响应国家的征召。

然而,1949年前的中国毕竟是一个乱世,战乱自始至终笼罩在人们头上。尽管村落些许受到了“开化”、保甲制度等的影响,但国家却很难有足够的资本来增强其对社会的控制与整合,国家权力并未能从根本上触及和改变社会结构,政府颁布的“改良风俗规则”并不能真正被民众所执行,人们在演武活动的传习及展演上,依然沿用“关门拜师、师公道场”的旧制,红

水河流域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

#### 4 政府下乡：社会改造工程中国家对社会的规训

1949年后，国家不遗余力地将整个社会纳入到宏大“社会改造工程”之中，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将包括红水河流域这样边远地区在内的乡土社会都纳入到了高度一体化的管控之中。经过数十年的高度集权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延续的村落社会结构。以传统血缘观念实现凝聚的西南社会，逐渐被新兴的阶级意识与固化的阶级分层所取代，家族成员以阶级身份被扞格入特定的社会组织中，“阶级意识从观念形态上超越了血缘关系”<sup>[18]</sup>。此时，作为国家权力执行者的工作队、村干部代替了传统村落中的布老、寨老等乡土精英，也代替了民国时期国家化不太彻底的保甲制度，红水河流域跟其他地方一样，概莫能外地被纳入到整齐划一的指导性变迁中。作为集体记忆的演武活动，也被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东西而遭到禁止。

CAM：听老人们讲，刚解放时那几年演武节还是搞的，共产党给大家分田了，大家有饭吃，清明节就可以凑点米，偷偷地聚到一起小规模地搞一下演武节。后来土地又被收回去，成立了人民公社，接着又大跃进，工作队进到屯里面，天天喊大喇叭，演武节不准搞了。干部说这是封建迷信，要铲除，连清明节都不准过了。不过，大跃进那阵子也红红火火的搞体育比赛，打篮球、拔河、做夜操。到了69年，我在那地（村级地名）的时候，除了军体活动，还经常组织大家搞三人板鞋竞速，这虽然是演武节的传统东西，但因为要求齐心协力、团结奋进嘛，所以上面对搞板鞋竞速还是不反对，只是不能跳板鞋舞，说这舞原来是跳给布洛陀看的，是封建残余的东西。那时候最红火的还是唱样板戏、背红宝书、在家里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之前的布老、寨老和甲长都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和封建余孽，被戴上高帽子在万人大会上批斗，他们弄的演武节那一套，我们也没有学过。

HHG：文革前期，清明节时演武节啊、土司那一套啊，我们是不敢搞了，被抓到那就成封建余孽了，五服之内敲锣打鼓祭祖也不能弄了。但从老一辈就有的演武节传统还是有人做，主要是三月三同宗的近亲在一起，象征性地交流比划一下，因为大家觉得如果不过一下三月三，就觉得少了些什么一样。不过只是偷偷摸

摸的，要是被工作队晓得了，会被斗的。但好像从72年起，村里搞清明演武的人又多了一点，后来听说是因为林彪死了，管得不那么严了。

1949年之后，国家对民间信仰的破坏与之前国民政府的“开化”的关键区别在于，之前的国家干预是较为缓和的，而这一时期却表现出一种不加区分的对民间文化的强势打击，其目的是要让民间强制执行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并与一切传统文化形态彻底决裂。当时的国家认为，利用这样一种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即可保持对社会的控制<sup>[3]</sup>。于是，这种总体性的社会控制从根本上压制了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作为族群记忆的演武活动基本上退出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这一时期内，尽管演武活动的一些内容仍然在黑泥屯自然地沿袭，以家庭为单位的祭祀活动也依然存在，但原来演武活动支配主体的合法性已经被剥夺，仪式活动少了民间精英的引领，自然较难开展。取而代之的是对政治仪式的系统建构，如毛主席语录背诵，对着毛泽东像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等占据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此外，长期政治仪式形成的村寨生活方式，又不断强化着村民们对共同政治信仰的绝对服从，人们从行为习惯、经济生活到思想意识都需呈现出整齐划一的面貌，整个社会都纳入到国家权威的规划性改造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成了规训与服从的模式。因此，与其说此时的村落仪式活动（如演武活动）没有了生存余地，毋宁说此时的民间仪式在整个日常生活中都是缺席的。

但是，历史地看此时期国家对社会的规训，它虽然显效一时，却呈现出效用递减的趋势，直至失灵<sup>[22]</sup>。很明显的，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民间仪式活动又有回暖的迹象。至文革结束，当整个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过渡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后，人们得以有机会寻回那些从不曾让渡——只是暂时退隐于规训之下的仪式生活，“社会”也借机从演武活动之类的仪式活动中重新“出场”了。

#### 5 试探与调适：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的博弈

从改革开放初到21世纪融入全球化前的这20余年里，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争论逐渐被淡化，转而着重强调尽快提升国民经济水平，之前深入村落的大部分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性力量逐渐撤退出去，社会的自我存在感开始重新表现。但是，因为民众对之前所受到的30余年总体性规训仍心有余悸，导致国家—社会都在寻找一种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边界，

于是双方形成了一种试探、改变、调适的状态。二者之间并不像前面30余年,完全处在强国家一弱社会的形式,而是社会的内源性传承与国家的外源性影响在民间仪式活动中均有所体现。

HHG:81年清明,那地文化站的CAM回来祭祖,提到现在政府好像对搞迷信活动管得不那么紧了,老人们听了后就提议我们黄家是不是把演武节搞起来?我那时虽然是村支书,可对上面的政策了解不多,但至少晓得共产党对搞迷信活动是不赞成的。我当时就提出,搞是可以,但应该把迷信的东西去掉。要不明年搞演武节时,会场上就不烧香了,也不敬神,也不要树那些“仁义礼智信”的封建思想牌牌,演武节让各单元<sup>①</sup>出些节目,大家热闹一下就行了。到时就算上面追究起来,也可以说是在搞体育比赛。至于烧香祭祖的事情,完全不搞也不行,可以派一些代表,到黑龙潭把它做了,就不放会场搞了。那些老人比较认可我这个意见,于是就在屯里面通了气,要在82年三月三搞演武节。

82年三月三,上午各单元先到黑龙潭祭了神。中午开始搞演武节,还专门派人到路口放哨,万一要是来了生人,就赶紧向会场报信。搞完后,公社找我谈话,说这样的活动还是尽量不要搞,如果非要搞,建议把那些迷信的内容都去掉,并尽量与上面的政策相符合,比如可以在演武节中宣传反封建迷信、宣传党的政策。这样,我们在以后几年的演武节中把改革开放好、国泰民安、实现四个现代化之类的东西放到会场中,同时也试探性地把我们的各路神仙也请到了会场中。

大概90年后,南丹允许打矿<sup>②</sup>了,大家一窝蜂地跑去开矿。那几年屯里的年轻人,不是去矿山就是去广东,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搞得每年三月三演武节参与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之前几年搞演武节都是黄家后人在做,也没有邀请其他莫家、郁家之类的人,一旦黄家参与的人少了,又没有其他家族的人来补充,这活动就慢慢搞不下去了。

自1980年代以来,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思维下,对于民间文化的管制逐渐放松,一些曾被冠以封建迷信的仪式活动开始得以重新回归,那些之前被定性为“封建余孽、牛鬼蛇神”的乡土精英也觅到了重新回归的契机,演武活动得以恢复正是以这种政策松动为前提的。不过,尽管宗教信仰自由已是《宪法》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力,但是对于那些未被制度化的民间

仪式活动,仍然被认为是阻碍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封建迷信”,对“迷信”的抵制依然是党的政策。因此,即使是远在边疆的乡村干部,也需要表明这样的立场。

演武活动在恢复之初处于一种秘而不宣、见机行事的状态,并且只是被定义为黄氏宗族的事情,与原本参与的他姓宗族没有多大关系。组织者知道,除了本宗村民,演武活动在“上面”的观念世界里是没有位置的,搞这活动有可能会背负着“迷信”的标签,为此,在参与群体规模上一直尽量控制。同时,演武活动的组织者并没有被动地等待打击降临,要使活动合法地、安全地持续办下去,就要设法淡化甚至摘去迷信标签,并积极地进行重新诠释,将它与“上面”所肯定的文化类别和事项接上轨<sup>[5]</sup>。于是,他们在举办初期采用了试探性方式,把活动本身与仪式内容分为两个场所进行,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处在明处的演武既娱乐了村民,也凝聚了人心,而处在暗处的仪式,既满足了乡土社会对祖先、神灵的精神追求,又强化了族群记忆。此外组织者还根据现时形势,开创性的把代表国家符号的诸如改革开放好、国泰民安等移植进演武活动处在明处的场域,以积极谋求合法性地位。正是这样巧妙迂回的民间智慧,使得演武活动表面上是按照时下的意识形态方式进行宣传、造势,但实质上人们依然保留了一些与民间信仰有关的核心内容。

只是,进入1990年代后,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刺激下,红水河流域那些最具创造性、最有活力的年轻一代大幅度地卷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潮中去,使得这一代人在乡土文化传习场域中长期“不在场”。他们对自己族群、对乡土文化只能是非建构性的,从而导致1980年代中期那种遍地民俗回归的“强化的仪式景观”(enhanced ritual landscape)昙花一现。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诸如演武活动这样的民间仪式活动进入了的低歇、困惑、尴尬的发展时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 6 相互在场:强调“善治”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合谋

21世纪之后,“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以便实施某项计划”<sup>[23]</sup>的“治理”(governance)逐渐成为执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理

① 黑泥人以宗支为依据,把聚落内的人分成多个相对独立的团体,主要便于仪式活动的组织分工。

② 南丹盛产锡矿,被称为中国的锡都。

念,而“强调合作与互动”的“善治”(good governance)则成为治理所追求的目标。在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后,政府在处理国家—社会关系时,转而开始强调通过上下左右的商谈而使行动结果互惠、双赢。对于国家而言,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试图把民间仪式运作成一套贯穿国家意志的政治艺术,此时的做法是以代表国家的象征物(如国旗、国歌)、政府人员(如在民间仪式中安排政府人员座位、讲话)及制度(如规定含有“封建迷信”的内容不能出现在公共仪式中)等出现在民间仪式当中,使作为社会文化的仪式沾染上浓厚的“权力技术”<sup>[4]</sup>;对社会而言,虽然民众普遍希望在仪式生活中更具有自主性,但是出于现实功利目的(如为了自身合法性地位的确认、国家资源的分享和争取),往往或主动、或被动地把国家符号设置入仪式中来。

加之2003年10月,文化部、财政部召开了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作会议,并与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自此,保护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政府、民间、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当然,与此伴随而来的,还有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的经济利益算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时喧嚣而来。此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体现为地方精英与政府的默契配合,双方都希望在积极保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各得其所,演武活动在国家—社会的“合谋”之下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 6.1 国家的符号在社会中

谭华认为,现代体育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兴起而兴起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民族—国家体育<sup>[15]</sup>,笔者认为国家在对待民间仪式性体育的存废、发展问题上亦如此。为保证国家利益,政府必然会有意地把大政方针融入到仪式性体育之中。但在强调善治的当下,国家在社会中的存在形式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前经常以暴力的方式介入其中,也与改革开放后20余年间国家与社会相互博弈较劲的情况不一样。此时,国家是以通过解决三农问题、实施新农村建设等利益输送的形式介入到仪式性体育中的,并在此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向民众宣扬各种政治观点、理念愿景,使得村民真实地体会到国家在为民众谋福利。而社会则在获得国家资助或为了获得国家资助的情况

下,策略性地把国家请入到民间仪式中来(图2、3)。



图2 “全民健身、民族精神”在演武活动中

Fig. 2 Ethnic Spirit Reflected in the Full Particip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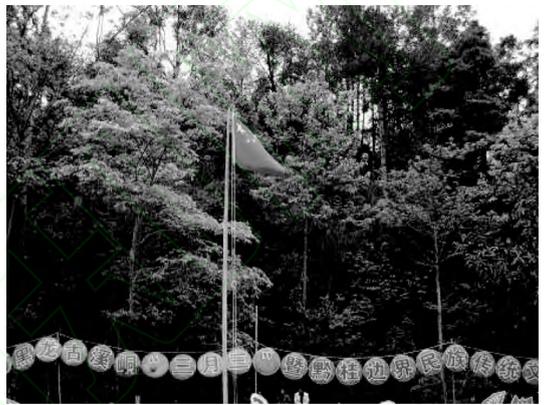


图3 演武场地最显要位置的国旗

Fig. 3 the National Flag Taking the Center Position in the Pitch

### 1) 演武活动文件呈现

2013年演武节舞美(部分):远景,片片梯田。远景,“2013年南丹(延州)土司演武文化节暨壮族狂欢埋蚂拐活动”名称。主席台右侧树一“国泰民安”大幡,场地正中间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高于一切,场右侧大标语:“在希望的田野上”;场左侧大标语:“欢迎您走进新农村”;场后大标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 2) 基层组织者、参与人员口述

HHG:做演武节事前联系政府,策划、宣传、运输、安保等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些免费帮助。搞这活动,买材料要钱,请外面的人过来表演节目要误工费,搞完之后,所有的演员、观众吃饭的钱也要花<sup>①</sup>,现在没有蒸偿田<sup>②</sup>了,这些钱全部靠我们组委会去讨肯定不现实。

① 在红水河流域,有各种公共活动结束后,所有观众都可以免费在当地任一村民家尽情吃喝的传统,村民也很乐意有人来家里做客,而且来客多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主人家的声望,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被村民们茶余饭后谈及。

② 即土司时期专门为演武节备粮的公共族田。

跟政府联系,政府多少会支持点,我们自己再去讨一点,经费就不那么紧张了。现在搞活动都会请领导剪个彩致个词,来的官越大,下面越觉得有面子。每次演武节,南丹县长、书记至少要来一个致词,很给我们长脸的。

HWG:08年前我们搞演武节,是不会请苗族和瑶族这些蛮子来的。但现在共产党提倡民族团结,再说,这活动已经不只是原来土司几家人的事了,是整个南丹、整个红水河的活动,所以我们每次也会请一些其他民族过来表演。通过这几届演武节的交流,感觉我们跟其他民族的关系处理好一些了。

### 3) 政府官员观点

ZHZ:这样的活动,肯定不能由官方来办。如果民间自己办的话,一届只需4、5万块钱,因为他们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在“修阴功”,就不会处处要钱了。如果政府来办,他们就觉得是在帮政府做事,做什么都会开口要钱,没有10来万是下不来的;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讲究原生态性,他们在演武场外拜神我们是知道的,只是不点破而已。如果我们来做,肯定会把那些“迷信”的东西都去掉,这样一来,活动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生命力了。

现在办演武节,我们的定位是政府引导,并建议他们在活动中注意宣传党的惠农政策和执政方针。还有就是相关部门一起来扶持,使他们通过演武受益,让农民发展经济。三就是坚持让原生态的优秀项目脱颖而出,争取申报非遗取得突破。

“民间信仰是他们自己与神灵的关系,关键是对神虔诚,可以不与外界、不与国家发生关系,也不必牵涉他人、牵涉国家领导人”<sup>[4]</sup>。而且,现在的社会早就从总体性国家中解放出来,信仰自由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保障,但为何民间仪式还要主动地把象征国家符号的“国歌、国旗、领导人”及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符号的“民族团结、全民健身、和谐新农村”纳入其中呢?

笔者认为,社会之所以在仪式中把国家符号纳入其中,并在自己的观念世界里建立对国家的认同,是因为无论是全能国家时代,还是强调“善治”的当代社会,国家一直是民间仪式合法性的判定者。为了让国家承认其仪式的合法性,或为了“利用国家、把国家作为一种发展的资源”,作为应对方式,最恰当的方法即是按照国家推崇的方式对象征资源进行操作,从而使国家礼制和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调和<sup>[28]</sup>。于是,

民间仪式通过借用特定国家符号的出现而有了合法依据,这也成为了民间仪式生存的政治策略。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管理已经成为左右民间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的当下,民间仪式活动的举办规模、影的大小及发展方向,也直接受制于国家的认可态度、投入力度的大小<sup>[13]</sup>。为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会在演武会场周围见到“强国门、基层党建兴文化、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全民健身运动”这样宏大的国家在场主题横幅了,也不难理解为何会在开幕式中唱国歌、升国旗、设主席台、请政府官员致词的国家仪式图景了。

从近几年国家介入演武活动的个案实践看,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基本上取得了预期效果:参与演武活动的主体人群由原来的土司官族后代扩展至整个红水河流域居民,把原本一场小范围的宗族祭祀仪式升格为流域性的民间盛会;参与群体的扩大,从黑泥人的独乐乐过渡到所有人参与的众乐乐,并使得原本稍显紧张的族群关系得到改善;在整个活动中,让参与者切实体验到国家对他们的影响及关照,也让他们体验到拥有原来不敢想象的信仰自由度的欢娱;通过演武节活动,既展示了黑泥屯的农村风貌,也推动了经济水平的提升;通过无处不在、润物细无声的“国家在场”,使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 6.2 社会的符号在国家中

其实,现代国家留给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远不仅只是让国家在社会中,人们在这种空间里享有的自由度,有时也会通过“社会的符号”<sup>①</sup>在国家中得以体现。与国家在社会中的主动介入形式不同,社会的符号进入国家中总是处在低姿态的,因此,要想进入国家的场合,很少有主动闯入的方式,大都是受到国家的征召<sup>[4]</sup>。

### 1) 官方的声音

WHM:我们原定于11年4月底搞“中国南丹·白裤瑶民俗文化旅游节”,但是很多人提出来,南丹发展旅游不能只靠白裤瑶,要把全境所有民族文化都要动员起来。于是,我们把“中国南丹·白裤瑶民俗文化旅游节”升级成了“中国南丹·丹文化旅游节”。

当把筹备丹文化节的文件下发到各乡镇征集节目时,初次报名大概有上百个节目。很多地方明确表示,他们不图钱,就是希望能够在全县人们面前露一下脸。

① 这里的“社会的符号”主要是指那些未被制度化的蕴含地方性知识的组织和关系,本文具体指演武活动中的部分项目,跟代表国家权力的制度化的“政府人员、象征物、制度理念”等相对应。

通过几轮选拔,最后确定了30来个节目,黑泥屯有好几个节目被选中。这些节目,既反映了南丹的人文特色,也反映了民族风情。5月26到28日(2011年),首届丹文化旅游节召开。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十届的努力,把丹文化旅游节打造成像“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一样级别的“中国品牌节庆”活动,使南丹借此实现从“资源型城市”向“工业生态化城市”的转变。

## 2) 民间的表达

HTY:大概04年后,各种文体活动多了起来。像“河池铜鼓山歌艺术节”(图4)、“广西南丹·丹文化旅游节”(图5)开幕式、闭幕式之类,如果要我们黑泥出节目的话,我们都很积极的。县里面一般只负责来回接送和吃住,训练、比赛基本上是没有工钱的,拿了奖金的话倒可以分一点点。在农忙时节,上面会补点钱给我们,让请人把田里的工做了。其实就算是不补钱给我们,我们也还是乐意参加政府搞的活动的。一来出去露脸了,很光荣的;二来出去混了个脸熟,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要政府帮忙,也知道去找哪些部门。



图4 演武节的竹篙龙参加2011年河池市第十二届铜鼓山歌艺术节闭幕式

Fig. 4 Bamboo Dragon Dance Performed in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12th Tonggu Folk Song Festival Held in the City of Hechi in 2011



图5 演武节的山歌拳参加2014年第二届南丹·丹文化旅游节

Fig. 5 The 2nd Nandan Culture Tourism Festival in 2014 (Folksong Boxing)

由以上口述发现,社会符号之所以能进入到国家

仪式场景中,主要是取决于国家意识到社会符号潜在的政治功用、经济价值和文化意义,以及因为社会符号帮助政府维持了地方秩序。在全国大力挖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热下,在积极发展旅游经济之时,南丹同样寻到了走向现代化的“良机”。政府认为,民间文化资源,能够在总体上增加南丹的现代性资本,于是,创造性地提出将“丹文化”作为南丹地域文化品牌进行打造,期望通过文化建设,实现从“资源型城市”向“工业生态化”<sup>[11]</sup>城市的华丽转身。而要想实现该目标,社会积极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在国家的庆典活动中,政府也积极地让社会符号在场。其实,这种“在场”还有更深的政治隐喻:通过社会的符号在国家中,能够凸显出“国泰民安、安定团结、喜庆祥和”的国家场景,并给民间创造一种“信仰自由、普天同庆、与民同乐”的盛世氛围,从而,把社会对族群的认同转化为对国家、政党和制度的认同。

笔者同时发现,社会的符号并非只是被动地坐等被国家征用,相反,社会的代表往往会积极创造机会争取被征召,有时候就算不能直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也希望能够让自己出现在国家的场域之中。在这种国家与社会双向需要和互动过程中,理想的状态应是通过社会向国家生活的介入,促成大、小传统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并引导民众对国家意志的接纳和认同<sup>[7]</sup>。于是,笔者在南丹调研中的“惊奇”发现就可以被理解了:黑泥人会带着自己的节目,费时费力地去南丹、河池甚至南宁参加由政府组织的各种表演和比赛,因为他们认为参与国家活动即意味着被承认,也意味着自己的文化获得了政府的合法性支持;而且,社会意识到,利用国家这一资源,有可能解决自身的经济增长,实现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提升地方性族群的自尊。从这一意义上看,社会其实是对仪式符号的征用,使自己出现在国家中,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对国家的征用。而且,这一策略可以预见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社会生活中被继续广泛地运用着。

## 7 结语

本文以演武活动为依托,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宏观背景中对其近100年的参与主体与主题变迁的路径选择及其运作逻辑进行了考察。通过这样历史性、过程性地诠释演武活动所映射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如何从“皇权不下县”走向“相互在场”的个案呈现,我们大致可以缩影式地认识国家力量是如何逐步向社会延伸的;社会是如何进入到国家仪式场景中的;社会对于

“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认知和感受是如何藉由仪式生活这一载体形成并发生变迁的。只是,由于受到历史文献匮乏和口述资料“破碎性、选择性记忆”的限制,笔者实际上很难从演武活动参与主体与主题的变化出发来完整地阐释出国家—社会的互动逻辑,所能做到的只是透过那些并非完整的片段性记忆和文献,去捕捉甚至“想象”演武活动这样的小事件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点滴关联。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这种从文化整体观去分析第一手田野资料的做法,对于体育人类学案例研究的空间拓展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 参考文献:

- [1] 陈奇,杨海晨,沈柳红. 一项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广西南丹拉者村“斗牛斗”运动的田野报告[J]. 体育科学,2013(2):30-37.
- [2] 邓京力.“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J]. 史学月刊,2004(12):81-88.
- [3]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0.
- [4] 高丙中. 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2-50.
- [5] 高丙中. 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J]. 社会学研究,2006(1):154-168.
- [6] 郭于华. 仪式——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的文化人类学视角[A]. 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5.
- [7] 何明,陶琳. 国家在民族民间仪式中的“出场”及效力——基于傣尼人“嘎汤帕”节个案的民族志分析[J]. 开放时代,2007(4):117-127.
- [8] 黄剑波. 乡村社区的国家在场——以一个西北村庄为例[J]. 西北民族研究,2005(1):187-193.
- [9] 李富强. 壮族村落——那善屯[A]. 翁乃群. 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C].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52.
- [10] 李志清. 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4,304.
- [11] 廖国璋. 2012年2月8日在南丹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DB/OL]. <http://www.gxnd.gov.cn/www/zwgk1/2013-11/201311-3140.html>.
- [12] 刘安.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 ——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J]. 文史哲,2009(5):162-167.
- [13] 陆群. 民间仪式中的国家在场——以湘西花垣县大龙洞村苗族接龙仪式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63-67.
- [14] 孙睿谄,陶双宾. 身体的征用——一项关于体育与现代性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2(6):125-145.
- [15] 谭华. 体育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52.
- [16] 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65-73.
- [17] 万义,杨海晨,刘凯华,等. 工具的展演与逻辑:村落女性体育活动参与行为的人类学阐释[J]. 体育科学,2014(7):23-29.
- [18] 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2.
- [19] 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02-403.
- [20] 魏源. 魏源全集(13)[M]. 长沙:岳麓书社,2012:370.
- [21] 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33,35.
- [22] 吴毅,陈顾.“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J]. 社会学研究,2012(6):146-171.
- [23] 辛西娅·阿尔坎塔拉.“治理”概念的运用与滥用[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1):105-113.
- [24] 熊迅. 仪式结构与国家认同:跨越中缅边境的傣族刀杆节[J].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2):45-50.
- [25] 徐勇. 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EB/OL]. [2015-08-24]. [http://www.chinareform.org.cn/society/manage/Report/201508/t20150825\\_232593.htm](http://www.chinareform.org.cn/society/manage/Report/201508/t20150825_232593.htm).
- [26] 杨海晨,王斌,胡小明,等. 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跨文化比较[J]. 体育科学,2012(8):3-15.
- [27] 郁建兴,吴宇. 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J]. 人文杂志,2003(4):142-148.
- [28] 张海超. 对明清白族本主庙碑文的历史人类学解读[J]. 云南社会科学,2008(4):9-13.
- [29] 朱新山. 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与组织重构[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33-47.
- [30] Susan 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 研究报告

# 体育产业“元”逻辑:运动项目

李荣日<sup>1</sup>, 叶 锦<sup>1</sup>

**摘要** 为论证运动项目是体育产业“元”逻辑,为我国体育产业健康发展敲响“固本”警钟,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比较研究等方法,从历史演进视角、文化视角、产业链视角分析运动项目与体育产业的密切关系。研究认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体育经济要素、体育经济现象、体育产业成型的内在经济程度变化均基于一定的运动项目产生、发展;运动项目文化贯穿体育产业始终;具体项目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运动项目起到了延伸其产业链的作用。据此得出运动项目是发展体育产业的根本。

**关键词** 运动项目;体育产业;元逻辑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094-07

## “Metalogic”of Sports Industry: Sports Event

LI Rongri<sup>1</sup>, YE Jin<sup>1</sup>

(1. *Research Inst. of Sport Economics, East China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o prove the metalogic of sports industry is sports events, and deliver a warning message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hain are used. It shows that: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sports economic factors, sports economic phenomenon, and the form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have roo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ports industry is deeply immersed in sports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sports, the activities themselves extend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refore, it is concluded that sports is the fundamental drive in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event; sports industry; metalogic

自国发〔2014〕46号文件出台以来,体育产业掀起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产业革命热潮,各地相继出台了体育产业相关政策,行业内、外人士争相寻求体育市场机遇,各界对体育产业的投资力度空前。而学界对体育产业的研究层出不穷,相关学者:任海,2015;邢尊明,2015;宋昱,2015;李荣日,2016;李博,2016等人分别从中国体育顶层设计、政策扩散、产业集群与集聚、体育公共产品服务外包和“供给侧改革”等角度展开研究,诸多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聚焦于如何使体育产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力量。正如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以运动项

目带动相关行业发展从而丰富体育产品市场”,并确立相关重点运动项目引导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时,鲍明晓也多次提出“做大做强项目产业才是发展体育产业的正道”。可见,运动项目在发展体育产业中的重要性。对此,本研究以“体育产业‘元’逻辑——运动项目”为命题出发,寻找体育产业发展内在规律,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 1 “元”逻辑辨析

“元”(meta)即为“超越”和“总体”,其作为前缀总是与具体的科学组合成一种更深层次的逻辑形式,比

**收稿日期:**2017-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服务外包理论下我国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研究》,项目号:12BTY027;华东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体育公共产品服务外包研究》,项目号:222201522033。

**作者简介:**李荣日(1966-),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经济与管理。

**作者单位:**1. 华东理工大学 体育经济理论研究所,上海 200237。

如元数学、元语言等。最具代表性的元研究起源于希尔伯特(D. Hilbert)的对象理论和元理论,前者指研究对象本身,即本体论;后者指研究该对象所用到的工具理论,即对对象理论的审视和反思<sup>[1]</sup>。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在逻辑学研究中提出“语言层次论”,即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前者指被提出和分析的语言,后者指认知和解释该对象语言的工具语言。根据以上学者对“对象”和“元”的分层观点可以看出元逻辑是相对于对象逻辑而言的,即元逻辑是研究对象逻辑的逻辑科学。而体育产业作为“向全社会提供体育服务产品的行业,它的价值内核是按市场方式组织的体育活动”<sup>[1]</sup>,这说明体育产业“元”逻辑存在的合理性。逻辑的本质在于寻找事物的相对关系<sup>[2]</sup>,因此,基于体育产业与其“元”逻辑的相对关系,通过已知推断未知,阐释通过“元”逻辑发展体育产业的科学性,对更为具体地总结、发现发展体育产业的“正道”具有重要意义。

## 2 历史演进视角下运动项目与体育产业“元”逻辑

历史演进过程中运动项目的发展经历了与体育产业由表及里的内在联系程度变化,基于历史演进视角从运动项目分析其体育经济要素、体育经济现象、体育产业成型,是对体育产业“元”逻辑最直观和本质的描述。

### 2.1 古代运动项目与体育经济要素分析

#### 2.1.1 古代西方运动项目经济要素

自古埃及文明时期起,人类捕猎工具的进步、生产率的提高促发了体育运动的萌生,甚者法老等贵族阶层对娱乐形式和休闲内容需求较大,导致社会上出现以奴隶和职业艺人为主体的体育表演,形式与今日的杂技表演如出一辙<sup>[3]</sup>。至新王国时期,击剑作为用于消遣的身体活动,加入当时宗教活动中的舞蹈动作颇具观赏性受到追捧<sup>[4]</sup>。可见,早期贵族阶层的体育表演首先具备经济要素。

古希腊时期,运动项目经济要素在古奥运会中尤为凸显。古奥运会最早是基于以跑、跳、投为运动形式的田径项目,后期发展成为囊括多类项目的综合性运动会,此时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一些经济要素。例如:公元前六世纪,诸多城邦以立法声明对古奥运会优胜者予以相应奖励,其中雅典奖励5000银币,斯巴达保障终身生活衣食无忧,其它城邦也提出政府扶持供养、免去公民赋税、基于终身津贴等优厚红利;发展到公元四世纪中期,仅战车项目优胜者就可获得等同

普通手工业者近四年劳动收入的橄榄油奖励<sup>[5]</sup>。此类经济奖励也激励了这一时期竞技水平快速提升,同时也使得古奥运会名声大噪<sup>[6]</sup>。综上所述,人类早期的体育运动项目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具备初级经济要素形态。

#### 2.1.2 古代中国运动项目经济要素

相比而言,诚然古代中国经济整体缺乏活力,体育只是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难以发挥经济溢出效应,但也有一些项目可看出古代运动项目的经济端倪。春秋战国时期,剑术名噪一时,铸剑、击剑、传剑、相剑等行业链条发展成为成熟的就业渠道,并带动了以剑为代表的体育用品制造的快速成型,无论是围绕国家控制的军事兵器还是用于体育娱乐表演,对剑的需求居高不下,因此剑的生产和销售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手工业系统<sup>[7]</sup>。至汉代,角抵、搏击等早期武术形式被诸侯列入“武坛”戏乐之中,成为体育娱乐表演的早期形式,权贵甚至为射箭、投壶、棋艺等娱乐项目设立专门官职。这也表明,基于运动项目形成的体育用品生产、休闲娱乐消费、体育劳务等已具备基本经济要素<sup>[8]</sup>。魏晋南北朝时期,得益于帝王和权贵参与程度较高,出现了体育娱乐能人得到提拔奖励,为体育赌博设置官职等现象<sup>[9]</sup>,体育博彩空前发达。唐代射箭、斗鸡、棋类等项目受到上层达官贵人赏识,从业艺人收获颇丰,甚者,宫廷中供养了一批专为皇帝娱乐的“角抵之徒”。商品经济繁荣的宋代,蹴鞠成为宫廷娱乐的同时广泛普及,社会上出现专门从事蹴鞠项目的职业艺人。可见,这一阶段体育博彩和竞赛表演的形式,具有鲜明的体育经济特征。此外,由蹴鞠发展而来的步打球进一步演化成一种贵族运动——捶丸,据考证,捶丸与现代高尔夫项目渊源颇深,两者都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发展条件,这也映射出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休闲方式和生活趋向<sup>[10]</sup>。至明清,镖行盛行一时,大到镖局、镖户,小到个体镖师都是体育劳务的代表之作,其走镖形式也都离不开剑术、武术、马术等项目的成熟。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古代体育已经具备了比较典型的经济要素,正是这种悠久历史文化的传承,为近代体育经济现象的产生埋下伏笔。

### 2.2 近代运动项目与体育经济现象分析

#### 2.2.1 近代西方运动项目经济现象

赛马作为英国倍受推崇的“户外运动”,发展十分迅猛,1750年,在英国的Newmarket成立了首个职业赛马俱乐部“The Jockey Club”<sup>[11]</sup>,英国运动项目的职业化和商业化从此掀开新篇章<sup>[12]</sup>。自此之后,足球、板球、拳击等运动项目争相效仿赛马的职业俱乐部模

式。1857年,英国成立世界上首个足球俱乐部“Sheffield F. C.”,此后,足球的职业化很快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职业俱乐部发展模式也随之成型<sup>[13]</sup>。英国运动项目经济现象的发展对世界体育的辐射不可小觑,伴随殖民主义扩张,英国运动项目商业化席卷全球,美国作为早期殖民地之一,18世纪末工业化初始,带动了赛马、斗鸡等民间娱乐项目在沿海工业城市初现经济现象雏形,至19世纪初职业体育兴起,1811年美国首家体育用品企业——泰勒公司成立<sup>[14]</sup>。伴随以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工业生产组织形式趋于集约化和精细化,投射到体育行业,逐渐发展了足篮排三大球等考验集体配合和娴熟技巧的团队项目。有别于欧洲的俱乐部发展模式,美国以棒球为先导的“联盟制”开启职业体育新纪元<sup>[15]</sup>,并为今后美国体育产业的辉煌奠定了重要的产业组织基础。

## 2.2.2 近代中国各阶段运动项目经济现象

相比之下,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并沦为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资本主义入侵的同时,也带动西方运动项目的传入,这也成为近代中国体育经济现象的中流砥柱。

### (1) 运动项目经济现象产生

近代在学习资本主义进程中,兵式体操项目最早被引进中国,随之又有田径、球类项目的陆续流传,这一现象首先体现在1848年进入上海租界的室内保龄球和墙手球项目,继而棒球、高尔夫、帆船等西方新兴项目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体育用品制造和销售的商业活动流行一时<sup>[16]</sup>。同时,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等经济现象产生,如1909年上海虹口娱乐场就有了高尔夫球场、足球场、网球场等<sup>[17]</sup>。西方多元运动项目的传入与发展促进了综合性赛事的举办,如1906年举办了营利性质的学校联合运动竞赛<sup>[18]</sup>。总之,此阶段体育经济现象只是作为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入侵的具体形式孕育而生。

### (2) 运动项目经济现象发展

“五四运动”后,中国近代体育的“民族意识”爆发,运动项目竞技水平的提升使得综合性运动会盛行。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期,国民政府已有五届全国运动会成功举办,且投入经费逐渐增多,规模愈增。全国运动氛围的凝聚促进了体育经济现象全面发展,以保定布云工厂为例,在1915年后其生产的标枪、铁饼和网球拍等体育用品,随着邮购业务的兴起,产品销售扩展到欧美等世界各地<sup>[19]</sup>。此时,体育竞赛表演规模空前庞大,且门票收入不菲,如1934年的华北游

泳公开赛门票供不应求<sup>[20]</sup>,1935年第六届全运会共售门票31121张<sup>[21]</sup>,运动会的火热程度窥见一斑。此外,赛马、赛狗等项目在上海盛行,借此体育博彩行业快速成型,据统计,1931年到1938年的八年期间,逸园赛狗场共盈利360万银元;上海跑马场博彩截止1939年盈利14139万元<sup>[22]</sup>。

### (3) 运动项目经济现象衰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体育经济几近崩溃。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民不聊生,无体育经济现象可言;国统区受战争影响,体育产业停滞不前,产业基础受到破坏;根据地多以群众体育的形式呈现,体育经济几近空白。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在经济复苏较好的地区出现了体育经济现象回暖,诸如在上海的篮球队受到企业出资赞助,区域篮球联赛也名噪一时,甚至远赴南洋比赛,但这些现象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体育经济无异于杯水车薪。

随着近代运动项目逐渐普及和竞技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现象纵然日趋明显,但碍于近代中国饱经沧桑,主权旁落,成长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体育经济最终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 2.3 现代运动项目与体育产业成型分析

### 2.3.1 现代西方运动项目与体育产业

人类历史步入现代,体育产业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职业体育的全面发展使得社会资本持续涌入体育产业。欧美国家作为当今职业体育发展的典范,欧冠联赛已成为全球最受热议的俱乐部赛事,高水平、多层次、大规模的竞赛表演也激发广泛的社会需求,欧洲五大联赛的门票、赞助、特许商品开发和电视转播收入都有良好的表现。美国作为篮球发源地,代表了世界篮球最高水平,其篮球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又带动了诸如体育经纪、新闻传播、体育旅游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兴起。学者鲍明晓也认为,职业体育是体育强国的核心竞争力,可见,职业体育在体育产业中得天独厚的优势,究其根源,职业体育是运动项目发展水平的体现。其一,运动项目的商业化程度是区分职业体育和非职业体育的关键因素,毕竟在门类众多的项目中达到职业体育联赛水准的只是少数,因此,推广、普及运动项目的社会化是提高其商业化程度的关键一步;其二,职业赛事彰显的是一种“品牌营销”,只有通过项目进入社会大众阶层才能提供赛事商业化的目标受众群体,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最后,职业体育的“明星效应”使得运动项目本身作为职业运动员与广大体育爱好者紧密接触的有利渠道,可见,运动项目在目前体育产业发展中尤为重要<sup>[23]</sup>。

### 2.3.2 现代中国运动项目与体育产业

中国的职业体育起步较晚。1978年之前,“举国体制”下的运动项目缺乏走向市场化的外部环境,但正是基于该体制下政府部门的统筹管理和对竞技体育的重视,实现了我国运动项目整体水平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通过运动项目竞技水平展示大国地位,也促进体育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可见,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体育事业的统筹发展为如今体育产业的快速成型奠定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福利惠及体育行业。为解决社会需求与体育供给之间日趋明显的矛盾,国家开始探索体育事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之路,1992年,“红山口会议”决定以足球为切入点开启中国职业体育改革之路。1994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正式打响,此后,围绕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展开的以职业赛事为主,以F1、网球大师赛、汇丰冠军赛等各类商业性赛事为辅的体育赛事体系初步建成;此外,诸如武术、中国象棋等传统体育项目也在摸索产业化之路<sup>[24]</sup>,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加上借鉴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无疑会指明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市场化、国际化之路,将传统项目的本土化优势转化为体育产业优势。

## 3 文化视角下运动项目与体育产业“元”逻辑

体育是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体育产业的核心产品归根到底是体育固有的文化价值<sup>[25]</sup>,而文化视角下的运动项目作为涵盖着物质、制度和精神等文化层次的独立个体,是对体育产业“元”逻辑最具深度的诠释。

### 3.1 橄榄球项目文化与体育产业

橄榄球项目起源于英国,但美国的橄榄球产业却发展成为世界单项体育运动产业的典范,据统计,2015年NFL总收入达到130亿美元,相当于NBA和NHL的收入总和,可以说,美国橄榄球产业的成功离不开其项目文化的支撑。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美国合理利用地缘文化差异性,使美式橄榄球一度成为专属美国的“国家运动”<sup>[26]</sup>,橄榄球项目文化也引领着美国体育产业。发展到今天,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美式橄榄球产业正向国际化趋势迈进,如NFL品牌形象代表“超级碗”因首次使用立体视觉环绕技术得以名声大噪,如今以30多种语言在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直播,2016年,仅在美国“超级碗”收视观众达到1.11亿,品牌价值升至5.8亿美元。在制度文化层面上,美式橄榄球联盟制管理模式,通过制定赛场内外统一的

规章制度规范联盟发展,例如:NFL联盟通过限制后卫、四分卫接触持球运动员的程度改善比赛观赏性,通过设立硬性工资帽形成联盟良性竞争等措施增加票房和收视率;此外,联盟制的限定进入原则,方便联盟统一管理的同时促使联盟成员垄断利润最大化,这也使得NFL球队迅速占领美国经济发达城市,成为该城市橄榄球产业的垄断经营者,这种“特许经营”模式造就了NFL每支球队的价值达到14.3亿美元<sup>[27]</sup>。上升到精神文化层次而言,橄榄球项目强烈的团队协作和个人英雄主义并重的精神突出了其身体对抗与技战术合理运用的文化特征,恰好适应了当下知识密集型社会背景下大众精神压力上升的社会状态,加上美国早期的去殖民化心态和创新精神孕育了橄榄球产业特有的文化姿态,也催生了橄榄球项目丰富的无形资产,产生超额利益。NFL被誉为美国最成功的体育品牌,其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将自身品牌上升到国家文化高度,例如,当有国家军队出征时,NFL会通过赛场上旗帜和标语等向军队致敬,感恩节观看橄榄球赛也成为美国人民的传统,NFL球员身影几乎遍布每一个社区参加慈善公益事业,这使得美国橄榄球项目文化展示亲民形象的同时培育了大量消费群体。此外,橄榄球作为美国人的本土精神寄托,正向着跨界和时尚等多元素方向演绎,如“超级碗”比赛中影视娱乐明星云集,橄榄球相关的休闲服饰装备等引领世界潮流,打造消费群体体验式的个性化服务等。

### 3.2 马拉松项目文化与体育产业

马拉松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其作为一项具有历史渊源和广泛影响力的运动项目,在历史传承过程中就携带了厚重的人类文化因素。我国的马拉松产业在世界项目产业中颇具影响力,2015年,其市场规模达到300亿元,据专家预测,2020年将达到千亿级别,究其根本,乃是项目文化的鼎力支持。物质文化层面上,马拉松被定义为“顽强拼搏、磨练意志”的兼具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功能的特色运动项目,在我国的综合影响力日益明显,随之而来的是马拉松赛事的爆发式增长,据中国田径协会统计,国内举办的马拉松赛事由2010年的13场上升到2015年的134场。此外,由于项目本身参与的门槛适中,对参与者的经济条件和技术储备无严苛要求,使得其作为全民体育参与的普适性项目拥有广泛受众群体,如2015年中国马拉松赛事已吸引世界范围内150万人次参加。加上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带来居民消费意识和消费结构的变革,即大众对运动项目的参与感、社交性、休闲性等多重元素的需求特征,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我国马拉松产业市场潜力巨

大。就制度文化层次而言,我国“46号文件”放开赛事审批权等利好政策,使得社会资本大量涌入马拉松项目,同时带动了城市旅游、商业服务、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综合发展,各地政府也将马拉松赛事作为城市对外宣传名片、城市营销的有效途径并提供优良的制度环境。发展至今,为满足参与群体的个性化需求,马拉松项目融入多元化的文化创意元素,例如:因比赛环境差异设置了沙滩、森林、山地等多样化马拉松赛事,因参与人群不同衍生出亲子马拉松、情侣马拉松、团队马拉松等形式。而城市马拉松作为诠释健康生活理念、提高全民体育意识、宣传城市经济文化成果的纽带,已形成包容式的“城市马拉松文化”<sup>[28]</sup>,如2011年重庆马拉松“宣传和保护母亲河”的赛事定位涵盖了社会和谐的文化理念,增加社会大众认可程度的同时拉动马拉松产业消费需求。此外,马拉松项目提倡全民参与的发展理念为其产业化运作培育大量消费群体。再者,我国以马拉松赛事为主,马拉松博览会、马拉松文化节等配套活动为辅的运营模式日渐成熟,使得马拉松项目的经济“溢出效应”明显,带动了诸如体育用品、传媒、运动APP、技能培训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初步形成完善的马拉松产业链。

### 3.3 足球项目文化与体育产业

现代足球又称文化足球,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悠久的历史渊源。英格兰足球的“长传冲吊”表现出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德国“日耳曼战车”足球文化彰显了其严谨坚韧的日耳曼民族精神,而创意、洒脱的南美足球风格则是拉美浪漫主义文化的凸显,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厚重的足球文化传统为足球产业的发展奠定历史基础,而足球产业化反过来也对足球项目本身产生重大影响<sup>[29]</sup>,这也可以解释足球产业发达的欧洲在项目竞技水平上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另外,足球项目的球迷文化作为看台文化的主体使得该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稳固的球迷消费群体,加上体育传媒对足球的长期青睐和不断挖掘,为足球项目成为产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世界第一运动打下物质文化基础。制度文化层面以具有典型性的欧洲足球为例,其足球产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俱乐部小联盟”的管理模式,不同于美国的联盟统一管理制,欧洲职业联盟采用升降级制度建立开放式垄断壁垒,增加比赛竞争性的同时避免职业联盟在商业竞争中承担过高的震荡成本,职业联盟对俱乐部数量、工资限额、收入分配的宽泛管理使得外借资本持续涌入,这也让各个俱乐部成为足球产业体系的赢家,出现曼城、皇马等豪门俱乐部,除此之外,欧洲足球的青训

体系、经纪体系、市场准入等制度的不断完善,促进了欧洲足球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引领世界潮流<sup>[30]</sup>。相比之下中国的足球产业,虽然足协改革使得其市场化信号逐步显现,也出现了广州恒大等现象级俱乐部,但碍于足球文化基础薄弱,竞技水平有限,看似火热的中超联赛,大部分俱乐部仍属于亏损状态,足球产业整体属于导入期。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占据中国体育产业总产值四成的足球产业拥有广阔的商业潜力。精神文化层面上,对国家而言,如前所述,成熟的发展理念和深厚的民族文化让足球项目成为国家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对于大众而言,足球项目所倡导的团结奋进精神契合人类价值理念,促使大众对足球的信仰和凝聚力高居不下,驱动大众消费观念,足球项目创意产品层出不穷,足球IP(Intellectual property)开发了衍生品价值。综合以上文化因素,造就了世界范围内足球项目在体育总产值中占据43%比重的宏伟图景。

## 4 产业链视角下体育产业“元”逻辑——运动项目

产业链既可以看作相互关联的产业组成的产业系统,也可以看成产业内部上中下游环节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sup>[31]</sup>。本研究按照传统的运动项目分类方法,以时下热门的冰雪项目、户外项目和球类项目为例,基于产业链视角剖析运动项目作为体育产业“链核”和“结点”的必然性。

### 4.1 冰雪项目产业链

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气候、场地、装备、人员等因素的制约,一直以小众形式呈现,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冰雪运动产业的发展,但北京2022年冬奥会热潮袭来之际,冰雪运动成为“新宠”,无疑以冰雪项目为核心的产业链条将迅速发展<sup>[32]</sup>。首先,位于冰雪运动上游产业的竞赛表演业呈现井喷式增长,据统计,“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黑龙江省将举办71场冰雪赛事,其中竞技赛事32项,大众赛事39项”<sup>[33]</sup>,竞赛表演的增多必然带动冰雪文化氛围的形成,大众对冰雪产业需求增长,促进了冰雪运动健身休闲业和技能培训业等服务行业的综合发展,开拓我国体育产业消费新领域。其次,位于冰雪运动产业链中间环节的体育传媒业,是连接体育内容和消费者的中心环节,体育传媒在符合大众的媒介消费取向的同时,需要引导大众对体育文化的深入认识<sup>[34]</sup>,而两者是通过运动项目实现的。通过分析冰雪运动产业链内在要素发现,体育传媒业与冰雪运动互为依托,其一,体育

传媒以滑雪、滑冰等项目为传播内容吸引消费者,放大冰雪赛事 IP 的影响力和持续性,以获得经济效益。其二,冰雪运动项目借助体育传媒得以迅速推广和普及,使得小众的、专业的冰雪项目成为大众娱乐项目,为下游衍生产业提供优越的市场发展环境。诸如冰雪运动用品制造业、冰雪旅游、体育保险等冰雪项目的相关衍生产业,基于上中游产业链条的有序运行,得到良好的延伸发展空间。随着冰雪项目受众群体扩张、冰雪项目用品需求增长、考验相关部门基础设施供给能力的同时拉动社会新一轮就业。此外,冰雪运动作为与旅游产业关联最为密切的项目之一,孕育了冰雪艺术景观、冰雪节庆会展等冰雪文化产业,通过不断挖掘冰雪项目经济要素,丰富冰雪产业内涵,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75% 的滑雪运动参与者属于旅游体验型消费的现象<sup>[35]</sup>。

#### 4.2 户外项目产业链

户外项目依托于自然环境,是通过互动产生的非生产性人体活动<sup>[36]</sup>。户外运动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大众闲暇时间和健康意识的同步增长,因此,大众需求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需求是依附于运动项目之上的,主要包括健步跑、骑行、登山等。首先,位于户外项目产业链的上游产业——竞赛表演业,是户外运动产业的核心流量入口,而赛事 IP 则是决定体育产业链条延伸空间的重中之重。例如,时下流行的 Color Run(彩色跑)、Mud Run(泥泞跑)和 Music Run(爱乐跑)等都是基于跑步项目发展起来的新兴户外竞赛表演,其良好发展态势还得益于运营公司积极开发赛事 IP 价值,赋予其时尚和智慧元素。此外,户外项目的发展也带动了户外健身休闲和户外技能培训等服务行业的兴起,逐渐形成大众户外消费需求,提高户外项目产业链的综合产出能力。以马拉松项目为例,围绕马拉松项目展开的体育传媒成为景观体育中实现城市营销的重要途径,加上户外项目信息网站、服务平台、跑步 APP 等新兴传播媒介的诞生,导致以运动项目为核心的文化传播体系逐渐完善,使得户外运动的中游产业——体育传媒业具有深厚的商业潜力。最后,户外运动的多元性决定了其产业链中衍生产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其中一些项目的探险性让体育保险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并且户外运动的“参与式体验”使得体育旅游业蓬勃发展,消费者参与其中,进而带动了餐饮、零售、交通运输行业的链条式发展。其中,下游产业受链条辐射较为显著的是户外用品行业,据中国户外品牌联盟(COA)统计,2015 年我国户外用品市场规模达到 454 亿元,同比增长 12.5%,COA 预测市

场潜在空间超过 680 亿元。

#### 4.3 球类项目产业链

球类项目是目前产业链发展比较完善的项目类别之一,其“产业化”模式比较成熟,消费对象的广泛性也决定了其发展空间的可拓展性。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当大部分消费者由士绅贵族阶层扩展到中产阶级资本家,甚至延伸到劳工阶层之时,大众消费就此成型”<sup>[37]</sup>。首先,围绕球类运动展开的体育竞赛表演层出不穷,这有利于球类项目的体育人口由观赏型转变成参与型,促进以球类项目为代表的体育产业转型升级。此外,近年来高尔夫、网球、斯诺克等“贵族运动”也逐渐步入大众阶层,围绕此类运动展开的技能培训、场馆运营、体育健身行业也积极引导大众体育消费,因此,球类项目产业链中,上游产业市场体系发展较为完善。其次,球类运动受众的广泛性使得其备受体育传媒业青睐,以球类项目为载体的体育营销就此展开,从 1994 年 CCTV 以 1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全国足球甲 A 联赛转播权到体奥动力“80 亿(人民币)全媒体版权费”,“腾讯以 5 亿美元签下 NBA 转播权并开启付费直播模式”等现象可见球类项目在传媒行业中拥有众多拥趸,运动项目的受欢迎程度上升也使得比赛转播权收入急速增长,刺激消费的同时使得球类项目产业链运行更加流畅。下游产业中球类项目的成熟丰富了“体育+”模式,诸如体育彩票中基于篮球和足球等项目胜负结果而设立的球类竞彩、足球世界杯带动举办城市体育旅游热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基于以上三类运动项目的产业链分析可以看出,运动项目作为“链核”和“结点”贯穿体育产业链条始终,因此项目产业是延伸体育产业链条、发展体育产业的根本。

## 5 结语

本文从历史演进视角研究发现,运动项目在古代蕴含丰富经济要素,近代体育经济现象日益明显,体育产业到现代逐渐成型。在文化三分法视角下,涵盖物质、制度、精神等文化层次的相关项目全方位推动项目产业的产生发展。从产业链构建、发展的视角,本文以冰雪、户外、球类等运动项目为例分析发现,产业链的不断拓展、优化、延伸离不开运动项目的普及和发展。因此,运动项目作为体育产业的“元”逻辑,无疑是我国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根本所在,必须实现体育产业与运动项目整体水平的双击式增长,脱离运动项目发展体育产业有违历史的、经济的发展规律。

## 参考文献:

- [1] 鲍明晓. 做大做强项目产业才是发展体育产业的正道[J]. 环球体育市场, 2009(2): 13.
- [2] 昂扬. 论逻辑的本质及逻辑的方法[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1): 87-93.
- [3] 王润斌, 熊晓正, 杨麟. 古代西方球类文化探微[J]. 体育科学, 2010(2): 83-91.
- [4] 韩春冬, 丁玉兰. 击剑运动的起源[J]. 体育文史, 1998(1): 21-24.
- [5] 潘建林. 现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竞技职业化的比较[J]. 四川体育科学, 1994(2): 10-14.
- [6] 陈支越, 曾贤军, 宋跃然. 古希腊的社会经济与古奥运会[J]. 体育科技(广西), 2001(3): 8-11.
- [7] 赵国庆. 中华剑术文化与当今剑术套路演练之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3(2): 100-103.
- [8] 易剑东. 中国古代体育经济纵论[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0(1): 1-6.
- [9] 熊志冲. 娱乐文化[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0: 30-178.
- [10] 崔乐泉. 中国古代球类活动演进与捶丸起源研究——兼具考古学资料分析[J]. 体育科学, 2016(7): 89-96.
- [11] 姜同仁, 宋旭, 刘玉. 欧美日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经验与启示[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3(2): 19-24.
- [12] Fort R.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sports differences (?) [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4): 431-455.
- [13] Sloane P J. The economics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the football club as a utility maximiser [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1(2): 121-146.
- [14] 王庆伟, 王庆锋. 西方职业体育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J]. 体育与科学, 2006(1): 42-51.
- [15] 郑芳. 美国职业体育制度的起源, 演化和创新——对中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的启示[J]. 体育科学, 2007(2): 79-85.
- [16] 易剑东. 中国近代体育经济发展阶段论[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1997(36): 7-13.
- [17] 罗时铭. 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124-126.
- [18] 张兆才.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J]. 体育科学, 2005(5): 73-75.
- [19] 毕学翠, 郑晓鸿. 近代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5(12): 107-111.
- [20] 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北京体育文史第四辑[M]. 北京体育运动委员会, 1989: 146-158.
- [21] 李显国. 我国近代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发展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4(4): 175-178.
- [22] 黄红媛, 叶锦, 刘宁宁, 等. 运动项目与体育经济: 历史轨迹[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6(6): 34-38; 64.
- [23] Mutter F, Pawlowski T. Role models in sports - Can success in professional sports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amateur sport participation? [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4(3): 324-336.
- [24] 鲍明晓. 职业体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路径[J]. 体育科研, 2010(3): 24-33.
- [25] 侯迎锋. 刍议体育产业发展的“元问题”[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6(3): 215-217.
- [26] 韩晓斌, 郭五一. 英式橄榄球与英国文化[J]. 中国体育科技, 2014(3): 35-39.
- [27] Yuksel M, McDonald M A, Milne G R, et al. The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ntasy football and NFL consumption: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onsumer coping mechanisms [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6.
- [28] 祝良, 黄亚玲. 城市马拉松赛文化特点的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4(9): 25-28.
- [29] 卢元镇. 世纪之交体育运动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 体育科学, 2000(3): 1-6.
- [30] 夏正清, 周强. 欧足联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经营的治理及启示[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6(2): 12-19.
- [31] 冯华, 温岳中. 产业链视角下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1(5): 82-86.
- [32] [35] 张瑞林. 基于北京冬奥会视域下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研究[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16(1): 1-4.
- [33] 新华网. 黑龙江将举办 71 项冰雪赛事为冬奥会“热身” [EB/OL]. [http://www.hlj.xinhuanet.com/news/2016-07/21/c\\_135528652.htm](http://www.hlj.xinhuanet.com/news/2016-07/21/c_135528652.htm).
- [34] 黄若涛. 体育传媒业的产业特性与产业发展研究[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9(3): 292-294.
- [36] 傅道华, 孙晓伟. 论当代体育运动发展趋势[J]. 体育文化导刊, 2009(4): 91-95.
- [37] Baudrillard J, Levin C.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M]. Telos Press Publishing, 1981.

● 研究报告

# 我国大学体育困境与出路探析

黄美蓉<sup>1</sup>

**摘要** 大学体育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存在许多问题,本研究根据哈贝马斯确定一个社会系统陷入危机的三个表现,认为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社会认同发生了质变、社会系统对于大学体育的控制功能失效、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大学体育陷入了一定的困境。大学生体育生活化要求大学体育以“大学生”为本,以“生活”为价值取向。它以体育与大学生生活的融合性、大学生体育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大学生体育参与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大学生体育活动的时常性为基本特征。因此,大学生体育生活化能够提高社会系统对于大学体育的控制效率,促进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社会认同,确立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引领大学体育走出当前的困境。

**关键词** 社会系统危机理论;大学体育组织原则;社会系统控制功能;大学体育社会认同;大学体育困境;大学生体育生活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101-07

## Research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Approaches of University Sports

HUANG Meirong<sup>1</sup>

(1.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sports have many problems macroscopically and microscopically. According to Habermas' three manifestation of whether a social system is in crisis, the study thinks that social members' social identity of university sports has made qualitative changes, the control function of social system to university sports is disabled, th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of university sports have been destroyed, university sports has been plunged into crisis. University students' mixing sports into life requires university sports to be student-oriented and life-oriented, which bears four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students' life, diversity of college students' sports values, diversity and consciousnes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regularity of their sports activities. Sports' mixing into life improve social system's controlling over university sports, promote the identity of social members to university sports, establish the organization principle of university sports, and lead university sports out of the crisis.

**Key words** social system crisis theory; university sports organization principle; social system control function; university sports social identity; university sports difficulties; university students' mixing sports into life

大学体育就是大学公共体育,也叫“高校体育”、“高等学校体育”或者“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它包括体育课程教学、体育学术活动、体育组织与管理、校园体育文化活动、体育训练与竞赛和社区体育等。它是以太学生为主体,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促进学生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目标,以大学校园为

活动空间,组织实施的所有体育及相关活动。<sup>[1]</sup>应该说,我国大学体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生成了体育心理学、体育教育学、运动生理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医学等等众多的交叉学科;获得了体育硕士、体育博士学位授予权;体育研究方法、

收稿日期:2017-03-20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促进大学生体育生活化路径研究》,项目号:T-c/2015/005;中国矿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一般项目《体育生活化视域下大学体育瑜伽课程教学模式研究》,项目号:2015YB42。

作者简介:黄美蓉(1980-),女,南京人,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与教育理论研究。

作者单位:1. 中国矿业大学 体育学院,徐州 221116。

教学方法、训练方法得到了多元综合使用;涌现了大量体育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创新技术研究成果等等。然而,大学体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学体育宏观问题有体育人文精神的缺失、健康人格培养的淡漠、个性化体育发展的忽视、和谐化体育环境的薄弱、多元化体育交往的狭隘。微观层面的问题包括:体育教育目标不清晰、体育教学模式无突破、体育教学内容单调散乱、体育考核形式限制着教学过程、体育教学设计比较薄弱。<sup>[2]</sup>2016年,关于大学体育教育的研究结果仍然说明了上面问题的存在。<sup>[3]</sup>

大学体育已经陷入了困境,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大学体育问题原因,迫切地寻觅摆脱困境的途径——大学生体育生活化。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与体育生活化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特性的关系。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目的是要实现追求运动的本真价值,促进大学生能力的全域发展。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客观对象是终身体育意识、行为习惯和大学生健康体育生活方式,是要在大学内部通过一定教育方式,使得大学生在校园里形成科学体育生活方式,将终身体育意识转化为生活理念,养成体育行为习惯,实现体育自觉。大学生体育生活化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管理问题,而教育问题和管理问题也属于大文化的范畴。因此,本研究认为,广义的大学生体育生活化是体育在大学生生活中自觉的过程和结果,也是大学生主体性活动的过程与结果。狭义的大学生体育生活化是体育锻炼行为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自觉的过程与结果。大学生体育生活化是大学生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使大学生在自觉参与中提升自己的思想、认知、道德和能力。大学生体育生活化对于处于困境之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体育有其迫切性。

## 1 我国大学体育的困境描述

无论宏观还是微观上,大学体育都存在不少问题。根据哈贝马斯衡量一个社会系统是否陷入危机的三个标准,即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和组织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sup>[4]</sup>,本研究分析了我国大学体育系统的困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第二,社会系统对于大学体育的控制功能失效;第三,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 1.1 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

社会系统有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通过改变系统因素或者理想价值来

维系自身的存在。但正是在这个改变过程中,社会成员对系统的认同也存在模糊性的可能<sup>[5]</sup>。大学体育一直以来都在困境的边缘徘徊。毛振明认为:“目前大学体育已经出现学科建设中大学公体方向迷失、高校体育教学水平低下等等许多危险的征兆,甚至出现取消大学体育课的声音。”<sup>[6]</sup>一方面,一批学者和专家极力强调大学体育对于大学生个体、对于整个民族的未来和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及必要性;<sup>[7]</sup>另一方面,大众对体育功能认识上存在狭隘性和片面性,教育决策者、教育管理者和大学生由于对大学体育形成的狭隘意识或片面认识,无法体会体验和感悟到体育运动的魅力,无法知晓大学体育对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的重要性。<sup>[8]</sup>在中国的教育界中也出现“为何在中小学教了那么多年体育后还要在大学教体育”的疑问。<sup>[9]</sup>人们仍然对一些问题存在质疑,如:大学的体育是不是知识和学问,是否适合列入大学的课程;现在已有的大学体育的状态不良;大学体育有没有阐明与中小学的体育的区别和意义;社会上的体育是否可以取代大学体育的功能等等,<sup>[10]</sup>对此,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出现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认同发生了质变。他们既不能厘清大学体育产生问题的根源,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大学体育的各种改变是向好的方面转型,还是走向大学体育崩溃的边缘?社会成员无从断定。当代大学体育发展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大学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制造出各种新的“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

### 1.2 社会系统对于大学体育的控制功能失效

哈贝马斯指出,危机过程是从无法解决的控制问题中产生出来的,首先要认同危机,而后是控制问题,两者紧密相关。主体一般都没有意识到控制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可能会对主体意识产生特殊影响,甚至危及社会整合。倘若社会系统不能在某一可能性范围内解决其控制问题,就必然会出现危机<sup>[11]</sup>。尽管整个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在更迭和变换,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

近十二年来,大学体育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管理改革、法制化建设的呼声日渐强烈,相关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如,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各省市为了配合《全民健身计

划纲要》也纷纷颁布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全民健身条例》等。在此背景下，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逐渐开展起来。但由于整个社会对于大学体育的控制功能失效，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一方面，仍然有一大部分大学生没有科学常规地参加身体锻炼。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不足三成，知识和能力都很强的当代大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的习惯，没有形成科学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sup>[12]</sup>。80.4%的大学生没有锻炼习惯，男生比例为67.1%，女生比例是89%。<sup>[13]</sup>另一方面，对全国大学生身体素质状况调查发现，从1996到2014连续18年都呈现下降趋势。相比于国外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我国大生在身高、体重、身体机能以及形态等方面的指标已经明显下降。<sup>[14]</sup>2006《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显示：超肥胖学生比例迅速增加，城市中超重与肥胖的男生已近1/4，视力不良率已超2/3，大学生的视力不良率高达83%<sup>[15]</sup>。另外，我国解放军2005年在大学进行招兵体检时发现，仅有35%左右的大学生身体状况是合格的。<sup>[16]</sup>北大两周军训期间，2011级近3500名学生累计看病超过6000人次，特别是第一周，晕倒者众多。王登峰说，学校体育面临严峻的挑战。大学生体质下滑的趋势还在继续<sup>[17]</sup>。政府规定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表明要改变大学体育现状，并不是某一主体能完成得了的。

### 1.3 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哈贝马斯说：“高度抽象出来组织原则是在巨大的进化动力中表现出来的自然特性，这些特性标志着不同阶段上新的发展水平。任何一种系统都由组织原则所决定，这种组织原则为系统的改变提供了抽象的可能性。”<sup>[18]</sup>大学生体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而组织原则一旦破坏，危机便由此产生。以大学体育课程原则为例。现代性体育在大学体育课程领域表现为对课程的本质、课程结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规律等等的探求，它以学科逻辑为中心，追求的是大学体育课程与体育技术传授、增强体质方式的内在的学科机理。这些大学体育课程的“组织原则”远离大学生生活实际，其实施的结果，不仅无益于大学生体育的发展，无益于大学生身体锻炼行为的促进，最终也会使大学体育课程“组织原则”自身遭到破坏。

一些体育专家和学者坚持，大学生参与身体运动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指导，大学体育课的根本任

务是要学习掌握体育知识、技术、技能和发展体能。大学体育课程必须以理性的方式贯彻“健康第一”的理念，其基本功能要以大学生的一定身体认知为基础。大学体育课程必须根据大学生的已有认知水平，科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合理安排锻炼负荷，从而使学生能够掌握正确的运动技术的原理和方法。体育课程模式要对学生身体进行规训与教化。体育课程具有系统性、程式化、精细化、规格化，有严密的学科逻辑。课程目标的制定要严格分层与设定，以教材、课堂和教师为中心。另一些专家坚持，要把学生身体拓展、情感体验和潜能挖掘置于人的视域之内，提出了盛极一时的“快乐体育”思想，把“娱乐”、“锻炼”和“陶冶”当作大学体育课的内涵文化；倡导学生学习过程中自己对知识技能的建构性，强调体育知识技能学习的非线性、社会性和情境性；主张要尊重大学生个体的多种需求，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强调大学要为大学生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条件；倡导探究式学习、合作式学习和研究性学习，重视课程的隐性价值；呼唤生命教育观，倡导尊重个性、尊重自由意志、尊重选择；构建“三自主”、“俱乐部制”等诸多类型课程模式，以课程“感性”取代课程的理性，将课程的结构、教学内容的密度、运动价值阈、运动负荷的监控、技能的掌握置于以“兴趣”为核心的运动参与之外。还有一些体育专家和学者寻求折中的办法，这一折中使得体育工作者在教学实践中，在“是让学生掌握体育知识、发展技术、技能和体能”与“保持学生体育兴趣、满足学生体育需要，促进学生体育动机与快乐体育”之间纠结和徘徊，简单地把“学生自主选择体育项目或内容”理解为就是体现“以人为本”，使体育课程陷入“乌托邦”的迷雾之中。

时至今日，大学体育研究，在体育课程理性认识这样原则性的问题上，在所谓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如何取舍这样的至关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还有待探索。对大学体育这些新旧问题不能给予科学合理的解释是目前大学体育改革中问题的具体反映，大学体育教师也茫然不知所措。

大学体育要走出上述困境，就要使得社会成员包括大学教师和大学生自己对大学体育的认同正确且达成一致；使得社会各相关系统对于大学体育这一社会子系统的控制功能得以发挥；就要确立科学的、可执行的大学体育系统的组织原则。而要实现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一致认同、社会系统对大学体育的有效控制和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的确立。大学体育要以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为导向和宗旨。

## 2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内涵与特征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本质是什么?它又表现为哪些基本特征?为什么要倡导大学生体育生活化?在大学体育受到多方面质疑,且在实践中出现无所适从现象的时候,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探讨大学体育生活化的内涵和特征,不失为大学体育走出困境之策。

### 2.1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内涵

#### 2.1.1 以“生活”为价值取向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强调的是要使体育活动方式、体育基本知识和理念、体育价值为大学生所喜爱、所了解、所认同、所掌握、所运用,并自觉地融入学习和生活中去,成为大学生的体育行为指南。特别是在大学体育困境的现实下,必须使体育价值内化为大学生所固有的价值观念,使体育锻炼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方式,使体育行为成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因为体育生活化始终关注的是大学生的精神需求和生活需求,为大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选择科学理性的体育观、生命观和体育价值观提供基本的参照系和平台,其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体育意识和体育精神的传播,培养人、塑造人,启发人们作为历史主体的自觉意识,自觉地进行体育行为,从而把体育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此:

一是大学体育要求去课程化。大学体育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体育课这么单薄。大学体育课程的作用和意义在于要为大学生提供与生活相关的实现运动价值的知识及技能。大学体育课程体系要紧紧围绕大学生的学习、娱乐、交往、就业等生活目标,为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而设置。进而使得大学体育课程所包含的大学体育知识技能、大学体育精神内涵、大学体育道德内涵、大学体育文化内涵都能够延伸和渗透到大学生生活的每个角落。使得大学生做到课内和课外都有体育、校内和校外都有体育。

二是大学体育生活化要求去专业化。体育的专业化主要是指像用对待自然界和物的眼光来审视和对待具有高度人文性的体育。这里的“专业化”表现为“只有专业”、“只要专业”、“只是专业”。一方面,我们要去掉“专业”仅仅在竞技体育领域和学校体育专业领域的认知和行为。普通大学生认为体育课程与他们的专业学习无直接关系;而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即使不锻炼他们的身体素质也是人生的巅峰时段,被强调为强身健体的体育相比较他们的专业学习是处于次要地位的。他们认为体育比赛是大学生运动员的事,体育学

习是体育专业大学生的事。这样的认知是对体育知识技能和体育专业的混淆。况且,运动技战术和体育知识在一时期都是通行的,且是公认最合理的,无论竞技还是健身,学练同样的运动技术,有部分学生可能当选专业运动员或者体育专业的学生。但是更多的学生在规范学习和适度操练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为实现体育本真价值。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任何社会都不能用运动员的标准要求所有普通大学生。我们要培养的是在现实时空中生活的普通大学生。任何时代的体育都要向人们传递一定的价值理想、体育知识和技能,但理想不是空想,更不是脱离现实生活。普通大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地学习、运用、践行体育知识、技术、技能的过程中,强身健体、发展个性、完善人格。这一过程正是普及体育知识和体育技战术、渗透体育意识的过程。

#### 2.1.2 坚持以“大学生”为本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主张学生体育情感、认知、理智、情绪和行为的统一,强调“大学生”是“主体”,以“大学生能力的全域发展”为目的。因此,除了智力以外,情绪、态度、价值均是大学体育教育应当关注的重要领域。大学生体育生活化要求按照“人本主义”教育理念,体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心理需求结合起来。为此:

一是要求大学体育去商业化。大学体育商业化表现在体育比赛、体育场馆的商业化,甚至是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商业化。大学体育本身是非营利性的。大学生体育生活化要求大学体育去商业化,一切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而不是以是否盈利为旨归。特别是对于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不能剥夺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应该享有的体育权力。张发强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体育事业应当是具有产业性的社会主义公益事业。其中,体育工作的基本点和立足点是体育事业的公益性。”韩丹说:“体育具有公益性是可以的,但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具有准公益性。”<sup>[19]</sup>这里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体育。而大学是公益性教育机构,大学体育则必须去商业化,大学的体育设施应该为大学中的所有人提供服务。

二是要求大学体育去工具化。当下,大学体育无形中成了工具,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事实上,大学生无形中也成了工具。在各项比赛中,大学代表队的名次成了学校的名次,成了学校出名和招生宣传的工具,因而学生运动员也成为比赛和训练的工具,为此,不顾及学业对学生进行全面全天候的训练,甚至滥用药物。学

校内各种比赛也注重成绩,忽视比赛本身的育人价值。大学生自己把体育作为修学分的工具。只有去工具化,真正体现体育本真价值,才能实现大学生体育生活化。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要求大学体育弘扬体育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主要回答人类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的问题,它是要给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丰硕物质成就一种善和美的价值引导。价值理性的终极指向是人本身。体育应有的价值理性不仅单纯表现为收益最大化,还表现在体育方式的合理性,如公平的分配多种体育成果和体育效益综合化等等。大学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大学生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讲求的“健康人生”、“健康向上”的精神;是否实现了体育讲求的公平竞争、团队合作等行为品质;是否实现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大学生的潜能,以争取精神与身体的共同健康,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改变个人的命运;是否实现了勇气、耐力、意志力等的提升。体育的价值理性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它内化为大学生心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追求大学生的人格完善。

## 2.2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基本特征

### 2.2.1 大学生体育活动的时常性

体育成为大学生的一种日常性的生活行为。如前所述,体育众多功能的实现是需要一段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日常性表现为在大学生生活中,经常性地发生体育行为,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 2.2.2 大学生体育参与的自主性

大学生发自内心的自觉,不受各种外在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够自主选择体育锻炼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形式,可以自主选择体育锻炼的伙伴,根据需要及时得到科学的体育指导等等。

### 2.2.3 大学生体育价值观念的多元性

体育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大学生对体育的态度和情感,并进而影响大学生的体育行为。由于当今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呈现多元性,大学生体育兴趣的多样化,体育条件的差异性,使大学生对于体育价值观念呈现多元性特征,如对个体劳动、娱乐、健康和生命的人本价值,对体育生活化的社会发展价值和学科发展价值的认识,等等,往往呈现较大的差异。

### 2.2.4 体育与大学生生活的融合性

大学生的体育行为形成并融入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体育成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体育与生活的相融,不仅包括比赛活动、体育锻炼活动,还包括大学生的体育观赏行为、体育消费行为等。

以上特征都是大学生体育生活化要求的大学生个体与整体的体育锻炼行为自觉的具体体现。大学生个体体育锻炼行为自觉和整体体育锻炼行为自觉对大学生个体与整体品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大学生体育生活化可以通过提升大学生个体和整体品质而提升大学的品质。因为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以“大学生”为本和以“生活”为价值取向的内涵与大学教育的本质是相一致的。说到底,大学教育就是要为满足大学生身心发展和能力素质发展,创设良好的、动态适宜的、健康的成长环境。因此,大学要充分体现以“大学生”为本的教育原则,才可能真正把握大学的本质内涵。大学理想的终极目的是“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服务”,大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又好又快、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3 大学体育走出困境:以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为导向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在要求大学体育坚持以生活为价值取向,要求大学体育坚持以大学生生为本,修正和确立了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正是以大学体育与大学生生活的融合性,大学生体育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大学生体育参与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和大学生体育活动的时常性为基本特征的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促进大学生和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认同。最后,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的修正和确立及大学生和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认同将提高社会系统对于大学体育的控制效率。从而使大学生体育生活化成为大学体育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 3.1 确立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

#### 3.1.1 以生活为价值取向原则的确立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明确提出自己关于大学体育的具体要求,并且以这些要求为大学体育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大学体育必须时刻和始终以大学生生活为价值取向,而不是以课程和专业为价值取向,因此要构建以大学生生活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从而使大学体育渗透到体育课程之外。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大学生接受正规的教学指导的过程,也是大学生在课余进行体育活动和体育学习,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得到指导的过程。正确区分大学体育技能和大学体育专业关系的过程,不仅是消除只有体育专业和高水

平运动员等部分学生自觉把体育融入生活的过程,即不是部分学生,而是全体学生自觉把体育融入生活的过程,也是要求大学生经常或者是日常的进行体育活动,不是隔三差五、间断地从事体育活动的过程。

### 3.3.2 以提升大学生素质为本原则的确立

大学体育必须时刻和始终坚持以大学生生活为本,要求大学体育去商业化和去工具化。大学体育去商业化的过程,不仅是大学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免费获得体育教育和指导,也是要求大学如同运作大学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一样去运作大学的体育场馆设施,满足大学生接受体育教育和进行体育学习的硬件和软件需要的过程。大学体育去工具化的过程,不仅是消除当今大学体育和大学生无形中成为工具的这一现实,让体育本真价值得以真正体现的过程,也是如是否实现了体育讲求的“健康人生”、“健康向上”的精神;是否实现了体育讲求的公平竞争、团队合作等行为品质;是否实现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大学生的潜能以争取精神世界的健康自由的精神内涵,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改变个人的命运;是否实现了勇气、耐力、意志力等提升的指向是人本身的体育价值理性得到弘扬的过程。体育的价值理性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它内化为大学生心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追求大学生的人格完善。因此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确立了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

## 3.2 促进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社会认同

### 3.2.1 基本特征促进认同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过程是大学生及社会成员理想的体育价值观念重塑的过程。在体育活动过程中,大学生不受各种外在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够自主选择体育锻炼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形式,可以自主选择体育锻炼的伙伴,能够根据需要及时得到科学的体育指导等,大学生能自觉进行体育比赛活动、体育锻炼活动、体育观赏行为、体育消费行为等。这不仅能够促进大学生自发自觉地进行体育活动,也能促进大学生体育活动的时常性的实现,即当体育行为如同吃饭和睡觉一样成为大学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的时候,体育的各种显性和隐形的功能,个体劳动、娱乐、健康和生命的个体人本价值,社会发展价值和学科发展价值将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得以充分的展现。

### 3.2.2 积极情感促进认同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过程是大学生能力、智力提升的过程,是完善人格和优良性格形成的过程,更是对大学生运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间接和直接的促进过

程。体育生活化是培养和激发大学生坚忍不拔、坚持不懈、吃苦耐劳、刻苦钻研等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学术品质的过程;大学生体育生活化是大学教育品质提升的过程,是大学生正义的品质塑造作用的体现,是对大学生传统美德和社会责任感塑造的过程。大学生对体育产生积极的态度和情感,这种积极的态度和情感即是形成新的、正确的、积极的社会认同的基础。

因此大学生体育多内涵的、自觉的、经常的、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后,大学体育的价值会多元的在大学生生活中呈现,大学生对体育的态度和情感会发生积极的改变,即提高了大学生对大学体育的认同。大学生及社会成员坚信大学体育这一社会子系统是能够获得良性的转型的。

## 3.3 提高社会系统对于大学体育的控制效率

### 3.3.1 组织原则确立提升控制效率

大学生体育生活化通过确定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和提升大学生和社会成员对大学的认同来提高控制效率。从外在来讲,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确立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大学体育的组织原则,在大学体育变革中表现出大学体育的自然特性。大学生体育生活化限定了大学体育这一社会子系统要获得大学生和社会成员认同的必要条件,确定了大学体育这一社会子系统的活动范围,确立了大学体育这一社会子系统要获得积极发展所依赖的机制。大学体育以大学生生活为价值取向和以大学生为中心的组织原则一旦确立,所有的活动都要以这个原则为出发点,在整个大学体育的管理、运作、检查、考核等等的过程,都是对这个标准进行衡量的过程。一旦这个原则的确立,有助于所有活动的终极指向的确立。从内部来讲,无论是大学体育的政治化问题、专业化问题、科技化等等的问题,都会在大学生的整个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社会认同提高的过程中得到缓解或者消除,大学体育将进入良性发展的过程。

### 3.3.2 社会认同提升控制效率

在大学体育组织原则确立的同时,在大学体育的社会认同得到进一步提高的过程中,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满足大学生追求生命质量的需要,实现大学生有尊严的活着。所以,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推进是大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可以说,大学生体育能否生活化影响着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品质的发展与提升。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品质都可以在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因而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过程就是大学文化、大学

精神、大学生品质提升的过程。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生品质提升有助于与大学体育这一子系统相关的其他子系统对大学体育这一子系统的控制效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以大学生体育生活化来引领大学体育的发展,为大学体育确立了系统的组织原则,能够促进大学生和社会成员对大学体育的社会认同,可以提高社会系统对于大学体育的控制效率,是我国大学体育走出困境摆的必由之路。

## 参考文献:

- [1] 徐伟. 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D].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 2013:18.
- [2] 高健,颜天民. 我国大学体育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0(6):41-44.
- [3] 李强. 对我国大学体育教育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 湖北体育科技, 2016(2):161-164.
- [4] [5] 郑晓松. 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 2007:95.
- [6] 直击全国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EB/OL]. [2012-04-27]. [http://www.chinaispo.com.cn/news/fitness/41646\\_2.html](http://www.chinaispo.com.cn/news/fitness/41646_2.html).
- [7] [21]黄美蓉. 高等教育价值视角下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

化必要性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5(5):33-37,58.

- [8] 徐伟. 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D].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 2013:9-10.
- [9] [10] 毛振明. 论大学体育教育的危机与改革[J]. 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学报, 1999(1):13-16.
- [11]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M]. 刘北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9.
- [12] 费加明. 影响当代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形成的因素分析[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0(7):43-45.
- [13] 慈鑫. 体育生活化尚未影响中国“宅一代”[N]. 中国青年报, 2010-5-17.
- [14] [16] 李强. 对我国大学体育教育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 湖北体育科技, 2016(2):161-164.
- [15] 国家体育总局. 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报告[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7.
- [17] 北大 3500 名学生军训两周看病者超 6000 人次[EB/OL]. [2012-09-17]. <http://edu.163.com/12/0917/09/8BJJFIRU00294JD9.html>.
- [18]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M]. 刘北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9.
- [19] 张发强. “鱼形图”和“网络化”一对体育工作的一点认识[J]. 体育文化导刊, 2002(3):4-6.

(上接第 75 页)

- [7] [10] 韩勇. 学校体育伤害的法律责任与风险防范[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7, 69.
- [8] 李永刚,谷平. 校园足球开展中运动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认定探析[J]. 运动, 2015(17):3-4.
- [9] 黄璐. 社会足球伤害案件的运动技术合规性审查[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6(3):46-51.
- [11] [13][18] 程啸. 侵权责任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106-107, 479, 106.
- [12] [14] 李钧. 论过错原则下的体育损害责任[J]. 体育科学, 2015(1):68-79.
- [15] 黄文煌. 阿奎流斯法——大陆法系侵权法的罗马法基础[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168-169.
- [16] 赵毅. 学校无过错,为何仍需赔偿损失——“长宁小学生体育课手球伤害案”判决评析[J]. 教学与管理, 2013(17):10-12.

- [17] 杜维超. 干预规范及其功能模型——基于中美两个案例的研究[J]. 南海学刊, 2015(2):54-62.
- [19] 李自然. 中国厌讼传统再认识[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94-98.
- [20] 刘可. 学校为何怕开体育课[N]. 北京日报, 2014-04-08, (3).
- [21] 黄璐. 运动技术考量在体育伤害责任认定中的重要性——基于上海新泾公园体育伤害案的分析[J]. 体育成人教育学报, 2015(3):16-20.
- [22] 陈华荣,王家宏. 美国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分析[J]. 体育学刊, 2009(6):31-35.
- [23] 张薇,李嘉,公兵. 校园足球系列调研报道之二:保险! 保险! 校园足球的软肋[J]. 校园足球, 2015(9):25-26.

● 研究报告

#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体育用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考

张燕中<sup>1</sup>, 李江<sup>2</sup>, 王静<sup>1</sup>

**摘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现“中国制造 2025”提供了具体思路和策略支撑。本文对“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体育用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研究,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是伴随着体育全球化以及中国制造业的背景衍生出来的,存在着价格低、数量大、处于产业链低端、品牌创新与特色不足、消费者忠诚度低等弊端。破局之策在于从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供给要素入手,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推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去产能、降成本;解决好“僵尸企业”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最大的阻碍就是解决由此而过剩的人力资源的出路,要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为先导,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补短板;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多管齐下去产能,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去杠杆。

**关键词** 品牌影响力;制造业资本;产业结构;贸易竞争力;补短板;去杠杆

**中图分类号:**G8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108-06

## O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de in China 2025”

ZHANG Yanzhong<sup>1</sup>, LI Jiang<sup>2</sup>, WANG Jing<sup>1</sup>

(1. Department of P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 fei 230036, China; 2. JI lin Sport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rovides concrete ideas and strategic support to realize “Made in China 2025”. In this paper, we have studie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de in China 2025”. The study shows that China’s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emerg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orts globalization and derived from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re are various shortcomings such as low prices, large quantities, be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lack of brand innovation and specialties and low consumer loyalty. The tactics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is to set out from the supply elements such as labor forces, capital, technologies and systems, strengthen the supply of high—quality goods and services, reduce ineffective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expand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to urge China’s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cut overcapacities and reduce cos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vercapacity brought by the “zombie enterprises”, the biggest obstacle is to seek outlets for the surplus human resources and urge China’s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lengthen the short stave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put. We should take multi—pronged measures through changing the growth pattern to cut overcapacities and promote the deleveraging of th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brand influence; manufacturing capit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de competitiveness; lengthening the short stave; delver—age

“中国制造 2025”是伴随着第四次工业化浪潮而衍生出来的战略部署,是新时期国家对工业化的

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划,更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具体措施。中国制造的基本方针是“创新驱动、质

收稿日期:2017-04-02

作者简介:张燕中(1969—),男,安徽宿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

作者单位:1. 安徽农业大学 体育部,合肥 230036; 2. 吉林体育学院,长春 130022。

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制造 2025”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破除体制和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在体育用品制造领域,中国凭借着劳动力和资源低廉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该行业的主流市场。进而成为“世界工厂”和体育用品制造大国。然而凭借数量扩张、低附加值、低效益和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此,从现行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结构和我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来看迫切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1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总体逻辑与状况

### 1.1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联系日益密切,各国之间按照要素禀赋进行生产分工成为趋势,世界成为一个大工厂,在不同的商品之间形成了全球性的产业链,各国之间生产优势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生产结构,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落实产业结构升级,利用资源数量庞大、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良好、廉价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形成了诸如制造业、高铁、互联网等优势产业,这些产业不仅对我国的 GDP 的推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外汇增长以及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体育产业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一项产业同样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难题。

### 1.2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产业结构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体制增效升级的主战场<sup>[1]</sup>。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也随之发展壮大,2008 年北京奥运会对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使我国最终成为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中心。其中,运动鞋、运动器材等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中最具规模,占据了总数的近 75%。在总体制造业中,我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业以其强有力的竞争力和活力成为其中的拳头产业,为我国增加出口、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以及促进就业做出了极大地贡献。

从出口量上来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量已经占据世界出口总量的半壁江山。20 世纪末,中国已经拥有全球 65% 以上的体育用品生产份额<sup>[2]</sup>。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使我国的体育产品出口总额在这一年有了一个小飞跃,即便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

的体育产业制造业出口量依然增速稳健。到 2011 年为止,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量达到了 162.52 亿美元,自 2011 年起,我国体育产品出口量增速开始逐渐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趋势。这与部分市场容量的饱和、经济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冲击以及目标国家出台了相关的贸易保护政策有关。出口产业结构是衡量一国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该项指标的分析可以了解该国三大产业的发展状况、优势产业以及现有的对外贸易政策。从 2003 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总额来看,竞赛性自行车出口额 8.66 亿美元,占体育用品出口总额的 23.11%,位居榜首<sup>[3]</sup>。我国充足的橡胶及塑料资源也使得以该项资源导向型的产品优势明显。有关滑雪服装、用具等方面的体育产品生产数量较低,除了资源等方面的因素外,还可能与滑雪在我国的需求不高,大多数以租赁为主有关,因此没有生产动力。从生产出口体育用品的地域上来看,主要集中在东部较发达地区,占全国生产体育产品的 97% 以上(像是广州、福建等地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优势,占据沿海主要港口,进出口交通非常方便;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区凭借其区域经济优势,进行大量的生产;而山东、河北等地区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较低的生产成本使其成为体育产品的生产大户)。体育用品生产的结构也反映了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而我国的体育产品出口活动涉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贸易伙伴仍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

### 1.3 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

我国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所占地位一直以来比较稳定,由于比较优势明显,表现出价格低廉、数量庞大等特点,这些优势既可以保证我国资源流动和人员就业之外,也保证了我国的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量。

贸易竞争力(Trade Competition),即各国在出口某类商品的相对竞争优势,体育用品的出口量在体育用品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程度。我国体育用品比较优势明显,首先,我国拥有丰富的资源,石油、钢铁、煤炭、水力、生物资源等储备丰富,种类多样;其次,我国现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目前仍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以北方部分省份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为代表,虽然面临能源开发进入萎缩期、急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对工业制造业有很大的依赖,因此对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包容性较大。我国素有“世界工厂”的称号,多个省份形成了大规模的生产园区,形成了集群生产的现象,由于这些体育用品制造商的聚集,从而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了规模效应,这使得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成本进一步下降,

加上我国对出口方的补贴、退税等促进政策,使得我国的体育用品在国际上更具有价格优势,仅福建就囊括了安踏、361°、匹克、鸿星尔克、特步、乔丹这六大运动品牌,而李宁及双星则被福建的邻居广东抢占。除此之外,我国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我国可以以较低廉的成本开展大规模的人工生产,人力资源作为制造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源源不断的职位需求在解决了大量就业的同时,大量的劳动力也为我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创造了生机。另外,人民币汇率的下降也使我国的出口商品在国际上更具有价格优势和竞争力。

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规模总体稳定,但仍然存在出口商品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球类、器材机械等商品的竞争力相比之下不足,雪上运动的器材生产更是呈现出数量较低的现状。促进各种体育用品的出口份额保持均衡,能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保证各种体育用品的生产量除了能促进出口,增加外汇之外,还能提高我国体育产品的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形成产业链条,有利于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全民化进程。

#### 1.4 我国体育用品品牌影响力

我国的体育用品品牌繁多,其中,品牌影响力较大的有李宁(LI-NING)、安踏(ANTA)、特步(XTEP)、361°以及乔丹等品牌,这些品牌的生产重点均是以服装为主,但随着品牌数量的增加和国外体育品牌进入市场,他们形成了多样的品牌特色。李宁成立于1990年,是由著名运动员李宁创办,是我国最为成功的体育用品之一,多次成为各大体育赛事的指定品牌,而李宁的经营范围也早不止于运动服的生产设计,鞋类、服装类以及运动器械等都有了稳定的受众,发展势头良好。安踏在国内各大城市之中建立了最全面的国内销售网络。361°是亚奥理事会全球官方赞助商品牌,除了在国内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外,同时出口亚、非、欧各大洲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虽然我国有大量的体育品牌,但在国内最受欢迎的国产品牌的优势不明显,耐克NIKE(美国)、阿迪达斯(德国)、匡威(美国)、锐步(英国)销量位居前列,在国内深受欢迎,但这些品牌仅仅只有设计是在品牌所在地完成,主要的生产制造流程仍然在国内进行,并出口到世界各地。本土品牌普遍存在品牌创新不足、难以形成品牌特色的问题,同时,由于国内品牌的受众定位不高,难以进入高端体育品牌的行列,这因此造成了我国的体育用品品牌的消费者忠诚度相对较低,很少会出现有新款出现需要排队哄抢的现象。除了传统的销售模式之外,随着互联网电商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

的产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互联网销售,体育用品也不例外,但由于大宗商品的进出口贸易现如今难以实现通过互联网电商解决,因此,网上销售主要集中在品牌的官方网站或依托第三方网站上。

## 2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问题的形成机制

### 2.1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劳动力、技术

我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由于我国的义务教育水平和程度仍有待提高,地区之间教育水平差异过大,劳动力相对廉价,这为我国发展制造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凭借此项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驻。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自1979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将人口出生率由60—70年代的30%左右控制到1996年以来的低于16%，“二孩”政策为我国人口增长带来的效果并不明显,我国开始面临老龄化社会的问题,适龄劳动力的数量有所下降,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文化水平较高的就业者走向社会,他们对工作环境、薪资水平、职业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让工业从业者的工资持续上涨,涨幅早已超过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增长,这让大量的生产企业觉得劳动力越来越“贵”了。我国还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许多涉及民生的日常用品物价增加迅速,备受热议的房地产业和股市疯涨,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推高了从业者的工资,此外,我国高级技术从业者的数量较为短缺,买方市场使他们享有更多的选择和更高的工资期待,加之从业者对生活质量和工作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使部分从业者的薪酬水涨船高,企业为了适应人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始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现状,但部分体育用品制造业从业者的生产率不能及时提高,从而使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不再明显。

在我国除了本土的体育用品品牌制造之外,还有大量的贴牌加工生产,像耐克、阿迪达斯等体育品牌在国内均有生产加工工厂,这些工厂大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由于该品牌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等环节等均在海外,贴牌生产作为一条生产链的最底层,使这些工厂只能以相较于最终成品售价低很多的价格出口。我们的体育用品出口外贸业目前主要以贴牌生产为主,国产体育品牌纵横国际市场的只是少数,这会影响到我国体育品牌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和对国际市场需求的敏感度。此外,运费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资源价格上涨等现实条件的限

制,使贴牌生产的工厂处境愈发艰难。除了贴牌生产之外,我国还有很多生产仿冒体育用品的外贸工厂,这些体育用品虽然质量劣质但是价格低廉,除了在国内有很大的销路,还以各种渠道流向其他欠发达国家。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因此国外的体育用品品牌开始打击限制这种现象(即使是国内自主建立的体育品牌也可能会有模仿现象),这种限制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企业的经营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对生产者的生产能力、生产技术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使企业竭尽所能的提高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能力,像体育用品生产制造业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数工作的技术含量不高,因此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是降低成本最好的办法。

国内体育用品品牌在国际市场上提高自身的品牌影响力,面临着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的问题,企业需要提高创新意识,尤其需要大量专业的、具有创新能力的技术人员来建设体育用品品牌文化,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提高国产体育用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虽然过多的贴牌生产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不利,但不可否认的是,贴牌生产工厂促进了我国的出口事业的发展,解决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就业,同时为我国的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不能将贴牌生产的企业全盘否定。但当前阶段,重视体育用品出口企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生产的能力才是当务之急。

## 2.2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资本、制度

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速度高于世界水平,这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养老压力和医疗压力,老龄化的加剧使步入老年的人口比例增多,我国的储蓄率上升,消费量会下降,从而最终影响投资水平。资金作为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旦得不到跟进,将影响企业的投融资问题,体育用品出口企业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将影响企业的生产数量和质量,这些问题将可能会影响“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的品牌形象,从而对整个体育产品出口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除了老龄化问题对投资的影响之外,由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面临价格虚高的状况,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似乎奏效不大,自古以来中国人以“房”为“家”,房子是安全、稳定的象征,而房价的上涨让越来越多的人以买房为目标而非其他类型的投资,这就使各大企业的融资更加困难,有的企业管理者也可能选择投身房地产事业而非努力创业。当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处于“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因素的叠加效应所造成的发展困局之中,这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最难以解决的系统性障碍因素<sup>[4]</sup>。“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使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的生存现状更加困难,加之我国面临的产能过剩、资产短缺的问题使制造商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商品的买方市场使其价格难以有所提升,从而进一步缩短了利润空间。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制造业的萎缩会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水平,并最终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提升,融资更加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生产,我国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利用低廉的土地煤矿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和税收减免等,保证了大量的生产得以进行,最终导致现今的产能过剩局面,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贷款利率和增加政府的投资没有实现持续显著的效果,为了促进制造业的发展进程,我国还进口了大量的高端机械设备和核心部件,去生产较为低级的如鞋子、衣服、运动器具等初级产品的产能,这大大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并将“中国制造”的企业定位在生产链条的底层。我国体育产品制造业核心生产能力较差,而这种低端的、缺乏创新性的制造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差,难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产能过剩影响了许多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产品的销路,这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了巨大风险。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长期依赖政府补贴和救助,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如果任其发展,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动荡<sup>[5]</sup>。毫无疑问,削减这类“僵尸企业”的数量将会缓解“产能过剩”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利用效率,但是这类“僵尸企业”以改革开放初期由政府投资补助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为主,这类企业一旦出现大量的倒闭现象,将对国有资产造成不利的影晌,同时造成大量工人的失业,而这类工人往往在其他行业难以实现就业,这对社会的稳定会造成不利的影晌。但如果任由这些“僵尸企业”发展下去,国家又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因此,促进体育产品的出口数量,提高海外需求量能够帮助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帮助“僵尸企业”的产品“走出去”。这就需要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之助力下,最终实现提高体育用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此外,将目光投向欠发达国家,将过剩的产能引入欠发达地区,通过并构重组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

## 3 以供给侧结构改革推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策略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使我国政府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插手较多,宏观经济调控能更有效地解决

很多问题,但也使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下降。其实,中国语境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虽然发力点是供给侧,但是其着力点却是结构性改革;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主基调,但政府职能转变却是基本前提<sup>[6]</sup>。政府对市场经济保持适当的干预,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放松对各大企业的过分管制,使我国的市场经济更具有活力,以实现“放活微观经济”的结果。

### 3.1 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推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去产能、降成本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得到国家的资助,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开始发展起来,企业生产数量的提升超过了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业出现了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产能过剩使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的话语权,体育用品制造业成本的不断提高使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越来越低。无论是社会福利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投入(比如“增加政府投资”、“增加养老保险”等政策的实施)往往更加容易落实,而去产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消灭“僵尸企业”。但这些僵尸企业的倒闭往往会使政府前期投入无法收回、低技能劳动力的员工大量失业、形成大量资产泡沫。然而过多的“僵尸企业”的过剩生产会使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的产品销售受阻。《人民日报》在2016年这样评价“僵尸企业”：“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让僵尸入土为安,腾出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政府去产能的本质是最终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以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从而使这些竞争力较差的企业减少产出或者退出市场,抑或是被其他企业收购。政府通过调整资源的配置将资源集中到经营状况良好的体育产品制造企业里去,促使生产者和工厂主根据市场规律进行产业内结构的调整。政府除了通过政策来鼓励企业之间的充足竞争之外,还应该利用市场出清规律,将原来补贴产能过剩的企业转为补贴消费者和生产的商品,一方面促进进出口事业的推进,另一方面促进这些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促进体育用品出口商之间信息链的发展更新,完善体育用品出口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实现信息的高效传播和流通,实现信息的共享,从而增强体育用品出口企业应对体育用品市场变化和挑战的能力。

我国体育用品生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优势逐渐降低,成本的上升和价格迫于市场压力难以提升使体育用品生产商的利润进一步压缩。降低成本,增加利润首先是要去库存,缓解市场产品数量过多,增加卖方对价格的话语权,减少企业的破产,防止恶性竞争的出现,鼓励合并企业,减少市场上的体育用

品生产企业的数量,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数量的减少能使国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并给予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减缓这些优质体育用品生产商的压力。我国的同类企业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经常会出现互相竞争,互相压价的情况,无视市场规律进行价格竞争,最终造成两败俱伤或将另一个质量更优质的企业挤出市场,这样的竞争经常会带来使用劣质原材料生产以取得的竞争优势的情况,因此,国家应该规范体育用品生产商的行业规范,建立更健全的体育用品出口竞争秩序,鼓励正当竞争,保持企业的竞争性和市场的活力,遏制恶性竞争。尽快建立产品的出口检测系统,及时帮助各类体育用品企业和各级政府部门准确了解并掌握国际市场变化,防范和减少贸易纠纷,并加快在战略领域和贸易摩擦较多的国家建立双边技术磋商协调机制,加强双方在技术标准法规和评定程序等方面的交流和互信,争取更多相互认可的技术标准<sup>[7]</sup>。为体育用品生产提供质量保障,防止体育用品生产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保证体育用品生产商的质量,将“僵尸企业”挤出,而防止他们通过价格战的方式占领市场。除了人力成本上升之外,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同样面临着资源价格的上升,由于近几年的过度开采和对环境的过度利用,造成我国的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同时,土地价格的攀升使体育用品制造商的进入壁垒越来越高,控制体育用品制造商的数量可以降低资源的价格,将更多优质的资源集中到优秀的企业之中,从而达到降低体育用品生产产品成本的目的。

### 3.3 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为先导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补短板

要解决好“僵尸企业”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最大的阻碍就是解决过剩的人力资源的出路问题,工资是人力资源的价格,不同的工种对应不同的工作价值。在体育用品制造业中,对应的人力资本以工人和技术人员为主,而倒闭这些企业势必会使“去库存”成为解雇员工或者拖欠薪资的理由,为了弥补这一影响,企业应选取更具有竞争、技术能力更强的员工作为雇员,提高生产能力。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新兴行业面临着缺乏人才和劳动者的现象,政府应投入在这些企业之中,开发更多的用人岗位,解决这些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除此之外,我国的居民消费能力如今略显薄弱,而且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消费穿搭攻略盛行,人们对运动品牌的服装鞋帽的消费热情降低,尤其是对国有体育用品品牌的产品,很少有消费者会追求最新一季的李宁或安踏的新品,而各大健身房的兴起也使大家对国产体育器具的需求减少,这使得体育用品的消费需求更加不容乐观。为了促进居民的消费需

求,国家通过补贴工资、增加居民的生活福利、降低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加以刺激,从而缓解“库存过剩”的状况,还能提高居民的生活条件。但应注意调控的范围,防止此项政策加剧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我国各大知名体育用品生产商应该重视品牌的定位,努力建设自己的品牌文化和品牌特色,适当减少生产,扭转“买方市场”的不利局面,从而提高价格,实现更多的获利。

### 3.4 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多管齐下去产能,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去杠杆

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政策使我国的传统行业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完成,我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和房地产行业增长的拐点的到来,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已不能适应我国转型的需要,反而使我国的杠杆率持续上升,资金大量沉积在低层产业,面临着无法收回沉淀成本的尴尬局面。同时,居民的贷款率越来越高,看似繁华的经济现状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泡沫,尤其房地产行业隐患最大。以杠杆率不断攀升为特征的旧增长模式拒绝出清,形成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和国有企业三大资金黑洞<sup>[8]</sup>。通过加印货币的方式实现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去杠杆效应会加剧我国的通货膨胀,由于曾经过度增发货币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消除,因此现阶段并不适合此种方式。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削减政府对“僵尸企业”的投资来实现,这一政策可以将配置资源的权利交给市场,提高经济效率。从本质来看,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供需失衡是造成高杠杆的原因之一,产能过剩所引起的债务规模的上升成为主要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信息显示,“2014年我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已经上升到了217.3%”<sup>[9]</sup>。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05年在我国从事体育用品制造的企业就已经超过了5000家”<sup>[10]</sup>。2011年开始,过去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创新滞后所暴露的弊端开始显现,由于无序竞争和产能过剩引发了“关店的潮流”。有数据显示,“仅在2010年我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关店数量就已经超过了1000家”<sup>[11]</sup>。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品的大量积压从表面上看是需求不足,但是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因此就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效应消化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 4 结语

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过去单凭数量扩张、低附加值、低效益和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为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转变发展方式,建立新的产业结构尤为重要。笔者认为,解决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价格低、数量大、处于产业链低端、品牌创新与特色不足、消费者忠诚度低等弊端的破局之策在于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供给要素入手,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以推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去产能、降成本。另外,解决好“僵尸企业”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最大的阻碍就是解决过剩的人力资源的出路。要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为先导,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补短板;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多管齐下去产能,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去杠杆。

### 参考文献:

- [1] 工信部.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N].中国工业报,2015-05-26.
- [2] 丁海勇,李有强.美国“以课程为中心”的概念体育理论及其发展[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6):26.
- [3] 席玉宝,刘应,金涛.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状况分析[J].体育科学,2005(12):22-27.
- [4] 张杰,金岳.“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破解思路[J].江苏社会科学,2016(1):75-82.
- [5] 楚明钦.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程度的国际比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6(1):132-140.
- [6] 刘志彪.中国语境下供给侧结构改革:核心问题和重点任务[J].东南学术,2016(4):28-36.
- [7] 范增强.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制约因素[J].经济研究,2005(9):32-38.
- [8] 任泽平,冯贇.供给侧改革去杠杆的现状、应对、风险与投资机会[J].发展研究,2016(3):8-13.
- [9] 王宇,杨婷.我国高杠杆的成因及其治理[J].南方金融,2016(1):5-9.
- [10] 侯树民,张艾丽.双星从名牌经营到经营名牌[N].中国国门时报,2004-12-06.
- [11] 吴建堂.“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下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6(5):55-61.

● 研究报告

# 我国体育旅游人才的需求特征、定位与支撑体系

褚 贝<sup>1</sup>, 陈 刚<sup>2</sup>

**摘要** 体育旅游是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大力发展体育旅游,对于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推动体育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对我国体育旅游人才的需求特征、定位与支撑体系进行研究。认为:人力资源是体育旅游获得发展的首要因素;体育旅游人才目前存在量的短缺、质的匮乏、结构失调和来源短缺等问题;发展体育旅游的策略在于明确体育旅游人才的特征和范畴,通过建立人才预测体系,构建人才规划体系,健全人才开发体系,完善人才激励体系,设计人才流动体系,构建体育旅游人才支撑体系,保障体育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 体育资源供给;体育服务;体育资源;区域配置;体育旅游产品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7)03-0114-07

## On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Positioning and Supporting System of Sports Tourism Talents in China

CHU Bei<sup>1</sup>, CHEN Gang<sup>2</sup>

(1. *lecturer of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Hangzhou 311231, China*; 2. *Sports Bureau of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Sport tourism is an emerging industrial form deeply integrat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sports industry. Strong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tour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ourism product system, expand the tourist consumption space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nationwide fitness and universal heal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is paper, we have studied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positioning and support system of sport talent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by making comprehensive use of documents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study shows that human resources are the primary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tourism,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sport tourism talents include shortage in quantity, low quality, structural disorder and shortage of sources. The key point of the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of sport tourism is to clearly def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tegories of sport tourism talents, establish the talent forecasting system and the talent planning system, improve the talent development system and the talent incentive system, design the talent flow system and establish the sport tourism talent support system to ensur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sport resource supply; sport services; sports resources; regional allocation; sport tourism products

“人才的定义为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且对于整个社会进行贡献的人,属于整个人力资源里面整体的能力与素养都较强的高级劳动者。人才实际上是推动整个经济社会不断进步

的首要资源。”<sup>[1]</sup>所谓体育旅游人才的定义为具备了相应的体育旅游方面的专业知识或是相应的技术能力,从事体育旅游经营管理、体育旅游服务等相关工作岗位,对体育旅游业发展做出一定贡献的从业者。2015

收稿日期:2017-03-26

作者简介:褚 贝(1972-),太原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旅游人力资源管理、酒店管理。

作者单位:1.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杭州 311231;2. 江苏省体育局,南京 210029。

年,国家体育产业总产出为1.7万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8%<sup>[2]</sup>。而美国体育产业是美国GDP发展中最稳定的支柱之一,常年稳居GDP总量的3%左右。“我国体育旅游整体约占旅游业年产值的大约5%,在一些发达国家,体育旅游所创造的价值大约占旅游总收入的25%”。<sup>[3]</sup>可见,体育旅游在中国发展尚不成熟。与传统旅游产品相比,体育旅游产品没有淡旺季,具有多次重复性体验性,市场利润率高,成长空间大,面临重大战略机遇。想要抓住这个机遇,在各项资源因素中,人力资源无疑是第一位的。体育旅游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等,都影响着这个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此,探究体育旅游人才的支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 1 体育旅游将成新兴的旅游产业,旅游人才的储备、支撑与保障将成为发展关键

为了进一步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7号)和《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16〕85号),2016年12月,国家旅游局与体育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体育旅游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作了细致的规划与部署。该《意见》里面提出:“体育实际上是整个旅游行业发展的第一大资源,而与此同时旅游则是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第一大推力;事实上体育旅游产业属于旅游与体育两大产业紧密结合的全新产物,其将体育运动当作中心,将现场观摩、参加体验等当作主体形式,将适应健康娱乐与旅游休闲当作目的,为社会公众供应相应的产品服务的行为,具体关涉到健身休闲、竞赛表演、设施制造等产业;积极发展这一产业有利于拓展旅游产品种类、扩大旅游消费市场、促进社会公众健身、带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全方位发展”<sup>[4]</sup>。

《意见》指出:“未来的发展目标,即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发展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大致构建起架构科学、种类齐备、功能健全的体育旅游产业与产品机制。截止2020年底,国内要新建起100个有重大影响力的体育旅游产业的目的地,100家国家级的产业示范基地,100项产业精品项目,100条产业精品路线,100家有着良好知名度与竞争能力的企业和品牌,游客总人数要超过10亿人次,占到整个

旅游产业总体游客数目15%,产业消费总体规模超过1万亿元”<sup>[5]</sup>。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国内游、出境游等多样化的旅游路线大热,世界旅游与旅行理事会(WTTC)预计中国将在近10年内成为第二大旅游与旅行经济强国。为了适应各种消费者的需求,随之诞生了多种如文化游、美食游、穷游、体育游等不同主题的旅游路线。体育旅游是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幅员辽阔,地貌特征和气候环境多种多样,不同的省份拥有着不同的传统体育项目和文化特色,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旅游当中,传统的流于形式的“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通过参与到当地特色的体育运动中来成为了解当地文化最快捷、有趣的方式。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地理优势,西班牙大力发展斗牛、足球、水上项目、潜水等体育旅游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旅游业成为其支柱产业;法国、瑞士等西北欧国家建立了众多知名的滑雪场,成为众多发烧友心目中的滑雪胜地;泰国的骑大象项目成为了泰国旅游中最有吸引力的代表项目。

我国的体育旅游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难以满足现如今巨大的需求量,传统的由学校培养的人才供给模式,无论从质和量上都无法满足社会对体育旅游快速增长的需求。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体育旅游产业,各地建起了数量众多的滑雪场,有些滑雪场甚至成为了该地旅游项目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该地旅游业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众多问题,像是教练的数量供不应求或质量参差不齐长期得不到解决,此外,专业的救援人员和指导人员数量稀少,大多数滑雪场缺乏专业的救援措施,这使近年来因滑雪而导致的人员伤亡事件频出。而沿海地区大力发展的水上运动项目大部分停留在体验式阶段,热门旅游景点由于相关从业人员的数量匮乏,经常面临长时间排队的情况。目前而言,我国的体育旅游人才十分匮乏,仅仅依靠学校的培养很难填补缺口,而且我国旅游存在明显的淡季和旺季,因此,为了解决旺季的游客拥堵现象而大量的雇佣相关人员并不现实,这只会使相关体育旅游项目的价格水涨船高,削弱游客对体育旅游的热情。

## 2 我国体育旅游人才的需求特征、定位与发展趋向

### 2.1 特殊性、专业性与复合多元化是体育旅游人才需求的定位

《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体育产业的从业人口要达到600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体育商学院院长易剑东教授根据经验和数据推测,2016年中国从事体育产业的人口不到430万,未来五年还要增加170万人,中国体育产业人口在数量上有着巨大缺口<sup>[6]</sup>。根据对江苏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旅游局、各大旅行社、体育旅游景点及消费者进行的一项有关体育旅游人才需求调查发现,目前体育旅游人才存在量的短缺、质的匮乏、结构失调和来源短缺的问题。所谓体育旅游产业,实际上属于旅游与体育两类产业进行全方位密切结合的新的产物,由于是两种产业相结合的产物,所需人才的素质要求相对较综合,其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有一定的通用素质。总体而言,体育旅游行业仍然是旅游产业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具有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的通用的素质,体育旅游是提供面对面服务的行业,在组织、经营、服务的过程中,不但要和客户打交道,还要和其他环节上的供应商、同行等打交道,因此需要具备良好的礼仪修养、较强的服务意识、人际沟通能力、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一定的人文底蕴,能以自己的特征来展现体育的理念与吸引力。体育旅游专业不是两个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需要相关人员对所从事的体育专业有深刻的理解和热情,并拥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能将自身对该学科的理解向他人表达出来,这就需要较强的综合素质。

第二,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体育旅游专业涉及到大量的相关体育项目的教学和展示,所谓体育旅游人才必须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在滑雪、攀岩、徒步旅行、水上运动、航空运动上都有较高的专业辅导和专业救援能力,从业人员的专业性不仅影响到客户的消费体验,还会影响到客户的人身安全,因此,除了基本的体育知识的掌握和专业能力的培养之外,体育旅游人才还需要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基本的医疗救援能力,需要掌握体育旅游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解决相关问题的基本能力、良好的临场反应能力、掌握一定体育运动有关的理论、技能和安全防护

手段。

第三,复合型多元化人才。体育旅游具有隶属于体育行业和旅游行业的双重属性,要求具备体育学科和旅游学科2个(或2个以上)专业(或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这对能力的要求更为全面。体育旅游人才数量缺乏,而且仅靠学校的培养难以获取相关的经验,因此,可以鼓励其他相关行业的优秀人才转入到体育旅游行业中来,丰富体育旅游行业的人才类型和素质,加强体育旅游与文化、教育、健康、养老、农业、水利、林业、通用航空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体育旅游行业的发展。

### 2.2 我国体育旅游的人才的划分依据与构成范畴

体育旅游人才是发展体育旅游业的重要支撑,《意见》指出,发展体育旅游的重点任务有以下五点,“引导健身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构建赛事活动旅游市场;培育体育旅游市场主体;提高产业装备制造能力;强化产业配套设施投入与建设”<sup>[7]</sup>。《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于人才所进行了类型划分。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人才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中,“人才具体分成了六种类型,即:党政、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高技能、农村实用和社会工作等类型的人才”<sup>[8]</sup>。体育旅游的产业是一种体育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商品化综合服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总体供给不足、产品结构单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体制机制不顺等问题。行业内对体育旅游的深度研究比较缺乏,产品供给结构性短缺,尚未实现旅游和体育的高度融合,难以有效满足广大消费者在体育旅游方面的需求。

体育旅游人才肩负着促进休闲健身旅游行业发展、促进当地的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和建设、促进完善当地的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等重任。根据“人才规划纲要”的部署,体育人才主要分布在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社会工作以及高技能工种之中,所涉及的工作类型比较广泛,作为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工作在与游客接触第一线的人才质量。这些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能力直接影响着当地体育旅游行业的形象建设,其主要来源现如今仍然以学校培养为主。2006年底,全国共有旅游院校1313所,其中高校574所,中等职业学校739所;在校生57万人,其中高校27万人,中等职业学校30万人<sup>[6]</sup>。而在这些高校中,早期只有4所大学开设了体育旅游相关的专业,虽然后期也有部分综合性的高校或者体育类院校

开设了相关的专业,但专业设置主要集中在本科生阶段,很少有相关研究类的专业出现,而且存在着招生数量较少的现象。2013年,我国的体育旅游相关专业仅仅培养了千余人,这些人中有很多人选择了其他与体育旅游无关的行业就业,因此学校培养的体育旅游相关人才的数量难以满足需求。这要求相关的部门要提高对体育旅游产业的重视,提高体育旅游人才的薪资待遇,增加相关的培训学习,重视已就业的体育旅游人才的职业能力的提升问题,除了对体育旅游人才的吸引培养之外,管理部门应该研究当地的地理优势、民俗资源等优势,开发出新的、更具有吸引力的体育旅游项目,针对消费者的喜好,开发体育旅游项目,这一方面可以吸引消费者的到来,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也能吸引专业的体育旅游人才以及其他领域的人才就业。由于我国的体育旅游专业主要以本科生的教育为主,因此缺乏专业的研究人才和师资力量,这要求各大高校完善体育旅游专业的教育体系,增加开设相关专业的数量,为体育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支持。我国的互联网行业高度发展,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网络大数据来考察消费者的偏好和流行指标,同时利用“双微”等新媒体的运营将当地的体育旅游项目推广到广大消费者面前,提高知名度。与此同时,要加强对相关地区的体育旅游行业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保证体育旅游人才可以在合适的岗位发挥自身的特长,促进体育旅游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以此缓解行业内的人才供不应求的现象。

### 2.3 我国体育旅游人才范畴与发展目标

根据体育旅游人才划分的依据,体育旅游人才建设和其相应的发展目标如下。

第一,行政管理人才。依照强化这一产业管理以及提升整体公共服务能力需要,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提高体育旅游行政管理人才队伍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积极地利用近几年发展迅速的互联网行业,发展当地的体育旅游行业,增强创新能力,打破固有思维,统筹建设新兴体育旅游行业,构建可以满足这一产业迅猛发展以及特殊需求的高素养、复合型专业行政管理队伍。

第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育和壮大体育旅游企业集群,构建我国体育旅游产业体系和品牌,以提升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现代经营管理能力为中心,以打造一支现代化经营管理团队为主要内容,大力促

进整个产业当中相关经营管理团队的专业化、市场化与全球化水平,构建能够指引行业创新、具备战略发展理念和社会责任感的体育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协助完善体育旅游行业所配套的餐饮、住宿、环境保护、医疗设施、从业人员培训等工作。

第三,专业技术人才。为充分挖掘和发挥我国体育旅游资源优势,推进旅游与体育的深度融合,不断扩展旅游产业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规模,将提升专业与创新能力作为中心,以高层次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和紧缺人才为培育重点,以体育休闲人才、赛事旅游市场人才、赛事旅游组织人才以及赛事旅游策划、体育旅游经营与装备设计制造和讲解等人才为重点,造就人员齐备、架构科学、素质优秀的产业发展专业化人才储备体系。

第四,高技能人才。为把体育旅游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身运动和旅游休闲需要,将扩展规模、提高职业素养与技术能力当作中心,将教练人才与高级技术人才等一线工作人员当作重心,构建较为稳固的、技术水平过硬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第五,公共服务人才。为鼓励各地将体育旅游与市民休闲结合起来,加速这类景点及周边地区的旅游集散设施、公共卫生间、路牌标示等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体育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以公共设施设计人员、咨询人员、票务人员等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显示体育旅游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公共服务人才队伍。

## 3 我国体育旅游人才支撑体系的构建

人才支撑体系即以最大程度地挖掘人力资源的效能为目的,借助国家扶持政策、市场机制、资本投入、教育培训、整体环境等要素的改善,不断建立起人才吸引、利用、培育、交流与激励等全方位的人才发展平台。保障人才达到动态平衡、生态发展的运行载体,其具备多元化、层次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等特征,既包括政府为主体的外部支撑体系,也包括以企业为主体的内部支撑体系;既包括宏观的决策层面,也包括微观的企业人力资源职能层面。本文仅就前者进行探讨。认为,体育旅游人才支撑体系包括人才预测、规划、开发、激励与流动等体系。



图1 体育旅游人才支撑体系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chart of the sport tourism talent support system

### 3.1 建立人才的预测体系对需求状况进行评估

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7号)与《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16〕85号)和《意见》为指导,以当地体育旅游产业战略为目标,结合当地宏观环境各要素的变动态势以及目前这一产业整体架构和分布格局,研究目前已有的人才存量、架构、产业分布格局、流动特征与作用发挥等具体状况,对于今后相应时期内的体育旅游人力资源的需求和供给做出预测,包括未来社会某一时期的体育旅游人力资源的需求和供给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以及人才结构、人才分布、人才流动、人才特点和要求等等因素。通过人才预测分析,既可以研究人才群体的静态状况,又可以探讨其动态发展,分析历史演变,预测将来,寻找人才群体的内在规律。体育旅游人才的预测不能脱离体育旅游行业本身,通过预测体育旅游行业的变化来有针对性的提前引进和培养相关的人才。通过对其他地区以及整个行业的研究分析体育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变动,研究当地的人员需求变动可以迅速了解当地体育旅游的发展方向,及时做好应急措施,保证体育旅游行业的人员供给量。体育旅游资源可供开发的方向有很多,郭来喜认为,凡能为旅游者提供观光游览、知识乐趣、度假疗养、娱乐休息、探险猎奇、考察研究、寻根访祖、宗教朝拜、商务交往以及人民友好往来的客体与劳务等,并具有开发价值者,均可称为旅游资源<sup>[7]</sup>。因此,要最大化的将体育旅游开发和以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像是增加龙舟、舞龙舞狮等具有观赏性和游客参与度的民俗

体育运动;定期举办与当地体育旅游业有关的知识竞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开设攀岩、登山、蹦极等惊险项目;建立以瑜伽或太极为主题的宾馆、民俗等。从而达到完善产业结构、优化人才种类的目的。这一系列的改变将面临对相关人才的需要数量更庞大、更多元化的问题,因此,做好人才掌握工作可以提前掌握人事变动,建立人才库,防止出现人员断层的现象。

人才预测,是其他环节的体育旅游人才管理决策和计划的前提和基础,为体育旅游的“供需矛盾”提供科学依据,是提高教育投资和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是达到当地体育旅游战略目标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中国到2025年体育产业要达到5万亿的目标”的重要保证。

### 3.2 构建人才规划体系,科学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

与各地体育旅游产业规划相配套的,还有体育旅游人才规划。在科学预测一段时间内体育旅游人力资源供需情况的基础上,充分注重人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运动和旅游休闲日益增长的需求,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组织设计,对体育旅游人力资源的获取、配置、使用、保护等各个环节进行策划,制定体育旅游长期(五年以上)或中短期人才规划。力求人力资源供需平衡,以确保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岗位上,获得各种必需的人力资源,保证岗有其人、人尽其才,从而实现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的最大化。人才规划需要深入的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市场的需要,同时要清楚各大开设相关专业或课程的学校学生的就业偏好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对工作的需求。为此,相关人力资源部门要及时地把握住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及时地为体育旅游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实时有效的培训工作,以满足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体育旅游行业在我国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行业不稳定,变动较大,及时地更新、培训人才,保存已有人才,是体育旅游进行人才规划的重点。体育旅游行业可以加强和相关学校的合作关系,为其培养的专业对口的学生提供实习以及正式工作的机会,合理规划人员薪酬预算,为学生们提供合理的薪资,从而提高体育旅游专业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继而提高这一专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使更多的大学愿意开设这一专业,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从从长远的角度丰富人才储备,同时,也使得人事部门进行长远的人才规划成为可能。按照人力资源的整体规划布局,把发

展目标、任务、预算、政策等当作内容,明确这一产业专业人才的能力、素质、知识构成等方面的要求与标准,进而调节整个人才的补充、实用、培育、更新等计划。事实上,人力资源方面的规划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因此还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做出调整。

### 3.3 健全人才开发体系,培养体育旅游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人才开发体系既包括人才渠道的开发,也包括人才能力的开发。人才渠道开发解决的是从哪些途径培养合乎体育旅游产业需要的人才。《指导》中指出:“积极鼓励各地区大力发展体育旅游教育产业,扶持符合要求的相关高等院校设置相应专业或是学科课程,加速整个产业的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和服务技能等人才培养。”<sup>[8]</sup>人才能力的开发解决的问题是从哪些方面提高现有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指导》中指出:“加强体育旅游从业人员培训,不断提高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鼓励体育旅游企业与体育、旅游类院校合作建立体育旅游实习实训基地。将体育旅游内容纳入导游培训体系。加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理论和实践研究,鼓励各地组建体育旅游专家库和高技能人才库,引导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体育旅游提供智力支持。”<sup>[9]</sup>开发人才能力就要组织相关的体育旅游从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可以与学校达成合作,将这些体育旅游人才带入校园,对现如今这些新颖、有效的理论进行学习。由于体育旅游人才需要较强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因此,除了学习、培训之外,体育旅游行业还应该鼓励体育旅游人才考取更多的有关的证书,比如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证书。从而达到培养综合人才的效果。现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宣传,越来越多的国外游客选择来到中国旅游,这些游客的需求更多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能体现本土特征的体育旅游项目体验上,因此大量的体现中国特色的体育旅游项目诞生,这就要求体育旅游人才首先要学好英语,保证基本的交流无障碍,并认真学习本地的传统文化和该项体育旅游项目的历史渊源,以此来吸引外国的游客消费,从而抓住这一商机,使当地的体育旅游产业更加国际化。人才开发体系将院校之中的基础教育与其他的诸如职业与在职教育等进行有效地整合。对各类人才使用相应的开发培育方式,并且借助政策法规的方式确保在培训费用与资金方面的投入,确保人才开发方面的资金基础<sup>[10]</sup>。体育旅游产业所涉及

的专业学科较多,对体育旅游人才的要求也相对全面,仅依靠学校的培养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因此这就需要其他专业的从业人员来到体育旅游行业来,比如历史、文学、心理学、旅游、经济等专业的学生或从业人员的加入,这样可以充分的满足不同岗位、不同体育旅游项目对于人才的需求。

### 3.4 完善人才激励体系为体育旅游行业提供必要保障

从目前来看,体育旅游人才为稀缺人才,远不能满足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如何通过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值得重视的课题。例如:首先从学校的方面入手,增加开设专业,国内优秀的大学可以适当采取降低分数或采取自主招生的方式进行招生,以吸引相关学子的进入,或者参考师范类专业吸引学生的措施,为其提供一定的保障、生活补助等政策,但是要求这些学生毕业后需要从事相关的体育旅游行业1—2年这样的类似政策。加强对高中生的宣传,让面临高考的同学们对体育旅游这一专业的专业设置、就业方向等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从而让这一专业进入到他们的视线,增加这一专业的热门程度。对于已经就业的体育旅游人才而言,采取激励措施,引导各类人才考取体育旅游导游员资格证书,缓解导游不足的困境;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优秀体育旅游职业经理人及优秀体育旅游企业家评选表彰活动,推动体育旅游企业完善年度薪酬管理制度、协议工资制度和股权激励等制度,使这一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更有吸引力;推动体育旅游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专业技术人才职级体系,建立和完善专业技术人才职业晋升通道;建立和完善体育旅游专业人才信息库,实现体育旅游人才的信息资源贡献,提高有关部门的工作效率,防止体育旅游人才的遗漏,增加体育旅游人才的利用率;建立省、地市、县区等各级旅游技能竞赛项目体系,积极举办各类旅游职业技术能力方面的比赛、岗位练兵等活动,建立“发现人才、识别人才、以赛促训”的机制,培养大批体育旅游高技能人才,通过这类比赛,以金钱或精神鼓励的方式激励相关的体育旅游人才提升自己;推动出台相关政策,将体育旅游高技能人才纳入地方高层次人才奖励和激励政策范围,完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政策,同时政府需要完善体育旅游行业的监管措施和体育旅游设施的构建,从而完善体育旅游产业的结构,以政府之力为体育旅游行业提供更多的保障,以此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这一行业;落实国家相关法律

及政策,完善体育旅游服务技能人才的社会保障体系、薪酬制度,改善人才环境;推动社会形成尊重、重视体育旅游人才的行业、社会舆论氛围。

### 3.5 设计人才流动体系和供需信息共享机制,不断完善服务技能人才跨区域流动配置

人才资源流动实际上属于市场经济环境之中非常常见的状况,其中不但涵盖了行业之间发生的流动,也包括地区间的流动<sup>[11]</sup>。合理流动有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尝试建立和完善体育旅游人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开发机制,健全专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的体育旅游人才市场服务体系。推动体育旅游人才工作信息化建设,推动完善旅游就业信息网络,推动建设各类网上体育旅游人才市场。推动建立健全规范化的体育旅游人才调查统计制度,开展常态化的体育旅游人才调查统计活动,定期发布旅游人才供需信息。进一步推动各级政府跨区域之间的合作,完善服务技能人才跨区域流动配置和供需信息共享机制,推动服务技能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薪酬管理制度和股权分享等激励制度,提供适当的优惠政策吸引专业技术人员向一线和欠发达地区流动。

## 4 结 语

《指导》指明:“积极发展体育旅游实际上属于不断扩大旅游产品类型、开拓旅游消费市场、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属于积极利用体育资源、促进全民健身与健康紧密结合、推动体育产业积极转型的必然结果,有利于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动力、扩大经济发展的成长空间”<sup>[12]</sup>。体育旅游发展的成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体育旅游人力资源的问题上来。人力资源无疑是在实现体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第一资源。打造优秀的专业人才支持机制,可以及时察觉人才方面存在的缺陷、有效地调节人才供应与需求状况、培养符合

要求的人才、激发人才的工作动力、优化人才的流动机制、促使人力资源取得最优分配的环境平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EB/OL]. [2010—6—6]. [http://www.gov.cn/jrzq/2010-06/06/content\\_1621777.htm](http://www.gov.cn/jrzq/2010-06/06/content_1621777.htm).
- [2] 《2015年国家体育产业规模及增加值数据的公告》[EB/OL]. [2016—12—27].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12/t20161227\\_1446406.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12/t20161227_1446406.html).
- [3] 《全经联城镇发展委员会主任林峰:体育小镇激活体育产业新蓝海》[EB/OL]. [2017—3—1]. [http://mt.sohu.com/business/d20170301/127611947\\_241989.shtml](http://mt.sohu.com/business/d20170301/127611947_241989.shtml).
- [4] 《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EB/OL]. [2016—12—22]. [http://www.cnta.gov.cn/zwgk/201612/t20161222\\_810129.shtml](http://www.cnta.gov.cn/zwgk/201612/t20161222_810129.shtml).
- [5] 李燕军,魏红涛.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8(2):25.
- [6] 邓凤莲,于素梅,武胜奇.我国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支持系统与影响因素[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6(2):8.
- [7] 张攀.《易剑东:体育产业5年内需填170万人才缺口,体制内15万从业者是稀缺资源》[EB/OL]. [2016—12—27]. <http://www.jcxg.net/a/675081.html>.
- [8] 陈刚,乔均.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M].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12.
- [9] 褚贝,陈刚.旅游业“人才安全”问题探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9(5):132—136.
- [10] 吴玲敏.浅析体育旅游人才的培养创新[J].人才资源开发,2016(8):52—53.
- [11] 武洋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人才支撑体系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7.
- [12] 杨强.中国体育旅游研究20年:述评与展望[J].中国体育科技,2011(9):90—100+115.